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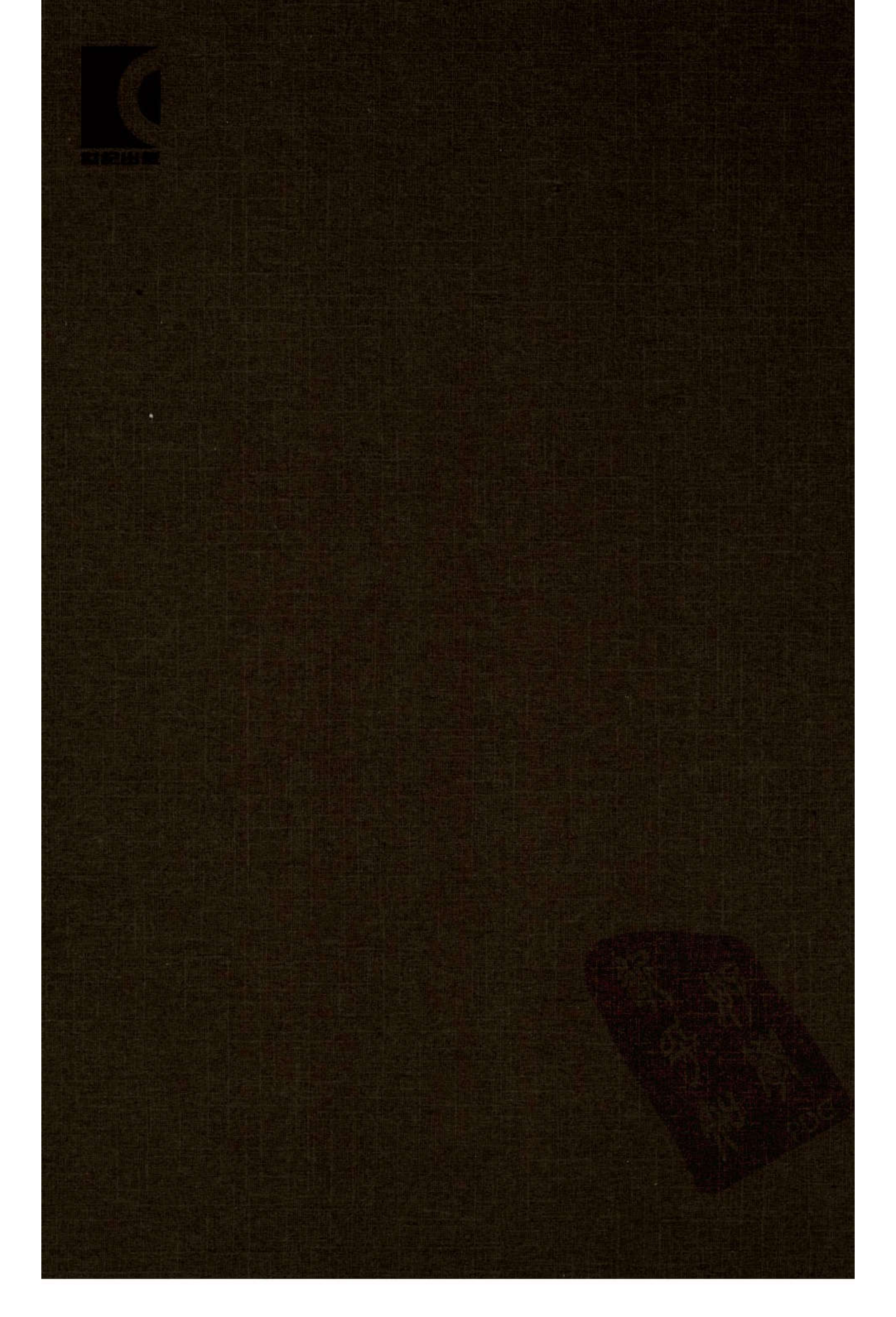
陳獨秀

主　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　华

1932–1942

第五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五卷

1932–1942

主　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　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1932年1月6日) …… 1
由反日到反国民党(1932年1月17日) …… 5
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1932年1月20日) …… 10
讨论栏——原则问题的争辩向党内公开(1932年1月28日) …… 20
致蔡元培函(1932年3月24日) …… 21
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1932年4月16日) …… 22
论国民会议口号(1932年9月1日) …… 28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1932年11月17日) …… 38
致灵均女士信十二封(1932年11月—1933年4月) …… 45
致胡适(1932年12月1日) …… 56
《一个新闻记者的杂评》跋(1932年12月26日) …… 58
辩诉状(1933年2月20日) …… 60
上诉状(1933年6月15日) …… 65
致汪原放信四十二封(1933年6月—1935年3月) …… 70
再抗辩书(1933年7月7日) …… 107
几个争论的问题(1933年10月8日) …… 109
致蔡元培函(1933年11月1日) …… 116
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1934年5月15日) …… 117
金粉泪五十六首(1934年) …… 119
附:简释《金粉泪》五十六首(陈旭麓)
赠望江吴幼卿联(1934年) …… 138
致胡适(1935年2月14日) …… 139
为刘海粟题字(1935年秋) …… 140

题刘海粟作古松图(1935年) …… 141
致蔡元培函(1936年2月7日) …… 142
中国的一日(1936年9月) …… 143
自撰遣兴联(1936年) …… 144
老子考略(1937年6月1日) …… 145
为潘玉良画题词(1937年初夏) …… 158
致陶亢德(1937年7月8日) …… 159
致蔡元培函(1937年7月24日) …… 160
致《申报》馆编辑部(1937年8月25日) …… 161
给耕野的三封信(1937年9月8日、9月14日、9月16日) …… 162
孔子与中国(1937年10月1日) …… 164
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1937年10月2日) …… 174
抗日战争之意义——十月六日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
(1937年10月6日) …… 176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1937年10月10日) …… 181
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一九三七年)
十月十五日在汉口青年会讲演(1937年10月15日) …… 182
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1937年10月16日) …… 188
和斠玄兄赠诗原韵(1937年10月) …… 193
致亢德(1937年11月3日) …… 194
打倒消极先生(1937年11月8日) …… 195
“言和即为汉奸!”(1937年11月9日) …… 197
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1937年11月11日) …… 200
实庵自传(1937年11月11日、11月21日、12月1日) …… 201
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1937年11月21日) …… 212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1937年11月21日) …… 215
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 …… 216
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十一月在武大讲演(1937年11月21日) …… 218
题赠甲原先生(1937年12月24日) …… 222

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 年 1 月) …………………………… 223
抗战到底(1938 年 1 月) ……………………………………………… 226
为自由而战——在武昌艺专讲演(1938 年 1 月) ………………… 227
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在汉口市立女中讲演(1938 年 1 月) …… 229
《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1938 年 2 月 18 日) ………… 230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1938 年 2 月 19 日) …………………………… 231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1938 年 2 月) …………………………………… 233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1938 年 3 月 5 日) ……………… 235
致《新华日报》(1938 年 3 月 20 日) ……………………………… 240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
　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1938 年 4 月) ………………………… 242
抗战与建国(1938 年 4 月 25 日) …………………………………… 244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38 年 5 月 15 日) …………………… 247
我们断然有救(1938 年 6 月 5 日) ………………………………… 249
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1938 年 6 月 10 日) … 251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七月十四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
　(1938 年 7 月 14 日) ……………………………………………… 253
民族野心(1938 年 7 月 16 日) ……………………………………… 255
论游击队(1938 年 7 月 21 日) ……………………………………… 258
说老实话(1938 年 7 月 27 日) ……………………………………… 260
敬告侨胞——为暹逻《华侨日报》作(1938 年 8 月 1 日) ……… 262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1938 年 8 月 2 日) ……………………… 264
我们为什么而战?(1938 年 8 月 8 日)……………………………… 266
致松年(1938 年 8 月 9 日) ………………………………………… 269
资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1938 年 8 月) ……… 270
“八一三”(1938 年 8 月 15 日) ……………………………………… 273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1938 年 8 月 21 日) …………………………… 275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938 年 8 月 24 日) ……………………… 278
抗战一年(1938 年 8 月) …………………………………………… 283

致郑学稼信八封(1938年9月12日—1942年4月20日)…………………… 286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1938年10月12日)…………………………… 292
致托洛斯基(1938年11月3日) ……………………………………………… 295
致杨朋升信四十封(1939年5月5日—1942年4月5日) ………………… 299
致台静农等人信二十九封(1939年5月—1942年2月)…………………… 319
简孤桐(1939年秋) …………………………………………………………… 332
附:答陈独秀
赠程里鸣联(1939年下半年) ………………………………………………… 333
告少年(1939年12月)………………………………………………………… 334
赠太虚法师联(一九三七年底)……………………………………………… 336
书赠胡子穆先生(1939年)…………………………………………………… 337
挽方守敦联(1939年)………………………………………………………… 338
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1939年)…………………………… 339
朋升夫人和平女士寄纸嘱书手册,即奉一绝(1939年) ………………… 340
赠台氏父子(1939年)………………………………………………………… 341
寄沈尹默先生………………………………………………………………… 342
给西流等的信(1940年3月2日、4月24日) ……………………………… 343
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作于四川江津(1940年3月24日) …… 347
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 350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 352
我的根本意见(1941年11月28日)…………………………………………… 358
贺邓蟾秋先生七十大寿联(1940年)………………………………………… 362
病中口占……………………………………………………………………… 363
寒夜醉成……………………………………………………………………… 364
独秀书来促写杨鹏升父墓表(1941年初) ………………………………… 365
给Y的信(1941年1月19日)…………………………………………………… 366
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 367
春日忆广州(1941年3月24日) ……………………………………………… 369
闻屈原祭日友人聚饮大醉赠建功(1941年7月) ………………………… 370

悼老友李光炯先生(1941年夏) …… 371
挽大姊(1941年7月中旬) …… 372
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1941年秋) …… 374
题“朴园收藏”(1941年12月) …… 375
对月忆金陵旧游(1941年) …… 376
漫游(1942年1月7日) …… 377
郊行(1942年春) …… 378
致朱家骅(1942年1月29日) …… 379
附：朱家骅致陈独秀
朱家骅致陈布雷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 …… 381
致欧阳竞无(1942年初) …… 388
赠罗宗文联(1942年3月) …… 389
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 …… 390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5月13日) …… 395
给Y的信(1942年5月13日) …… 399
《后记》与信(1943年4月19日) …… 400

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

占据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致命必死之争，英法美各帝国主义，各以其利害关系，都只能为见好于日本而牺牲中国，这总算得是铁一般的事实了吧！

这种铁一般的事实，不但把国民党政府及一般高等华人向国联及美国主持公道的乞怜，打得头昏脑晕！就是有些人称为满洲问题会引起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特别是日美冲突这一死板公式，也被这种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

一般的说来，帝国主义之自身就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而发生的，它一发生更增加了矛盾冲突的高度与速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有随他们自身之消灭而消灭。可是帝国主义并不是今天才产生，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若沿着一直线而进行，他们早已自行消灭了。世界变动不会这样简单，所以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曾经酝酿了多少年才实现；第二次大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一般的说来，也是日益走近了的，好比人之自出生便日益走近了死亡的日期。若是毫无理由的对于随时随地任何事变之发生，都拿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所酝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美冲突所酝酿的日美战争这类前途当做现实，万应药一般的应用，这种革命的烂〔滥〕调，这种死板的公式，将不止一次被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

所以在最近时期，我们还不会看见各帝国主义因满洲问题以至中国问题，由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至于战争，而只会看见他们共同的并各〔个〕别的随日本之后尘，加紧侵略奴役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它占领锦州后，满洲问题即入建设时期。日本在满洲的胜利，即一切帝国主义无形瓜分中国之序幕，亦即中国殖民地化之序幕！

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样的局势，将取如何的态度呢？

有许多痴人，曾伸长颈项盼望国民党宁粤统一以后，会有办法来共赴国难；现在已经统一了，新政府已经正式成立了，有了什么办法呢？

首先看他们的一中全会宣言有什么办法没有？宣言中的办法是：(一)召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议，为的是要“人民与本党之步骤一致”；(二)“努力肃清赤匪”，压迫工农参加生产，认为“腹心之患甚于外敌”；(三)“应用外资”实现“总理实业计划”！这就是所谓“国难期中救亡必要之图”！此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在一中全会上，蒋派的文武代表一致反对主战，全会默无一言。张学良撤兵，锦州失守，南京政府一概装作不闻不见。

真正国民党政权，已不在南京，而在蒋介石派的九省联防，胡汉民派的西南五省联盟及北方的冯阎联合这一鼎足三分的势力，这也就是他们屡次所宣布的“精诚团结”；国民党所有的军人，对外都一致反对主战，这就是他们的一中全会宣言所大喊的“人民与本党之步骤一致”和“一致对外”；然而对内他们却准备重新屠杀与火并，这就是他们的宣言所大喊的“腹心之患甚于外敌”。

他们准备对内的屠杀与火并，即或因财政的困难而暂时延缓，至于对外，他们当中的任何派别任何个人，都不会走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他们在野时，也会说点较左的话，骂骂张学良，并且还主张开战：一旦在朝，马上向右转，至多只说上“备战”(如冯玉祥便是一例)，因为备战与否没有人看得见，永远是可以空言欺骗的。

他们既不主战，又不能再拖延下去，当然只有交涉，或者是直接交涉或者乞怜于调查团间接交涉，或者是双方并进。总之，同样是城下之盟！

不抵抗而交涉的结果，等于是战败的结果，我们是可以预见的。和东北派接近的胡适自始就主张牺牲东北，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陈友仁也自始就认为满洲问题对日本须有经济上的让步。胡适在北平主张组织“对日让步研究委员会”，所谓让步，大概也和陈友仁的意见无甚出入。犬养内阁也说“不要满洲只要条约”。这可见中国政府及一切高等华人，已和日本帝国主义心心相印了！

由中国承认袁政府二十一条的中日条约，承认段政府和蒋政府一切密约，承认熙洽、张景惠，□式毅，所允许的一切让与契约，解决三百余件悬案，由中国把实际的满洲送给日本，由日本把空名的满洲交还中国，这便是犬养毅所谓“不要满洲只要条约”。陈友仁还准备把整个的满洲的经济即实际的满洲让给日本，在政治上再承认满洲不驻兵，所换得的条件便是日本将军队撤退至满铁区域和由中国政府得任命双方同意的东三省长官，如此而已。日本帝国主义所要的是实际的满洲，一时撤兵不撤兵无关重要，实际的满洲一到手，撤兵与不撤兵都随时依着它的需要而自由行动；撤兵至满铁区域，更是滑稽的事。双方同意的长官，自然非亲日派莫属，中国政府的任命，不过是一个空名，到这时，无耻的陈友仁，无耻的国民党，会拿已经办到“日本撤兵”和“收回失地”来欺骗人民，来强制人民停止一切反日运动，高谈中日亲善！其实，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办到所谓“日本撤兵”，所谓“收回失地”，实质上是等于割让了满洲！

日本帝国主义从国民党手中取得实际的满洲之后，其影响于整个的中国者，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领土与主权，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的重要原料（如煤铁木材大豆等），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商品的市场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移民的出路，更重要的危险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或迟或早的，用公开的或秘密的各种软硬形式，经过国民党政府这一“买办头”之手，取得类似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众日益供他们的奴役。中国由现在半殖民地地位（什么“次殖民地”，真是胡说乱说）降为殖民地，便是亡国！那时即仍有各派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便等于是现时印度的各王公。

安心做印度王公的各派国民党，不但现时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广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杀反日民众，即亡国后，他们这班小朝廷儿皇帝的党国要人，仍然是各帝国主义压制中国民众的工具，和印度各王公反对印度民众对英国的革命运动一样。

将来受亡国痛苦的，不是国民党要人和一般上层的绅商学者名流，而是下层的劳苦民众，他们是不会默然让卖国的国民党，安然的由出卖

东三省以至出卖全中国的，他们是要不断的为爱护他们自己的国家为爱护他们自己的生存而起来奋斗的。只有他们的奋斗才能够决定中国的运命，也就是决定他们自己的运命。

民众奋斗的方式，应该是继续现时的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不断的加深与扩大，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这一革命的国民会议，是不能而且也不会由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它应该是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同时也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它不应该是一一四八年德国高谈法律和专做决议案的法工闻克佛国民会议，它也不应该是现时印度半革命半妥协的国民大会，它应该是一七九三年法国雅谷宾党人领导的国民会议，是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总机关。它的国内拥护者，将是成千万成万万的工人贫农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它的国外同盟者，将有整个苏联和广大的印度革命民众。即这一同盟已据有东半球一半以上的土地与人民，已足与帝国主义周旋了，此外还有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声援，我们并不是孤立呵！

除了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救国即自救之道呢？

全中国的民众们！奔赴革命，或是准备当亡国奴，此外还有什么道路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

《热潮》第六期　署名：顽石



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

调动国家所养的百余万军队之权在国民党政府手里，正式征收赋税以供军饷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管理全国兵工厂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代表国家宣战讲和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其他一切高居人民之上的权力机关：警察，法院，监狱，也都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如果真要实行反日而不是说空话，必然要利用这些物质的力量才行，决不是贴贴标语和打打通电可以济事的。

自九一八日军侵入国境以来，国民党政府不用它手里的一个军队去抵抗日军，而用之镇压反日民众，屠杀爱国学生和“剿赤”；不用它手里的赋税收入储为对日战争的军饷和接济反日的军队(如马占山的军队)，而用做开他们党的大会，豢养鹰犬(如在上海汉口等处，除地方侦缉机关外，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直接遍设穷治敌党的侦探机关和豢养敌党叛徒的机关如“苏俄评论社”和“光明之路社”等等)，以及个人的肥私与滥费(例如蒋介石购自用飞机一架花了二十八万元)；不用它手里的军器武装民众(对上海等处的学生义勇军不发一枪一弹)，而用做扩充个人私有的军队(例如扩充蒋系的宪兵以牵制陈铭枢的军队)；不用它手里代表国家的权力对日绝交宣战，而用以向国联乞怜和准备向日本订城下之盟；不用它手里的警察，法院，监狱，以惩办亲日卖国的官僚奸商和逃将，而用以逮捕审判拘禁爱国学生，日货检查员以及革命的工人与青年。

以上这些事实有如白日经天，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叫真心要反日救国的人民，如何能够“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如何能够只做反日运动而不反对国民党政府！

不但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政府是客观的必然，无论人们愿意

不愿意这样做；并且，反国民党运动之发展必然和反日运动之发展成为正比例。民众反国民党运动发展之前途，亦将与国民党镇压反日运动互为因果，因为国民党愈看透了反日运动与反国民党运动之连环性，它愈要镇压反日运动，它愈镇压，民众愈要反对它。

或者有人认为这两个运动开始时虽然有它的连环性，未必长久都会连环的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国民党既然看清了这两个运动的连环性，它便会自解其连环，即停止镇压反日运动，代以努力领导反日运动，则反国民党运动和反日运动，还会并行的存在吗？

这仅是形式的假定，而不是实际。国民党不能自解这两个运动之连环性，是受了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之限制。

今天已是二十世纪之三十年代了，国际帝国主义已垄断了全世界的筵席，到来得太晚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有德意志和日本资产阶级那样的幸运，由它在推翻旧的封建统治斗争中，组织成它自己的武力和政权来统一国家而使之对外独立自主，得以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由发展国民经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鸿运，最可能是太平战争时代，其次便是李鸿章时代，最后而已经难能是经过中日战争后的戊戌维新时代，其后更经过辛丑条约，它已经没有这样的运命了。辛丑条约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筑成了坚固的堡垒；非冲破这一堡垒，所谓“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国民经济自由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堡垒，不是某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某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关系，简直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于公共殖民地之关系，同时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对于宗主国之关系；所以中国民族冲破这一堡垒的斗争，已化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民众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一部分，即世界社会革命斗争之一部分，不能够像前世纪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那样简单。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采取了这样的公式：反抗一二强邻 + 摧毁国内封建制度 = 民族解放。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要想得到胜利，必须采取下面的公式：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 在资本家地主压迫下工人的农民的阶级斗争 = 民族解放。为什么？乃因为前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它为历史的等条件所限制，不能组成强大的力量，它根本没有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意志与能力——

它自身的阶级利益连系于帝国主义而反于工农，成了代帝国主义压制摧残工农民众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伟大力量之工具，这便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所以只有镇压反日运动而不能领导反日运动之根本原因，也就是它不能自解反日运动和反国民党运动的连环性之根本原因。

孙中山所领导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在推翻清帝统治这一点，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整个的此次革命中，没有一点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工农民众解放运动，这两大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特点，在当时的革命纲领中竟没有一字提及，这就是那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之反革命性，也正是那次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

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最初阶段，国民党为了骗取苏联的帮助好打击它的政敌——北洋派，以取得中央政府的地位，不得不打出反帝国主义和扶助工农的旗帜。北伐军在胜利的半途，国民党即露出其本来面目，转过枪头来屠杀工农民众，向帝国主义投降。它妄自以为已经不需要工农民众的力量，不需要苏联的帮助，它自己已经有力量可以组织军队与政权；它妄自以为拿它的反赤军队反赤政权的资格向帝国主义纳降，必能获得若干赐予。其实，在流产式的革命中，它并未能组织成有力的军队与统一的政权，它一离开工农民众，一离开革命，立刻变成一个软弱无能的东西，它以和各派军阀官僚妥协代替了革命的统一，以向帝国主义哀求谈判代替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其结果，它所遭遇的不是统一而是军阀战争，不是帝国主义的让步而是济南惨案，万宝山惨案，朝鲜华侨惨案，以至最近东北三省之占领，热河之进攻，天津青岛福建之扰害和老西开之占领。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这些不断的暴行，照例是“不抵抗”，它所最得意的政绩，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广州屠杀工人，在长沙屠杀农民，以至几年以来，继续在粤、桂、闽、湘、鄂、赣、豫、皖等省屠杀争取土地的农民，一直到最近的滔天大水灾都阻止不了它征剿农民军，空前的日本暴行都阻止不了它在上海广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杀反日的市民与学生。

国民党为什么这样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同时又这样疯狂的屠杀民众呢？这两件事也有其必然的连环性：一切统治者，一切上层阶级特

别是他们的领袖们，第一天不相信民众，第二天就要离开民众，第三天就要害怕民众，第四天就会仇视民众以至屠杀民众；它既然离开了民众，便不得不投降帝国主义，否则在空中一无所恃而不能生存了！投降了帝国主义，便不得不屠杀民众，帝国主义不允许它有中立之余地。即最欢喜找中间道路而终于不曾找着过的汪精卫，最近也承认国民党只有因宣战而灭亡或因讲和而卖国之两途，既穷于中间道路之发明，所以只有不宣战而卖国了。像这班宁可卖国以救党的人们，不用说是“民族之叛逆”；就是一班号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中等华人，奔走呼号“宁粤统一”、“汪蒋胡团结”，也算是“准叛逆”！这班“准叛逆”所奔走呼号的，不是救中国，而是救卖国的国民党！

这班“准叛逆”，即不痴心妄想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至少也痴心妄想它不在承认所谓五项基本原则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其实，这完全是“痴人说梦”！日本所谓五项基本原则，国民党政府早已实行过了，或是在行动上答复过了，外交形式上的承认不承认有多大关系呢？

第一项，日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南京政府曾请求日本济南撤兵延缓以抵制冯玉祥；湖南湖北省政府曾请求日本炮舰轰击长沙和黄石港的“赤匪”，这不是早已承认了日本有保障中国领土之义务吗？

第二项，取缔排日排货及排日教育。“镇静”和“切实保护日侨”，国民党政府早已三令五申；最近天津及福州，都已明令禁止反日运动；上海，广州和湘潭，都枪杀过反日民众；上海法院惩罚过日货检查员；教育家竭力提倡“救国不忘读书”，“埋头读书即是救国”，“科学是救国要图”这些理论，甚至由学校通知学生家属“如来校读书，不准再作爱国运动”（一月十五日《申报》本埠增刊）。这不是根本铲除了排日教育吗？

第三项，确保在中国日人居住营业旅行之自由。国民党政府既然三令五申“切实保护日侨”，这些所谓在中国的日人之自由，都已经不成问题，并且事实上，在上海的日本人且有聚众示威之自由；在青岛的日本人且有聚众焚毁国民党党部和报馆及放枪示威之自由，事后，国民党的市政府还向日本人道歉；在福州的日本人且有当学生开会时撕毁标语开枪示威之权，同时因日人水户夫妇二人被杀（自杀或暗杀尚不可知），国民党的省政府对于日人各项要求：（一）将肇事学生送交日领署惩办，

(二)公开谢罪,(三)取缔全省反日运动,(四)撤销反日会及一切反日机关,(五)将全市反日标语全部洗刷,(六)赔偿抚恤,已如何解决,诿为"外交秘密未便发表"。而悬赏万元购缉凶手,抚恤水户夫妇四万元,封禁东方新潮两报和禁止反日运动,则是公开的事实。这不是确保日人之自由是什么?

第四项,确认所得权利,履行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本来是共党的主张,国民党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不止一次宣布遵守条约,它只主张由合法的外交程序请求修改,并不主张根本废除;即最近否认所谓一九〇五年的中日密约十六条,也只是否认该密约之存在,而不是宣布废除,那么一旦日本政府证明其存在(如电通社十五日东京电日外务省所发表),国民党政府怎么办呢?不用说是确认日本所得权利了。

第五项,保证南满铁路之安固。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胆量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则一九〇五年的十六条和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都继续有效,这不是充分保证了南满铁路之安固吗?

所以,除了一班"准叛逆"以外,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即令它一时还不肯在外交形式上承认日本的五项基本原则,也只是一时遮掩这个事实,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所以,我再重复说一句,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

一月十七日

1932年1月23日 《热潮》第七期 署名:硕石

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①]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用了列宁《两个策略》第一章的标题，当时他所指的“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第一章开端所说的一段如下：

“我们目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这问题应怎样解决，意见极不一致，现在正形成三种政治倾向，即：

“（一）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国民大会之必要，但极不愿意这个大会成为一个全民的立宪大会，若按报纸所载关于“蒲力根委员会”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所同意的会议，是在选举的时候不准宣传自由，选举的资格必须以财产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狭隘的阶级制为标准。

“（二）革命的无产阶级既受社会民主派的指挥，则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要达到普通选举权亦不仅要达到宣传之完全自由，而且要从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的政府。

“（三）自由资产阶级，拿‘立宪民主党’的首领作工具以表示自己的愿望，不要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张临时政府的口号，至于怎样保证选举完全自由正确，怎样保证代表大会使之成为真正全民的代表大会，使之成为真正立宪的代表大会，这些问题的实际办法，是自由资产阶级所不主张的。实际上，自由资产阶级是现在‘解放派’唯一的社会力量，它只想使沙皇与革命民众间之政权问题，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同时，这种和平解决的结果，要使资产阶级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众（无产阶级与农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

① 本文撰写于1月20日，成文后，即散发。因此在未正式发表之前，1月25日《红旗周报》第29期即发表两篇文章批评陈独秀的“民众政权”口号。

列宁在分析这三种政治倾向之后，就表示多数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

"现在不同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即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我们处这样时期的俄国，自然不能'仍旧贯'，'食古不化'了。

"已经开始的俄国革命，已造成一新局，这新局面就是绝大多数的民众表示绝对不能与沙皇政府相容……民众若已经表示与现政府不能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则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就应当想想，拿什么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要建立一'真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仅只叫这代表大会为立宪大会还不够，亦必使这大会有权与力来'立宪'，决议案因觉悟到这点，故不尽限于'立宪大会'之形式上的口号而且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大会真能执行自己的责任。这种条件的指示，使口头上的立宪大会，能成事实上的立宪大会是必要的；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如君主立宪党）总是有意的曲解'全民立宪大会'的口号，使这口号成为口头的空话。

"'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于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总是不显明的提出来；在这时候，我们应当把这问题看作是目前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时，他批评少数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

"孟雪维克派和新火星派的临时大会，犯了与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错误。解放派常在口头上说些关于'立宪'大会的话，同时无廉耻的闭住眼睛，不看见力与权是把持在沙皇的手里，忘却了要'立宪'便要有实力来立的问题。……临时大会忘却了，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决议都好，都会与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时历史上有名的佛兰克府国会的'决议'一样，只是成为一种可怜的具文……马克思在其《新莱茵报》中曾用极激烈的讽辞怒骂佛兰克府的自由主义的'解放派'，说他们只在口头上说了些好听的话语，采取了民主主义的各种'决议'，'规定了'各种自由，但在事实上却把政权放在国王的手里，自己没有组织武装实力以与受国王统治的军队力量战斗。佛兰克府的解放派还在唱空调时，国王已得了空间的时间，巩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反革

命乃得凭藉实际力量把民主派及其一切好看的'决议'打得粉碎。

"临时大会派向我们提议，把今后的革命好好的分成阶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机关；(二)这个代表机关在民众威迫之下，'决定'组织立宪大会；(三)……关于第三阶段，孟雪维克派还未能商量定妥。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和共和政体的问题，从未在决议案中找得机会说一说。

"把代表机关的'决议'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之彻底胜利'。

"临时大会在策略上所提的口号，与'立宪民主政党'即要求君主政体的资产阶级政党所提出的口号相符合……你们实际上就变为解放派的尾巴了。"

我征引这许多话，并不是说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目前的中国完全相同，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采用当时俄国多数派所提的同样口号：临时革命政府与共和政体；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两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说目前的中国和当时的俄国局势有某些类似的重要点即列宁所谓"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今天中国的多数派，在今天的国民会议斗争中，对于统治阶级，应该采取当时俄国多数派同样的态度。

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已动摇了沙皇统治的威信，并且因为战败后市场之缩小，财政之紊乱和人民购买力之降低，若不迅速清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俄国大工业已不能继续生存，沙皇的专制政府若不加以资本主义的辅助，也已经不能支持下去。所以，政府以前极力反对召集的那相信限制沙皇威权对于地主资本家是不利的乡绅会议，也不得不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召集了；以前有人一开口提起宪法便算是政治犯，在十二月的政府官报上，还禁止在公众大会上提起宪法的问题，一九〇五年正月九日(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沙皇用屠杀请愿工人的手段，打碎了它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最后的信仰。从此正月、二月、三月，这三个月中，工人的罢工运动和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知识界各种自由职业团体的活动，风起云涌的扰乱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秩序，沙皇政府眼见不能同时敌对两种势力(工人与资产阶级)，于是羁縻资产阶级以专力对付工人之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遂在俄国史上破天荒的

应运而生了；同时资产阶级的政党把宪法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已经不算是“放肆”而算是“稳健”了；并且在激进的群众中还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政府”和“共和国”的口号。

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作于一九〇五年七月，他认为那时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认为“大多数的民众表示绝对不能与沙皇政府相容”；主张“要推翻沙皇政府”；主张“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大概不能算是犯了“史大林派”的盲动主义吧！

现在中国是怎样的局势呢？

国民党政府在工人群众中的信仰，早已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四一二”屠杀中打破了；在农民中的信仰，早已在长沙马日事变及其后这几年粤湘鄂赣等省的“剿赤”战争中以至去年大水灾中打破了；剩下来的学生群众，亦在最近南京的“一二一七”血案中，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仰更是扫除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内部的连年战争，不但与民众的利益绝对不能相容，并妨碍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同时就是更加掘溃了它自己的政权统一之基础；因此，所谓“党治”、“训政”、“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些国民党的信条，不独各阶级的人民不相信，即他们自己也丧失了自信心。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国民党政府虽然不曾战败，它的不战而屈服于日本，在人民面前所丧失的威信，比俄皇政府被日打败还厉害几倍。它在宁粤统一后反而陷首都于无政府状态的今天，就是国民党要人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已至非常危险时期，汪胡蒋如不来京，一切对内对外问题均无法应付。”(居正)“中央政府成立已十数日，迄今无声无臭，无以对国民……看现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渐至水尽山穷……听其沉顿下去，即将无声无息的完了。”(陈铭枢)“国事危急至此，实为本党能否负起救国责任最后一次之试验，科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前次以全党团结救国宣示国人者，今竟无以答国人矣。”(孙科)“尤不忍见先君，艰难缔造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竟日就于破碎支离不可收拾之险象。”(孙科)

全国学生的反日运动已走到反国民〔党〕运动，自南京的中央党部以至上海的市党部，北平的市党部，山西的省党部，陕西的省党部，浙江

的省党部，汕头的市党部，江阴的县党部，都被学生群众捣乱了，致陈公博主张要把党部秘密起来。在北平示威团中，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杀学生游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有些激进青年的报纸（例如《上海日报》）已提出“民众政权”和“革命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府”等口号。

上海各大报，除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外，一向是等于半官报的新、申、时三报，也不完全站在政府方面；至于无数的小日报和旬刊周刊，无不一致公开的攻击国民党之只顾关内争夺权位而不向外抵抗日本，国民党所奉为“国母”的宋庆龄，更是公开的发表宣言，直认国民党宁粤两方，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并且直认“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国民党主张它一党专政，对政治却无办法，特别是对日问题；它如果自认无办法，便应该将政权还归人民；这已经是普遍的声音。

国民党的统治确是难以支持下去了；中间分子的势力虽然还未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对于国民党的依赖确已大大的动摇了。目前所缺欠的正是工人斗争的进展，但是我们当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闭着眼睛说些不能欺人只是自欺的大话，说中国工人斗争已经如何如何的高涨；然而据各国革命史的先例来判断，也不能否定在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继续发展中，工人斗争会在最近期内缓慢的或突然的高涨起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开始而不是终结，并且距终结还很远，即令中途有暂时的顿挫，如俄国一九〇五年夏天一样；因为国内国外的条件，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奋起而复归于决定的惨败，国民党资产阶级决不能得到重新稳定的机会。

我们还应该承认，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的内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蒋阎冯战争中，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已经不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我们固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不待和城市工人斗争之汇合，拿孤立的农民武装队（红军）作攻打大城市（如武汉）的冒险企图；同时，也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所不能消灭的势力，并且还未继续削弱它的军事势力，如最近孙连仲二万余军队之归附“红军”，在北方开始发展的反日义勇军将

又会形成包含多量农民的一种新军队。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比俄国一九〇五年较有利的环境。

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固然还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各有其长所与短所:中国党过去在群众中是有威权的,而其历年错误的政策则为群众所失望,俄国的党则恰正相反;至于分裂的缺点则彼此相同,在政治水平上,中国党自较俄国的党为低,而在农民和军事势力方面则较强。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民众若已经表示与现政府不能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则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就应当想想拿什么政府来代替现政府,而不应当企图使国民党与革命民众间之政权问题仅可能的和平解决。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不仅予以民主任务(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民族独立等)的内容,而要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会议真能执行它自己的责任,即真能解决民主任务而不是一句空话。这种实际条件即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这才是我们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真实意义。

国民党政府(无论是某几派合作或蒋介石复辟)所能召集的国民会议,为要维持它的一党专政,必然尽可能的限制选举资格和宣传自由。

派别资产阶级的政团(例如正在开始形成的"宪政促进会"他的领袖是孙洪伊、张耀曾、褚辅成、罗家衡等四国会人物)他们并不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也不要求真正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由宣传完全自由和选举完全自由而产生,他们只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们希求恢复从前的国会,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他们只希望国民党觉悟,容许他们以人民代表名义参加政权而已。此外如第三党他们也赞成普遍选举和宣传自由,但他们未曾实际计及,如果政权仍在国民党手里,即令在他们所认为国民党最左派的手里,将怎样保证选举和宣传之完全自由,怎样保证国民会议能以成为真正民众的代表大会并有全权解决民主任务。在国民党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只有资产阶级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众

(工人与贫农)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或一无所得。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则不仅要达到普遍选举,不仅要达到宣传之完全自由,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

"革命的民众政权"是什么?史大林派当然认为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则认为应该是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便向群众解释:只有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才真正是"革命的民众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认为革命的民众政权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应该径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们又认为目前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遂认为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遂认为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可是为免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概念之混乱,无出路,我以为须认明这个问题之提出应分别三种场合:(一)规定在党的纲领上,(二)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三)由党实际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一)是不成问题,(二)目前当然不是时期,(三)则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目前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若是"仍旧贯"、"食古不化",在群众中对国民会议的口号不加以革命的解释;不领导群众为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而斗争;不以推翻国民党政府夺取政权的路线指导群众;不告诉群众:政权握在国民党之手,任何国民会议都不能解决民主任务;则我们左派反对派所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将真如列宁所骂"与立宪民主党所提的口号相符合,实际上就变为解放派的尾巴了"!

并且,目前的实际政治生活已使群众自发的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我们还是像一九二七年一样,跟在群众后面制止他们"过火"呢,还是学国民党要人的口吻责备他们"行动越轨"!?

或者有人认为俄国的一九〇五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和现在的中国相提并论。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主张"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为的是实现共和政体,我们的第三次革命,应该走俄国一九一七

年十月的道路，应该主张“全部政权交苏维埃”，说这样话的人，会有好几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列宁估量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这当然没有了解列宁并不曾简单的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他曾提出“工农专政”的口号充实共和政体，他又曾解释“工农专致”“有其过去与将来两方面的”；至于托洛斯基和列宁意见之不同，则不必要在这里缠夹着讨论。

又一种是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的条件之下，才能主张“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那么在革命运动已开始发展国民党政权已开始动摇的今天，以至更发展更动摇的明天，同时中心城市的苏维埃还没有，组织暴动夺取政权实现第三次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我们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是否应该而且可以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政府呢？如何答复群众提出推翻国民党政权后拿什么代替的问题呢？如果群众问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可以解决民主任务，还是在民众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可以解决民主任务，我们又如何回答呢？如果回答说：解决民主任务是将来第三次革命全部政权归到苏维埃时的事，现在的国民会议运动，只是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做做要求宪法自由的和平运动。这样的国民会议，至多只能做些向政府要求解决民主任务的决议案，而没有权与力能够执行自己的决议。像这样的对于托同志所云“革命民主要求”和“解决国家最要问题”的国民会议口号，加非革命的解释，正是把我们自己总的政治口号降低到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水平线□□□革命运动已开始发展中的急进的群众向后退，而不是用自己总的政治口号把一般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线。如此，则党内党外许多革命分子指摘我们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口号是落后的，便不能算是全无理由了。

或者又有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要求实现共和政体，而是要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其创造一个争取政权的国民会议，不如创造一个争取政权的苏维埃；更直率些说，就是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共产党，不需要什么“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少在革命斗争已开始发展的现在便不需要它了。这一意见表面上似乎是正确的，而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我们认为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并不是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

东西，我们应该为创造我们的国民会议而斗争，当然还应该为创造我们的苏维埃而斗争，只有在两个斗争过程中，看那一个真是我们的，我们才发出全部政权交那一个的口号，实现我们的“十月”。可是创造苏维埃——工业中心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尚需一个时期，国民会议运动却迫在眼前了。并且即在将来的发展上，国民会议运动更富有全国性的作用之实际可能，如果我们机械的把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对立起来，把后者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认定它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那就是认为托同志所云：“在这(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的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暴动。”“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团结贫农于自己周围并拿联合的进攻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苏维埃政制将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这些前途都是不会有的了。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在现有的苏区以外，固然可以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苏区内则用不着，因为那里已经有苏维埃政权。这也不很正确，即令农村中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而毕竟只是农村苏维埃政权，而不是统治城市阶级的政权，尤其不是全国性的，没有城市阶级(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之领导，农民的游击队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术行动，以建立全国性的政府，现在显然还没有工业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可以号召全国，如何能拿现时的农村苏维埃来代替国民会议之全国性的作用。并且据托同志的估计，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实现之后，召集国民会议还是必须的。现时农民运动中虽然挂上了苏维埃的招牌，而在农民意识中模糊的苏维埃口号，和我们所要创造的苏维埃还并不是一个东西，他们所真能了解的东西，苏维埃远不及国民会议，尤其是苏区以外农民，现有的苏区是不应该划疆自足的。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以扩大现在散漫性地方性省份性的斗争而成为全国规模的斗争呢？或者有人以为苏区内如果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将给富农及商人活动的机会，如果农村工人、雇农及贫民把权力拿在自己手里，是不必过于害怕富农和商人能有多大活动的；否则像现在

的苏区中，富农和商人还不是有很多危险性的活动吗？

最后，还有两点必须说明一下。我所反对的对于“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乃是专指我们所要创造的“国民会议”即我们总的政治口号而言，当然不是指国民党资产阶级所召集的任何“国民会议”（许多人攻击我们左派反对派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特别是在革命运动开始发展的今天；他们的误解，都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甚至以去年五月蒋介石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这一层大家必须要弄清楚。托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曾说过：“组织国民会议，不经过蒋介石而经过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才是庄重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所提出的总的政治口号，我们自己对它加以非革命的解释，即是以资产阶级所能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而不敢侵犯资产阶级的政权，则我们便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反对派，而不是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了，这还怪别人攻击吗？）；同时也不能据此作为在没有革命运动时期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之理由，因为只有在群众正在奔赴革命走近武装暴动时，拒绝参加行将崩溃的统治阶级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如俄国多数派拒绝参加第一次国会），才是正确的政策。

总之，参加统治阶级的国民会议和革命阶级所创造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1932 年 1 月 28 日 《火花》第一卷第七期 署名：独秀



讨 论 栏

——原则问题的争辩向党内公开①

我们当中关于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讨论以至争辩,不但应该向党内公开,并且应该公诸党外的无产阶级群众以至一般的革命群众,让他们能够真实的了解和正确的选择,因此我们决定今后把讨论重要问题的文件,不在《校内生活》上发表,在本刊上特辟一栏以容纳之。史大林派往往摭拾我们当中一些不同意见而加以夸大,视为破坏左派反对派的一种机会。其实左派反对派丝毫也不怕这样的破坏,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说明了史大林派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列宁同志在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自始至终党内都有不同意见,每次重要的不同意见之争辩,都是向群众公开的,从来不曾隐讳过,党员及群众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提高了,党也就是这样强大了。到了史大林的领导才发明了严守秘密、封锁加惩罚的制度代替了公开的争辩。这样的制度只能造成加特力教式谟罕□□式个人专制的派别,而不能造成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争辩的问题之一,也就是他们不敢容留我们在党内的原因之一。

1932年1月28日 《火花》第一卷第七期 署名:编者②

① 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讨论栏》载于本期第27页。在本页右下角,有钢笔字注明:"编者即陈独秀"。

致蔡元培函[1]

孑民先生赐鉴：

兹特恳者，皖人濮君[2]，留学日本，返国后，历就沪、皖教职，独秀来南京方有缘聚首。一年以来，多承其照料接济，谊至可感。兹已失业，事畜维艰，更无余力惠及故人。独秀欲为尽力，奈处境如斯，开口无门。惟念先生关爱素切，特为濮君事作书介绍于座前，至希进而教之，倘有机缘能得一相当位置，则加惠于濮君者，即亦加惠于独秀也。濮君与独秀只乡友，并无政治关系，此层请先生勿以为虑。

专此，敬颂

起居百益

独秀手上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贱恙时益时发，亦是肠胃病的常态。近日令亲周仲奇先二来赐诊治(金家凤兄介绍，颇见效。知注特以奉闻。

(据陈独秀手札)

《蔡元培书信集》(下)第 2147 页

---

① 蔡元培在此函信封上注有"霞飞坊七十二号柏烈武先生转，为濮君介绍于中大罗志希、暨大沈鹏飞、商学院裴复恒诸校长"等几行字。

② 陈独秀有位表亲名濮德志。

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

汪精卫曾于去年十一月七日对上海各大学代表说："我们一定要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现在，今年四月二日《申报》记者也主张"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他们能否实行"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这是另一问题，而在怎样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赞成他们的主张："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现在所必须讨论的是"要怎样的民主政治"这一问题。

汪精卫所要的民主政治，即是他所解释的"以均权求共治"。究竟谁与谁"均"，谁与谁"共"，汪精卫已在事实上答复了这一问题。广东的陈济棠不与他"均"，不与他"共"，使他奋然跑到南京去与蒋介石"均"，求与蒋介石"共"，蒋介石恢复了事实上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地位，汪精卫也荣任了行政院院长。蒋派仍旧盘据了中央政府的陆财两部，汪派也分得了实铁两部，湖北、安徽两个省政府的主席仍旧属于蒋派，汪派也分得了几个省委，这虽然算不得是"三一三十一，逢三进一"，而比之在陈济棠所统治的广东，汪派已经是扬眉吐气了。他们所准备召集的什么"国民代表会"，尽人皆知只是国民党政府的谘议机关。这样的民主政治，不但不是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谁也知道即和欧美资产阶级现行的民主政治还相去很远。欧美号称民主政治的国家，毕竟形式上总有一个普选的人民代表机关，毕竟表面上总有相当的集会结社（政党包括在内）出版言论信仰之自由，他毕竟比中世纪的政制有了高度发展。

同时，代表各上层阶级的其他政治集团，如国民党内胡汉民、孙科派，如国民党外的国家主义派，安福系、旧直系，以江浙地方党为中坚的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派，他们眼见蒋汪两派这样的均权共治而轮不到他们自己，于是也提出"民主政治"的口号，求与蒋汪"均"，求与蒋汪"共"。胡孙之对付蒋汪，主要方法是诉诸军事阴谋（如东南自卫军之类），

其他各派则诉诸国难会议的争持，胡汉民对于党治训政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表示，他为了拉拢各派，已表示“各党（保皇党及共产党除外）并存”的意见，此外他并没有比蒋汪更“民主”的主张。包括上述国家主义派之上海，北方及广东三方面的国难会议会员，有他们共同的要求：（一）结束党治，制定民主主义宪法，实行宪政；（二）不分党派，组织国难政府；（三）在国难会议前宣布“各党并存”（他们有时声明是“与党并存”，当然革命的政治是除外的），他们现时可总称为“国难会议派”。此派的民主政治，是希图恢复以前的国会制度（汪精卫讥为“欲返民国十二年以前有名无实之宪政”），建立国难政府，他们与国民党均权共治，得到比顾维钧、罗文干较体面的地位；他们不敢也不愿提出普选的会议和任何党派之政治上的自由。这样的民主政治，即和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现行的民主政治也还相去很远。

民主政治之本义是说国家的政治由大多数人民管理，不但干脆的少数人均权共治不是民主政治，即在欧美资产阶级国家，虽然表面上有了相当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信仰之自由，虽然形式上有了普选的人民代表的议会，虽然比之中世纪的政制有了高度发展，也仍然是不彻底的虚伪的民主政治。为资本主义狭窄框子所限制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只能是利于富有阶级少数人的民主政治。

《申报》记者（我们并不能认为他真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见）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不是‘均权’的民主，不是‘党’的民主，也不是现在西欧的‘伪’民主，因为那些根本都是虚伪的，是欺骗大多数人民的一种更巧妙的说谎。我们所要求的是‘真’的民主政治，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他又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主人应该有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绝对权力。假如政治而为少数人独裁，处于主人地位的大多数人民反不能过问政治，甚至生存的自由都为彼辈所操持，人民不得不走上‘以血去求民主政府之产出’的路上去。”

离开了实际的政治组织和由那些人来掌握国家的权力这样一针见血的问题，什么“以大多数人民为基础”，什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类话都空洞而无实际意义。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自认国民党的政权是

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都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以这个基础，这个主人是阿斗，国民党不得不尽训政的义务；即袁世凯也承认主权在民，只以人民程度不够，他不得不尽行使政权的义务。大多数人民是些什么人，怎样他们才能够有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绝对权力，何以西欧各国是“伪”民主，怎样才是“真”的民主政治，对于这些问题，这位记者都陈义含糊，没有一点明白的说明，或者是有意含糊？（这样的含糊还不免触动了汪精卫的盛怒，电责史量才。）

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国政是民主政治之本义，而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切国家权利机关，都掌握在代表极少数人资产阶级的政府手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劳苦人民，选举若干代表到议会里，有多少直接管理国权的作用？

选举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占全国人口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它有广大金钱做选举运动费，如宣传费，广告费，甚至贿买投票，它有优越地位如企业主或明或暗的强迫被雇者之投票，它还有它的政府用官权监督干涉选举，如此则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能有多少选举自由？

集会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除了资产阶级的政府藉故干涉外，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有多少闲裕时间能够像有闲阶级自由集会？又有多少公私建筑供他们自由集会？

出版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最好的印刷机器，巨量的纸和油墨，都在资本家手中，伟大设备的日报和杂志也在资本家手中，即令它不直接用法律干涉言论，它广有金钱可用经济压迫操纵著作家，雇御用的学者做它的喉舌，所谓出版自由，乃资本家收买新闻纸和制造所谓舆论之自由，对于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只是写在宪法上的一句好听的空话而已。

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被榨取被统治于少数榨取阶级的社会中，在被榨取者起来推翻榨取者之统治解除资本的桎梏以前，任何民主政治的国家，即欧洲和美洲最进步的共和国，所谓大多数人民的自由，所谓民主政治，都不过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之一种民主主义的形式，以别于赤裸裸的军事专政而已。西欧各国“伪”民主之真相即在于此。

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城市，它的运命完全握〔在〕外国帝国主义

的掌中：幼稚的工业虽然因企图对外竞争有时向左盘旋，而其渴望外资，终于决定了它向左盘旋的程度；至于还有巨大势力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更不得不仰鼻息于数十万万元在华外国银行资本和托命于外货输入原料输出，民族斗争无论是排货或战争，对于他们简直都是致命的打击。在乡村，中国已无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已无直接冲突（如土地买卖和雇佣劳工之自由），而有共同利害（如城市资本家土地化：购买土地，抵押土地；私有财产权之拥护等）。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自始即不需要拿民主旗帜，激起大多数人民来帮助它向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地主阶级斗争，它并不敢轻于采用西欧各国的“伪”民主即民主政治的形式统治中国，因为它恐怕弄假成真，恐怕因此激起被它榨取被它统治和它站在敌对地位的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侵犯到它的利益，它终于要依赖军人势力，用枪尖镇压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以维持它及它的国内外同盟者（帝国主义及地主）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民之榨取与统治。所以，资产阶级的在野派，尤其是手中没有多少枪杆的派别，往往拼命冒险提出空洞的民主政治口号，做他们向在朝派要求均权共治的武器（如过去的汪精卫、李烈钧等和现在的国难会议派）一旦在朝，连他们的民主政治都石沉大海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太落后了，不但害怕“真”的民主政治，并且害怕像欧美各国的“伪”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它害怕民主主义，不减于害怕社会主义，或者更甚些，因为前者比后者更现实些。

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第三党，他们的利益不像大资产阶级牢系在帝国主义脚下，他们有倾向欧美的“伪”民主即民主政治形式之可能。他们在帮助大资产阶级打败了无产阶级（一九二七年）之后，受了大资产阶级的欺骗，未得到任何利益，而且深受着军事专政的压迫，于是又开始左倾，感觉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有利于他们向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要求之旗帜，企图组成反对现政府之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以向大资产阶级争取他们的利益。现时，他们虽然还未能组成独立的政治集团（第三党还自称是“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而已在酝酿和开始萌芽。他们会提出普选的“议会制度”之要求，他们当中（如第三党）已有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他们的“伪”民主，较之大资产阶级各派的

"均权共治",固然进了一步,可是他们替大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面貌也进了一步,他们为了欺骗民众,不但会提出形式的民主口号,有时还会高喊几声社会主义。一到民众斗争激烈化的时候,这般中间地位的分子(严格说,本是资产阶级之一部分),其中最下层在经济上濒于破产者,固然一部分在政治上有可能走向无产方面,而其上层或仍旧抛弃其"伪"民主,干脆的投降于大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而拥抱着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在过去一九二七年革命中就是这样);或者用他们的名义拿出"伪"民主的面具,来欺骗群众,替大资产阶级维持垂死的运命(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克伦斯基政府和一九一八年德国爱尔白政府)。

忠实于所谓"适合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运动者,只有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自身即是全国人民之大多数,他为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而斗争,即是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申报》记者提出"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的主张(四月十二日《申报》时评),而未说及由什么人来建立这样的民主政治,若认为榨取阶级的少数人可以建立适合被榨取者(工人贫农一切劳苦人民)大多数人民之利益的民主政治,这不是欺骗便是幻想。

在国内外恶势力双重压迫之下的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迫切。他们毫不犹豫的要努力于实现民主政治形式(直接普选的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大会)的斗争,而且要为充实其内容而斗争,即是实现选举和宣传之实际自由,以及排除国内外一切恶势力相结托的压迫与榨取,主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经济命脉之控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以开辟整个的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以挽救大多数人民破产,失业,饥饿,自杀和堕落的悲惨运命。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真"的民主政治。

"真"的民主政治和"伪"的民主政治之区别乃在:前者是利于被榨取者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后者是利于榨取者极少数人的民主政治。前者比后者,显然有新的高度发展;而和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均权政治"的民主,更无共同之点。

"真"的民主政治,决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实现的,只有工人贫农一

切劳苦大众以血来推翻整个的榨取阶级，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政制，才能够表现出来。这样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如果有人拿欧美现行的"伪"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做标准，来根本鄙弃民主主义和民主政治，这是没有理由的。"德谟克拉西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争斗中是有极伟大意义的，但是德谟克拉西却决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只是从封建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进化过程中的阶段之一。"（列宁《国家与革命》汉译文一六六页）

1932 年 4 月 16 日 《火花》第一卷第九期 署名：陈独秀

转录自《中国问题的各派思潮》，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社会改造问题研究会编，1934 年 8 月版

论国民会议口号

民主主义制度，远在氏族社会即发生了，其精义即大众管理大众的事，那时国家制度还未发生，酋长和军事首领的权力都很有限，一切决定于“民会”(希腊的 agora，罗马的 Comitiacuriata)。所以后来资产阶级，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一致或多或少或久或暂的拿民主主义做他们反对君主或贵族专制的旗帜。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宣布：“民主主义的形态，在几千年的经过中，自古代发生萌芽，其后每次由一阶级交代到另一阶级，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变。”“在古代希腊共和国，在中世纪的诸都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民主主义都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程度。”“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较中世纪，不用说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求从根本改变。”我们可以在这些说话中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民主主义的思想，由古代社会传到阶级社会，它也和别的事物一样，要受阶级的影响，而不能成为超阶级的怪物；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面前，它是狭小的，而比之中世纪制度，则是高度发展的，是进步的。所以，列宁有理由可以说：“民主主义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斗争中是有极伟大意义的。”“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面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了。”所以托洛茨基有理由可以说：“在一定的时期，民主主义口号不仅是幻想和欺骗，而且是历史的动力。”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只有当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拾起来他们已经破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来非难无产阶级专政，来企图恢复资产阶级政权的时候(正如列宁写《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那本小册子

的时候)；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统治之下，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如于右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的更揭开假面的迫害无产阶级。

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会议，是形式的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表现。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并未完成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今后只有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中国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提出最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做总的政治口号，在实现这一口号的斗争中，动摇、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来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这应该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整个的战略。

这一战略，在无政府党人当然不能赞成，他们根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之态度，和马克思主义者已争论了半世纪以上。如今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半巴枯宁主义者)的史大林派，也居然非难这一战略，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当做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于是他们一般的骂提出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口号的人都是拥护资产阶级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人；其实，恰恰相反，反革命的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阀政府，即对于他们自己阶级的民主主义也害怕得了不得，无产阶级对于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愈彻底愈坚决，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愈团结于无产阶级的周围，资产阶级专政愈加动摇。他们认为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实际上只能够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的装饰”，愈走到东方愈卑贱的资产阶级，并且还有地主，都竟能够拿“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做他们专政的“装饰”吗？史大林派现在对于中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还有这样的幻想，这和他们从前幻想国民党可以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幻想汪精卫可以做土地革命的领袖，其荒谬的程度相差几许呢？他们认为并且说是“列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即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国民会议”；他们完全忘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写的十九条《立宪会议提纲》之第一条，开口第一句便是“立宪会议召集的要求，列入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的政纲中，是完全应当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立宪会议是民主主义的最高形式"。他们又反对我们"单独"的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其实我们自始就是"国民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这四个革命民主要求的口号同时提出的；并且是以后三个口号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他们理屈词穷了，于是异想天开的引用列宁在解散立宪会议后驳斥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特别是考茨基）拥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拥护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说话，来反对现在的中国在反革命反民主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军事专政之下提出民主的国民会议的口号，这完全"文不对题"，并且混乱了阶级的立场！

"企图以这个口号（按即指'国民会议'口号——作者）来组织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来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苏维埃运动。"粗暴而不忠实的半巴枯宁主义的史大林派对于我们这样无端的毁骂，是不值识者一笑的，如果有人说，"国民会议"自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它是否为革命的口号，要看它对于资产阶级政权的态度是怎样；这就是说，如果认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只是反对军事独裁和力争在现政权之下的议会制度与和平发展，这便是自由派改良主义的企图；如果认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不仅是反对军事独裁，不仅是为议会制度斗争，并且力争武装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策略，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史大林主义者以及一切反对国民会议口号的人们，也只有在这样观察分析的方法之下评定我们的策略是否正确，才是妥当的。

托洛斯基同志告诉我们："国际第六次大会否决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的状态，因此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时代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向群众解释，说这个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够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倘若物质的权力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时候，这个立宪会议仍是没有力量的。由此，我们又有重新提出武装工农口号之可能。""'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口号，是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

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些口号里，就反映出中国革命发展中之民主主义的阶段。在国际政治上，共产党将要求联合苏联。正确的结合这些口号，各个口号之恰合时机的提出，共产党就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结合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仰并以此促进建立苏维埃和直接夺取政权斗争之时代，迅速的到来。”“至少要使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了解，走向国民会议的道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动和由民众来夺取政权的手段，才有可能。”“在这个口号(‘全权的国民会议’)之下，共产党先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这还不明显吗？除非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信口雌黄，托洛斯基同志的这些指示，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即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运用，和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岂非根本不同吗？

采用同一“国民会议”口号而政治路线根本不同，这也并不自今日始，以前列宁在已有革命高潮的一九〇五年，和少数派甚至自由资产阶级都采用“国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而政治路线则根本不同：前者是主张的民众武装暴动，推翻沙皇政府，建立革命政府，来实现这一口号；后者则希图在沙皇政权之下，实现立宪大会，在没有革命高潮的一九〇七年，列宁和少数派都主张要利用那个“六月三日的议会制度”；但少数派的政治路线是抓住议会的行动而抛弃革命的行动，列宁则是利用议会行动来帮助革命的任务。所以，我们左派反对派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不但向极左和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者有斗争；同时，向右和少数派改良主义者也有斗争。

在我们左派反对派的内部，当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反对国民会议口号，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所谓“公开的改良主义者”，现在也已经没有了；而所谓“形式的革命者”即承认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用革命的暴力”者，则恐怕还非常之多，只在意识上有明了与模糊之分。托洛斯基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人民和各国，看为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不仅是完全分开的，而且相隔得很远。”这即是说，“形式的革命者”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在根本上同样是阶段论的错误。在这样

阶段论的观点上，自然把民主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不能同时并存的东西；自然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看成永远是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不可分离的东西；也自然把国民会议的口号看成是用不着革命暴力的，而只是在两个革命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做做和平的合法运动即争取部分的民主主义要求如出版集会等自由，如此而已。这种形式的革命者（如民傑①、小陈②、劳他等同志），无论他们对于未来的阶段有“武装暴动”、“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等等革命的口号（正因如此他们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不同），而对于两个革命间现阶段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国民会议”，其认识却与改良主义者没有两样，也就如托同志预料史大林主义者的话“跟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所以他们和史大林主义者同声相应的反对“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仁静）、“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独秀）这一类说法。这是把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国民会议，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之一——独秀），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中国革命之不断性，完全截断了！或者他们误会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可以由民主的国民会议选举来实现”，这便是天大的笑话！如果真有这种误会，也只是由于他们“用不着经过革命的暴力来实现国民会议”这一和平观点出发的。“经过要求实现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而举行的武装暴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同时也实现了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和平的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但经过国民会议不可能，即经过苏维埃，经过工农民主专政也都不可能。

左派反对派对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和史大林主义者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是同样犯了阶段论的错误之故，他们有了阶段论的成见，所以不能了解“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意义，而认为只有“冲破”、“毁灭”国民会议（民傑同志）或“赶走”国民会议（劳他同志）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托洛斯基同志说：“我们的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到专

---

① 民傑，即严灵峰。1931年任托派中央宣传部干事。

② 小陈，即陈岱青。1931年任托派上海法南区委书记。

政，只是因为党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实现民主主义的口号和要求。”“照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民族解放革命经验所证明，全体人民代表政制之思想，乃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最能够号召真正广大群众的思想。占统治势力的资产阶级愈加抑制‘全体人民的’要求，则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愈加团结于我们旗帜之下，而人民群众也愈加团结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同时战胜资产阶级国家之真正胜利的政治条件也就愈加成熟了。”在托同志这些指示中，对于民主主义的政制，只有要求实现，而不是“冲破”、“毁灭”和“赶走”。且以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不是“冲破”、“毁灭”、“赶走”了立宪会议才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才召集立宪会议，托同志在预测中国革命前途中也是说：“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即苏维埃政制接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也不曾有“冲破”、“毁灭”、“赶走”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说法，如果说，“冲破”、“毁灭”和“赶走”是对于具体的资产阶级政府所召集的御用的国民会议或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议会制度的最终运命而言，则在我们此时所争辩的革命策略上没有一点重要的意义。

此外，如赤声同志说：“争取中国民族完全独立与土地革命，是要在第三次革命中求得彻底解决的。国民会议的口号，在目前应取的策略是，使共产党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结合群众……”晴光同志反对他这样的说法，而自己却也摇摆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国民会议”和“一切中国根本问题是不能在国民会议中解决的”。这两种说法之间。这些说法，也是由阶段论出发而更加混乱。其实，“国民会议”、“民族独立”、“土地革命”都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之一，不是其中何者现在能够解决，何者要到第三次革命才得解决，也不是任何国民会议都不能够解决“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问题，而是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不能够召集解决“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些民主任务的国民会议。

刘仁静同志，因为反对阶段论者对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而又走到另一种错误，即是他所谓“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

俗公式"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个东西",如果认为这只是由于说法不同,其真实意义即等于他自己所说:"真正的国民会议必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同时。"或竟如他自己的解释:"我从前说过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本是我所重的只是无产阶级用国民会议口号夺取政权运动的意义。"如此则我们之间似乎不必有所争论了。但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根本的争点,还是仁静同志根据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最初期所要解决的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遂不承认二者之间有阶级性的分歧,难道二者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吗?由无产阶级的动力及其和各阶级的关系之变化所形成的政权之阶级性,是不能拿其最初期所要解决的直接任务来混淆的。这本是极浅近的道理。我不相信仁静同志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难道二者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吗?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当做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因此认为任何国民会议既然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则无产阶级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的斗争,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这当然是阶段论的错误见解。然而也决不应该因为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遂否认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这样的否认同样是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分离"这一观点出发的。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虽然国民会议,又如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等,都带有浓厚的反资产阶级反军事独裁的性质,但这只可以作为一种理由,来假定将来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阶段能够很快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有人因此便认为这些任务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不赞成"第三次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说法的仁静同志,他当然又会把"国民会议"、"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些明明白白的民主任务,看做是社会主义的任务。仁静同志大概会有第三种说法,即二者都只是"秃头的"民主主义,而没有阶级性的分歧。仁静同志虽然没有这样明白的说法,在我的认识中,他确是常常讨厌在民主主义上加用"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好像他还有"民主主义不是

资产阶级的"(大意如此)这种说法,他最近又发明了他所了解的民主口号之内容,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农民的民主主义,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不是民主主义的是一件事,历史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制度之存在又是一件事,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上所谓"民主制度"、"民主任务"、"民主口号"无一不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能想像:在阶级社会里会有超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也不能想像:在现代社会,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还会有其他民主主义。仁静同志千方百计的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在这一点上,他和史大林派及小陈同志等,根本都同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分离"的观点,虽然发表出来的形式各有不同,有时还正相反对。

我们为什么要力持二者之间有阶级的分歧呢?这并不是名词或单纯的组织形式问题之争,而是因为二者各有不同的内容,即是:国民会议即使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它也不能排除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妥协(不如此便没有召集国民会议之必要了),它并未能公然剥夺榨取阶级参加的权利(普选制),即未能完全走出榨取者的民主主义范围;它只能解决民主任务(是因为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是被榨取者大众的民主主义,它比之榨取阶级的民主主义,在形态上有更高的发展,在性质上有根本的改变;它和农民的关系,开始确定一种新的形式,即中农除外,连贫农亦须"归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纪律范围之内"的工农联合;它不仅能够解决民主任务,而且还能够保证最健全地转到社会主义去的唯一形式"(列宁)。如果国民会议和苏维埃政权是一个东西,而没有在阶级意义上的和历史意义上的任何差别;那末托洛斯基同志只不过在这两个异名同实的口号当中,挑选一个较灰色的告诉我们;这就是革命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这也未免太过儿戏了吧?

或者会有人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岂不是企图和资产阶级妥协吗?我们回答说,否,中国资产阶级是害怕民主主义的,我们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不是和资产阶级妥协,而是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妥协,据托洛斯基同志的

意见："关于形式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关系的问题，而且是对于尚未达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工人群众关系的问题。"这几句话是对的，不但农民，即大部分工人，亦不能预先见到无产阶级苏维埃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他们所见到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幻想。（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是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有高度幻想的表现，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外，特别还有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或农民的民主主义。）特别是农民，不有对于这个幻想之活的斗争经验来证明，他们是不会先天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

此外还有什么理由，我们必须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呢？难道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便不能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吗？难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法兰西革命史）民众不曾为了实现民主要求口号而举行过反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暴动吗？不但"国民会议"，即"民族独立"、"没收土地"和"八小时工作制"这些口号，也没有一个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难道我们也要一一加以否认、避讳吗？

以前曾有些人避讳"民主主义"这个名词，恐怕沾染了机会主义，而以"德谟克拉西"代之，又有人避讳"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想代以秃头的"民主任务"；这都是掩耳盗铃！我们不要继续做这样无意识的事吧！应该牢牢记住托同志指示给我们的话："在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站在主动者的地位，那么史大林官僚派将落伍退后，而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将于短时期中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对于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等民主口号，从来不曾站在主动者的地位进行强有力的鼓动，怠工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我们各个人或多或少的受了史大林官僚派宣传和辱骂的影响，不自觉的在思想上跟在它后面鄙薄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这一心理上的暗礁。仁静同志不严正的驳斥史大林主义者抄袭巴枯宁派在第一国际时代鄙薄而且诬蔑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口号之反马克思主义的老调，反而自己很腼腆的急忙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的口号，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仿佛以为必须把国民会议口号当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是没有分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方可采用，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便是丢了左派反对派的脸！

对民主口号这样鄙薄而怠工（和对于爱国运动鄙薄而怠工一样）的状况，还能任它继续下去吗？我们必须有个坚决的迅速的改变！

九月一日

1932年10月1日 《校内生活》第四期 署名：独秀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

在国际帝国主义榨取束缚之下的中国经济，大工业之发展，赶不上农业及手工业破坏之速度，并且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发展之本身也带有破坏农业及手工业的作用，这样的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之剪刀式的发展，便是农业国的中国农村破产及其影响到一般经济不安之根本原因。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空前大水灾，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蹂躏中国南北经济中心的区域，这三件事先后并发，更使整个的中国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大破产：不但农村并且城市，不但小城市并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汉口，甚至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但工人与贫农，即中等农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学教员，各机关小职员，这些占全国绝对最大多数的人民，都在破产、失业、借债、饥饿中度日。

谁都知道，不但是恢复并且要提高国民经济，中国才有救；因为只是经济恢复，或一时的部分的活跃，根本还并不能救中国。但谁来提高中国经济和怎样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乃是问题的中心所在。

由外国帝国主义来提高中国的经济吗？不用说这是使中国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国的反面。并且，由帝国主义势力来发展中国经济，其结果不是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而是肥了外国的财政资本家和中国的少数买办及半买办的企业家，大多数人民仍旧陷于颠连困苦和饥饿，印度和朝鲜便是榜样。帝国主义间相互争夺战争更要变中国为废墟。

由中国人自己来提高中国之经济以复兴中国吗？“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着的社会，两个力量决定一切。”即是：或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复兴中国(俄罗斯的道路)。更具体些说，或由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或由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之伟大而艰难的责任。政党是代表阶级的意识与力量之最高表现，中国现时只有这两大政党，即将来也只会有这两大政党，别的党派在政治上

只能立在附属地位，并且有终于要融解于这两大政党之中，其中间作用与地位，只能是最短时期的，甚至只是名义上的。

代表资产阶级地主的国民党能否复兴中国呢？我们可以断然的回答一个“否”字。

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有三个根本的必要条件：(一)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的经济命脉之榨制；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碍物。(二)必须无条件的从不生产的地主手中，没收所有土地，交给生产劳动的农民；因为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小农国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权独占在不经营农业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们用非资本主义的形态，榨取土地产物之大部分，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榨取了严格意义的地租即超过普通利润及工资以外的剩余，并且榨取了农民由劳动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其结果，农民把大地部分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甚至农民一部分生活费也包含在内)，都在非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度之下牺牲干净，这不但阻塞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且因之农民贫困，农业衰退，土地荒芜，农村破产，都是相因必至的现象。(三)必须实现合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数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动的创造经济，创造政治，方能根本肃清闻名世界的 Mandarin(中国官僚)这一臭虫窝。

这三件事是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什么不为它的利益而办到这三件事呢？这是因为它的利益根本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利益相联的，它自身则是军阀官僚的集团，它不但不愿也决不能办到这三件事，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来完成，这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断，而已是众人目睹的事实。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当它宣布对俄绝交时，美报《密勒评论》曾有这样的描写：中国之封闭俄领署及要求俄员离境，此种姿势显然表示中国领袖今日之目光向于何方，诚如郭泰祺氏上星期在美国大学同学会席上所说，中国已决定于其将来发展中国追随“盎格鲁撤避之途径”，此其意味即彼愿与美英为友而接受彼等之赞助是也。中国已利用苏俄之赞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长

江流域及传播国民党主义于全国是；但今以俄共党欲包揽中国之革命，中国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显其本能，而与俄人决裂，中国乃相信西方列强尤其英美已准备与中国讨论条约问题，假使列强于此，能急起应和，勿再断断于法律理由，稽延时日，则西方制度在中国之前途当颇为光明。但此种新局面必须以绝对平等给予中国为基础，质言之，必须修改条约，使中国满意，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权是已，此乃中国抛弃共产主义应得之代价，若列强而果贤明者，应速承认之，勉力与国民党之中国结好，与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国。

但国民党政府之"目光向于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价，不是"修改条约"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却是扩大不平等条约，扩大外人在中国的领土，扩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权。在眼前的中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抵抗的黑龙江、吉林军队及义勇军，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军，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国各业之中国当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货团体。并禁止检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电)并且造出"反日即是卖国"的妙论(最近蒋介石在南京军校论说)。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枪炮和飞机炸弹，不是用以抵抗侵占中国土地在中国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军队，而是用以屠杀中国农民的。它对于农民为饥饿而争取土地的要求，始终只以"派兵剿赤"答复之，它始终不曾考虑一下，在农民国而有了广泛的农民暴动，这决不是简单的什么赤化问题；在民主共和国而有要求土地的农民暴动，这不是拥护旧制度的农民暴动可比。至于国民党的军阀之横征暴敛和官僚之黑暗贪污，比之前清北洋时代更是肆无忌惮；这班飞蝗横行全国的国民党军阀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贿晏安淫靡，腐烂中国，而且公然奖励鸦片，以毒杀中国。

以这样的国民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任务，就是他们当中稍有知觉的青年党员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非难国民党，这是一种大过奢侈的说法；其实〔国〕民党的罪恶，还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国主义，镇压农民的土地斗争和军阀官僚之横行，破坏了提高中国经济的三个条件，阻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孙科、陈公博辈所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四年计划，都等于伍廷芳之说鬼。在国际一般物价还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

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也没有像一九二八—三〇年相当统一与稳定的今天，连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外资以实现暂时的经济活跃，目前也还没有可能。

最近胡汉民发表关于国民党的问题之谈话，他认为：近顷“外交之丧权辱国，政治现象之日趋恶劣，国亡无日”，不能“归咎于党治”，“盖五年以来，所厉行不改且有加无已者，实为民国以来相承一贯的所谓军阀之治，而未尝有所谓党治”。试问国民党据政五年，还仍旧是军阀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谓“以军权而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以政握党之现象”。这样吃饭睡觉不问事的党，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于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胡汉民并且公然承认以下的事变：“自十七年后，各省北洋武力虽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统治则如故，二十年来所造成军阀政治之环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凯以来相承一贯之所谓军阀统治，亦遂继续如故。”党员“沉醉于‘有枪斯有权’之谬说，甘心为军人之附属品”。“人民自由权利横被摧残。”“我人只见借党营私之个人，而不见有献身革命之同志，所谓党员者或一切取给于党，以党的寄生，或倚党而作恶行奸，于党为蟊贼狡黠之魁，正乐得此辈供其指使。”这样无恶不作的党，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吗？胡汉民为了一时快意，痛快淋漓的攻击蒋介石而不自觉的把整个的国民党之罪恶供认出来了。五年以来，在国民党党治之下所励行的一切摧残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汉民一派的立法院所制定？他有什么理由什么脸面可以反对蒋介石的“军阀之治”？

又如宋庆龄骂倒了国民党中无论那一派，这当然等于骂倒了整个的国民党，她并且宣称不怀疑国民党已经给全国人民所唾弃，所蔑视，所憎恶，然而她同时却又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从来没有在那一天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吗？孙中山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显然是主张由外国帝国主义来复兴中国经济；因为一直到现在，还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孙中山在世所领导的党，不只一次宣布他们的革命政府将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决不侵犯列强在华权益；不只一次希求由列强承认他们的政府来打击北洋派；他并且公然替帝国主义威吓中国民族，说：“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

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向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之理论的根据。“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这些阿斗当然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民权主义第五讲），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国民党看做是“万能”的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名义上的“政权”奉诸不知不觉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荡不羁”和“一盘散沙”而加以掊击，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以军阀官僚的权威压倒民权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据。“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训词）宣布阶级和平，用不着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大贫”的工农，向所谓“小贫”的地主资本家斗争，教成千万成万万饥饿垂死的农民，等候着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着国民党政府规定地价几十年后把涨高的地价归公的办法，来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第二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土地斗争之理论的根据。

这样的三民主义，谁要说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谁就不曾认真研究过三民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三民主义，这样的国民党，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吗？

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既不能够提高经济以复兴中国；别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能力当更在国民党之下，那么，提高经济以救中国的责任，只有放在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双肩之上了。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立在绝对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余年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反地主之不断的流血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排

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字，已经在它所领导的农村苏维埃区域见诸实行；虽然还没有统一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解决整个的帝国主义及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苏维埃不仅是整个的无产阶级联合机关，而且是一种广大而富于伸缩性的组织形式，一切觉醒起来，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城乡被榨取的劳苦民众，都能够参加进去。苏维埃政权不是由少数人在上面统治民众，而是由民众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除了游手好闲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都有参加这一政权的公民权利，它废除了立法权和执行权无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间的障壁，它引进了广大民众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之管理，它废除了以官吏为职业的特权阶层，它扫清了国会及地方议会等猪圈，它实现了直接选举一切公务人员和随时撤换的彻底民权。

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之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

我们这样的主张，并非根据党派的成见，而是根据理论与经验，而且还要诉诸被榨取的大众之政治好恶，必须由大众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在民主的国民会议要求的斗争中，认识我们的主张之优点与需要，蜂起拥护我们的主张，这才谈得自下而上创设大多数民众直接参加的苏维埃政权。真正苏维埃政权，是大多数民众的政权，必须由大多数民众自己创造起来，决不能由少数人创成交给民众，少数人用民众的名义宣布的苏维埃政权，是经不起困苦艰难的斗争之试验的。

现时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日军从吴淞撤退时，日本军官举杯向中

国接管人员演说:"自此以后,愿中日两国共同合作,以扑灭共产党。"不几日,十九路军果然被调到福建"剿共"去了!这不但表示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协定,并且是国民党政府向一切帝国主义表示其"目光向于何方"。

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屠杀工农民众屠杀共产党的国民党政权存在一天,它的政绩,只有破坏国民经济,扩大延长人民的饥饿,而不能提高经济。

中国的民众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之下,走向破产,饥饿,灭亡的死巷,或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革命合作,走向复兴中国的大道!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了!

我们的道路上也有两个困难,这是不应该对民众掩蔽的。第一个困难而且是很大的困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向中国彻底反帝国主义的新政权之围攻。但我们只应以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全国广大的劳苦民众的力量,最后还要结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难,而不应企图避免此困难。因为这一困难的斗争,几乎是中国革命之全内容,也就是提高中国国民经济之根本的根本条件。国民党资产阶级,正因为企图避免此困难,而屠杀革命的工农和共产党,而对苏联绝交,而投降帝国主义,而背叛革命,而断送了复兴中国的机会。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史大林派的错误政策足以延迟革命甚至绞杀革命,也和别国共产党中央史大林派一样,他们在中国所做的错误摆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义和玩弄政治总罢工,在客观上是不断的破坏了城市工人运动复兴的萌芽;过份的估量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图以农民来代替工人的领导,并且连党自身也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把发动民众引导民众到革命道路之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义议会主义而加以鄙弃;党的这些错误政策,当然也是我们的道路上一个困难。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

1932年11月17日 《先锋》第五期 署名:独秀

致灵均女士信十二封

（1932年11月—1933年4月）

编者按：汪原放的手稿《亚东六十年》里有陈独秀写给灵均女士的信十二封；写给汪本人的信四十一封，内有两封都标31号，实是四十二封。这些信对研究陈独秀在狱中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是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现将信的全文及汪原放在信前的说明和信后的注释，分作两部分：一、致灵均女士信，二、致汪原放信，全部收录如下：

最近（1964年）我又看见陈仲翁（独秀）的一些信件，都是大叔要人录存的。我看这些信都是在民国廿一年（1932），仲翁被捕入狱以后写的。我现在来把它一封封的录于下：

一

王女士：

前托彭律师带沪由长沙路转交一函，不知收到否？该函所索款及胃病药六瓶，均已由彭律师带来，至少老朋友已接阅该函矣。

日前又由玉英女士转上一函，谅亦寄到。

岳州路旧居，你已去过否？所恳之事，不知可行否？至以为念，并盼示知。

我去后，屋中一切情形，请尽所知见告！至盼至祷！

附上致老朋友一信，请即交他。

彭律师处，望先生能去一晤，并望能于每星期日下午去见他一次，因每次我都有信寄沪也。

明夷白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望赐平安信，以释远念！又白

二

灵均女士：

廿七日托彭律师带来的信及麦乳粉、狼褥，均收到，至感至祷！

岳州路一切衣物尽失，都不必问了，惟书桌抽屉（靠窗户右手抽屉，非将桌子挪开，不能抽出）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看一次。需否偕律师去，请你自己酌定。务求见信即去，迟则退租后，恐木器为房东移去。如幸而尚在，望携存先生处，我得信即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领取之地，或可在彭律师住宅，不知你能想的更妥的地方否？

书籍中有郭沫若著甲骨文及金文书三册两函（大东出版），望检出交彭律师带来。捕房如无禁令，即木器、书箱亦可搬出。如房要房租，付他十四元也值得。

明夷白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卅日

三

灵均女士：

与老李信，望转交。我等在此有钱用，暂时不需寄款来。惟上海方面有点小用度，乞向长沙老友取廿元交老李代我应付。

潘女士信，望为付邮。她如愿在律师处见你，请告以鄙人生活近状，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忧虑。此祝

双安！

弟明夷白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又启：我处出事之由于小谢（即由你们介绍到现代译俄文小说者），这方面你们还要相当戒严！我们和玉英及任曙通信时，早都说过，外间同人均知之，我以为你们和李三先生都一定知道了。不料你来信竟虑我对你怀疑，我闻之十分不安！你为我做了许多事，我无以酬劳，结果还对你有所怀疑，使你心中难受，这是什么话！彼此相知非一日，出事后，我和你们的关系丝毫没改变，按之常识常情，你均不至虑我对你有所怀疑，长兄何以也至过虑而不给你解释呢？！

我此次信望你保留若干日，万一有人冤枉你，你便可拿给他看，不过我以为除了你们自己以外，不会有人这样无理白怀疑。下次来信壳，望称明夷，望（勿勿）书仲甫。

夷又白　廿三晨

四

灵均女士：

十八日信收到。家俱事只得如此结束，书箱存彭律师处甚妥。我前函所要郭沫若甲骨文及金文二书，得便则检出托彭带来，不便当，暂缓亦可。

我处出事，由于小谢，我等于次日在捕房会齐时即不谋而合的一致断定了（有许多证据），十七日（出事在十五日）在公堂上，捕房律师又公开的报告是由于谢，此事早无若何疑问之可言。我之写信问你经过情形，乃因为你幸未波及，我欣喜之余，欲得悉经过详情以为快，乃痛定思痛者之常态也。今接来函，竟有什么“是否已是解释疑团”的话，真是天外飞来的奇谈！彼此相知非一日了，以后万万不可这样多心！（此信可与长沙老友一看）

室中衣服是谁拿去，很难说。如果潘女士取去当在当铺，倘见面，可请她给我当票自赎。所当之钱，她当然已用去，不必提了。

我下半夜不眠症，日来略好一点，然未全愈。前日猪肉吃多了一点，口溃微泻一二日，现已好了。每日可跑慢步数分钟，习柔软运动数

次，身体、面色、精神，都和初来时不同了。

老友十八日信亦收到。表两只尚未收到。《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另纸所写西文书名，望交老友在中美图书公司购买，托彭律师带来。

下回来信，可不要署上款，或署明夷。

明夷白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二日

五

灵均女士：

四五两日信均收到。收到乳精及皮褥已见前函，谅已达览。

某君译书费，最好和长沙老友商量早日交清，以免麻烦。长沙老友此次总算镇静，难得之至！

来函所云章律师古道热肠，不知于何事见之？

弟在此间并未写过楹联，《晶报》所影印的，大约是我在军部所写。弟在军部受何应钦半谈话、半审问后，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之小纸条，索书纪念，情意殷殷（充满同情心，毫无敌视表示），令人欣感，四面包围（长官不能禁制），弟真接应不暇，幸而墨尽，才得解围。

我当初甚虑先生因看病被误，后竟幸免，不知何以能够幸而免，望告我以经过。

潘女士所藏物包已自取去，真是万幸！但不知确否？倘只是二房东所云，未必十分可靠，因出事后的数日，她未必敢，也未必能自由出入也。惟事已如此，只得听之而已！

顷闻彭律师云，岳州路二房东说我欠她房租两个月，真是混帐。弟

处房租，先付后住。弟出事在十月十五日，十三日付房租十四元，交她的儿子久福之手（潘女士手交），当然可住到十一月十三日。倘过十三搬出，也只欠她一个月十四元，不至欠廿八元也。木器虽破旧，当可值五六十元，惟此等小事，可以不必与之计较。书籍似宜搬出，因有许多日文书颇有用，二房东不但不要书籍，一定还很害怕收留此物。有人搬去，她当万分乐意。惟为安全计，和二房东说好，请她搬家后（她早已说打算搬至法界），我们再搬书，较为安全。但若无探捕守门，头天装好箱，次日一清早车去，狗们也注意不及也。

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这是她的旧业），不需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敢受我们帮助也。为她藏物事，迟日或去信问她。

与长沙老友信，阅后请送给他。

世道艰难，我望你们能以生活刻苦，节省用度，以便早日开设诊所，才是办法。此祝
健康！

明夷白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六

灵均女士：

玉英女士回沪，托带一信，谅已收览。

急欲得老托的《不断革命论》一读，前曾函托长沙老友向中美图书公司（听说此处的确有）买一册寄来，望催他务必买来；如他办不到，即请你买一本托彭律师带来，是为至托！

前函所拟将寄存彭律师处之书，分存兄处及老友处，不知可行否？有一部分（如另单所开）书，希望检出托彭律师带来。检出带来之书，可开一清单交彭律师，以免其疑心有红色书籍，不敢带来也。

致李、潘二信，请分别送寄。潘如果在彭处留有通信地名，则当然

可以改寄那里。此祝
健康！

明夷叩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

上次彭律师来宁，带来一月八日信，早已收到。

《自传》稍迟即可动手，老友处大半不能出版；不能公开发卖《文存》，岂能发卖《自传》。曹聚仁君曾代表群众图书公司（上海四马路）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

夷又白

1. 英汉字典。2. 辞源。3. 西方革命史。4. 法兰西革命史。5.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本。6. 郭沫若著甲骨文研究。7. 郭沫若著金文研究。8. 清朝通史。9. 我的生平。

七

仲三老哥：

近来各事多见致灵均女士信中，谅她已略告吾兄，兹不赘及。

超麟、资深、长子等各处救济事，弟甚关心，经灵均女士手交兄之款，已有几次，约有若干，如何分配办理，是否足用。他们（超等）的近状如何，均望吾兄一一赐知。来信交灵均女士转来不误。

罗汉兄近状如何，亦望示及。此颂
双安！

弟明夷叩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

八

灵均女士：

久未接来信，不知你们好吗？

前向长沙老友所要各书均未见寄来，至为盼望。

致老李信，亦未得复，不知他仍在上海否？

鄙人身体如恒，惟大便不能天天有，有时还是糖便，这是胃中消化不良之证，不知应服何药？此祝

双安！

明夷白

〔一九三三年〕二月廿六日

小女洗子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学读书，曾嘱她与先生一见，俾受教益，已相见否？

今后彭律师多在沪，少来宁，普通信可由邮政局寄来（惟不必写发信地址），此间寄尊处及长沙老友之信，亦望择一收信地址示知（当然以普通信为限，署名明夷，或常常易名）为盼。

明又白

九

灵、羽二君：

彭君带来四日的信一封及麦乳精二盒（今天收到的），都照收。

又《醒世姻缘》八本，信中虽未提及，因是亚东出版，想系长沙老友送我们的。惟另有白色药水一瓶，西名□□□□，来信亦未提及，不知是否你们寄来给我吃的，或是玉英寄给老彭的，所以还未敢服用，尚望来信示知！

《自传》尚未能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我的衣服，除羊皮袍及驼绒袍三二件外，余都不能用了。想是潘女士的。不知能否通知她检出这二件衣服的当票，以备赎取？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她在浦西有通信处否？

如有信由邮局寄来时，信中望勿提及收到我的信，因为我不便公开寄信给你们（因通信地址的原故，你们来信不写发信地址，则无妨也。玉英常有普通信由邮局寄老彭）。日前由邮局寄去之信（由老友处转）乃托人投之邮箱，未曾交所检查也。上海如有妥便收信处，此间托人投邮箱甚便，倘无甚秘事，以后可以不烦彭律师也。

前与老李信，急盼复。超麟及长子接济之事，弟甚挂念。不知老友处能否每月付二十元？老李收款后如何办理，均望示知。此祝
双安！

弟明夷叩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夜

十

灵、羽二先生：

前函据云托的□□□□□已托书店代定，二月后准有，惟日前老友来信云（即由哲民转来者），遍询沪上各书店，均已售罄，无法购得，嘱弟告以原出版的外国书店，以便定购云云。倘君等已向书店定妥如寄函所云，则已无问题；倘君等亦系托诸老友，则此尚无着落矣。原出版书店之名，弟亦不知，曾忆向刘仁静开有该书出版书店之名，交之弟处，不知尚存在否？其实并不需知这原出版处，只要托中美图书公司函美国芝加哥各大书店定购即得也。

前函仲三兄询问救济郑（宁）、尹（沪）等之事，不独至今未得回信，即君等来信亦未一字提及，殊为闷之。在外者不知在狱者之苦，我们对他们，即以朋友关系，亦不应置之不理也。仲三兄已去沪了吗？不知何以不给我回信？即仲三不在沪，老友处是否取得款，所得后又如何办理，君等亦理应告知我也。又老友处如取不得款，君等亦应函告我另行设法，置之不理，殊不应该！

贱躯如常，惟胃肠仍不佳，大便过少而稀薄，老友寄来之白色药水已服半瓶，依然无效，不知是否肠中有寄生虫？

弟之辩诉状稿，前托彭先生带上一份，不知收到否？兹再寄一份，较前稿有二处字句的修改，望交老友饬人钞录数份，分送知己传阅。本月十四日准开审，弟等虽然要求公开发表该辩诉状，而将否为政治力所阻，不可知也。倘开审后，上海各报未见发表该文件，请君等设法油印数十份，分送上海大小各报及北平《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庸报》、《大公报》，是为至托！

写《自传》事，俟判决后情形如何，再决定动手与否。

请告老友将亚东出版的《欧洲经济发展史》(李季译)寄我一部，同时告知季子，请他将此书德文原本寄我，以便对照译文一读，以此作学习德文的教科书，虽稍艰难，而比他书有趣也。《德文入门》将习了(此书极好，灵姐可一读。江西路壁恒公司有)，大约或可求教字典强行读书，狱中从事于此，最足消遣日月也。

书及信，均可由老友寄哲民转下(他每星期来看我一二次，甚自由)，不必烦彭先生。

与潘女士信，请转发邮。如见她，婉言劝她不必来此看我。

明夷叩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

望即赐复!!!

十一

灵均女士：

彭君赴申之便，带上要信(此信寄与老友一阅)一封，望即往取。彭君已移居辣斐德路万福坊六号，谅先生已知之。

来信望交老友寄哲子转下不误。倘向老友抄哲子通信处直接寄来，则尤为便捷也。

余已详前函，不赘。此颂

双安！季、仲处均乞代为致意，未另。

弟明夷白

〔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

十二

灵、羽二先生：

由彭君带上之信（内有状稿）及由邮局寄老友处转上之信（内有致静真信）均收到否，至以为念。

昨日由行严交来铅印辩状两册（据他说是从老友处拿来），我想是组织所印，一问静真即知，或羽兄已知之。此印本非最后改正之稿，而亦大致可用，稍加改正，即可发出，似乎不必再印。当送已间接的命令此种文件发表，不知铅印之件曾送达上海各报否？大约平、津、港三处报或可发表，望即寄去。

下次彭君来时，望示以静真的通信地名。托潘君寄老友转尊处之款（闻老友已还乡，月余始回申）请你询问□□，函及。

〔一九三三年〕四月

上面的十二封仲翁在狱中书，我觉得有几处，可以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封封的略加注释，以便阅读。我分条写于下，1 即第一信的注，2 即第二信的注，以下仿此：

(1)“王女士”是王灵均女士，高语罕先生的爱人。

“彭律师”，我未见过，听说是年轻的，自不是和行严先生一道挂牌的老彭律师。

“长沙路”是亚东图书馆编辑所的所在地。

“老朋友”是我的大叔孟邹。

“玉英女士”大概是陈碧兰（碧云）女士的别名，彭述之先生的爱人。陈仲翁和述之先生当时同在狱中。

“岳州路”是仲翁旧居，即被捕处，我未去过，看报才知道的。

(2)“女友潘君”是仲翁的第三个爱人。

(3)“老李”是李季先生。

“长沙老友”也是我的大叔孟邹，因住长沙路。

“双安”指高先生(语罕)和灵均女士。

“小谢”,听见大叔说过,记不起他说的名字了。(任建树补注:小谢,即谢小珊,又名谢德磐,托派中央常委。)

“任曙”,不认识。

“长兄”大概是指语罕先生,他的个子又高、又长。

(4)《自传》即《实庵自传》,《文存》即《独秀文存》,都是亚东先后印行的。

(5)“章律师”是行严先生。

灵均女士是学产科的,故有“开设诊所”的话。

(6)“老托”是指托洛斯基。

“老友”仍是我的大叔孟邹。

(7)“仲三老哥”,不知道是哪一位。

“超麟”即郑超麟先生。“资深”不认识。至于“长子”,疑指“陈大哥”,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个子也是又高又长的。“罗汉”不认识。

(8)“洗子”是君曼(高)女士所出,好像是哲民的姐姐。

(9)“灵”是灵均女士。“羽”是高先生(语罕),他的笔名有一个是“一羽”。

(10)“郑(宁)”指郑超麟先生,时在南京陆军监狱狱中。“尹(沪)”指尹宽,不知时在上海哪一个狱里。他们在《向导》里都时有文章。

“较前稿有二处字句的修改”,“望交老友”的“辩诉状稿”,我未见过。

“亚东出版的《欧洲经济发展史》(李季译)”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之误。

(11)没有什么应注的。

(12)“由行严交来铅印《辩状》二册(据他说是从老友处拿来),我想是组织所印”,似有错,不是“组织所印”,是行严先生要亚东替他排印的,名《陈案书状汇录》。但不知“《辩状》二册”便是《汇录》不是。《汇录》是我手付排付印的,记得是一千册。

“闻老友已回乡,月余始回申”,不错,我的大叔孟邹是四月一日回绩溪去的。〔是民国廿二年(1933年)〕

以上所录的信,第二封是“十一月卅日”,是1932年;第六封是“二月七日”,是1933年的信。推测或不至大误。总是三十年前的旧信了。仲翁致我的大叔的信,我一封不曾见过,再也找不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将来如出现,再录。

致胡适

适之先生：

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梦麟先生北返，当已详达鄙状。日来贱躯比梦麟先生到此时更好一点，已能稍稍吃饭与肉了，已能照常写字读书了，特此告慰故人。

审判①约在本月底，计尚有月余逍遥。判决后，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牛兰②现在即是这样的生活），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的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待最后。如果能得着纸笔，或者会做点东西，现在也需要书看以销磨光阴。梦麟先生前曾送来几部小说，惟弟近来对于小说实无丝毫兴趣，先生能找几本书给我一读否？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先生要责我要求太多了罢！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出版，能

---

① 1932年10月15日，托派中央常委机关被中西探员破获，彭述之、谢小珊等五人被捕。谢供出陈独秀的住址，当日晚陈独秀被捕。1933年4月14、15、20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26日判陈十三年有期徒刑。陈不服，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

② 1931年8月，瑞士共产党人牛兰在上海为国民党政府逮捕。

够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注音字母这一工具又太不适用,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拙著至浅陋,只是引龙出水的意思而已。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此祝健康!
梦麟、孟真、叔雅、启明、兼士及其他友好,均请代为道念。

弟仲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回信望寄段书诒兄转下,他常来此探视。

叔雅兄所著《淮南集解》,望他能觅一部送我。又白。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一个新闻记者的杂评》跋

在二十二期《红旗》周报上，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妙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它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者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它所要走的道路，是苏联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所要走的道路。"我读了这一段妙文，十分感觉得史大林派的先生们的头脑实在与众不同！在他们所谓"苏维埃临时政府"统治下的选举制和领导权的阶级性，其实质究竟是怎样，在这里不必讨论；我们必须要问：既然剥夺了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既然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与一个党——共产党的领导，所走的是十月革命道路，这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只能算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那末，要怎样才算是无产阶级专政呢？难道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吗？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读到托同志这篇文章，才知道张闻天这样与众不同的头脑，并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从他们的老师——马奴易斯基那里取来的，马奴易斯基这一"布里丹驴子式的理论"（托同志在今年一月给我们信中批评马氏的话。此信曾登在《无产者》第十期，信中所云对马氏论文之批评一文，即是这篇"狼狈的溃退"），我以为不完全如托同志所说："狼狈的溃退"和"为了抛弃民主专政的反动公式之面子"。如果他们真是在革命战略之总路线上决定了政权的阶级性，只是为了面子问题，还要保存"工农专政"这一名称，则已大大的减少了问题争论之重要性。革命之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阶级性如果决定了，什么是民主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只是玄学的学院的争论，至于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初期，还会有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反

对派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挟有丝毫怀疑的态度。列宁曾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苏维埃政权时期，更进一层的实现工农专政了。”托洛斯基同志也说：“工农专政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则是分成数部分，民主专政的空壳，只附托在当时苏维埃暂时的拥护克伦斯基与柴来特里的身上；而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果实之获得，只在工人阶级胜利以后，这个民主专政辨证的分化，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没有懂得。”

史大林派现在不但辞句上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并且，有些地方的苏维埃还是富农的领导，有些苏维埃区域共产党还不是公开的组织。在将来，如果他们发见了还有在革命高潮中向左盘旋□□□资产阶级统治□□□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党派，他们还试试民主专政这一法宝，而放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适当的时机，这就是他们不肯决然地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真正原因。这一口号之真正危险亦即在此，我们和他们的争点亦即在此，面子和名称还不是重要问题。

我在这段文章写好之□，又看见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十三期《红旗》周报上，载有一篇《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在这一文内说：“这一大会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她将根本摧毁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度，没收地主阶级豪绅军阀的土地归中农贫农雇农与红军兵士……她将废除地主国民党军阀一切……”[①]全文内没有半个字提到资产阶级；富农的土地当然也丝毫不能侵犯。现在国民党政权是地主政权；这些自然都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留了一席地；这就是他们所以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原因。

独秀　〔一九三二年〕[②]十二月二十六日

《火花》第一卷第七期

---

① 省略号是原有的。

② 本篇据抄体。作者写作时间为12月26日。抄者将年份错定为1932年，现据《火花》第一卷第七期出版日期，应为1931年。

辩　诉　状[1]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即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

---

[1]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于1933年4月14、15、20日由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进行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在第三次审讯时对所谓的犯罪证据进行了抗辩，并于4月20日书写此辩诉状，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决陈独秀徒刑十三年。陈独秀不服判决，于6月15日上诉（见本书《上诉状》）。1934年6月30日江苏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于8月21日宣告将陈独秀减刑三年，予以释放。23日，陈独秀出狱。

会的物质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够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认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意义。此种生产制,决非我等之空想。经济落后的俄国,已有初步尝试;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联日即繁荣。此新的生产制之明效大验,众人之所周知也。

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联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或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此一终极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实现。为实现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一曰: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盖以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都是直接间接宰制于帝国主义之手,非采取革命行动,击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镣锁,中国民族工业将无发展之可能。列强的海陆空军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强占了中国领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骗,均与卖国同科,尚何"民族主义"之足云。

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盖以军阀官僚自由发动他们的内部战争以破坏经济,自由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公债以饱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毁坏政治效率,甚至自由勒种鸦片、贩卖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不统一,民力不伸张,国外帝国主义之宰制不推翻,国内的军阀官僚之毒害不扫除,即所谓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亦属梦呓。中国终于是半殖民地,终于落后而已。

一曰:改善工农生活。盖以近代产业工人及其所领导的农民,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资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质上精神上抑压工农,即不啻为帝国主义挫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锋刃。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贫农,

农民终岁勤劳只以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就衰及农村之破产，而且农民购买力日弱，直接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即令能由城市输资设立农村借贷机关，亦不过向农民增加一种剥削机关而已。

一曰：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盖以贤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适于近代国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国。北洋军阀既废，代之者只应是人民的〔权力〕，若仍尚贤人与保育，则谁是贤人，堪任师权力保，伊何标准，北洋军阀亦得而尸之。况当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能力，无政治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课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

凡此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之大纲，予以前和现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国，以征求全国大多数人民之赞否。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于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者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均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

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君主专制国之称。欧洲各国推翻专制者，流血以争民主，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及实行不参政不纳税之信条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国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国亦如此，“危害民国”者何？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遗同样之教训于吾人。即或不然，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倘实失而存其名，则军阀之魁，民众之敌，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诩，妄人亦或以“共和元勋”称之，其实毁坏民权，罪即类于复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国之实质也。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

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以力服人”之政策对付吾国，同时国民党已挟同样之态度以压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党国”之罪枪决新闻记者闻矣。而予则力争表示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力，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扩大到它的历史最高阶段；予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认为一为共产党人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若法若英若

瑞士等几无此事，各国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加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只远在二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言论自由也。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为"危害民国"（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此直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与科学家的把戏，彼时固无公认之信仰与自由也。而今日之民国绝不容有此，民国而若容有此，则不啻为日本帝国主义证明其"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之非诬。

总之，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昔之"法利赛"不仇视罗马，而仇视为犹太人之自由奋斗的"热狂党"，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彼等此时有权在手，迫害异己之事，固优为之，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陈独秀

《陈独秀先生辩诉状》①

① 无出版时间和出版单位名称。现存上海市档案馆。

上 诉 状

五月二十七日奉读贵院判决书，所据理由颇露布予等政治主张，使之有目共睹，其是非当否，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待废辞众应瞭然矣。惟是，贵院亦自宣称："该反对派尚无实行暴动之准备。"仅据予等政治主张而判谓"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而判以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似此显有疑意之判决，关系予等罪状之事小，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之事大，故不得不将不服判决之理由为贵院缕晰陈之。政府即国家，与夫行使中央统治权者即统治权、即国家之说，贵院亦知其乖谬过于显明，不便公然采用，乃苦心文饰，易以国民党国民政府为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义；其词虽与前说异形，而含意所趋仍在与前说同质，其不能据此构成予等叛国之罪，亦复无殊法王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其意亦以身致法国富强之巨任丰功自许，反之者即目为叛国。清朝以为中国开辟疆土自夸，中国士大夫亦以"我国家深仁厚泽"颂之，反之者即罪以叛逆；"保中国不保大清"，即爱新觉罗氏穷治康、梁之唯一罪状。自古帝王无论创业继统，悉如梨洲所讥"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此辈专制独夫，其家天下之谬见固已无足申论。独是国民党革命，正为颠覆帝制，标榜建立民国而起，帝政仆而仍继前轨，弃"天下为公"之说，以民国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目反之者为叛国，岂其以万世一系之天赋特权自居乎！此于建设民国之约言岂不显然背叛乎！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犹之视建筑房屋之匠人即为建筑物，谓反对建设民国者之自身即为根本推翻民国，亦犹之主张更易匠人即等于毁坏建筑。世间滑稽之论，宁有过于此者乎！再衡以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至数十倍，新税名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农夫辍耕于田亩，工贾咨嗟于市廛，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

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民国景象固应如是乎？此即判词所谓"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乎？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民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此即判词所谓"于训政时期以内指导人民为革命建设之进行"乎？前年不战而断送东北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崖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政府复纵百万虎狼于民间，所谓抗日捐，所谓救国公债，所谓防空捐、飞机捐，成为强征暴敛之最新名词，人民之爱国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栗。此即判词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所应从事者乎？以予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而谓为"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而诬为"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后世。"图谋变更国体"，亦为贵院判词指责予等危害民国及叛国之一要点。夫所谓国体其大要有三：曰君主，曰贵族，曰民主共和。由民主共和而改为帝制，或前王复辟，如袁世凯与张勋之所为，固为变更国体；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虽视前者顺逆不同，而变更国体则一也。民主共和已达改制之极则，过此便无国家改制之可言。世界政论已无于民主共和之外别标新制，即根本已无变更国体之要求者，只在采用若何方法或和平进化或革命斗争，以达到巩固共和发展民主为歧点耳。是以十月革命后之新俄，国体仍属社会主义苏俄联邦共和国也。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先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中国，恢复帝制者二次，至今仍徒有共和民主之名。后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德国，年来帝制复活运动已公然行之国中，魏马宪法不绝如缕。独苏俄共和国日臻巩固，此非世界共见共闻之事乎。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是以自英人边沁著作以迄最近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和平申请书，悉以所谓"为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幸福"一语相标榜；但以何阶级人民占全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论家

自来避而不言，以自君主贵族衰亡以来，财产权以至统治权悉操诸极少数人资产阶级之手，彼单所标榜之民主政治，虽与君主或贵族专制有别，而仍不越统治者资产阶级之狭小范围，所谓大多数人民幸福等诸空头支票。惟自占人民大多数之工人、贫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始获睹真正大多数人民统治之实现；在此政权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民幸福始庶几可得可期，亦惟有经过此政权，始有达到全民福利之途径。盖以任何优良之社会制度，只能使人人为生产者（工人或农民），不能使人人为剥削者（资本家或地主），苏维埃政权正为消灭剥削制度之工具，人剥削人之制度消灭，始有全民福利之可言。即以欧美资产阶级所标榜之民主国家而论，所谓民主，虽实际只限于狭小范围，而其统治者亦不敢公然躬自撕毁其民主之假面，不得不以普选议会之名，掩饰其专政。是以自组织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制为违背民主共和，为危害国家，为叛国者，在欧美标榜民主之国家实属罕闻之事；即在君主立宪之英国，不独二百余年来无人目所谓“王之反对党”为叛逆，即今之共产党亦不被认为犯罪集团，其公布政纲、竞争选举、列席国会与法、德诸国无异。两月前独立工党集会时，党魁其高呼打倒现政府，高呼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亦不曾以图谋变更国体，危害民主政治及叛国被控于法庭。统治英国之资产阶级何以如此宽容，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特克诺克拉西”运动方轰行于美国，近复延及法兰西，其公然拮〔抨〕击资本主义及私产制度，主张根本取消之，主张组织技术家苏维埃，以实现技术家之统治，主张以“能力证券”代替金银货币，其论旨、其方策虽为左方之共产主义者及右方之资本主义者所夹击，然不闻美、法政府曾以推翻现行制度、图谋变更国体、危害共和民国及叛国罪之，美、法之统治者何以如此宽容，亦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独至东方民国之统治者仅此民主假面亦不惜躬自毁也，即此一点，已充分说明危害民国者乃所谓建设民国之领导机关之自身而非他人也。欧人有言曰：“民主政治不适用于野蛮民族”，吾人深吟此语宁不痛心！此予等所以主张继续革命，实现苏维埃政权，以完成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所未完成之民主任务所由来也。贵院判词谓予等主张苏维埃政制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实属无稽。盖以苏维埃政制并与民主共和无忤，在民国而图谋

变更国体仅只恢复帝制之一途，由北京政府而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而苏维埃政府，均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趋势，根本与国体问题不相牵涉也。北京政府由北洋各派相继行使中华民国中央统治权者十余年，吾人能谓十六年北伐战争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乎？复次，贵院判词又以“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故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苏维埃国家，则主权仅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两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为言，予等于此则益有说焉。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所谓“全民主治”或“全民统治”及“全民政治”者，皆不合逻辑之言，近代统治国家之资产阶级用以欺骗人民者也。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亦仅只达到以大多数人民统治国家已耳。过此以往，必待剥削制度消灭，因之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界限消灭，夫然后乃有真正全民平等之一境。谓阶级存在而全民得以平等者，非有意欺世亦自为童稚。剥削阶级因有被剥削而存在，统治者乃对于被统治而言，既无被统治者则全民政治所统治者何人？所以剥削制度及统治、被统治阶级既已消灭，全民平等之社会既已出现，则所谓国家统治权及一切政制悉成为历史上过去名词矣。故曰“全民主治(全民统治)(全民政治)”皆不合逻辑之诳言也。吾人第二须知主张苏维埃政制之共产党人，固不屑以全民统治之妄语欺世欺人，而并世英、美、法、德等号为民主之国家，其实际无一非资产阶级专政，所谓民主更无不限于其阶级之狭小范围，占人民大多数之工农劳苦贫民，胥隶属于被统治者之地位。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忽为之曰全民，未免过于揶揄；判词谓为“全民主治”不知置国民政府现行之“党治”及“训政”制度于何地？谓予等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更属无的而放矢矣。夫“主权”及“统治权”，乃英、法、德文“权威伦特”一语之异议，后一译名视前者较有实际意义。所谓“主权在民”，所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所谓“主权寄于全民”，其空洞无实权，以视清代加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尤过之，以故虽袁世凯以至曹锟，亦并不惜承认“主权在民”之说，盖以主

权而不行使，仅只在之、属之、寄之之虚名，实际统治者固不惜慷慨奉送也。倘责以应由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则必闻而大骇矣。“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大会闭会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此非赫然载在国民政府所须颁布之约法者乎？即宋财长最近在美国人面前之饰词，亦仅云“中国政府之后盾筑在强固之中产阶级”，奈何贵院判词竟以所谓“主权寄于全民”与“全民政治”为之遮饰耶！吾辈无欺之共产党人，固尝提出由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之苏维埃政制之主张，以诉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特为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者也。持试此以与现行政制两两相较，孰为合于民主制度，孰为危害民国，尚希贵院平心静气一思之。贵院判词当有最后之一盾，即现行法律是也。兹姑退一步而在法言法，按之现行刑法，关于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秘密罪，均有具体说明：关于内乱罪，乃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着手实行者”为条件，予等固未有此判词亦未援侵此条文。再退一步而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此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谓“叛国之宣传”，何谓叛国并无定义，稽之此法全文亦无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之明文规定。贵院判词所援用者何为“按诸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精神”，贵院仅知揣摸该法之“立法精神”，而忘却民主国家所应尊重之思想、言论自由精神，而且于法律明文之外揣摸“精神”，此种神秘方法，在法言法者固应如是乎？依上所述，予等认为贵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此即所以不服判决要求上诉之理由也。

陈独秀　六月十五日

1933 年 8 月 13 日　《法治周报》第一卷第三十三期

致汪原放信四十二封

（1933 年 6 月—1935 年 3 月）

一

方泉兄台鉴：

自去年十一月起，至本月止，承代购书物、药品甚多（并月付灵均之款），至为感谢。

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转收，不知全数若干？除以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去年十一月以前另计）务请抄一细帐赐知。无论如何深交，帐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糊里糊涂，望兄一矫正之。

潘寄百元，收付均不必列入，因系一笔整帐也。

专此敬颂

大安！

弟夷白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

这是 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的信，信封上有“南京”戳。信封上书：上海公共租界北泥城桥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所转交方泉先生启，金陵小门口高冈里刘宅缄。

“方泉”是仲翁在狱中替我取的一个别名。

“灵均”是高语罕先生的爱人。

“柏”是烈武先生，“章”是行严先生。

“潘”是仲翁后来的爱人。

“夷”是仲翁的别名，是“明夷”的简称。

“潘”是英美烟公司的一个女工。有一个时期，她曾得到许可，进监与仲翁同居。仲翁去世于江津(1942)后，潘在上海，因患癌症去世，是生前自己决定要火葬的。记得我的大叔替她办过后事(还另有朋友)可惜年份记不清了。

二

地图二份，《西游》二册，均收到。

(鉴初兄用铅笔批有“已发”两字——原)

商务新刊《英文世界地图》价金元一元。

(鉴初兄用铅笔批有“商务缺，另办《新世界列国地图》有中英文”一行——原)

已见广告，望代购一份寄来。

羽兄寄来《大美晚报》(汉文的)(登载“上诉状”的)未曾收到，大概未用信封寄，被没收了，可否再觅一份寄来?(用信封寄，或托人带)

黄医生来此一次，不知用钱若干?黄医生所开药方，已购服二次，未见有若何特殊现象，大约病未发，不易试出它的效力，现在只有继续服用再看。

望与行严先生一商，是否可将其中“清共而后……罪胡为乎来哉”这一段删去?①

莫尔干《古代社会》(南强出版吧?)望购一部寄来，能购一部英文的更好。倘英文购不着，望商之季子兄可否暂借我一读，如他此时不用。

此启

方泉兄：

弟季丹白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

---

① 章士钊《辩护词》中的一段：“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以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申报》1933 年 4 月 22 日)——编者注

以后来信，望写今名，因"明夷"此间已有知之，望告羽兄。

这是1933年的信，信封上有"二十二年八月九日南京"邮戳。信封上所写和前信一样，但发信处有"高冈里廿三号刘缄"，以前未写号头。

《古代社会》旁，鉴初兄有铅笔字注："照发中文本一本，英文本一本——借的。"

"羽兄"是高语罕先生，他号"一羽"。

"黄医生"是黄钟医生。

"季子"是李季先生。

"季丹"是仲翁的另一别名。

这封信里有"望……将其中'清共而后……罪胡为乎来哉'这一段删去"的话，可惜我一时无法查出行严先生所写的这一段话的全文了。

我只记得有一句是"成畸〔犄〕角之势"。

有一天，我到南京狱里去看仲翁，他一见面便气忿忿的，光着眼对着我说道："唉！行严真糟！你回去，马上告诉他，我再也不要他替我答辩了！你看罢！……"

他一面回头在书架上拿出一本《陈案书状汇录》来，翻到一页，说："你看！这成什么话！"我当时一看，仲翁已经在"清共而后"那一段改掉了不少的字句了。我看后，说："这一本，我可以拿回去给章老伯一看罢？"他说："好的"。

我记得是要把"反对派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江西，成为'畸角之势'"(非原文)的意思，要完全删去；这很明显，他无非不赞成说他和江西是对立的。

我希望行严先生将来可以找出那本《陈案书状汇录》来，在他的书橱里或者是文件柜里。那是我面交给他的。上面改的句子，都是仲翁的亲笔字(毛笔写的)，熟人一见便会知道是仲翁的笔迹。

最近，我访《陈案书状汇录》不得，只有在此带说一笔。如此书再也找不到了，将来如有机会，在当年的《申报》、《新闻报》、《晨报》等日报上，或者也可以找出章先生替陈先生答辩的文章来，再把那"清共而后"

的全段完全录来；不过，可惜的是仲翁亲手改的那几句句子究竟是怎么样改的，非找到我带给章先生的那一本来，无法录全了。这真是大憾事！

现在手头还有“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八日的《晨报》”上剪下的“时论”一篇，是《中央日报》的《再答章士钊(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及政府)》中有云：

“……偶忆章君在京出庭抗辩归沪之日，在沪自作谈话，曾自言政府当局于其辩词丝毫未加阻止，京中党内外各报亦尽量予以披载，不漏只字，章君且为政府辩白干涉言论之无据。”

又有云：“……记者前《论国家与政府》揭布于前月二十六日，而法院之判决即在是日。”照这样看来，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后的上海日报上，如有机会一查，章先生的“清共而后”那一篇辩词一定是可以查考得出的。

陈仲翁去世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陈案书状汇录》里亲笔修改的一段，恐怕是再也找不出来了(如下很大的功夫，自还可以找得出来吧?)，现在只有他给我的一封信里有如下的这一句了：

> 望与行严先生相商，是否可将其中“清共而后……罪胡为乎来哉”这一段删去?

这也足以证明他对江西自是存有莫大的希望的。

此信是用本国信纸、用毛笔写的，也有信封，并不是像其他的信、有时只是用练习簿(三十二开本)上的纸，用钢笔写的。可是他的字，那怕是用钢笔写的，熟人一见，也都会认得出是他的笔迹的。

我觉得这一句很可以看出仲翁的立场来的。

三、四

方泉兄：

托赵先生带上之信，谅已收到。

顷接哲子转来手书，并附来章先生致黄医生信稿(见前)，均读悉。

黄医生来此之川资、旅费，应在弟存款内开支，如不足，迟日再行筹寄补足，万不可由亚东支付。(已有款，惟尚未想得寄法；如一时无妥便方法，只好俟兄有事来此时带去。)

章、江、卢处，不必向之索款，尊见极是。

兄前偕令亲来此，在弟处毫无妨碍，因此时任何人都可来谈。闻他在南京伊文思书馆任事，如确实，可函告其时常来谈，弟顺便可托其购西文书，似甚便当。再兄处及羽兄如寄西文书与我，似亦可寄他转交也。

黄医生药方可服四瓶(每瓶十粒)，除大便稍顺利外，无他特别现象，盲肠部分已月余未作痛，谅无妨碍矣。

令叔回沪时，望告其来此一游，故人久不见，弟颇思之。

望到内山书店代购如下各书：

1. モルガン古代社会(上下卷)(如购得此书，前函所请购中英文本，均可作罢)。

2. v— ＝ r组织论。

3. 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

4. 伦理卜唯物史观。

5. ヌルキシユム方法论。

以上五书均日本改造社出版，其定价共计日金不过二元余，务望购齐寄刘女士处。

与灵、羽信，望转交。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由何家发行望示知。

《马克波罗游记》可请洪孟博或刘仁静(季子可寻着他)翻译。据我所知，他们二人，英文均可靠。其中人名、地名部分很难译，此方面，弟可尽力考证。此书在近代东方史(特别是中国)极有价值。

《古代社会》莫尔干的，亦有重译的必要(最好请季子译)，此书和《资本论》及《人类由来》为近代三大名著之一，皆世界不朽名著也。

此颂

暑安！

弟季丹白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

这也是1933年的信。

“章”是行严先生，“江”是彤侯先生，“卢”是仲农先生。

“江”、“卢”后来有款接济仲翁与否，不得而知；至于行翁处，后来由我经手，接济仲翁的钱实在不少。（每次都由我要仲翁写有亲笔收条交与行翁。）我记得有一次，行翁一面说困难，一面掏出皮夹，连六十几元几角（钞票）一概都交给我转与仲翁先作为另用再说。

方泉兄：

刚兄来此，得悉一切。带来《世界地图》一册、《古代社会》英汉文本各一册、大美报一张，均照收。最近寄来之《伦理与唯物史观》一册亦收到，勿念。（药六瓶亦收到。）

交刚兄带上钞洋一百元，望收弟帐内。

兄之婚事，刚兄亦与我谈及。我以为旧戚吴女士因家庭及子弟关系而论，固属方便；惟闻她的个性颇强刚，日久共同生活，未必于兄病体及急燥脾气有益；此事兄可不必过于固执，如有其他合适者（性情很重要），亦可图之。

弟病两月以来，曾发胀痛数次，惟未及盲肠部分，痛快放屁后，胀痛即止，此为消化不良，肠中发哮以至胀痛，此病症已毫无疑义。望以此病象告知黄医生，并问他是否继续服用前方或改服他药。Intealinol Henning 治发哮似有效，是否更有好于此者？饮食方面，何者宜食，何者宜忌，亦请黄医生开单示知。

此祝

暑安！

弟季丹叩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

日来大便还不大好，吃面包及黄牛油，不知相宜否？

余已与刚兄面谈，兹不详及。

以上两信套在一个信封里，外书“请便交原放先生转方泉先生”。赵先生名健，号畏天，是刘梦符女士的丈夫。信是托他带来的。我记得

那时赵先生是在慈幼协会工作。他从前是柏先生部下的军官。他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最宜于做“慈幼”工作。

“哲子”是哲民。他是延年、乔年、松年的弟弟,他出自君曼女士。

“令亲”是先妻的娘舅萧绳之,他后来自己在中央大学门口开过一个良友书店,卖新书新杂志与文具仪器,抗战后收歇。

“刚兄”是我的大哥乃刚。

“吴女士”是先妻的妹妹,她名彩霞。先妻只有姐妹二人,并没兄弟。

先妻比我小十二岁,她的妹妹比我的年纪更小得多,原来是不很适宜的。1937 年,先岳母去世后,她和许自诚先生结婚了。

五、六、七

方泉兄:

所托购买各书已购得否?又有二种书:

一、何礼所著 12 本小册子,内容是主张共和政治,香港出版,以前上海广学会出售,书名已不记得,只要是何礼著的便得。

二、《中亚细亚游记》(书名大致如此,其详已记不清)。上海时务报馆出版(不过十万字左右)。

右二种书,均是三十年前的古骨,但此古骨却有不朽的价值。望兄自己或乃刚兄亲到广学会(基督教的)和各石印书店详细一搜寻,如能寻得,等于获得宝物,因此二种书均极有价值,恐均已缺版了。倘购得,亚东大可重印出版,可请多人作序(弟当然要作叙)大吹一下,这种书真值得一吹也。

所购买各书,大部分均可交邮局寄刘女士,只很少部分须托赵带也。

又,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厂史、地理》、《史林》,此三种刊物均已连续出数十册,中多名著(商务印书馆已选译数种出版了),请函托日本书坊,尽所有的全部购来,我认为亚东亦可于其中选译几种出版,因其有

永久价值，且多系二、三万字的小册子，费成本并不多，虽然销数不能很多很快，而却有永久性也。亚东如有意办此事，我可为寻可靠而价贱的日文译手，由我选编指导为之。此事如商之适之兄，彼必然赞成。

《法史》(法国革命史)，程始仁的编译三种，适之的《自述》及《短篇小说》各一册，均收到。

与兄往来之帐，务望于每节给我一细帐单(以前令叔经手的只好将来另算)。此次中秋节的结帐，望交赵君带来。他将于十月一号或二号来京寓过节，所有托带之件，望于此期前送给他。

前与行兄信，不知有何结果？

兄之婚事，前途如无望，应另图；如有望，亦望勿急图；总之，勿以此等儿女事累及精神，损及事业也。此祝
一切快活！

季丹手启

〔一九三三年〕十二日

再启者：

最近病状奉告如左，请送黄先生一看。前收到“一扫散”，比晚睡前服四粒，次晨迄午泻三次，腹中胀痛难受，精神大疲，嗣即停用此药。我认为泻剂对于我病还不相宜。幸一、二日即愈。

“阿达所根”服后无特殊现象。

在今一星期前，因午饭时食牛肉五、六块，食时尚无所感觉，晚间腹部忽腹痛，手不可触，起坐转动均觉痛。腹部极右，在盲肠之右(以前作痛均在此处)近胯骨处，有硬块隆起，不独手可摸着，而且眼可看见，惟不作红色。胃及大肠亦时作阵痛，而不甚剧。此病是否盲肠发炎，还是疑问。因无热度，不作呕，硬块不作红色也。发病之因是否因吃牛肉，也不一定，因为在此前三、四日，曾食鸡腿一只，并未发病也。病时服药如后：

上午七时服“阿达所根”一汤匙。

七时半吃牛奶一碗。

吃牛奶后服“阿达所根”一汤匙。

午饭前半小时服“阿达所根”一汤匙。

饭后服 Acidol-Pehsin 一粒。

午后三时服“音特司梯拿尔”四粒。

晚饭前半小时服“阿达所根”一汤匙。

饭后服 Pehsin 一粒。

如此一、二日仍不见好，乃加服 Ohtalidon 上午十时、晚九时各一粒。

一日后，痛乃止。近来三天已渐渐回复到一星期前状况。

现时只于早点、晚饭后各服“音特司梯拿尔”三粒，午饭后服 Pehsin 一粒，他药均未服。

病根显然未除，现时只是为 Ohtalidon 勉强制住，稍一不慎，均再发堪虞也。

今后以取不作痛、不服药的方针，不知可否？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

这是 1933 年的信。

后又附一毛笔字的“又白”：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及清华《国学丛刊》，亚东曾代售否？能觅得若干册否？全部当不易得也。

罗振玉著《殷墟书契》前后编（珂罗版影印本），此书不知何处出售？哈同花园仓圣大学不知有售否？便中可问行严先生知道此书售处否？书价倘能在廿元左右，请为我购一部，特恐无此便宜耳。

以上三信并一信，信封上是“高冈里廿三号刘缄”，下注“九月十二日”，邮戳上是“南京”，廿二年九月十三日。“刘”即刘梦符女士。

只要仲翁有信来，说病状，我总要想法去看到黄钟先生，拿信给他看，再请他开药方，再办药送到南京监里去。黄先生已经摸到他的病了，所以回回总可以开好药给他服用。

我记得回回都要写信给仲翁，把黄先生怎么说告诉他，可惜都没有留底，无从知道是怎么写的了，这是很可惜的。

黄先生不厌烦，真令人感谢。后来仲翁继续服药、打针，经过一个

不短的时期，病才大好，他竟可以天天读不少时间的书，到后来，又竟能从事著作了。最后他还开始学德文了。他原来懂日文、英文、法文的。他还懂别国文不懂，我不知道了。

八

日来病未发(前二三日小伤风，服金鸡纳丸数次，已愈)，睡眠照旧好。饮食及大便亦尚可，惟精神不见佳，不能继续读五、六小时的书，尤其不好的是肌肉日见瘦削，想是胃肠中吸收滋养料的力量日弱也。

Ohtalidon "Sandoz"仿单，望送交黄先生一阅。此药据其仿单云能止一切痛，弟屡次服之都实有效。

Biolactyl 英法文说明书中均未言服法，弟暂时每饭后十分钟服一粒，俟黄先生指示时间及分量后再改正。据此药说明书所云，似乎贱恙定有益，因此药不是普通的杀菌剂，而是以人工的发酵剂克服胃肠中因发酵所生之毒，定是近世理想的治疗法。服后有如何现象，自当详陈。想黄先生亦乐闻之。

每饭前仍服"音特司梯拿尔"三粒，谅无妨也。

此外温和运动和"静坐"并行。静坐时眼观所谓视窍，即是集中精神于抱朴子所谓眉(?)间却行三寸之"上丹田"。弟以为即是脑下垂体之内分泌，殊有益于生机。不知黄先生以为如何?

〔一九三三年〕九月廿二日

这是 1933 年的信，这封信无头无尾，想来是为了带到黄先生那里请他一看，比较的方便。

九

方泉兄：

九月廿八日寄刘女士转来信，附李函，均已收到。

买书既如此之贵，自然不能买，即有钱亦不必买。如有二百三十二元，再加若干，可购一部《廿四史》了，何必买此，已设法托人借一部来看看，或者可以有望。

售地事，蔡信既到手，大约有望。惟事前必须与令亲谈好条件，否则彼钱到手，对你说一声多谢了事，你为彼白忙，真是白白地为烟鬼多筹点烟费，岂不多此一举！

你的婚事，倘你真能静待，不至妨碍做事，自然很好；惟在吴女士方面，一面回绝你，一面又怒你另作他图，殊非常情常识所可解。

我服 Biolactyl 一瓶后，食欲稍旺，大便已顺利，腹中 gas 放出也很通畅，已显出有效，望告黄先生。现在每日服"音特司梯拿尔"三次，每次三粒；Biolactyl 三次，每次二粒。拟续服。惟 Biolactyl 此间买不着，请即速在沪购二瓶寄来(前一瓶，明天即吃完)。此祝

大安！

弟季丹手启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

这是 1933 年的信。

先岳母(萧镜清女士)常对我提起家中人口太多，很困难，全家商定，决把房屋并给中央大学，要我托托蔡元培先生、罗家伦先生(中大校长)，把这件事办成。

后来我托蔡先生写一信给罗先生，用子女教育费困难为题，蔡先生竟替我写了，我带给先岳母，我便不过问了。

我是不要分钱的。

她们家的房子很不少……先妻在日，我们都不想到南京去住，依先岳母，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那里去读到大学毕业，岂有在先妻去世之后，托我卖屋，还要去分钱之理？

此种情形，仲翁实在不知道。不过他听见有人吃鸦片烟，他非常可恶，却真好。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方泉兄：

前日由邮局寄上一函，已收到否？致行严信，望便中交去。

中美图书公司或他家，如有英、德及德、英小本字典（没有汉文的）望各买一册，有小本合印者更好。我以前曾见过此类小本字典，小小本子，纵约三英寸，横约二英寸弱，一册中，英、德及德、英各半，解释少而单字并不少，价钱不过一元左右，不知此时上海能觅得否？如觅不着，望询之行严先生，他如有，请他送我一本。

再者，日本有一种各国语独羽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过一、二角，想必现在还有，或者比从前的更好些。兹开一单，请寄东京托购（其书纵横不过二、三寸，不过一百页）。

1.《蒙古语独羽》
2.《西藏语独羽》
3.《缅甸语独羽》
4.《逻罗语独羽》
5.《朝鲜语独羽》
6.《安南语独羽》
7.《马来语独羽》
8.《土耳其语独羽》

或者先去内山一问，他那里有也未可知。

昨日中秋，食物稍多，今日午间，腹又胀痛（Biolactyl 昨今两日因用罄未服，但决非因此而作痛复发），此病老不易好，请问黄医生，是否"大肠癌肿症"或有寄生虫？此祝

健康！

季丹手启

〔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

我的肠胃五日痛了一天，六、七日都好了，八日又多吃了一点，胃肠又有点胀痛，今天（双十节）还未全好。此两次胀痛，非出于偶然，我有点试验作用。

赵君带来书如下：日文书十一本（内计十种，其中：《第一ィンタナショナル史》只有第二部一本，望补购。函购时，此次要注明“改造文库本”）、《中国革命史》一本、《达尔文传》一本、《不如归》一本、《书信选辑》一本、《马克思传》三本。药：罗氏补药四瓶，Biolactyl 二瓶。又：石印《山海经》四本，前已收到。你的信及羽的信均照收。牛肉汁暂勿买，狮牌的要不得，兰庭又太贵，保卫尔比较适当，此间大瓶二元八角一瓶，沪价如何，问知再说。服罗氏补品时，拟不同时吃牛肉汁，以便试其效力。

店中经济，应早日开源节流并行。开源如令亲地皮即是一法；节流则将店用、家用双方紧缩。分等级的廉价多卖几次，或也是开源之一法。根本出书宜小心，除有价值及真能投机行销二种的，概不出版及再版。

闻令叔已回沪，确否？

兹托赵君带上一百元，望入弟帐。此祝

健康！

弟季丹手启　双十

与适之信，他到时交他。

今日（十一日）又由刘女士转来八日的信，并附有帐单。

罗氏补药，只吃一天便觉得很好，可是价钱真太贵，穷人真吃不起。

帐中一次胃药一瓶（价二元五角），一次胃药二瓶（价五元），想必都是 Biolactyl，此药也不便宜。前函说每瓶一元五角，想是笔误。同时吃此二种贵重的药，实不能再吃牛肉汁了。

另一帐单，是《文存》的帐，写的商业方式，我是外行，不大看得懂。帐上的 11 ￥是《文存》的码价吧。15％是版费吧。我猜想这帐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余，是这样吗？所谓透支，是在以前的版税帐上，我多用过三十元余，是这样吗？《文存》还可以再印吗？《字义类例》未卖出多少，还有多少呢？

看你最近的来信，孟翁似还未来沪。

我认为《今古奇观》、《诉状》(章行严先生拟编的)、《适四集》(是指《胡适文存》四集——编者注)都能销行，勿过虑！

地皮事，如令亲问你蔡信是怎样弄来的，要说是托朋友弄来的，如此才便提出分钱的话。此事，最好你自己再获写一介绍信与罗家伦，来宁为令亲接洽一下，这样办，不独事易于成，如能钱经你手，分钱更有把握。对这班鸟烟鬼，不必客气。

前托你到中美图书公司购买英文的《世界地理新字典》，有否？那里如有 L. T. 的 What next？望代购一本。致羽信，望转交。

仲叩　十一日下午

顶上又批云：

《中亚游记》(时务报馆出版)各石印局都没有吗？

兄处如有《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二集，望检出觅便带来，此时需用甚殷。最好托适之带来。

我胃肠已不胀痛了，大概与罗氏补药有关系。此药已吃三整天了，觉得很好，饭后放屁很顺利，放屁后颇觉舒适；但无屁才算是更好。此药一瓶只可用一礼拜，一个月要四瓶；Biolactyl 一个月要三瓶；音特司梯拿尔一个月要二瓶；这三种药每月要花二十六元左右，实在太多，只好过一两个月再看罢。

自传尚未能动手写(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述)，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希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

仲白　十三日

所有的药品，候我来信再买，现正在此间托人打听，如各种药价和上海相差不远，当以在此购买为便。

亚东和有正书局，以同业名义购书，如有折扣，望代买《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珂罗版印)一册，托便人带来(书重，邮寄太贵，不合算)。倘无折扣，则勿购。

又启　十五日

这是1933年的信，信封上写的是"请便交(外洋一百元)汪先生，仲托，十月十五日"记得是畏天先生带来的。

药费都成问题，读"穷人真吃不起"一句，真令人神伤。那时(以前)有些文章里常说他有"卢布"可用，自非实话。

"商业方式，我是外行，不大看得懂"这一段真叫我不解。当年上海书店、新青年社、长江书店的帐，看来他都是不看的。

L. T. 的书是否在中美图书公司可以买得，《中国革命问题》是否可以在书架上检出(寄来的，寄给编辑所的)，都记不起来了。那都是反对派——取消派——托派的书，真不知道何以又有"需要甚殷"的话？是作为研究的资料吗？

"现在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这可知在狱中看书是不能自由的。

十五

泉兄鉴：

赵先生携去函件，谅已收到。

此间药价不比上海贵，已在此购得矣，上海不必再寄。

请函日本书店为购モルガン著《古代社会》一部(改造文库本)上下二册，书到请即交邮局寄下为荷。

病体日渐痊可，知注特闻。此颂

侍安！

弟丹手启　廿四

罗氏补药已服两瓶，现停一星期再吃。

这是一个明信片，1933 年 10 月 25 日收到的，据邮戳。

发的地址是“南京乌衣巷周寄”。“周”是随便写的，并无姓“周”的人。

十六

此信望与季子一阅。

信封外面有“十一月八日”一行。

信是适之兄写给他的，录于下：

仲兄：

手示敬悉。

《资本论》，此间已托社会调查所吴半农、千家驹两君合译，已脱稿的第一册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册已在四月前付商务排印。此二人皆极可靠，皆能用英德两国本子对勘。其第二册中 Rent 的一部分也已译成。此间与社会调查所已订有契约，不便再约季子重译。季子译书能力，自然能胜任此书。但我听说中山文化馆有约季子译此书之说。如此则季子另译一本，已有着落。如不归商务发行，则两本并无冲突。如两本均归商务印行，则商务不能不因此间契约关系，继续接受此间吴、千二君之译本。

《国语稿本》，已于四月前亲交商务。顷晤云王先生，他说，稿本字太小，不便影印。排印则有许多困难。他已与馆中商如何排印之法。迟印之因在此。

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敬祝

安好！

适之　廿二、十一、二。

这是 1933 年的信，很正确。

适之兄写信总要写年分、月、日，行严先生写文章总要系甲子，都比仲翁不写年分好，极便考核。

《独秀文存》里的文章都是根据《新青年》等杂志加上年分的，否则这一个时期和那一个时期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要花很不少的时间去考据了，很不经济，很麻烦。

关于此信，仲翁来信还问过，其实已经交与李季先生看过了。

十七

泉兄：

十一日信及打针药一合，均于昨日收到，勿念。

《史林》等三种报既如此昂贵，当然不能买了。

牛肉汁此间可购，大瓶保卫尔每瓶二元一角，上海未必更便宜，望勿买来。

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他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弟前函及此函所说关于老胡之事，望勿告知他人，即令叔亦不必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店中经济既如此困难，眼前救急，除节省开支外，实无其他办法，令叔以前谨慎小心的办法，未必无理由，兄现在身当其冲，已领略其中滋味，我以前极力怂恿令叔把店交给你管，亦有必须使你早日获得经验之意。惟兄却不可以自馁，应该加倍努力为之，谨慎为之，天下无不可战胜之困难也。惟节省开支，必须以身作则，始能见谅于同事及家人，此层望兄特别注意。

前次寄来日本文十一本书中(改造文库)，《第一ィンタナショナル史》只有第二部一册，缺少第一部，前已奉告，谅已知之，不知系由东京寄来即缺第一部，或系误留兄处未曾寄来，望示知。

《反杜林》不知系何家出版(汉译)望代购一部寄来。

月余病未发,面色已较好,大便亦稍好,可无虑矣。

此祝　努力!

(前函王女士在兄处取五十元,谅已交她。)

季丹手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是1933年的信,是十一月十七日收到的,“上海”邮戳很清楚。

此信嘱办《反杜林》,可以看出,不能单搞“干燥无味”的东西了。

适之兄次年还是到牢里去看过仲翁的。

据适之兄说,他是由那时的教育部长段锡朋同他一道进监牢里去看过仲翁的。

仲翁最重感情,适之兄去看过他以后,他又不生气了。他时常要和人绝交,如行翁,如适之兄,可是火性过了,又没事了,仍旧当好朋友了。为了《新青年》的事,也闹得要和我的大叔绝交,和陈家(子沛、子寿翁)绝交,可是后来又照旧要好了。我的大叔常要说的“仲甫的脾气,真怕人哩!他的脾气发起来的时候,真是‘黄茅火性’一样呵!”

十八

方泉先生台鉴:

日文《古代社会》上下二册及汉译《经济学批判》、《工资、价格与利润》和石印书目均先后收到。惟前函所托购《经济学批判》等四种书,注明均要英文的,不是要汉译本,此书汉译本弟已有了,现在买重复了。《工资、价格与利润》买来也好,惟前函所要的,不是这书,而是李季译的、商务出版的《价值、价格及利润》。下次购书,请将原名细心看明,以免错误。此颂

近安!

弟季丹叩　十九日

这是一个明信片，1933 年 11 月 21 日收到的，据邮戳。

此信是明信片，所以索性用了“先生”两字，这是更稳妥的，他想。

十九

方泉兄：

日前收到日文汉文书二册，比即复以明信片，谅已收到。

灵、羽处久无信来，彼等仍在沪否？倘见面，望致意。

兄倘知高一涵先生沪寓地名，望即示知。

与季子信，请转交。

寄来打针药尚未用，因近来小伤风初愈也。

胃肠已渐良好，面色亦略好，勿念。

哲民借你的四十元，已还清否？如未，望催他还，至要。

令叔有信来否？何以久不出来？我很想见他谈谈，请告知他。

令亲地皮事如何办了呢？

此祝　健康！

弟季丹叩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六日

此信是 1933 年十一月廿七日收到的。据邮戳。灵、羽那时都在上海。

高一涵先生的地址打听清楚，告诉他了。那时我们正在准备出《现代文明史》，我曾求得高先生的一篇新序，置于卷首。语罕先生也写了一篇。

有些报纸上的文章，常把高一涵、高语罕先生当做一个人，实在是错的。

二十

方泉兄：

昨日寄上一函，想可与此函同时达览。

七月十日左右，曾有一与王女士函托兄转交，函内嘱她向兄处取五十元；顷接她昨日来信，竟未提及此事（相隔二十天了，实在误事非浅），想前函已失。兹特再写一信请兄转致，万请注意，勿再失去！前曾两次函询兄已否给王女士五十元，即指此款；如尚未付，望即随信付她。

兄近日想甚忙而脑中纷乱，弟又屡以琐事奉渎，罪过罪过，后当极力避免之，乞恕！

弟丹叩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

这封信是1933年十二月三日收到的，据信封上邮戳。

“七月十日”的“七”似有误，在“十二月”怎么好说“相隔二十天了”？

“王女士”即灵均。

二十一

方泉兄：

本月三日、四日两信均已读悉。

借款度日终不是办法，以后总须努力设法，能够保持入出均衡才对。（我以为缩紧仍有必要，别的积极方法，收效太慢。）

贱恙近又小发三、四日，但只胃肠微有胀痛，现已渐好，勿虑！朋友都说面色颇好，惟肌肉消瘦如故，想非短时间所能复元也。

补血针已打过三针，不见好歹，医生云非有二十针，不能见效。精神还不坏。

罗氏补药，不知能否再服一、二瓶，因其收效较速也，请问黄先生。

今晨奉上一名片，言《大美晚报》事，谅已与此信同时收到。五日的报，昨日下午送来（只有英文的，没有中文的），今晨才见到，闻系由下关专人送来，而非由邮寄，不知何故？务望通知该报馆，望每日交邮局寄来为要！

灵女士未将住址告知我，所以不能直接寄信给她，很不方便，见面时，请她把住址写给我。

我无什么须询行翁。

此祝　健康！

弟丹手启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日

这是1933年的信。

同日"早晨"的明信片并未收到，看来有些信也都会遗失了。也许已经收到，后来散失了。

二十二

方泉兄：

前致兄函中附有与季子一信，来信未提及，不知收到否？

《大美晚报》英文部，五、六、七日的报均按日收到，中文的只收到五、六两日的。六日的报昨日收到，五日的信反在今日收到。中文的均由邮局寄来，英文的均由下关派人送来，不知何故？或该报馆在下关有分社吗？倘由下关派人送报，不用我们另出钱，听其派人送也好。因鉴于中文报由邮寄反延误也。如果每日交邮，邮费过贵，则更应听其由下关送来。

寄上通商纸币十元一张，尚系去年病中由王女士从令叔手取来者，在此数次用不出，兄处倘能搭用固好，否则暂存兄处以为纪念也好。

弟丹手启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

顶上批云：

Intistinol “Henning”(音特司梯拿尔)已用完，此间索价每瓶三元五角五分，太贵，望即在沪买两瓶(只要两瓶)寄来为荷。

又白

这是 1933 年 12 月 9 日的信，11 日收到的。“通商纸币十元”大概是一张假钞票，究竟是我的大叔有意搭给仲翁的不是，不得而知。他说“存兄处以为纪念也好”，也是一句很生气的话了。

狱中信又一束

以下是 1934 年—1935 年的信了。

编号接着前面的，可知仲翁在狱中给我的信一共究竟是多少封。

每信有当注处，仍旧明注于后。

我很怀疑，仲翁的信散失的实在不很少哩。1934 年怎么会到八月才有信呢？这里大概少掉了不少的信的。

只好拣在手的先一一录下再说了。

二十三

原放兄：

刘女士回沪带去之信及文稿，谅已收到。稿送行翁后，不知彼以为可用否？接来函，屡述及行翁付款为难情形，可见此款纯由行翁拿出，并未将文稿售于书店。行翁未有书店营业，收稿何用？望兄言之行翁，可否将稿设法售出。如实无处可售，则弟便无意续作矣。

《廿五史》第一批书，不知何日可出？

顷见报上大吹补益胃肠药“赫飞灵”Hefering，未知实际如何，望便中一问黄钟医生。

此祝 健康！

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

只有此信未写时日。

二十四

原放兄：

与行公信，乞转致，有回信亦望即转示下。

哲民赴沪校继续读书，每年应缴学校之费，略有着落，望兄在弟版权费存款内，按月（自本月即八月起）付他拾元，作为另杂用度。入校之前，望能暂住兄处几日，以免小客栈之不洁。

回信交畏天或哲民均可。

此祝 暑安！

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

二十五

原放兄：

前托转章行翁信，谅已交去，回话如何，望示知！

来信望寄南京东厂街五十六号陈子美女士转交李明宜收不误。

结存兄处之款，计尚有九元五角三分八，请扫数付给静如女士手收不误。此祝

秋安！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陈子美"是仲翁的女儿，哲民的姐姐。都是君曼女士所出。

"李明宜"是仲翁的另一别名了。

"静如女士"姓吴，是郑超麟同志的爱人。那时超麟还在南京的陆军监狱里，没有出来。有一次，静如女士要我介绍她见见行严先生，托他设法要超麟同志出狱，我陪她去看过章先生的。

二十六

原放兄：

哲民来信言你说我的文章有法出版，我意非止出版，主要的是筹款。我每月开支非百元不可，此时一文没有，十分为难。我的文章至少要卖每千字十元(要现金，不要版税)，此条件不独亚东，即他处亦未必能办到，故只有托行翁商之商务，即请吾兄将弟困苦情形转告行翁。以现在的市场，我若给稿亚东，非助之，实害之也。一旦市场好转，我必为亚东写几部有价值的书。孟翁与我多年好友，必不负之。望兄放心。

静女士需用甚急，存兄处余款九元余，务求设法早日付之。此祝健康！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

二十七

方泉兄：

本月十六日手书并附件，刘女士已于前日送来。《独逸文法教程》极好，正合用。前托兄所购各书书单中并未列此书，惟前曾托羽兄购此类书，或系他送交兄寄来的吗?

日本文译手即住此间，候书寄来，弟阅后，如有可译印者，兄亦同意，即可令其动手，此时不必介绍也。

女医主持家中自是极好，惟行翁介绍之人，必须注意是否彼之妾党，品行是否可靠；倘此点无问题，弟十分赞成你就此舍吴。我妄揣吴女士之为人年幼性傲，恐不适宜于稍复杂之家庭也。托行翁介绍之人亦必须询明此点，长久同居，非一时苟合，性情不谐者，必不能终吉也。此点万望注意！

赵君有信来，他于秋节来或双十节来，尚未大定，已购得之日本文书，可择其中比较平淡者三、四种先由邮局寄来，因托赵君携带太多，恐更不便也。

你已非初婚，何以因此碍及做事的精神？真不可解？我以为在行翁尚未介绍成功之前，应先向吴女士直接正式提出婚姻问题，要求其明确答复，成则问题解决，不成亦便安心更作他图，倘始终含含糊糊，在你则方针动摇不定，在吴女士则现在有观望游移之余地，将来还有说事后的风凉话之余地（即是说：她本有意于你，只是你未曾向她正式求婚，即另与别人结合云）。不知你意以为何如，我则以为有取此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之必要。此层务望复知，因我闻你不能打起精神做事，甚为挂念也。此祝决祉。

季丹手启

我给兄的信均可留与孟翁来沪时一阅，因为在这些信中亦可得知我之近况也。

又及。

病况另函，便与黄先生一阅也。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V. Sanint Martin：***Nouveaudictionnaire de geographie universolle***《世界地理新字典》

不知中美图书公司有此书否？如有英译本，那便更好。

又及

此信以前，仲翁有一信要我面交行翁。行翁拆看后说："很好。我有四、五个女子，都是学医的。她们都是护士学校出来的。我来一个个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如果你不欢喜，不要当面说，只告诉我，再换别人。你同意的，可以先做个把月朋友，再成家。"我当然很感谢，但是我一直不曾开口要看一看那一位护士。

仲翁要行翁替我介绍一个女友，事前我实在不知道。

二十八

原放兄：

静回沪所托寄书，谅已达览。兹托静转上宣纸一条，请即送交行翁，请其大笔一挥，写好仍交兄觅便寄来。并请兄转告行翁，最好能写他的近作诗词，愈速愈好。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兹托行翁书即此四幅之一，望以此意告之行翁。此祝　健康！

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九月廿七日

此信交后，过了一些时，行翁已经写好，我问起时才知道他新做了诗，写成便拿去裱去了。这张条屏真裱得好，是绫裱的。

记得是我送交静如女士带到南京去给仲翁的。当时我把行翁所写的抄下了，今录于下：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议从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伯先京口长轰酒，子縠香山苦嗜□。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溥泉声。红渠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佛罗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

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戌初冬

甲戌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

标点是我现在随写随加的，也许有误，原来是并没有标点的。

二十九

原放兄：

前月底托静女士转上一信并附上代请行翁写字宣纸一张，谅已收到。行翁如写好，望即存兄处觅便寄来。

行翁处之款倘本月分能继续付出，望存兄处，候弟去信拨用。此信到兄处，已属月半，兄可问行翁一问能否继续付款。文稿已动手，题为《道家概论》。此一种稍冗长，一时不易写完，拟先写一短文，题名《老子考略》，写好即寄兄处转行翁，乞兄先告行翁，不知合用否？行翁收到拙稿，系售诸书局出版，或暂存置行翁处以待价，请兄询明行翁示知！

近日上海印两种全史：一、开明《二十五史》，预约价四十元；一、书报合作社《廿六史》预约价廿八元。后者比前者价钱少十二元，是否内容太差？倘二者内容不相上下，当然购书报合作社的《廿六史》；倘合作社的太投机、撒烂污，则应购开明之《廿五史》，虽稍昂贵亦无可如何也。此祝

健康！

弟明宜叩

〔一九三四年〕双十

回信望寄南京东厂街五十六号陈子美女士转李明宜收。

又启者：

开明及书报合作社两家预约券最廉之价，均以十月底满期，兄处能否代定，务望早日示知，以便弟决定办法，免得误期，是为至要！

又白

三十

原放兄：

行翁款倘交来，望与静六十元，余请代购开明《廿五史》或书报合作社《廿六史》预约券一分。专此敬祝

健康！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

三十一

原放兄：

静带来一日手书并钞洋二十四元，均收到。日内如能在行翁处取得一百四十元，望拿交静收不误。

兹托静带上文稿一册，请交行翁，无论能用与否，尚望寄还。倘能用，俟全部写定誊清后再寄上转送行翁处。倘不能用，亦望示知，以便另写别稿。

弟拟在二、三年内着手写下列各书：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家》

《耶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二十五史》预约券已定，好极。出版时嘱其直接寄弟处如何？倘邮费不甚贵，可以直接寄来，弟定《东方杂志》，每期亦由商务直接寄来也。

行翁之款，仍以交由兄转为宜，倘他往或有他项故障，不便经手再说。

孟翁出来，望来看我。

此祝　健康！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

三十二

泉兄：

《汉晋木简汇编》一大册已收到。

《玉函山房辑佚书》如有石印本，请代购一部寄来。务求派人即到各石印书局一问，并求向各石印书局索一书目寄下。

此祝　健康！

弟季丹手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

三十三

原放兄：

行翁处之款已取得否？寄去之稿，彼意云何，均望即速示知！

书报合作社之《廿六史》、《史记》已出版，开明之《廿五史》，不见动静，不知何日出版，不至成为骗局否？出版望即寄来。邮寄或太贵，能

有便人托其带来最好。寒假中静女士必来，倘迟至彼时始能出版，托她带来正好。此祝　健康！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回信望寄南京东厂街五十六号李明宜收。

三十四

原放兄：

三日手书敬悉。

行翁出钱收稿给亚东，我自不反对，惟有三事请兄答复：

1. 亚东是否承认每千字稿费十元，而且外国文翻译权保留。

2.《自传》是否收用。

3. 以现在之市面，亚东是否能印此类冷僻之书？

亚东近出二书，书名及作者之名均不能号召读者，不知何以要印那样的书？行翁《论衡》及李译《马可波罗》都要行销些，若照那样书，我的书也可印。

此祝你的健康！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

这是 1934 年的信。

三十五

原放兄：

由此回沪后未来信，不知所谋如何，至以为念。

1. 店中加新资金事有希望否？

2. 为季君谋事之事有希望否？

3. 文稿已由行翁处寻得否？

4. 行翁处，年内能通融百元否？

此四事望早日示知！文稿及钱如到手，均可交由静如带来。

此祝　健康！

弟明手启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这是1934年的信，寄“上海公共租界温州路二十七号，亚东图书馆编辑所”我收。信封上有“南京”邮戳，是1934年。

以上是1934年的信，以下是1935年的信了。

三十六

方泉兄：

别后谅早已抵沪。

所托三事，希一一赐复：

1. 托购中、英、日各书如何？

2. 蔡处已去过否？

3. 黄医生对贱恙有何意见？上次寄来打针之药已用完，此地买不着，请再购一打寄来（药名：Glycero-Coliton No. 60—1c. c.）。

兄店事实危，靠借款救济，不是办法。第一必须实行大大的减人减薪；第二兄必须早日解决婚姻问题，以便安心整顿营业。我认为必须绝对办到此二事，始能逃出危机，否则终必不免。婚姻之事必须选择一老练女子，吴女士实不相宜，务必斩钉截铁的打破以前的迷信。兄口中虽不言，弟却深深察知兄对于吴女士无理的迷信实太过也。

兄初次恋爱不也是弄昏了头脑吗？后来和已故的夫人结婚，不也很好吗？你现在的固执，也得称是错误的。望速觉悟！叨在至好，我对兄事又极关心，既已见到，便不能不言也。吴女士果然能爽快和你结婚，倒也罢了，象现在这样吊的你不上不下，实在要不得。单相思有何意义呢？

弟季丹手启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

三十七

原放兄：

久不接你信，亚东增加资本问题，谅必无望了。

为季君向北京及福建谋事的话，有无希望，请面告静如，由她函告我。

《老子考略》稿及《廿五史》一册，望交静如或哲民带来，谁先来则交谁带。

行翁处款，有则收之，交静如带来，无则不必催他。此祝

侍安！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季君"名杰，是第一监狱里的办事人，很想行严先生替他另谋一事，后来没有办成。

下面的信，也是"一月廿八"的，现在只好并在一起。

信的次序不免有错，但无法排得正确了。不写年分，真不很好。

原放兄：

日前静如女士来信说行翁已来南京，恐怕不确罢。

《廿五史》一册及稿纸早已由哲民交来，勿念！

哲民说你旧历年后将来此一行，确否？

存行翁处之稿，务望取出带来，倘失去则真糟！

报载《廿五史》第二次出书已发行，来时望带来。

商务百衲本《廿四史》缩印本价若干，及是否影印，望便中打听一下。

此祝　健康！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五年〕一月廿八日

三十八

原放兄：

兄如无要事，当然不必来。

店股款事，谅必无望（我以为章、胡都无法），则只有自己努力，极力开源节流，以勉强支持此不景气时期。年关不知如何过去？好在全上海市面都不佳，即信用欠好，也不算什么特别稀奇，望勿以此愁损身体！

章家婚事即不成也勿懊恼，行翁想亦无可如何，必非有意欺弄你也。望勿以此伤友谊。

我的稿子倘失去则真糟糕！究竟尚在与否，望向行翁讨一个明确的回答！如果已失去，得示以便重新另写，搁久殊难记忆也。

静如日内或来，《廿五史》第三册，望取交她带下。季子所译《马可波罗》倘不即时付印，能带给我校阅一下也好。《廿五史》颇有错字，确是排印而非影印。兄前所云商务百衲本价昂贵有限，谅是缩印本（请打听价若干），否则须四百余也。此祝

健康！

弟明手启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

三十九

原放兄：

今日乃刚兄来此面谈，敬悉一切。

孟翁及行翁往来信稿亦看过。书店改组后，孟翁只任董事，推鉴初任经理，我甚以此见为然。如照此办法，兄可一面帮助店中进行改组后的出版新计划（此事十分必要），一面帮助行翁做点事，兄以为然否？

店事，兄之借款主张，全是幻想，切勿再作此打算。股份公司亦不可能，不独招股不易，而且以书店历史关系，诸多窒碍难行也。唯一的办法，只有二三好友，集资合办。此制度中外都有。合资之人，当以行翁及黄（钟）先生为最相宜，章、胡（适之）如能合作，胡亦应加入；惟此事务必慎重，不可冒昧邀胡加入，是为至要！

新资五、六百万元即足用（能多更好，恐不易得）。章、黄二人如肯出任董事（合之旧资代表孟翁共计三人），五、六百万元谅非绝对不可能，虽然不很容易。据我观察，此事非孟邹到沪，便无从谈起。我看章、黄二人都有此意见，所以催速孟翁出来为要。他虽然答应出来，兄还应继续函催，且应告以兄及乃刚兄及惜余（协如）拟作何事（我以为乃刚兄或惜余到芜湖科学），使其安心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店中。孟翁未出来以前，兄应拟一详细的改组后整顿出版及发行计划。此事至要，非此，即章、黄亦未必乐于出资，特别是黄，他不无将本就利之观念也。即章非此亦无法向人挪款，因夏太太与亚东并无交情也。惟此计划必须守秘密，宜力嘱章、黄勿轻示人。

婚事，兄宜暂取冷静态度，盖缓则将来或可有成，急则立见决裂，甚至影响店事，兄必须慎之！此事行翁必大呕气（因塌了家长的面子），你托人询问一次，他为难一次，以后不可再向他提及此事了。行翁伯侄都愿意，本人不愿意，事无可疑，何必追问。此事泽民糊涂于前，行翁糊涂于后，事已至此，目前只有放松，以待将来。事已弄糟，越追问越糟，即将来终于不成，亦没有什么大不了，倘此女子果有嫌贫爱富之意，失之亦不足惜也。前几天有一世交托我做媒，此女是安徽师范毕业，将来兄如

有意，我可令她家中寄照片来看。

此祝　健康！

明宜手启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

另一函又与行翁一看。

再启者：

我的稿子不知行翁寻得否？

我以为行翁事务繁忙，应有一得力的私人秘书管理往来函件（并且应有专室办公，并誊写一人，均与律师事务所无关）及他的著作（此方面整理起来，必不在少处），系此时的手工业新法。毫无秩序的乱丢乱塞，将来失去的还不只我的文稿，将来店事如得人，兄任此颇相宜，可达此意于行翁。

又白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

这是 1935 年 2 月 18 日的信，寄“温州路 27 号”的。

四十

原放兄：

日前寄一长函，谅已收到。

哲民已转学他处，不到大同矣。他的零用，据他说，从你处取过六个月（至正月）共计六十元，对否？以后尚望能继续，惟不可直寄他，望按月交静如收，以便交我转去。

行翁手中想必甚窘，寄我之款曾提及否？

此祝　健康！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五年〕二月廿二日

四十一

原放兄：

日前奉上一长信，嗣又托静如转一信，均达览否？

弟比来手中奇窘，不知行翁处能商得若干否？如有所得，望交上海银行直寄东厂街十七号舒宜之先生转弟收不误。交上海银行寄，不需汇费也（中国银行或者也可）。

专此敬颂

侍安！

弟明宜手启

〔一九三五年〕二月廿五日

这是 1935 年的信，寄温州路廿七号，信封上有邮戳。

四十二

原放兄：

旧历正月已过，孟翁尚未出来，不知又有变动否？店中加增资本事，想尚无把握。店中生意如不佳，与哲民款，望停止，即寄，亦万勿直寄彼处，彼用度已另有办法矣。

弟欠亚东之款（孟翁手），公私两方面在三千元左右，店中又如此困难，我一时无力偿还，心中十分不安。目前办法，惟有将版税逐渐扣还，虽为数不多，亦聊胜于无耳。

廉价书目中，《文存》已加入否？望将《文存》极力推销，使我还欠可以加速。倘能销七千部以上，清还旧欠，当相差不远。重新印售以来，不知已销若干部，已有版税若干元，务乞示知！倘懒于写信，乞店中朋

友抄一帐单，交静如寄下，是为至盼！

我的文稿实已失去否？望告行翁予以明确答复！此祝

侍安！

弟明宜叩

〔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

何以屡次询问，他均置之不理！非待朋友之道！



再抗辩书

为提出抗辩事，顷奉读高等法院检察官六月二十二日上诉答辩书，对于予等六月十五日上诉书所陈各种重大事实与理由，一概抹然，置之不理，并未根据法理法文及民主政制之原则，逐点驳答，只仍旧重复前此起诉书及判决书中若干说法，并以“核阅上诉理由书意旨，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及“上诉意旨强为曲解，殊难认为有理由”等简单空洞而武断之词句了之。此绝不成其为答辩也，予等尚不欲遽以“不以法不以理只以权力”之说，轻篾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故提出再抗辩书如左文。

检察官答辩书之主要点有二，一曰：“核阅上诉理由书，谓英美法诸国对于共产党行动未认为危害国家，何以中国独异云云，殊不知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按中国固有政制，君主专制行之数千年，辛亥革命，改建民主共和，其为取法法美政制，应无辩争之余地，并世各国政制，固非一端，辛亥改革，自系择善而从，予等主张，亦复如是，上诉书征引英美法诸国政象，并非盲效某一国家，乃以明民主政制之通则，倘并此而亦目为“强为比拟”充其义必至认为“民主政制不适用于野蛮民族”。袁世凯以至古德诺筹安会诸人正以“中国有特别国情”、“人民程度不够”之说，毁坏民主共和，为此说者正为危害民国之罪魁，甚望今人勿复拾此牙秽矣，即不以择用别国善良政制之见地而言，孟子古之圣贤也，曾谓“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黄黎洲中国之名儒也，亦曾讥君主政制“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此岂可谓为出于旁行典籍或强为比拟别国政制也耶。一曰：“即以打倒三民主义，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为目的，即为危害中华民国。”按行使国家统治权之政府或人物、与所统治之国家、三者界义各别，正不必旁征欧美学说。上举孟子梨洲之言，即已显示三者之非一物，倘强

认三者为一物，谓国民党国民政府即国家试问在未有三民主义之国民党以前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中国乃一未有国家组织之部落社会乎，或谓前此已有国家，国民党颠覆满清政府及北洋政府，亦为叛国乎，此固皆常识所不许也，故即现行之约法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亦不敢悍然有国民党国民政府即国家以及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叛国或危害中华民国之规定，今高等法院检察官竟公然作此警人之解释，在近代国法学界、在中国司法界，皆属空前之壮举，奈陷国民党国民政府如梨洲之所讥何。

上举二点，关系于中国民主政制之进退存亡者，至钜且急，不得不向贵院再贡一言，贵院如认为“牵引”认为“曲解”，亦应依据法理政制，详示以曲解之所以及不应牵引之正当理由，斯折狱之道也。

陈独秀

〔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

附信封：上海法界亚尔培路三三一号国立中央研究院通信处确交蔡孑民院长台启，仲缄，七月廿二。邮戳为上海，廿二年七月廿三日十二时。

（注：此件为手抄件）



几个争论的问题[1]

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的政治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掣肘而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民主运动问题

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即是说，它能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得到政权，这本是“不断革命”的主要概念之一。这一“不断革命”的战略，在十月革命前，乃是布尔什维克和门什维克的争论之中心；两方面在各种事变各项问题上不同的策略，都由于这一不同的中心战略而分歧。门什维克阶段论的战略，即是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只好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这样划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革命论，已经由“十月”打得粉碎了。我们还很有理由可以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推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如果当时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会首先在法国民主革命中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因此假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不断革命”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不但是理论上，而且在好几次历史大事变的证验上，已经破产的阶段论，我们现在

---

[1] 1933年至1936年，陈独秀与狱中的彭述之等人及狱外的刘仁静、史朝生等人对一些问题的争论。

还在讨论它,真是不幸得很!如果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阿谀者,便应坚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决不是卑怯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的了。例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全国政权之统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召集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会议,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等等,没有那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没有那一样是中国资产阶级所愿做所能做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之胜利,取得政权,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这便是"不断革命"的战略应用于经济落后国之具体说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走"不断革命"这条生路,如果不把民主运动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拼命,如果不认为民主斗争之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斗争之胜利有相互不可分离的密切因果,而认为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时代才谈得上夺取政权,那么,真要如布哈林所说须等到数十年整个时代以后了!我敢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者,有二种人,一是巴枯宁主义者,他们根本鄙弃它;二是门什维克主义者,他们把民主主义限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改良运动。门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至少在许多人的下意识中还未能肃清。因此他们仍旧用门什维克的见解,把国际左派反对派给我们的革命民主口号右化,即是:国际左派反对派告诉我们,革命民主主义不仅用在反革命时期打击军事独裁,并且还可用在革命时期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我们的阶段论者却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反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这样还不是门什维克的阶段论,怎样才是阶段论呢?这样还不算是将民主口号右化了,怎样才算是右化呢?他们由于将民主口号右化出发正会走到感觉它不中用,想根本放弃它,会在长篇的政治论文中取消它的地位,竟以别的没有一点革命意义的口号代替它,或者仅仅为了敷衍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面子,或者为了搪塞同志间的责难。在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史大林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的理论之杂货堆上,也不痛不痒的安上民主运动和国民会议几个孤单词句,作为各种杂货之一,这更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之刻薄的讽刺。因此,我必须坚决的说:我们如果不是披着左派反

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主义者,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

“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权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倒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可惜述之无力制止他们的“过火”!述之走得这样远,恰好证明当时实有提出这一类的口号之必要。史大林派起初也很尖刻的笑骂这一口号,可是在群众中碰壁后也采用了这一口号。我们如反对这一类的口号,现在无问题,将来一定碰壁。有人说,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说这样话的人,未免太过阿谀资产阶级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历史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是反对民众政权的。真正民众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会出现。他们又自相矛盾的说,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他们又问民众是什么?我可以反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人民”是什么?托同志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国国民的“党”。之“国民”又是什么?正确的答复,只有如托同志自

己所说:“我们所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之二九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马克思眼中的民众,也作了同样的解释:民众即工人与农民。听说最近临时大会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众政权”的口号,从前反对“民众政权”口号的人们也同意了。其实这两个口号的内容是一样的;反而是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做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传口号,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

(三)国民会议问题

对于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施存统近来颇倾向史大林派,因为他认为左派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太和平了。我们且慢点责骂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有许多自命为左派反对派的人们,其诬蔑我们的民主口号,也不亚于施存统,或者还要厉害些。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综合起这些意见看来,能够说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比这样更恶毒吗!?托同志曾告诉我们: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暴动来实现;中国的党能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由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民会议通过苏维埃政制等等。在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人们眼中看来,托同志这些指示未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吧,因为托同志这些指示,和他们门什维克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和平运动的景象太相违背了。同志们,让我们不要取学者态度,专门研究研究国民会议在学理上的定义,在历史上是那一阶级的性质和能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让我们取革命战士的态度,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奋斗,为逼迫它解决我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奋斗,以至激起大众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这便

是左派反对派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运动的景象。有人曾批评我故意把国民会议口号革命化了，是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罪过，只怪中国无产阶级不安分不听和平的门什维克学者们劝告，而要走上“不断革命”的“迷途”。说不定将来又要劳驾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先生们，在国民会议斗争高涨中，再玩一次制止“过火”的把戏！

（四）经济复兴问题

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在这一观点上，列宁和斯徒卢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宁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们现在且不说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爆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承认，任何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者，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须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国经济复兴问题和现存的无产阶级能否担负革命任务的问题牵连在一起，我必须要问：所谓革命任务，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是民主任务？如系前者，便是门什维克传统的思想；倘系后者，便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评价拉退到中国还没有左派反对派，还没有共产党以前了。梁干乔正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失望，对于农民也失望，这才走回到他们的老营寨去。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如果所谓经济复兴问题，是简单的说，主张在落后的中国经济范畴以内，我们应该把手放在经济状况上升或下降这一社会的动脉上，来决定我们政治的及罢工的策略之进攻或退守，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共产主义的 A. B. C。我们已不需要这一原则的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之升降或其征兆。史大林派固执其经济危机有利于革命发展这一不完全的理论，即谬论，到处夸大经济衰退的现象，到处隐蔽经济上升的事实，以求符合于他们的盲目政策

之前提，这当然是含有罪过成分的错误。倘因为反对这一错误，而走向另一极端，即是将斗争策略依靠在虚构的还没有征兆的经济上升之前提上面，形成等待主义，这便是反对错误者多走了几步，自己也陷入错误。有些人预测的中国经济复兴，经过了整个的一年，一般的国民经济之崩坏，反而日见加大其深度与广度。现时统治者的欢迎外资(统制经济也包含在内)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跃的征兆；但是这种征兆毕竟还很脆弱，因为国内各种纷扰，使南京政府的统治还没有能恢复到它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那样稳定的地位。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这样程度的经济复兴，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谁敢在中国能民主革命完成之前作此幻想呢？在这样的经济复兴以前，除了所谓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又有那一阶级能完成民主革命呢？这样循环推论的结果，非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不止，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

(五)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

无产阶级的苏联之孤立，只有靠推动世界革命来救济。“国际条约和国内宪法同样是自身无力的白纸黑字。”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大部分是靠着帝国主义之国际的国内的矛盾冲突和苏联停止世界革命企图以求得帝国主义谅解作保障的。如果世界革命来得太迟缓，或史大林派的统治被左边来的力量所削弱以至代替它来得太迟缓，则世界资本和俄国内部的特尔米多[①]势力相呼应，史大林派的左右跳跃政策，重

---

① 为 Thermidor 译音，亦译特米多尔。1793 年 10 月 5 日，法国国民公会重颁革命历法，每月以季节时令命名。特米多尔是热月，即共和政历之第十一月(公历 7 月 19 日至 8 月 17 日)。1794 年，热月 9 日，发生政变，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送上断头台。从此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权，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

复着又加强这一呼应，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至于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联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的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自己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那里有武装进攻苏联之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史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一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单看下面二件事，已可见这一威胁的程度。苏联的美国顾问Thomas Campbell，在他的著作中说："史大林君……将我的手握在他的双手中(对我说)……在托洛斯基当权时曾有过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斯基决裂的最初原因。"(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一五一页)欧洲进攻苏联之组织者——法兰西统治阶级代表赫里欧，游俄后大肆宣扬其钦佩史大林之"六原则"。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什么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亦未必敢于冒险。所以托同志说："苏联的危机在国内不在国外。"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则与其说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政策是掩蔽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烟幕弹，不如说史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

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

1934年5月12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油印件)，"中共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 署名：雪衣

致蔡元培函

孑民先生赐鉴：

敬启者：比月以来，得晤海门陈训廷先生，与谈文字学，甚为快慰。陈先生于此道颇有深造，且多创见，独秀以能时与晤教为乐，陈君亦以居通州太孤寂，思来京获得友朋商榷之机会。因此日前曾言之于志希、孟真二兄，为寻一相当职业，使陈君得以寄居京中。闻中大及史语研究所目前均无法可设，故特陈情于先生，倘研究院其他部门或教部之图书馆及编审方面，如有可谋，请先生为之一言，使陈君有居京研究之机，则独秀之所渴望也。此上，敬祝

健康

独秀拜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

（据陈独秀手札）

选自《蔡元培书信集》（下）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①]

译者凡西按：这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陈独秀从南京监狱写给当时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一封信。中文原稿当已失落。它的英文译稿现保存在美国加州斯丹福大学胡佛学院的胡佛学院档案库中。我这里是从英译稿译回中文的。1991 年 1 月 24 日

从报纸上见到托洛茨基同志遭受法帝国主义的种种刁难，又见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所行所为的如何反动，我感到非常悲痛。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他已经把各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代之以他一己的走狗。他在中国所扶植的“领袖们”，甚至还不是他本人的走狗，而是他手下人米夫的走狗。西方的无产阶级多半不会知道，这些“领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要控制党的机关。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帝国主义者如今不再需要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他们可以通过斯大林主义者达到这个目的。那个目前只是形式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一旦被苏联各种反动势力最后压倒后，不一定要导致特米多[②]的。无论如何，斯大林派会完成它。斯大林的立场与奥国的陶尔夫斯[③]的立场相似。斯大林把十月革命的领袖们交给了西欧资产阶级与流亡在外的白俄政党。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我们不应

---

① 本件由郑超麟提供手抄译稿。

② 特米多(Thermidor)，见《几个争论的问题》一文中的注释。

③ 凡西注：陶尔夫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奥国基督教社会党领袖。1932—1934 年期间曾任奥国总理，于 1933 年独揽大权，企图建立一个法西斯式的国家，但与希特勒支持的奥国国社党冲突，结果被纳粹党人所杀。

该仅仅组织一个新党，还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①这个口号。这是我对国际书记局的建议。国民党囚禁了我们许多亲爱的同志，都不能阻遏我们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一致的精神。我们身处在野蛮的地牢之中，唯一足以鼓励我们的乃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我们给斯大林派伪造虚构的答复乃是阶级斗争。

① 凡西注：这个口号的英译为“Recreate the soviet union of October”。倘照字面直译应该是：“重建十月的苏联”。猜想这不见得是陈独秀原来的文字，故擅译如是。

金粉泪五十六首[1]

一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二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三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
（杨永泰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

四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五

世事由来似弈棋，黄龙青白耍斯梯(Swastiks)。

---

① 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去南京监狱探望陈独秀时，见到这五十六首诗，说："你给我拿去，让我的侄辈和同事都去看看罢"。他便给了我。1953 年 2 月 11 日亚东公司合营，汪将这组诗上交时，写了个便条。这组诗"有一个时期很不容易收藏，……今天捡出十分难得。故把来历写下。独秀不曾署名，也无印章，我也应该为之证明。请给我一收条"。(《党史资料》丛刊(上海)，1983 年第 3 辑第 137 页。)这组诗手迹系狂草，现藏中共上海"一大"纪念馆。

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六

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有不行。
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

七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
微笑捻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
（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

八

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
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

九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销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十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
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
（广东、湖南皆以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十一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都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十二

批颊何颜见妇人，妇人忍辱重黄金。
高官我做他何恤，廉耻声声教国民。
（蒋曾因事批邵元冲之颊）

十三

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
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十四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十五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
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

十六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十七

人心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
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十八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
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十九

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
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
（戴传贤有惧内癖，营金屋于宝华山僧舍，
颜曰不二书斋，以与僧同宿诳其妻）

二十

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

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

（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

二十一

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

三皇五帝推翻后，稻桶(道统)灰飞大圣悲。

二十二

两载匆匆亡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二十三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二十四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啕。

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

二十五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

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

二十六

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

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

（何应钦在天津宴客语）

二十七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二十八

低头分取一杯羹，实业宣传花样新。
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
（谓陈公博长实业部事）

二十九

分肥不及暗生嗔，蹩脚先生老气横。
唯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
（张人杰长建设委员所建设者，李纯遗留之电灯公司而已）

三十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三十一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雕残国脉衰。
孕妇婴儿甘并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三十二

关门闭户两争持，伛偻主人佯不知。
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
（开门闭户谓英美与日本之争持也）

三十三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
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三十四

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
检查毒品官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三十五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饰王冠只一端。
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
（故宫盗宝案乃李石曾、吴敬恒、张人杰合伙为之）

三十六

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
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
（谓汪兆铭也）

三十七

拳乱偿金万民血，故宫宝器尽连城。
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
（李石曾垄断庚款及故宫财物以十万元赠程砚秋出洋）

三十八

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
太子叨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
（孙科长铁道部时侵吞三百万元、汪兆铭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

三十九

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
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
（胡汉民嗾陈济棠杀陈树人之子）

四十

凛凛威风御史台，三光荫下集群才。

狐狸暗笑苍蝇拍，心眼歪时嘴亦歪。

（世谓监察院委员为苍蝇拍）

四十一

一门亲贵人称美，宋玉高唐结主欢。

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

（谓宋孔相继为财长）

四十二

党权为重国权轻，破碎山河万众惊。

弃地丧权非细事，庙谟密定两三人。

四十三

严惩鸦片不容情，高坐唐皇国法尊。

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

四十四

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

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四十五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

干事委员资笑谑，女权不重重花瓶。

（男干事女干事干事干干事，大委员小委员委员委委员。彼中自嘲之词也）

四十六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百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四十七

皇皇大典枉抡才，官运高低靠后台。

封锁未成民已苦，七分政治费疑猜。

四十八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四十九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

五十

委员提款连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
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五十一

垣墙属耳党先生，士气消沉官运亨。
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五十二

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
无力复仇应抱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五十三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
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五十四

嫩江血战惊强敌，爱国男儿自主张。
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

五十五

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
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
（陈立夫谓国民党为伊尹周公）

五十六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所谓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原件存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
1982年《中共党史资料》第四期刊出

附：简释《金粉泪》五十六首

陈旭麓

一九三四年，陈独秀在南京狱中以七言绝句形式写了一组诗，共五十六首，题曰《金粉泪》。南京旧称"六朝金粉"之地，是个繁华古都。这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他们歌舞升平，过着豪华腐朽的生活，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暴虐统治下，水深火热，血泪和流，这就是《金粉泪》命题的旨意。末署"所谓民国二十三年书"，表示不承认蒋介石的"民国"。原稿是汪孟邹探监时携出的，辗转秘藏，一九五九年始归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汪籍安徽，上海原亚东图书馆主人，是个出版商，与陈独秀为同乡好友。《独秀文存》就是由"亚东"出版的。

全诗是感时伤事之作。那时，中国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划为"满洲国"后，又于一九三三年占领热河，向绥东、察北、冀东进犯，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而蒋介石挟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

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百般屈从，相继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对爱国人民则残暴镇压，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他们调动百万大军，两百架飞机，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又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开始在全国玩弄"新生活运动"的花招，宣称"国民军事化"，要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还规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尊孔读经，借以掩饰他们穷凶极恶的法西斯面目，如此等等。在狱中的陈独秀，从报刊和接触人员中的所见所闻，感慨万端地写下了这组诗。

诗中涉及的面颇广，有军政大事，有生民命脉，有要人隐私，探幽阐微，言之有物有据，可以当史诗读。就诗的内容来说，反映了陈独秀虽历经艰险，失去自由，而字里行间仍流露着早年爱国革命的豪情：一、宣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华北、国民党反动派毫不抵抗的危险局势；二、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厉行法西斯和"新生活运动"的倒行逆施；三、怒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迫害和压榨；四、揭发了国民党反动头目的无耻行径。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无个人的失意呻吟，语不求工，娓娓道来，发自内心，不难窥见作者自诩"依然白发老书生"的意态。现依次诠释每首的大意，供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生活的参考。释诗甚难，失误和不妥之处，阅后请指正。

(1)"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燕，河北。云，大同。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这里借指国民党断送了东北、华北等地。天骄，汉时匈奴自称为"天之骄子"。这里借指日本。两句是说自从放弃燕、云大片国土后，敌人如醉如狂不可一世。概括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进犯的形势。"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作者说自己并没有衰老，梦里还想踏过辽河的冰霜去抗日。颇有陆游"夜阑卧听萧萧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之慨。

(2) 这首是说要人们玩弄的"新生活"花招，你们这些腐败官僚哪能招回已逝的国魂！不过是把"国家兴亡"当作儿戏罢了，"满城争看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

(3)"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清党，指"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进行的反共清党活动。倒党，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两句是说你们干的清党、倒党和复古勾当，难道天

下就此太平了吗？“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蓝衫，秀才的穿着。吴秀才，即北洋军阀吴佩孚，他是秀才出身。两句是说你们和北洋军阀并没有什么两样，当年的北伐看来是多此一举，真要笑煞了吴佩孚。

(4)“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这里的“经正”、“礼教尊”、“旧文明”都是指“尊孔读经”等复古活动。“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投壶，我国古代宴会中的礼制，也是一种游戏，以盛酒的壶口为目标，用矢投射，以投中多少决胜负。孙联帅，即孙传芳，一九二五年称五省联军司令，正当北伐军挺进韶关的时候，他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壶古礼。末一句是说孙传芳不愧为你们国民党的先辈。

(5)“世事由来似弈棋，黄龙青白要斯梯(Swastiks)。”黄龙，指清朝的黄龙旗。青白，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要斯梯，指德国纳粹标徽。两句是说世局好像下棋一样变幻，由黄龙旗变为青天白日旗，现在又要变为纳粹旗了。“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红袍，指古时以大红袍为高官礼服。蓝袍，指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青衣，贱服。晋愍帝被匈奴军掳去，叫他着青衣行酒。两句是说国民党官僚政权，厉行特务统治，青衣行酒的臣虏命运正等待着你们。

(6)“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有不行。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抽水马桶、汽车洋房是你们少不了的，其他“摩登”(现代化)都可以破坏(当年四月南京等地出现“摩登破坏团”)。只要穿上古色古香的长袍马褂，表演着中世纪的骑射(当年九月十一日报载张学良、何成濬、张群等发起“武汉骑射会”)，就是一派升平气象了。

(7)“五四五卅之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微笑捻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张大辫，指辫帅张勋。石头城，即南京城。这首是说“五四”、“五卅”既然是“亡国祸”，武昌起义也就更没有必要了。如果这样，当年在长江顽抗辛亥革命的辫帅张勋，倒可悠然自得地徘徊于石头城上了。

(8)“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赣、港、宁，是指当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胡汉民在香港、汪精卫在南京主持行政院。诸葛，即诸葛亮，这里可能是借喻蒋介石的。两句是说国民党政府的三个首脑各有势力，可怜那个梦想统一的

"诸葛亮"到处分身应付、弄得昏头转向。后两句是说经过清党应该是"党中无派"了,可是仍然是"一国三公",这一点阿斗先生看得最清楚。阿斗,这里指老百姓。

(9) 这首是说老百姓议论政治就会触犯刑典,民气在受弹压中消沉了。不要瞎说官家不好说话,老百姓本来是当牛马的啊!

(10)"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乌夜啼,乐府曲名,这里借喻老百姓的悲苦作乌夜啼。两句是说早上方忍饥挨饿躲过兵,跟着又是吏胥来催收飞机捐。后一句"将军救国要飞机"的将军,指蒋介石。

(11)"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这里似指米春霖在锦州成立辽宁政府,日本派飞机轰炸,遂失关外战略要地,日军随之进迫长城。所以后面两句说敌人快要饮马黄河,而临河还是一片沉寂,因为蒋家王朝在实行"怀柔"的投降政策啊!

(12)"批颊何颜见妇人,妇人忍辱重黄金。"批颊,打耳光。妇人,指邵元冲的老婆张默君,国民党中央委员。这首是说蒋家王朝高唱"礼义廉耻",其实都是些寡廉鲜耻之徒。"高官我做他何恤,廉耻声声教国民"二语道破。

(13)"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指出自"九·一八"起,学生爱国运动高涨,国民党反动派穷于应付,通过胡适之流叫嚷"读书救国",想把学生禁锢在书斋里。"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胡儿语,外国语。甲必丹(Captain),船长、海陆军尉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意谓学会了外国语,就好去充当买办官员,与"读书救国最平安"相呼应。

(14) 这首指蒋介石压抑民权,摧残民智,全是嬴家(秦始皇)帝王万世之业的愚民政策。

(15)"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木鞋,日本的代称,因为日本人习穿木屐。两句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已深入华北,国民党反动派只知空喊三民主义。"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祭陵,国民党提倡清明节扫墓,当年四月十三日报载戴传贤等赴陕西谒周陵(周文王墓)、茂陵(汉武帝墓)。保墓,同日报载戴传贤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

墓是“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应严禁，犯者当判刑。两句是说革命、维新都是反动，只有祭陵、保墓才能使中国中兴。反话。

(16)“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修庙，当时报载要筹一百万元以修复孔庙和作祀孔基金。扶乩，请神预卜吉凶的迷信，当时国民党一些军政要员多借扶乩决策。念经，当时报载戴传贤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是说四边烽火告急，国民党的要员一味尊孔、崇道、念佛，在他们看来做亡国奴是小事，头等要紧的是复古正人心。

(17)“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一正，双关语，指“正人心”，也指蒋中正这个人。四裔，四方边远地区。两句是说只要人人从正，样样复古，边远国家的头目就会自动罢兵言好。“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中国圣人，指蒋介石。训政，为孙中山规定建设“民国”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之一，谓人民须经过教育训练才能实行宪政，蒋介石借此剥夺人民自由，长期独裁统制。紫金山，在南京市东，孙中山陵园所在地。这两句是说你蒋介石对人民长期训政下去，就会象中山陵一样万年长青了。反话。

(18)“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德，德谟克拉西。赛，赛因斯。两句是说民主与科学是互相依存的，事功与道德怎样分得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金刚法会，讲经奉佛活动。除(16)所注外，当年四月，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在报上刊出大幅《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将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切望十方善信如期到会恭候大法”。这两句是说为了忏悔犯上作乱、目无领袖的罪恶，都要到金刚法会上来听法修行。

(19)“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宝华山，在江苏句容县北，离南京约九十里。不二门，即不二法门，佛教语。二门，指不是两个极端。法门，指修行入道的门径。这首揭露戴传贤一伙假道学的丑行，看原注自明。

(20)“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艮、兑，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落水，指吴稚晖早年在日本投水获救的事。两句是说吴稚晖仗着运气好早年没有溺死，便以钻营成名，到老官

运亨通。接着则是说可是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的烟火将断种啊！

(21) 这首是专讽戴传贤保护古墓事。大意是：保墓贤人别有怀抱，痛恨考古学家散播发掘古墓的邪词，古墓发掘了，三皇五帝和他们的道统岂不荡然无存！道统就是稻桶(饭碗)，所以死去的大圣、活着的大圣都那样悲痛。

(22)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忘，疑亡字之误。四省，指东三省和热河。两句是说匆匆两年中就丢失了四省神圣领土，"三民主义万岁"倒是叫得怪响。"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海底，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那里，子文跟到那里，诸君打到天上，子文跟到天上，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纪念周，国民党规定各机关、学校每星期一早上集合诵读孙中山遗嘱和负责人讲话的仪式。后两句是说中国终归有一条新的生路，那就是到海里去大做纪念周。

(23) 这首是讽刺国民党的逃跑主义，是说长城以外已经丢了，万里黄河也已黯然失色。还有长江的天险，国民党的官老爷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24)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啕。"苏、马，即东北义勇军将领苏炳文、马占山。蒋、蔡，即主张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将领蒋光鼐、蔡廷楷。胡儿，指日本帝国主义。汉，指中华民族。两句是说苏炳文、马占山投闲置散了，蒋光鼐、蔡廷楷被赶跑了，亲者痛仇者快。"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这两句是说蒋介石有了石敬瑭做儿皇帝的忠诚，就不用再为日本皇军去打仗了。

(25)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中夏，即中国。亡君，亡通无，意即无主。"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邻国，指日本。庆车邮，指北平政治分会派殷同和"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通邮协定。这无异是对"伪满洲国"的承认。所以讽刺地说：多谢邻邦的好安排，首先应为关内外统一庆祝通车、通邮。

(26) "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关东少帅，指张学良。淮上勋臣，指段祺瑞，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曾入保定肄业，段由天津南下，蒋介石到浦口迎接，执弟子礼。后两句看原注自明。

(27)“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虎狼，指贪官污吏。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这是讽刺国民党搞的“兴复农村”花招，不过是“虎狼百万”、“苛捐三百种”，把农民的血肉变为他们的黄金。

(28) 这首看原注自明。

(29)“分肥不及暗生填，蹩脚先生老气横。”这首是讽刺张人杰的。张人杰，即张静江。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一度任国民党主席，北伐期间宣布为浙江省主席，未到任。在南京政府的分赃中，争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发怒。张早年跛足，人称“张跷子”。后两句看原注自明。

(30)“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唐皇，即“唐哉皇哉”。炮烙、凌迟，皆酷刑。大方，这里作大道理解。两句是说严刑重典做得很堂皇，炮烙、凌迟也有大道理。“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秦皇，秦始皇，这里借喻蒋介石。博浪狙张良，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两句是说秦始皇(指蒋介石)的暴虐真是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像张良这样的人去刺杀他。

(31)“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雕残国脉衰。”朝右，古代习惯尚右座，这里指权贵。两句是说国民党满朝文武都是贪夫，有作为的人才却横遭摧残，国家的命脉越来越衰微了。“孕妇婴儿甘并命，血腥吹满雨花台。”甘并命，愿意一块儿死。雨花台，在南京市中华门外，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屠杀革命志士，解放后辟为烈士陵园。

(32)“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关门，开门之误。佝偻，病名。主人，指国民党政府。两句是说任英美和日本互相争持——一方要门户开放，一方要闭户独占，害了佝偻病的国民党政府却装聋作哑。后两句则说国民党有雄兵百万不去抗日，用来“围剿”革命人民倒是毫不迟疑的。

(33)“感恩党国诚宽大”，反话。“宽大”何在?“并未焚书只禁书”，他们只是禁书还没有烧书啊！但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一次就被查禁了一百四十九种文学书刊。而且进步人士常以言论获罪，所以后两句则说民国政府也公然屡兴文字狱，民主共和早就一命呜呼了。

(34)“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麻雀，赌具。乌鸦，指

鸦片。两句是说烟赌是祸根要严禁，投机彩票也不能随便开放。后两句则说官家却借禁赌禁烟恣意勒索，开办航空奖券大发横财。当时在报上刊登了“航空救国，储蓄致富”大幅广告。

(35)“故宫春色悄然去，无饰王冠只一端。”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春色，指宝物。无饰王冠，王冠上嵌镶的珠饰被拆偷。两句是说故宫博物院的宝物悄悄地溜走了，有珠饰的王冠变成了无饰是一件。后两句是说还有运转南方的三百箱珠宝，国民党元老们乘机扒窃，他们都成了面团团的富家翁。

(36)“珊珊媚骨吴兴体。”珊珊，妇女衣裾玉佩的声音。吴兴体，浙江吴兴赵孟頫，本赵宋宗室，仕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他的书法妩媚，称吴兴体。这首是借以讽刺汪精卫的毫无骨气。

(37)“拳乱偿金万民血，故宫宝器尽连城。”拳乱偿金，指义和团运动中的庚子赔款，后来帝国主义者部分归还，指明用途，设立庚款委员会，李石曾是法国庚款委员。连城，即和氏璧，价值连城。两句是说庚款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故宫宝物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要人，指李石曾。伶人，戏曲演员。缠头，古时歌舞者缠在头上的锦帛，这里是伶人的代称。两句是说要人垄断庚款和故宫宝物，伶人很高兴，因为一次就获得了十万元。

(38)“十三万万债台高”，指南京政府当时欠的外债。“太子叨光三百万”，指孙科任铁道部长贪污了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宗臣，位极群臣的大官，这里指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这句是说铁道部不仅是孙科的金窟，也是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外库——大荷包。

(39)“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萧何为西汉制订法制的大臣，曾被刘邦猜疑，遭囚禁。这里借指曾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与蒋介石争权，一度被囚禁于南京汤山，故说“身难免”。嗾杀，指使杀害。陈郎，陈树人之子。两句是说立法的萧何也公然违法，指使别人杀害陈家的儿郎，大家都很惊讶。“司马家儿同眷属”。司马家儿，晋永嘉五年，匈奴军刘曜攻洛阳，掳晋惠帝羊皇后，不久刘曜僭位立羊氏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这句是说刘曜与晋惠帝司马衷同一个皇后。暗指

陈树人之子与胡家眷属有暧昧事，所以胡汉民要嗾而杀之。“祝君终老妙高台”。君，似指胡汉民。妙高台，在金山上，僧了元建。这句是说你还是到妙高台去修行养老吧！

(40) “凛凛威风御史台，三光荫下集群才。”御史台，谏官，这里指国民党监察委员。三光，日、月、星。两句是说威风凛凛的监察委员，是在三光照耀下汇集的人才。反话。“狐狸暗笑苍蝇拍，心眼歪时嘴亦歪。”这两句是说有些狡猾的人讥笑监察委员只是拍拍苍蝇，因为这些谏官老爷心眼长歪了，话也是歪着说的。

(41) “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一门亲贵，指蒋、宋、孔。宋玉，战国楚人，善词赋，有《高唐赋》、《神女赋》名篇，这里指宋子文以女宠为蒋介石所宠信。“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司农，财政部。衣冠，指士人，知识分子。这两句是说何曾看见财政部长竟可私相授受，原来裙带关系胜过发愤读书。

(42) “党权为重国权轻，破碎山河万众惊。”是说以国民党一党的私利为重、国家民族的公利为轻，祖国的大好山河任敌人蹂躏谁不愤慨！“弃地丧权非细事，庙谟密定两三人。”庙谟，朝廷决策，国家大计。两三人，指蒋、宋、孔等。丢弃国土、丧失主权不是小事，现在糟到这步田地是由两三个人的谋划啊！

(43) “严惩鸦片不容情，高坐唐皇国法尊。”唐皇，疑为堂皇之误。两句是说国民党要人冠冕堂皇地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口口声声要严禁鸦片。他们实际是阳一套，阴一套。“为免欠呻溯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欠呻，疲倦的表态，这里指烟瘾发了。这两句是说惟恐被人看到烟瘾发作、眼泪鼻涕一大包，偷偷用袖子遮盖脸面吞下烟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陈布雷就是这样一个烟鬼。

(44) 这首仍是揭示国民党禁烟中的丑剧的，但丑剧已变为暴行。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报载，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十里方圆，惟见烽烟蔽天。”“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两句，就是指的这件事。

(45)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国民党诬革命为反动，略涉嫌疑，即遭迫害。拱默，两手拱着默不吱声。公卿，文武百官。两

句是说人人自危的通“匪”嫌疑多么惊心动魄，满朝文武默不吱声的好一副太平景象！后面的两句讥笑国民党官员昏天黑地过日子。

（46）“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百人。”前一句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还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国民党中还有ＣＣ和蓝衣社。后一句的“黑百人”，指沙皇时代的反动帮派组织“黑百党”，是说国民党效法沙俄“黑百人”的特务统治的。所以“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一片白色恐怖。

（47）“皇皇大典枉抡才”，指国民党煞有介事地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实际是“官运高低靠后台”。这样的作为，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徒然苦了老百姓，你们叫嚣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又有什么用！故说“封锁未成民已苦，七分政治费疑猜。”

（48）这首是说世界经济恐慌袭击到中国，使得白银外流，百业萧条，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国民党当局袖手不顾，苛捐杂税，有加无已。“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是说工商业家不懂得他们说唱的美妙“遗教”，只怕遭致歇业破产，饥寒交迫。

（49）“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是说他们粉饰太平费尽了心机，却像索命一样催逼建设捐，造成“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的悲惨情景。媪，老婆婆。

（50）这首同上一首所述的情节相似：委员接二连三地向州县提款，好心的州官无法应付弃官而去。恶吏闯入民家找不到男主人就把妇女抓走，留下了婴儿要吃奶的哀号声。

（51）这首写的是人们相戒“莫淡国事”的“万马齐喑”局面。所以说墙垣有耳，谨防国民党特务窃听惹祸，他们是借此摧残士气使自己官运亨通的。大家只有“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满纸悲愤。

（52）这首写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屈辱外交。意思是说东北、热河几千里的国土和人民被夺走了，使节还在那里打躬作揖。你们这些混蛋，即使没有能耐报仇雪恨，也不该低声下气再向侵略强盗敬香槟酒。

（53）“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是说军队布防疆场而不御敌等于废物，多少老百姓在逃亡中或死或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回銮，帝王车驾称銮，出巡返回称回銮。这里指蒋介

石于"一·二八"战起的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字以后回到南京。这两句是说临阵当逃兵已经太可耻了,回来居然还有脸皮大摆威风。

(54)开头两句指出在嫩江血战的义勇军打击了强敌,他们这些爱国男儿是自己采取行动的。"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半闲堂,是南宋宰相贾似道在西湖葛岭建立的豪华庭园。这两句是说在嫩江冰天雪地里打仗的义勇军有谁去管他们?东风吹来的暖流都汇进了蒋介石及其权贵们的豪华公馆。

(55)"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两句是说专制王朝很难期望政令宽大,每每却有功业彪炳、震动人寰的英雄人物。"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伊,商初政治家伊尹。周,西周政治家周公。这两句是说从来却没有听说向敌国屈辱投降的儿皇帝,也可同伊尹、周公一样看待。

(56)"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妖孽,古人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里指国民党反动派。一世,一代,这里作当代讲。两句是说国民党这些妖孽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当代的兴衰早已逃不掉我的眼睛。接下去的两句则说我幸喜从艰难险阻中得到了磨炼,依然是个不改初衷的老书生。这最后一首又落到作者自己身上来,与第一首相呼应。如果说第一首是作者在寇深国危中发抒自己的怀抱,最后一首则表明了作者的境遇和意志。

一九八〇年一月稿　一九八二年三月修改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期

赠望江吴幼卿联[1]

金樽银烛销春雨，
象管鸾笙护紫云。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1] 朱灿枢，安徽省望江县人。1934年，陈独秀被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时任国民党高等法院见习书记官的朱灿枢多次到监狱探慰陈独秀。陈为朱写了此联。见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民国人物联语》。

致胡适

适之兄：

由书诒[1]兄转来信及稿均收到。闻此稿费已付账，如释重负，请转达云五先生致谢，千万。如稿改好交何人转致他，并求询明示知！（弟常向此间商务分馆购书，不知可否交那里转云五先生？）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倘真要，我便真写。他们倘真要，望示以内容大致范围，即确能出版者。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乞便中转达此意于云五先生。

兄南游中，此间颇有谣言，兄应有纪行一文公表，平心静气描写经过，实有必要。弟私心揣测，兄演词或有不妥处，然圣人之徒不过借口于此，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先觉耳！

此祝

著安

弟仲甫启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

① 段锡朋，字书诒。

为刘海粟题字[①]

海粟先生雅教：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独秀

① 刘海粟说：1935 年秋，我刚从欧洲回来，见到蔡元培、杨杏佛。他们想去监狱看望陈独秀，但又不便去，跟我说：你是无党无派，你去吧！我是通过段锡朋的关系去的，见到陈，紧握他的手，说："你伟大！"他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还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陈在狱中没有忧忧不乐，很自然，有气派。我说到我在法国开画展的情况，他听了很高兴。我们谈话约一个小时，门口站着特务。临别时，我请他题字留念。他写了这副对子。在十年浩劫中，我把它辗转藏匿，才得以保存了下来。（1985 年 10 月 2 日任建树访问刘海粟于上海衡山饭店，谈话笔录。）

题刘海粟作古松图[1]

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此非调和折中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

① 1935年11月，刘海粟从黄山写生归来，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看望陈独秀，呈《古松图》与陈共赏。陈为此画写了题记。

致蔡元培函

孑民先生赐鉴：

舍亲等承先生之力保，前日已释出，其本人及独秀均至感。又有王简、贺贤深，五年前同在上海被捕，王判十五年，贺判十年，经过大赦之后，王之刑期只余四年余，贺之刑期只余二年余，二人均日久重病，再羁迟狱中，必无生理。兹特请求先生函上海警备司令部，保释就医。此二人现在京中中央陆军监狱，原判机关则为上海司令部也。屡渎至歉。专肃。敬颂

道安

独秀敬上

〔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送此信到先生处之王女士，即王君之妻也。又及。

（据陈独秀手札）

选自《蔡元培书信集》（下）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的一日[①]

朋友嘱我为《中国的一日》写点感想，在这天，我没有什么感想，且就本地风光，即就《中国的一日》这个题目，说几句话吧。

《中国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害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凡是读《中国的一日》以至读《世界的一日》的人们，应该很客观的想想这个问题，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 1936年9月初版 署名：陈独秀

---

① “1936年间，茅盾先生写给我一封短信，要我请仲翁写一篇《五月二十一日》，并附有几张《（中国的一日）征文简章》。我5月6日到南京，11日回来。在南京曾到监里去看过仲翁几次。《五月二十一日》仲翁写成寄给了我，我按照茅盾的嘱咐，于5月28日把仲翁的文稿寄给生活书店徐伯昕先生，转交给茅盾先生。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中国的一日》一书。”——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自撰遣兴联[1]

海底乱尘终有日，
山头化石岂无时。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① 据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中（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此联作于1936年南京老虎桥监狱中。

老子考略

一 老子与道家

道家本黄帝之言，道家之名非古也，初见于《史记》，《史记·陈丞相世家》："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前此战国诸子概称为"黄帝之言"，当时所谓"黄帝之言"、"神农之言"，与儒、墨并行于世，故司马迁曰："《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荀子·解蔽篇》曾称引"道经"，而他书则称"黄帝书"或"黄帝言"，黄帝轩辕氏，当非一代帝王称号（远古无帝王），或亦非专谓一人，可假定其为诸夏有力之一族（因有阪泉涿鹿战争之传说）。据《大戴记·帝繫》，黄帝产青阳及昌意，昌意产颛顼，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产子六人，六人即《国语·郑语》已、董、彭、秃、妘、曹、斟、芈，祝融八姓之祖，《史记·楚世家》称重黎、吴回相继居大正，为祝融，是祝融乃世袭名号，非一人之称，黄、熊、融三字皆取于火，盖是族以发明用火著称于世，故或言黄帝，或言有熊，或言祝融。《淮南子》、贾逵注《左传》、许慎注《说文》、高诱注《淮南子》，均谓祝融死为火神，祀于灶，祝融为黄帝之后，亦两汉诸儒无异辞，芈、楚诸王率以熊名，亦可证有熊祝融同一族系，此族入中国或最早，自阪泉战胜，追逐先住民族之苗黎，渐至燕齐以南，析为八姓，与夏商之先王同时，其后八姓除楚外，多为商周所灭，其子孙当更由徐淮（八姓之彭已居彭城，即徐淮境）南徙吴越，留燕齐者与殷之遗民混合，西阻荆楚，与兴周声教遂不相通，然楚及吴越之文化，并不逊于北方，儒书率鄙夷之，实乃偏见。史称重黎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后世阴阳家及数术方技诸家之所祖（重黎之术或与南方原住民族有关，《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曰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大荒西曰：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

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常羲、常仪、羲和，皆即重黎，八姓据地南达江淮，曰东南海，曰天虞——天虞即天吴，由地名或族名转化为人名，为水神名——曰生十日，皆可证南北文化之交流，羲和之传说，或即吴地故事，经过祝融八姓，传至北方中国，犹后世以盘古为诸夏之初祖也），此皆道家者流，道家称黄帝，并不比儒家称尧舜更为无稽。周人崛起西土，祝融八姓则广布于东土滨海之地，其环境，其生活，其文化，其思想，自难强同；自姬周统一以至春秋之世，中国学术思想，惟儒道二派，余皆后起，老聃、杨朱、邹衍、秦越人、阳庆、淳于意、蜎渊、黔娄皆燕、齐、楚地之人，秦、汉间方士，亦多出于燕、齐海上，其操术与西土周儒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异趣，以六艺与道家之天文、地理、历象、医药较，其优劣亦难言也。自学术言，道固无逊于儒，以政治制度言，道术已不适用于经济发展之秦、汉社会，以此道家学术虽广行于民间（儒家且窃取道家之言为己有，如《周易·系辞》，如《洪范》、《五行传》），而政治则不得不屈折在儒法二家之下（汉时法家言兵家言多羼入老聃书，即以此故）。自汉以来，貌为尊儒，实际所用者乃法家言，然儒有尊君之义，近于法家，以取宠于历世民贼，道家未能与之争衡（世之谀媚权贵不识人间有羞耻事者，缁流之外，即为儒者，黄冠多隐逸，其人品之高下，非偶然也），故文献日益散佚，先秦诸子所称引之“黄帝书”及“道经”，今已不可考，即《汉书·艺文志》所录《黄帝四经》四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黄帝君臣》十篇（班志于后二书均谓为六国时所作，而于黄帝四经则否。隋志亦谓：“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是《黄帝四经》隋时犹存也），亦久已散亡，今所存者，惟先秦及两汉诸子百家所称述者而已，其言义理最完备者，则为《周易·系辞》及《老子》。汉初称黄帝之言为黄老，或黄老言，或称黄帝老子之术，司马谈著《六家要旨》，班固著《艺文志》，始以道家与阴阳、儒、墨、名、法并称，魏晋以后，又称老庄，罕言黄帝矣，其后更以老子为道家之初祖。其实庄周并非道家（《庄子·天下篇》所举五家——惠施别篇，不计在内——《荀子·解蔽篇》所举六家，《天论篇》所举四家，《吕览·不二篇》所举十家，皆未老庄并列，以庄子与黄老同列道家者，始于刘歆班固），庄子虽喜称引黄老，而其根本思想“一生死齐彭殇”，实与道家背道而驰也。老聃在春秋战国间，与秦越人杨朱、邹衍，皆道家钜子（阴阳，五行，医方，历数，皆黄帝之言，司马谈分道家与阴阳家为二，刘歆、班固从之，更置数术与方技于道家之外，是

不知黄帝之术者也。《史记》自叙称父谈:"习道论于黄子",《汉书·司马迁传》师古注谓黄子为儒林传之黄生,按《史记·儒林传》,与辕固生争论之黄生,显然为法家,非道家,太史公父子于自身讲习之师承尚不明,述古学流别,自不了了也。汉之儒者,于各经师说之不同者,门户甚严,然以阴阳卦气说易,以五行说尚书春秋,则又大开其门户,不明古学流别,不独太史公父子然也),而非道家初祖,老子以前,已有"道经"与"黄帝书"行世,老聃不过祖述黄帝之言者之一人而已。《庄子·天下篇》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老子与道家关系也如此。

二　老子略历

神仙家所传老子之神话固全然无稽,即《史记·老子传》,亦全不可信,即如开始一段中所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据三注合刻本)此所记各事,无一足以征信。《庄子》、《列子》均载杨朱至沛见老聃,以老子为楚苦县人,乃由于以老莱子与老子相混而致误。先秦诸子称引老聃或老子之言,其词或义,多见于今本《老子》(例如:《庄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今本《老子》第二十八章作"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淮南子·道应训》引"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溪。"为老子语,又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权势不可以借人……其说在老聃之言失直也。"《喻老》篇:"势重者人君之渊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庄子》"天运"、"庚桑楚"、"则阳"、"寓言"诸篇,均于一事之中老聃与老子并用,明明以老聃、老子为一人。《史记》以前未有称老子为李耳者;老聃或即姓老,《韩非子》《战国策》以前,只见有老姓,不见有李姓,《风俗通义》:"老氏,颛顼子老童之后。"至于老子字伯阳,则更非《史记》原文所有,乃后人据《列仙传》而增改者(《史记》索隐曰:"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

也。"可见索隐本《史记》但云名耳字聃，并无字伯阳之文。王念孙《读书杂志》按《经典释文》序录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阳。《史记》云字聃。《文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诗注，引《史记》曰，老子字聃；游天台赋注，及《后汉书·桓帝纪》注，并引《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则陆及二李所见本，并与小司马本同。……又按《文选》反招隐诗注，引《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仙传》曰，李耳字伯阳；然则字伯阳，乃《列仙传》文，非《史记》文也）。《史记》又称老子为隐君子，依老子之思想，此说颇可信；果尔，则东土之隐君子，何至不远千里西适周而为守藏史乎？史官世业，又岂容远方流寓之人为之，且周文史官又如何弃文武周公之道而祖述黄帝也。所谓周守藏史，乃由于以老聃与周太史儋相混而致误。不但《论语》未称及老子（《论语·述而》篇何晏集解引"苞氏曰：老彭，殷贤大夫也。"皇侃亦以老彭为彭祖。郑玄以老为老聃，不足信；如果老是老聃，则应云彭老，不应称周人于殷人之上。或谓彭聃声通，老彭即老聃，更非是。彭聃二字，声类绝远，即声通亦不能以此决定重要史事；依声通假，亦如辨伪，固为解释古书之良法，然滥用之而流为谬妄者亦多矣），即《墨子》亦无之，《孟子》只言杨朱而未言老聃，可知老子并不与孔子同时。《论语》"以德报怨""无为而治"等语，或原为古语，或出于"道经"或"黄帝书"，不能据此以为老子在孔子以前之证；犹之《金人铭》亦颇类老子语意，然《荀子》（见《太平御览》）、《说苑》及《太公金匮》（见《意林》）均以为黄帝之言，或即《汉志》所载黄帝六铭之一。至如王肃所辑《孔子家语》后复几经改窜，其中所载子路之言，更不足据。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说，乃由于孔子见老莱子之传说演变而成。《史记》以老莱子为楚人，与孔子同时，著书十五篇；《汉书·艺文志》有《老莱子》十六篇，亦注云：楚人，与孔子同时。《大载礼·卫将军文子篇》，记孔子称老莱子之行曰："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贫而乐也。"《庄子·外物》篇老莱子教孔子之言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由此观之，孔子见老莱子即不必为信史，尚不失为一种近乎情理之传说。再就诸家言孔子见老子之事一观之：（一）《史记·老子传》，老子谓孔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大戴礼》则以"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为曾子之言。《庄子》则以"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为老聃教阳子居之言。又《史记·老子传》，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此与《庄子·外物》篇老莱子教孔子

之言相同，仅“躬矜”易为“骄气”，“容知”易为“态色”而已。（二）《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年十七，……偕敬叔适周见老子之事，其时间之违误，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即已致疑，清梁玉绳崔述更详证其误。（三）《庄子》言孔子见老子之事最多，《天地》篇称孔子问老聃以辩者离坚白若县寓之言；《天道》篇竟称孔子缁十二经以说老聃，又与老子谈仁义及兼爱；此皆墨翟孟轲以后之事。《天运》篇谓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按《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实五十一），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明年定公十年，孔子为鲁司寇，此二年中皆无南见老聃之事；此篇又载孔子谓老聃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载“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又载老聃谓子贡曰：“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此亦墨翟孟轲之事。（四）《礼记》乃杂采诸子而成，本不能谓为信史，其中《曾子问》尤来历不明（《大戴礼·曾子立事》等十篇，可视为汉志《曾子》十八篇之数，《小戴礼·曾子问》体裁与大戴十篇不同，不能视为十八篇之一）。《春秋经》明载：哀公二年二月季孙斯……帅帅伐邾；冬十月葬卫灵公；哀公三年秋七月季孙斯卒。而《曾子问》竟载：孔子告曾子曰，“昔者卫灵公适鲁，遭季桓子之丧。”其所称述不足信如此。此篇所载孔子自谓“吾闻诸老聃”者四事，无一非守礼（不仅是知礼）老儒之行；倘或欲以此证明老子与孔子同时，其须承认周末有两老聃，一为与孔子讲礼之老聃，一为著书反礼之老聃（如汪中即以孔子所问礼者为周守藏史老聃；著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之老聃乃太史儋）。礼若作宗教民俗解，殷礼周礼自无根本差异，而儒家之所谓礼者，非尽为实有之宗教民俗，更非所谓“不争”、“柔道”、“拘谨”之义，乃儒家杂采殷周之宗教民俗而增损之，其微言大义，在别尊卑，教忠孝，以挽封建之颓势，此儒所谓“礼”之特殊意义，乃为儒道二家不可逾越之万丈鸿沟；不明此义者，不知儒亦不知道也。如谓老聃立反礼之教，而躬行又唯礼是崇，此曲学阿世之徒，以自身滑头改容之行为，厚诬古人也。近有妄人谓老子《道德经》之思想，乃在老聃五十岁以后即与孔子讲礼以后，思想改变之结果；此类无稽之谈，与老子亦儒家及老子化胡说同属妄诞。

《史记》又谓：老子，或是老莱子（有人谓老子传中言及老莱子，是附传，

正义误认为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此说非是，附传不应有或曰二字），或是周太史儋（《史记·老子传》自“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至“世莫知其然否”一段，或非原文所有，而为魏晋间神仙家所增——《列仙传》已引“史记云二百余年”——原文首尾已确定老子之籍贯姓名及子孙系谱，而中间忽置以莫知然否之疑词，太史公不应糊涂至此。况《仲尼弟子列传》，明以老子老莱子为二人，周秦两本纪均载太史儋入秦之事，而无一涉及老子，衡以老子传首“字伯阳”为后人所增改，传尾又有人据自叙妄增，“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十字，此段由后人妄增，亦非不可能也）。按《庄子》明分老子老莱子为二人，《史记》在《仲尼弟子列传》亦为二人，今本《老子》多载先秦诸子所引老聃之言而无一语属于老莱子《大戴礼》载孔子所称老莱子之行，亦不能证明与老子为一人。聃儋耽（《吕览》“不二”篇、“重言”篇均作老耽）三字音义相同，太史儋入秦在周烈王二年（西历纪元前三七四年），下至西汉文景之世，不过二百年，假解固得为其七八代子孙，太史儋即老聃，固不失为有力之见解（毕沅汪中同以老子为太史儋，然毕氏以孔子问礼之老子与著道德书之老子为一人；汪氏则以为彼此意见乖违，年代又远隔，不能为一人，乃分为“孔子所问礼者聃……而著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按毕说固失，汪说亦未为得）；然而先秦诸子所称引老子之言见于今本《老子》书中者。概称之为老聃、老耽或老子，未有称老儋或太史儋者；且老聃与太史儋意见亦甚乖违：一指斥前识为愚之人，如何入秦予言周秦复合而霸王出；一隐居之道家，又如何同时而为游说诸侯之纵横家；周之太史，更不至同时成为痛斥周礼之叛徒。

《史记·老子传》中较为可信之事，仅末一段所记老子子孙之谱系：

> 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按此谱系注字，日本河上本《老子》葛洪序作瑶，宫字神仙传作言，假字葛洪序及神仙传并作瑕，正义本亦作瑕，日本武内义雄谓宫为崇之讹，崇即《战国策》魏将段干崇，而斋藤拙堂则以宗为段干崇。）

胶西王卬死于汉景帝三年，司马谈生于文景之世，与假解为同时人，见闻较确。以三十年为一代计算，由汉景帝三年（西历纪元前一五四年）上推二百四十年，为周安王八年（西历纪元前三九四年），在孔子死（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后八十五年，老子果于此时生，则其时代应与孟子相

前后，孟子见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即周显王三十三年（西历纪元前三三六年），在孔子死后一百四十三年，惠王称孟子为叟，此时孟子若在六十岁左右，其出生亦在孔子死后八十年顷。倘以魏将段干崇为老子之子宗，则已在战国末期，去秦始皇不远矣。《史记·魏世家》载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战国策》载魏不胜秦，使段干崇割地而和，事在魏安釐王四年，秦昭王三十四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西历纪元前二七三年），去始皇元年只二十七年，此时在孔子死后二〇六年，在孟子见魏惠王后六十三年，则老子乃远在孟子之后。然《史记·庄子传》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载楚威王使使迎庄周，许以为相；《庄子》记与惠子之问答有八，《吕览》记匡章与惠子之问答有二；据《庄子·齐物论》及《徐无鬼》，则惠子死后庄子犹存；据《庄子·徐无鬼》"儒墨杨秉四"之说，则庄子犹得见少年公孙龙子之成名；由此可见庄子与孟子同时而年较幼。《庄子》各篇均无与老子会见之事，内篇《养生主》又明记老聃之死，则老子显然在庄子之前（近有人谓老在庄后，承袭庄子思想而发展之者；果尔则庄书明记"老聃死秦失吊之"以后，乃又有一老聃出世，承袭庄子而发展之乎？此谬见实不值一驳），决不能后于孟子，《战国策》颜斶对齐宣王已引老子语。因此，以宗之孙宫当魏将段干崇为妥。总之：《史记》既言老子之子为魏将，《文子·精神篇》亦引《老子》"秦、楚、燕、魏之歌异传而皆乐"之言，以燕魏与秦楚并称，应在战国之世；又《韩非子·内储说》上，有齐王问治国于文子之记载，文子乃老子弟子，生于齐称王以后，老子年代便不应前此过远也。《孟子》杨墨并称，杨朱当在孟子之前；《庄子》以后诸子无不称引老聃，而独不见于《孟子》（即庄子盛称老聃亦多在外杂篇，内篇仅三见，乃述其事而罕举其言，庄周盖未亲见老聃著述也），可见老子并不在孟子之前，虽与孟子同时（或年稍长），以其为隐君子之故，名亦未显于孟子生前也。孟子拒杨墨排神农之言，而未及道家或黄帝之言者，当时杨朱实道家之代表也。由此，吾人得以推定：

老子即老聃，沛之隐君子也。生于周威烈王或安王时，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略与申子、惠子、孟子同时，与关伊同悦黄帝道术，著书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今名《道德经》。

关于老子略历，其比较可信者如此而已。

《史记·老子传》又谓：老子去周至关，为关令尹喜著书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此一子虚乌有之事，亦由周太史儋入秦说献公之事伪变成。《史记》之后，复代有增饰，《史记》但云"至关"；葛洪乃谓为散关，且杜撰度关日期为十二月二十五；《列仙传》作者更赠老子以青牛车；后《列异传》作者，又夺车而强令老子"乘青牛而过"。《史记》但云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王弼、葛洪乃为之署名《道德经》。《史记》但云"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列仙传》作者更加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迹(今本作遮，兹以《史记》集解所引及索隐注作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列异传》作者又从而附益之曰："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史记》但云：老子为喜著书而去，"莫知其所终"；班固《艺文志》增为"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列仙传》作者则又强令关尹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兹从集解引，今本《列仙传》作"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于是道士王浮遂撰《化胡经》一卷，由晋至唐，增为十卷或十一卷，唐时更有老子化胡图，至宋时乃附八十一化图于《化胡经》内；附会老子西去流沙化胡成佛之事日益增盛。

其实，《庄子》内篇明记"老聃死，秦失吊之"，安有西游化胡之事。由《庄子·天下》篇观之，关尹似犹在老聃之前；合观《庄子·应帝王》及《吕览》"审已"篇、"下贤"篇，关尹子乃与子列子、壶丘子、郑子产同时；即令原本《老子》乃老聃自著，是否由于关尹之请，亦难确证；其他神话，更不足信。《化胡经》图虽经元朝屡次严禁之后而亡失，近年敦煌发见唐代《化胡经》残本，其第一卷中有如下之文：

> 后经四百五十余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以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试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人天，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至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象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此辈热中化胡成佛之道士，以道教而窃取佛教故事词句，以杜撰《化胡经》，已可耻矣；高谈化胡成佛，并印度佛教和波斯摩尼教之分别

而不知之，益可悯矣。

三　老子著书

《老子邻氏经传》四卷，《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均见《汉书·艺文志》，而早已散佚；《汉志》虽无二篇之说，而《史记·老子传》言老子著书上下篇，《汉书·扬雄传》赞亦言"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两汉通行本《老子》，其为上下两篇可知。宋时《老子》注家谓：刘向定著《老子》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或云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今本《老子》多为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然司马迁、班固所见《老子》是否如此分章，殊难确知矣。《老子》注家，据唐陆德明《释文叙录》所载，共有三十一家，陆氏《释文音义》所征引者，只河上公、王弼等十三家，此谅为陆氏所亲见者。《老子》古注之存于今而可信的，亦仅王弼、河上公二家。河上公《老子章句》四卷成于汉文帝时之说，自不足信，葛玄、葛洪以前未闻有此注，为其祖孙所作而托名河上公无疑。至唐时河上公注已有二本（陆氏《释文》中往往举河上本及河上一本之异文），历代河上本经文存于今而可考者，有唐代景龙碑之《道德经》及焦山定慧寺之老子经幢，宋刊河上公本（今在《四部丛刊》中），明世德堂本《老子》及《道藏》各本，日本所传旧钞河上公本有五种，法国巴黎图书馆亦藏有敦煌唐钞河上经注残本，诸本字句颇有不同，而上篇题道经，下篇题德经则同；惟日本旧钞本之存于大阪府图书馆者，每章只提行，不题章名（见武内义雄之《老子原始》），此或为河上本之原式。王弼《老子》注本，只署《道德经》，与河上公本上篇题道经下篇题德经者不同，每章又无章目，与通行之河上公本一章为体道章，二章为养身章等亦异，故宋晁说之云："弼题是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欤。"陆德明《释文老子音义》乃依据王注本，只分上下，不记章目，此为王本不分章目之证。现行之武英殿本及浙江书局本王注《老子》，虽非以道经德经为上下二篇，而标分章次与通行之河上本同。王注在河上本之前，两者字句之不同，显然为葛氏所校改

者。二家所据经文，大体相同，所不同者，仅字句而已，此即魏晋以来流传于今日之今本《老子》。所谓今本，乃以别于淮南以前之本也；先秦及西汉各书所引老子之言，其章次及词句先后，多与今本《老子》不合，且有为今本所无者，可见太史公及淮南王所见《老子》必与王弼、河上之本不同也。

《史记》所谓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之说，亦不足信。此书一部分，或为老聃自述，或为及门弟子所记。自古相传黄帝以来之成语即所谓黄帝之言，其中韵语部分，显留口口相传之迹；其余或为老聃所作；或为老聃后学所述；最后又羼入兵家言（如第三十章，三十一章，六十八章，六十九章，皆是。自王弼以来已疑三十一章非老子所作），法家言（如第三章，十八章，十九章，五十七章，六十四章，六十五章，七十五章皆是。第十八章"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二句，《意林》所载《慎子》"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下，亦有之，一本作正文，一本列之注文。第七十五章，与《慎子》"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民富则重家，重家则安乡，安乡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贫则轻家，轻家则危乡，危乡则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义同），纵横家言（如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七十七章"功成而不居，"与《史记·蔡泽传》所引（周）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处"义同。第三十六章首八句，与魏策所引周书——当即《史记·苏秦传》所谓"周书阴符"，战国秦策作"太公阴符"，此纵横之类；至所谓"黄帝阴符经"，乃道家之类，朱子谓为唐李筌所作——"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义同。第四十七章与鬼谷之"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义同。本章末二句"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与《意林》载《六韬》——庄子陆氏释文引"司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汉志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阴符六韬或皆其篇名，惟太公在周如汉之良平，汉志列入道家是非。——"国柄借人则失其威。"义同。第六十一章亦策士语），使《老子》一书成为一部诸子大全，因此后世乃有"九流皆出于《老子》"之妄说。殷以前或仍为部落社会，即原始国家尚难言之，黄帝之言应无与治国明法；老子愤时嫉俗，亦志在复古；以此后起之儒法各家言，根本无与黄、老相通之理。不但儒之于道根本相非而不相承，即庄子亦非道家；近有人以儒墨老庄各派不同思想之分野，变为先后相承袭而次第发展之思想统系，以此推断其年代，谓老在庄后者，真是梦呓。九流同源，三教亦同源，今日又有儒释道耶同源之说，一切一切，都无差别，吾族好齐恶歧

之性达此极端，欲求科学之发达，必自力除此思想笼统之病始。各家羼入《老子》，当在西汉之初，其理由有三：（一）《庄子·胠箧》篇及《韩非子·喻老》篇均已引"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句为老子语；（二）司马谈已谓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三）《史记》老子著书上下两篇五千余言之说，当非凭空捏造也。《老子》亦如其他古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因此据《老子》以推断老聃年代，或据某章词义以推断《老子》全书年代，宜其支吾而难通也。竹简漆书时代，一人著书，自属难能之事，自《管子》《论语》以至《淮南子》，多为门徒宾客甚至后学所辑一家言，其书仍用本师之名，无所谓伪。若依据后代人著作之例（即以后代论，《康熙字典》亦非清帝自著），专以是否一人一时自著之书为真伪标准，妄疑古书，动辄斥为依托（自班固至今日），此事固大愚蠢；但如今本《老子》八十一章中羼入别家言者十六章，以至其词重复者十七：

（一）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二章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第三十四章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第七十七章

（二）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十章

道生之，德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

（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四章

塞其兑，闭其门。第五十二章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

（四）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第三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第二十四章

（五）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第二十二章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

（六）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七）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五十五章

（八）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

（九）知止所以不殆。第三十二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

（十）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十三章

（十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

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第四十八章

（十二）知常曰明。第十六章

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

（十三）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也。第三十九章

人之所恶，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第四十二章

（十四）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第四十八章

以无事取天下。第五十七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第二十九章

（十五）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第三十二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之下。第六十六章

（十六）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二十九章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六十四章

（十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七章

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第五十七章

其义矛盾者七：

（一）十八章言“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六十七章则言“我有三

宝……一曰慈”。

（二）二十章言“善之与恶，相去几何”。而七十九章则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三）三十八章对道、德、仁、义、礼以次薄之；而二十三章则言“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殊非重道德而薄仁义礼之旨。

（四）八十一章中言圣人处凡三十一，大抵皆至上人格之拟称，如《庄子》之言至人；而十九章则言“绝圣弃知，民利百倍”。

（五）同在六十四章中，始而言“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继而又言“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依无为教义，前者显然非老子之言。

（六）三十六章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彊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又言“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六十五章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此与三十七章、四十五章及五十七章“无为自化清静自止”之旨不合。

（七）第七章言“以其不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外其身而身存。”十三章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三十三章言“死而不亡者寿”。这显然与五十九章所言长生久视之道相矛盾。

加以章句之错简，文字之讹夺，几至不可读，则不得不大加辨正也。今惟就《淮南子》以前各书所称引老聃之言以及见于今本《老子》而合乎黄、老道术者，辑成一家言，然后老子教义之真面目始可得而见也。

1937年6月1日　《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一号　署名：陈独秀

为潘玉良[①]画题词

一幅画为《侧身背卧女人体》题词为：

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迫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

独秀（印）

另一幅画为《裸女》，题词为：

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白描，玉良以为然乎。廿六年初夏[②]

独秀（印）

---

① 潘玉良（1895—1977），原名陈秀清，后改姓张，扬州人。家境贫苦，幼年被卖于青楼，后嫁于潘赞化，陈独秀为唯一的证婚人。并见玉良的画有灵气，遂建议潘赞化送玉良进美专，后又建议送她去法国深造。潘玉良苦学绘画成名家。1934年回国，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这两幅及题词见于2002年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潘玉良画展。

②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被释放出狱。8月，已是南京的盛夏期。“初夏”，可知陈独秀这时还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想必是潘玉良携画前往狱中探望陈独秀时题的词。

致陶亢德[1]

亢德先生：

（上缺）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下缺）

独秀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亢德：《关于〈实庵自传〉》。1942年10月1日《古今》日刊第八期。

① 这封信未见到全文。

致蔡元培函

孑民先生函丈：

在报上见先生病后已复康宁，至为喜慰。兹特恳者，前承盛意，致函军政部请释放中央陆军监狱郑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顷据人云，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专此，敬祝

道安

独秀手叩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据陈独秀手札）



致《申报》馆编辑部[①]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五日

---

① 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司法院训令：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现将该犯原处徒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沪上各大报全文刊载“训令”。23日，陈独秀获释出狱。25日，写了这封信，但未能发表。原信无标题，存上海市档案馆。

给耕野[1]的三封信

（一）

耕野兄左右：

羽兄[2]夫妇来此已见面畅谈多次。弟明日由此乘轮赴武昌，俟到彼处再行奉告。沪上诸兄均平安否？至以为念。弟到武昌处住尚未定，赐示望寄实庵收，外加封致武昌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可也。

东方杂志及宇宙风尚能出版否，乞示知！

此祝

秋佳

实庵叩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

潘女士附候

（二）

耕野兄：

弟已抵汉，暂寓旅社，日内即移居武昌，地址确定，再行奉闻，近来信可寄王抚五兄转交。

---

① 这三封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郝盛潮先生供稿。耕野即汪孟邹。后刊于《革命史资料》第10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

② 羽兄，即高语罕。

宇宙风稿费，倘交在兄处，除付妻兄十五元外，余交王兄手收不误。

此祝

秋安

弟仲甫启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

（三）

耕野兄左右：

久未接来信，不知前在南京所上各信曾收到否？弟于日前由南京来汉口，并已租定寓所，来信望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陈仲甫收可也。兄及在沪诸友均平安否？至以为念。东方杂志及宇宙风能继续出版否？望示知！

此祝

秋安

弟仲叩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

孔子与中国

尼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摈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语·先进》），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述而》）其对于天道鬼神的态度，见诸《论语》者：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公冶长》）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义在以祭享。为治天下之本，故《祭义》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至于鬼神之果有或无，则视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

高无上之鹄的，以制躬行，至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则非所容心，此孔子之异于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旬子，亦力唱仁义礼乐而不言天鬼，至战国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说，作《中庸》(《中庸》言华岳，又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这明明是和李斯辈同时代人的口气，决非孟子之前东鲁子思所作)，始盛称鬼神之德与天道，于是孔子之面目一变；汉初传《周易》者，取阴阳家《系辞》归之孔子，大谈其阴阳不测之谓神，大谈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大谈其精气游魂鬼神之情状，大谈其极数知来，极深研几，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中庸》犹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犹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谈其河出图，洛出书(《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说，大约亦此时窜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纬》有"龙负河图，龟具洛书"之说，可证为阴阳家言)，于是孔子之面目乃再变；董仲舒号为西汉大儒，实是方士，成、哀以后，谶纬大兴，刘氏父子著书，皆兼采儒与阴阳二家之说，班固、许慎承其谬，于是孔子之面目乃三变；东汉诸帝，笃信谶纬，无耻儒生，靡然从之，白虎观讲议诸人，都是桓谭、王充所讥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论》，广引纬书，侈言三纲、六纪、五行、灾变，可说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谭还公言反谶，几以非圣无法的罪名见诛于光武，郑兴亦不善谶，乃以逊辞仅免，王充著《论衡》力辟神怪，贱儒贾逵以附和谶纬取媚民贼，亦尚言"五经家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到郑玄，他早年师事第五元，本是习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笃信谶纬，博采纬书神怪之言以注《毛诗》、《周礼》、《论语》、《孝经》、《礼记》、《尚书大传》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变，而与阴阳家正式联宗矣。从此贾逵、郑玄之学日显，桓谭、王充之说日微，影响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不为小也。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中国的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虽早已确定，但并不象孔子特别提倡礼教，以后的后世那样尊严，特别是君权更不象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三权一体的礼教，虽有它的连环性，尊君却是主要目的；这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

王室渐陵夷，各诸侯国中的商业都日渐发达，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属货币(见《周语》及《汉书·食货志》)。郑桓公东迁新郑，与商人立“无强贾”、“毋匄夺”的盟誓(见昭十六年《左传》)。齐擅鱼盐之利，“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见《史记·货殖传》)。“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见《汉书·食货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见《管子·轻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见《汉书·货殖传》)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经动摇了闭关自给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即孔门的子贡亦“废著(《汉书》作“发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见《史记·货殖传》)。是为战国白圭、计然、猗顿之先驱，这便是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势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动摇，遂至诸侯亦日渐陵夷，大夫陪臣挟“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欧洲的中世纪之末，封建陵夷以后，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间曾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Machiavelli 的君主大权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昭七年《左传》)的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所以孔门的礼教即孔门的政治思想，其内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

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可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礼记·经解》)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坊记》)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礼记·哀公问》,《大戴礼·哀公问》"庶物"作"庶民")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

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礼记·祭统》)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曾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曾子立孝》)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治之也。(《大戴礼·本命》)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大戴礼·本命》)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

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礼记·郊特牲》)

仲尼曰：……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不但孔子自己及他的及门弟子是这样，孔子之后，孔子的嫡派大儒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无论对于天鬼，对于礼教，都是孔子的继承者。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已则王乎。(《孟子·梁惠王》)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

当尧之时，……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同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荀子·礼论篇》，《大戴礼·礼三本》，"生之本"作"性之本"，"恶"作"焉"，"无安人"作"无安之人"，后世天地君亲师并祀，即始于此。）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彼君者（依俞樾说"君"下删"子"字），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养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荀子·礼论篇》）

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篇》）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篇》）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似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杨注云：告，言也；妻者，齐也；天子尊无与二，故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杨注云：适读为敌。《礼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官吏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荀子·君子篇》）

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门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司马迁谓韩非"归本于黄老"，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尊礼法与反礼法乃是儒法与黄老根本不同的中心点。）孔子是中国的 Machiavelli，也就是韩非、李斯的先驱，世人

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历代民贼每每轻视儒者（例如汉朝的高祖和宣帝），然而仍旧要尊奉孔子，正是因为孔子尊君的礼教是有利于他们的东西，孔子之所以称为万世师表，其原因亦正在此。近世有人见尊君尊父尊夫之弊，而欲为孔子回护者，妄谓"三纲"之说盛倡于宋儒，非孔子之教，而不知董仲舒造《春秋繁露》，班固纂《白虎通德论》，马融注《论语》，都有"三纲"之说，岂可独罪宋儒，孔子、孟子、荀子虽然未说'三纲'这一名词，而其立教的实质不是"三纲"是什么呢？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他积极建立起来他所独有的伦理政治学说之体系是什么呢？周末封建动摇，社会的飓风将至，故百家立说，于治世之术都有积极的独特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是黄老的主张；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这是墨家的主张；尚法、好作，这是慎到田骈的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这是惠施、邓析的主张；并耕、尽地力，这是农家的主张；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我向来反对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人们倘若因为孔子的学说在现代无价值，遂极力掩蔽孔子的本来面目，力将孔子的教义现代化，甚至称孔教为"共和国魂"，这种诬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较之康有为更糊涂百倍。

《周礼·天官大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吏，小吏在乡邑者；《地官大司徒》：联师儒。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是周之儒者，其地位与乡邑小吏同，其专职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贤属师，治属吏，非儒者之事，儒者所教的礼，当然说不上吉、凶、宾、军、嘉全部的礼，不过士民所需凶礼中的丧吊，嘉礼中的昏冠之礼节仪文而已，更说不上治术；若有人把孔门的礼教和孔子以前儒者所教六艺的礼并为一谈，便是天大的错误？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礼记·郊特牲》）。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此所谓君子小人，与

“小人哉樊须也”之小人同义，彼谓稼圃为小道末艺，非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此谓小人儒为习于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儒，非以礼教治国安民的君子儒。）这正是说礼之义不在礼节仪文之末，君子儒不以六艺多能为贵，所以孔子以后的礼和儒，都有特殊的意义，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帝制虽然两次倒台，然而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走狗，却先后昌言民国的大总统就是君，忠于大总统就是忠于君；善哉，善哉！原来中国的共和，是实君共和，还没有做到虚君共和！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人们，竟认为夫妻平等，无伤于君父二纲；美哉，美哉！原来孔子三纲一体的礼教，是可以肢解的！这些新发明，真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才。

孔子的礼教，真能够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吗？就是一班主张尊孔的人们，也未必能作肯定的答复吧！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君臣大伦不可废，无君便是禽兽；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两次推翻帝制，把皇帝赶出皇宫，律以礼教，这当然是犯上作乱；一面犯上作乱，一面又力倡祀孔，这是何等滑稽的事！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身为议员，在国会中大议而特议！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大倡其女权，大倡其男女平等；这不是反了吗！礼教明明告诉我们：“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郊特牲》）然而有些主张尊孔的人，自己竟和寡妇结婚。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馂，既食恒馂。”“非馂莫之敢饮食”。“子事父母，鸡初明……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以适父母舅姑之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枣栗饴蜜以甘之，堇、荁、

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礼记·内则》）然而主张尊孔的人，都这样孝敬父母吗？非父母舅姑之馂余不敢饮食吗？有此还要离开父母舅姑组织小家庭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内则》）“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不杂坐。”（《曲礼》）然而尊孔的人，能够愿意千百万女工一齐离开工厂，回到家庭，使之内言不出吗？能禁止男女同学吗？他们宴会时不邀请女客同席杂坐共食吗？他们岂不常常和女朋友互换名片，社交公开吗？不但女子出门不蔽面，大家还要恭维学习美人鱼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礼记》）“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礼记·内则》）然而尊孔的人，不但男女授受可亲，而且以握手为礼，搂腰跳舞，而且男子生病会请女医诊脉，女子产儿会请男医收生，孔子若活到现在，看见这些现象，岂不要气炸了肺吗？这班尊孔的人们，大约嘴里虽不说，心里却也明白二千年前的孔子礼教，已经不能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了，所以只好通融办理；独至一件与他们权威有碍的事，还是不能通融，还得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班犯上作乱的禽兽，至于他们自己曾否犯上作乱，这本糊涂账，一时也就难算了。孔子的三纲礼教所教训我们的三件事：一是“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礼记·表记》）；一是“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礼记·内则》）；一是“寡妇不夜哭”（郑注云：嫌思人道），“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郑注云：嫌媚，略之也，问增损而已）；“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均见《礼记·坊记》）。今之尊孔者，对于第二、第三教训，未必接受，对于第一个教训，到有点正合孤意了，他们之所以尊孔，中心问题即在此；汉之高帝宣帝以及历朝民贼，并不重视儒生，而祀孔典礼，则历久而愈隆，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孔子立教之本身，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此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也。如果孔子永久是万世师表，中国民族将不免万世倒霉，将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认外国统监就是君，忠于统监就是忠于君，那时万世师表的孔子，仍旧是万世师表，“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孔子之徒，只要能过事君的瘾，盗贼夷狄都无所择，冯道、

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等，正是他们的典型人物。

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提倡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

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

1937 年 10 月 1 日　《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
署名：陈独秀

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

我们每年双十节都不能不回想到廿六年前的双十。

廿六年前双十，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这一革命战争，在本质上，是对内推翻满族的统治，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宰割，在社会的动象上，后者尤重于前者，辛亥以前的收回权利运动，正是这一意义之表现。

不幸辛亥革命的结果，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也不曾解决这一问题。

一直到廿六年后双十节的今天，才动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是直接与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此次抗日战争，其对象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其涵义及历史发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所以此次抗日战争，不是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即令由这一战争做了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而在远东方面，只要中国政府始终联合苏联对日作战，仍然不会失掉革命的意义。一个革命家，难道不应该站在联合中国和苏联的人民以至朝鲜、日本的人民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赞助这一战争吗？

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谁对于抗日战争怠工，便是不愿意中国革命事业之继续前进；谁害怕革命震动，便不配抗日，要脸的只好追踪苗大哥逃到川、云、贵的深山中去，不要脸的终于要跪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前！

中国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无论政府在抗战中有何错误，甚至根本的错误，都不能作为人

们消极的理由，消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消极是革命内在的敌人！

左倾的人们，以左倾的词句掩盖他们的消极，和右倾的人们害怕革命震动，害怕民众起来，同样会葬送有世界革命意义的抗日战争！

今年第廿六双十节，我们并不须有别的纪念庆祝的仪式，前线上忠勇战士对敌人所发的炮声，便是我们的纪念、庆祝。只要我们除去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使抗日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则第廿六双十的价值，在历史上要超过第一双十多少倍。

双十节前八日，写于武昌

1937 年 10 月 16 日 《宇宙风》散文半月刊第四十九期 署名：陈独秀

抗日战争之意义

——十月六日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

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瞭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十九世纪之末，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的发展工业与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败下去，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在东方发达较晚，因之产业、生活、文化遂比较落后，大部分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供他们的奴役，在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因为各国发展不平衡，强弱遂至不同，现在单就中国和日本两国说：日本在德川时代，盛行过守旧和攘夷运动，可是他们幸运得很，在守旧攘夷运动中，社会上有力分子，受了由欧美留学回国者奔走号召的影响，渐渐感觉到守旧攘夷不是办法，由此一变而为明治维新运动，全国上下疯狂的崇尚工业与科学，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六七十年，工业与科学很顺利的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中国怎样呢？中国提倡科学与工业也略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鸿章采用西法以富国强兵的企图，不幸当时民间没有援助，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也没有发挥一点力量，李鸿章的一切设施计划，都受了守旧的清廷之阻碍而失败，使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响，因此收得了甲午年对日本战败的后果。

因战败的刺激，产生了戊戌维新运动；康梁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

动，其动力是出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其理想是输入西学以振兴工业，改革行政制度，一时震动了全国，其意义大于李鸿章时代之改革。这一运动若一直顺利的发展到现在，即令只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工业与科学之发达，国力之强盛，是不会在日本之下的，不幸这次改革，又被清廷守旧的太后派所摧残而失败，这第二次改革失败，遂酿成了庚子拳匪事变，八国联军占领首都的后果。

庚子战败后，中国更加陷入了帝国主义宰割的深渊中，赔款连息九万五千万，这样大的数目，在现在还足惊人，在那时的国计民生上更是不可承受的打击。这还是小事，最致中国死命的是：在以前的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之外，又加上全国重要的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权，和北京、天津、汉口、上海驻兵权。这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无一不是破坏中国的主权，辛丑条约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的条约，此后中国陷入半独立国家的悲境，较庚子以前更加明显了，因此国计民生日增困苦。清廷之无能而又横暴，很明白的摆在人民面前，排满革命论逐渐抬头，君主立宪论逐渐失势，于是乃有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辛亥革命的朝气，本有收回主权，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发展工业与科学的希望，不幸又遇到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之反动，一切都趋向复古，此次革命在推翻满清帝制是成了功，在完成国家独立以致富强的大改革又失败了，因此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欧战中有了一点发展，又加以俄国革命之刺激，革命党之努力及工农之奋起，于是乃有轰动全国的北伐战争运动，以此次运动的朝气，本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不幸又以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而失败了，因此酿成了“九一八”的后果。

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业与科学，一直顺利的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阶段，戊戌维新时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理论，经过袁世凯反动时代梁启超的渲染，至今犹支配着知识分子的头脑，至今还有人认为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大刀队能够抵抗敌人的机关枪和大炮，这就是中日强弱之所由分，也就是一般

恐日病者主和派(实际是投降派)之理论及事实的根据。

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

此次抗日战争,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也不是由于民族的复仇,更不是为了正义、人道、和平,这些好听的空洞名词,而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战争之对象,虽然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军阀政府;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

每个民族之国家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必须力争关税自主,采用保护政策,本国的幼稚工业才能够和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工业品竞争,自由贸易政策,在工业有高度发展的国家,有大量的商品输出并且农产品不足,才能适用,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如纺织、人造丝、火柴、肥皂、面粉、纸烟、水泥等,正因为处于半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但不能对于上举各项工业品施行关税保护政策(现时海关增税的,仅仅是少数的奢侈品,虽然增多一点政府财政的收入,而于保护上举各项工业无所裨益),抵制倾销,而且各国还有在中国境内设厂,航行的特权,此种状况不改变,依资本竞争的规律,中国的民族工业,便永远不能抬头,这是中国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基本原因。

前年日本广田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

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是第五次,到了对帝国主义武装冲突阶段,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

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两方面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各自反对其本国的侵略战争，使之失败，因为这种战争只有牺牲人民，而没有进步的意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被侵略国的人民，抬起头来打倒掠夺他们的强盗，乃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应该起来反对其本国政府，而被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则应援助其本国政府，使之获得胜利，此种胜利，不但使本国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使被侵略国的被压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机会，因此，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帝国主义战争，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此次抗日战争有严重的意义，决不可当作儿戏，战胜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并且使别的工业先进国亦不能够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根据历史的经验，以前德意志、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都是经过对外战胜，循外交途径，收回了独立国家所必需的主权，脱离了半独立国的地位，在中国，德俄两国的特权已经放弃，法、美、意、比等国与我关系较小，惟英国在华势力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英人素来持重，近年对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非以前的英国可比，聪明的美国人，比较日本更懂得中国国民要求解放运动的意义与力量，未必肯蹈日本一味蛮干而失败的前辙；如果中国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或者不必经过战争，而循外交途径，以次收回，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然而绝对不是幻想。

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

有人以为中国如是之大，不至灭亡，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中国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把不愿充当傀儡的人们赶到川云贵山中和苗大哥作伴，这不是亡国是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即对于各种傀儡的组织，也利于他们分立，更易于由他摆布，并不容许他们统一和力量强大起来，近日谣传溥仪将迁北平。余不

信会有此事，因为日本的政策不愿以一个傀儡的组织统治全中国。

假使民众不起来，政府的军事势力始终陷于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弃华北，这种南方暂时偏安的局面，也会日趋于全中国灭亡之路。

投降派唯一的理论及事实之根据，是中国在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敌，他们不懂得日本不能用全部力量对中国战争，他们更不懂得中国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能仅仅拿两方政府手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估计最后的胜负，中国政府手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的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补充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两种力量之补充，不但投降派振振有词，即主战派将来也会动摇，所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首先必须深刻的了解抗战之真实意义，才会有始终坚决不挠的意志。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1937 年 11 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

辛亥革命，在实质上，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总之是建设民族独立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惜乎当日的政府口号，是偏于排满，当日的工作，是偏于军事，满清一推翻，军事一停止，人民以为革命已经完结，即党人亦感觉无事可做。真正认为革命尚未完成，并且前途还甚辽远的，只孙先生一人。民国八九年间，孙先生曾对我说："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族，可是救了革命党人！"孙先生见我完全了解他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异常高兴，如是接着大发议论道："我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一般党人都不感兴趣，甚至说我空想，多事，孙瑶卿在汉口公开的反对我提倡三民主义，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革命，现在满清已推倒，革命已成功，何必又来谈什么主义呢？他说的这些话，是代表许多党人心理的，像他们这些近视，还懂得什么是革命呢？"这一段话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脑中响亮着。我们在今日的抗日战争中，切切不可忘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我们不要使政治工作落在军事后面，我们不要以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的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

1937 年 10 月 10 日 《武汉日报》 署名：陈独秀

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在汉口青年会讲演

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这个题目。

现在有许多人都在说:"我们对日战争,要得最后的胜利,"并且说,"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怎样的胜利才是最后的胜利呢?同时,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呢?这一点,我们应当具体的说明,仅仅抽象的说说胜利,那是过于空洞的。

今天有很多人都在骂"和",以为和就是投降,其实一个国家打仗,有战必有和,说和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只看怎样的和法。如果是屈服的和,那是投降;如果是对等的和,那是可以的。民族战争,和是可以,投降则不可。

前几天我在华中大学曾经讲过此次抗战意义,今天当然已经用不着再说这一方面的话,不过我当时有一个结论是不能不提一提的:我说这一次抗日不是感情的,复仇的,而是求中国在国际上、经济上脱离半独立的地位,得到完全独立的地位。不然,则我们是奴隶的生存。我们必须经济能自由发展,不受外国任何势力的宰制。这才是我们战争的意义,才是我们战争的目的。

我们的胜利,是不是要割取日本的土地呢?不是。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只要他交还侵略去的土地。是不是要他赔款呢?不是。因为赔款是负担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们不是侵略国,我们不要使敌国人民负担加重,我们只要日本把在华侵略去的权利交还。这些权利是什么?如租界、如关税协定、如领判权、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驻兵和开办工厂……等等,我们只要这些权利交还

我们。因为有上述几种特权存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称为自主的国家，中国就永远做他们的农奴，他们就永远做了我们民族工业的主人。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争取民族工业的主权，要自己起来做主人。所以，这一战争不是感情的，复仇的。我们并不要日本割地赔款，我们只要交还我们的主权，把在中国侵略去的交还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并且也只有这样才算是最后的胜利，不应该存苟且的心理，以为日本能够停战撤兵至多做到交还失地，就算我们的最后胜利；这便和以前一样，排满只限于清帝退位，讨袁只限于取消帝制，迷惑于苟且成功的心理，极力降低要求，缩短战线，自以为是稳健的战略，结果仍旧是失败。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现在有一班中国必胜论者，很轻率的说日本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境地，这一句话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乐观，是自己欺骗自己，在事实上，一个短时期内即一年半甚至二年，无论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我们是摧毁不了她的，我们须要能够持久的和她抗争，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这样的长期战争，在现代当然不可能，但我们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必需有虽三十年也不愿意做奴隶而要做主人的决心，纵然中间经过惨败甚至一时的屈服。

现在有一件事，就是远东会议。也许有很多的人希望这一个会议可以帮助中国得到胜利，如果真是这样希望，那就非常错误。就是我个人的意见，远东会议能够不增加中国的困难，就已经是很好的了。虽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远东会议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从历史上观察远东会议的来源，也就可以知道一半。自从英帝国会议以后，澳大利代表就提出了太平洋会议，日本表示相当赞成，美国不理，其目的就可以想见了。澳大利对于远东问题，有一个目的，想拿中国问题满足日本，只要日本不干涉她，她自己得到安全就够了。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呢？现在国联的机构以内，给日本以经济制裁的空气非常浓厚，连加拿大都赞成了，但是英国在意、阿战争中已经有了经验，经济制裁以后，倘不进一步加以武装制裁，经济制裁必然要失败的，武装制裁，又非所愿，只得赞成远东会议来和缓经济制裁的空气，来安定她自身，表面上虽说希望两者并而为一，实则只想玩玩远东会议而已。再说远东会议会有什么结

果呢？只要看看到会的成分便知道了，如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瑞典、挪威，一向是跟着英国走的；法与苏会同情于中国，但终局也不能走出英国的范围；美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她和日本剧烈的冲突还在明天，今天值不得一战，不妨流点他人的血，自己向中、日两方面卖卖军火，这便是美国孤立派和和平主义者的真实意旨，罗斯福现在虽然走进一步，也不过为了他自己将来选举票，敷衍少数主战派一下，决不会抛弃和平派而走到英国前面；德、意两国呢？意大利对日本当然很同情，德国不能公开的帮助中国，也不会帮助日本，德助日以欧洲方面为限，在经济上她不愿失去中国市场，她或者中立，或者不参加会议，如此看来，除德、意别有自己的立场，其余都要或迟或早惟英国马首是瞻。所以决定远东会议之前途的还是英国。英国呢？大概还不外是折中、调解，和承认既成事实这些老办法。如此则远东会议便无疾而终了，我们对它能有什么别的希望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于国际的援助一点希望没有呢？这到不尽然。我们在客观情形明瞭以后，应该断然抛弃对国联对“九国公约”国任何集体制裁的幻想，并且应该抛弃什么和平阵线侵略阵线这一虚构的公式，努力在外交上尽可能的向各别国家获得军火的接济，如苏联、美国、德国和捷克。所谓外国军火之接济，决不仅仅是寻常小量的补充，而是大量的接济，而是要看做我们得到胜利的因素之一。说到这里，或者会有人出来反对所谓“唯武器论”，我以为“唯武器论”，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上是无可非难的，因为用弓箭刀矛的人战胜了用石头的，用来福枪的人又战胜了用弓箭刀矛的，用飞机大炮的人将来也会战胜用来福枪的，武器并不能简单看做武器，它是每一时代每一民族一般文化发展的象征；即在实际战争上，“唯武器论”在一定限度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武器的数量质量约略相等的条件之下，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才有决定最后胜负的作用。如果我们盲目的反对“唯武器论”，那只好痴心妄想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希望大刀队可以抵抗飞机大炮，仿佛标语、祈祷、歌咏，可以打退敌人，这都等于用符咒治病，病人只有倒霉！

日本比起我们来，已经是工业国家，军火尚须不断的从外国补充，战时更不用说，中国是农业商业国家，军火几乎全部依赖外国，如果打算继续抗战二年，就是说二年以内不向日本屈服，便不是宣传大话所可

济事，要能够从外国获得四十八万万元的军火才行。单是飞机一项，二年内陆续补充一千架，平均每架以三十万元计，就要三万万元，大炮及大炮的子弹的价钱那就更可观了。

如果我们有了军火，那就可以拿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来决定胜负了。日本对中国作战，只能出兵四十万，我们的军队以训练上的缺点，应该用一百二十万兵来对付，一百二十万兵的给养及被服药品之补充，官兵每人每月平均以三十元计，二年共需八万万六千四百万元，此外尚需巨额的运输费，连军火，二年战费当在六十万万元以上。以半年计至少要用十五万万元，日本预计半年战费要二十五万万元，我们不能再少过十五万万元了。假定在此半年中，能够得到五万万元的军火借款，尚需筹得现款十万万元，才能够支持半年，若准备支持一年，还要加多十五万万元，合共二十五万万元，只抵得日本半年的战费，似乎不能再少了。现在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只五万万元，实在太少，第一批救国公债，最少要二十万万元，而且最好是一半现金，一半法币。现在集中在政府手中的现金虽很多，但为了维持外汇的平衡，当然不能多量动用，近代的战争，谁不能维持外汇的平衡，谁就踏上了失败的道路，日本对于中国的全面抗战，倘然不能攻取中国多少地方，从她占领的中国地方获得大批战费，恐怕不到二年，外汇的平衡便不能维持了。我们在此二年中，将怎样维持外汇的平衡呢？外国借款当然希望很小，只有陆续从国内筹出三四十万万现金。怎样筹法呢？我们要知道现金在人民身上，政府无法没收，要靠人民用救国公债的形式拿出，如果说不能不用强迫力，大部分是要用民众的强迫力，单靠政府的强迫征收，那是不行的。如果人民能够拿出二三十万万现金充战费，这才真是财力的全国动员，这件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为这一消息传出后，日本绝不好再说：对日抗战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

这是财力问题，再有人力的问题。日本打中国，可以出到四十万兵，中国的军队，除了中央军、两广军、川军，其他军队战斗力是有限的。中央、两广、四川军合拢来，大概有八十万，全中国也许有二百万兵，但可打的则只有这八十万，这八十万可超过日本一倍。但现在的战争，日本不但是机械化厉害，就是军队的训练也好过我们，所以拿八十万对四

十万，还没有胜利的把握，我们最少要一百二十万，三人打他一个，这样我们就要大大的补充，照现在征兵办法，似乎不会有多大效果。中国习惯怕当兵，强迫征兵，还会偾事，必须要使民众了解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自动的起来参加战争才行。民众如果蜂涌起来，武装起来，自愿的参加战争，那么，不但正规军之补充不成问题，并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辅助正规军作战，这才真是人力的全国动员。人力的全国动员和财力的全国动员一样，都需要民众自动，靠政府的强派，是不会有多大成绩的，譬如小孩子读书，靠父兄强迫是不行的。强迫征兵和强派公债一样，不但不会有多大成绩，倘贪官污吏、土劣、保甲长等，视为发财机会，藉着征兵派债，肆行敲诈，那更要大糟而特糟。政府若赶快发动广大民众，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上说的毛病，自然是不会发生的。这回上海战争，军人的确尽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当中竟有接了撤退命令还不肯退的，这种英勇的牺牲，是值得敬佩的。但后方民众还不曾起来，所谓“全民抗战”，还是未曾实现的宣传口号。现在单看看武汉，大家还在睡觉，不仅是随便的睡觉，还是吃了鸦片烟的沉睡！救国公债，湖北省只摊派一百三十万，数目并不算多，现在连五分之一还未收齐，而武汉商人还在斤斤较量摊派数目太多，这真不成话说！政府应该立即决心发动民众，使民众蜂涌起来，疯狂起来，热心抗战，要做到政府征兵一万，报名的有二万，公债发行五万万，人民拿出十万万，真正做到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并出力，则抗战的胜利才会有把握。所以我认为胜利的因素是：

第一，从国外得到大量军火之接济。

第二，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做到全国财力人力之动员。

再加上政府军队的力量，这才能够保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这三样好比一张桌子的三只脚，缺少了一只，甚至两只，漫说胜利，就是曲线的失败，也是很难想像的事。此次中、日战争，不是两个国家军备约略相等的战争，而是军备贫弱的中国民族，反抗军备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只有依赖外国大量军火及国内广大民众的力量，才不会使政府军队因孤立而失败，这两种力量，又恰好是敌人所得不着的。

我们要得到胜利，必须在具体办法上指出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倘空

口高喊“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便等于一种咒语，这种咒语，打毁不倒敌人，帮助不了自己！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①]

国庆日前夕，记者访陈独秀先生于其病中，恳谈目前对日抗战的种种问题，兹分节记述于下：

记者：前两天，武汉文化界有一次较为盛大的集会，陈先生没有到，有许多人都颇失望。因为他们都很想听听陈先生的演说。

陈：呵，是的，是的。那一次的集会，听说到了很多人，我本来很想参加的。可是先和华中大学约好作一次讲演，恰恰在同一个时候，事实上分身不开了。

最迫切的两件事

记者：现在对日战争，已经全部展开了。从海南到华北，都在炮火连天的状况之下，而东北的义勇军也活跃起来了！前线将士的英勇，不仅得到国人的爱戴，而且得到世界的赞美，可是后方的工作，陈先生以为最迫切的是什么呢？

陈：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可是后方却赶不上，前方的血战是何等紧张，而后方竟是这样的松懈，尤其是武汉，简直连表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武汉为全国后方的中心，而空气这样沉寂，太可怕了。所以党政当局，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会有最有效的办法。

记者：五万万元的救国公债，湖北承销了一千二百万，现在还没有

① 1937年10月9日，答《抗战》周刊记者采访。

收足。

陈:这是不好的现象。日本人打算筹集二十五万万的侵略费。中国应该筹足此数,五万万还嫌太少,湖北人承购一千二百万,更是太少了。并且此次公债应该多数以现金购买。

记者:以现金购买?

陈:是的!用纸币购买,实际上并不能收"有钱出钱"之效。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所代表的若干现金,已集中在政府手里,以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以公债形式交纳政府,几乎等于未曾购买公债,其效用至多减少若干通货膨胀,所以以纸币购公债,效果小得很,因为外汇是需要现金的。

记者: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很是成功,曾博得世界各国财政专家的称赞,现金不是早已集中了么?

陈:政府的法币政策,确是成功,如果法币政策不成功,这次的仗是打不起来的。不过国内的现金仍未能完全集中。因为大部现金都还在乡村里,政府只能集中都市中若干现金,而不能完全吸收乡村的现金,乡间富户的窖藏,比都市里银行的保险库要充实得多!政府应该设法把乡间的元宝和银币以及珠宝等都集中起来,则对日抗战的费用,方可长期支持下去。

记者:训练壮丁问题怎样?

陈:敌人的炮火很厉害,我们战士的牺牲一定很多,我们应该把全国的壮丁训练起来,然后才能谈得上持久战。

记者:据我所知,现在武汉三镇受训的壮丁,大概有×万人,×个月后,可以调到前线上去作战。

陈:不够不够!中国的壮丁,大部在农村里,都市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体质上,都市里的壮丁也还比农村为劣。政府应该征集农村里的自愿作战的壮丁来受训,以作对日战争的后备军。

记者:陈先生所说的两个问题——集中现金和征集壮丁,都是注重在农村里,进行起来,恐怕很为困难。

陈:要是民众起来,而且有组织,并不怎样困难。

民众的组织和训练

记者:如何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呢? 在现阶段中,我们应该给予民众以何种训练为最适宜呢?

陈: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的改造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由下而上,一个是由上而下。现在既还没有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不能等待,只好取自上而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执政的国民党从速完成他。尤其在抗战期中,要做到全国总动员,民众的组织应看成第一重要。

记者: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是由中央、省、县,以至区、乡、保、甲的这个制度,层递下去而运用起来呢?

陈:区、乡、保、甲,不能担负这个任务,而且也不大适宜。

记者:现在上海出了许多新的刊物,都在鼓吹利用这个系统呢! 还有许多青年,都准备回乡去运动做保、甲长,或去和保、甲长联络呢。

陈:据我所知,现在的区、乡、保、甲,和民众还有许多隔阂,并不能切实组织民众,更不能训练民众,我们所谓组织民众,是希望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分赴各县担负这个责任,而不能厚望于区、乡、保、甲长。

记者:那末,这些青年回乡去后,岂不是要和那些区、乡、保、甲长冲突起来,对于抗日的后防,不是一个大累赘么?

陈: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为区、乡、保、甲长,将来我们如果一旦军事失利,他们又会摇身一变而为汉奸,他们可成为敌人利用大汉奸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我们将如何避免和他们冲突呢?

记者:陈先生对于这次抗战前途的观察怎样呢? 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陈: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 日本屈服以后,他在中国的权利,当然要为中国所收回,中国的主权,可因此而得保完整。

记者:此次抗日胜利,日本在中国特权固可收回,其他各国的呢?

陈:不成问题!土希战争以后,使土耳其的主权渐次完整,但土耳其只打败希腊,没有打败英法,然英法在土耳其的权利,也渐渐被土耳其收回了。所以中国只要对日抗战到底,统一固不成问题,独立也不成问题。英美各国和中国的关系,或者可循外交途径来解决,不一定要诉诸战争;假如中国不能振作,他们就非分尝一脔不可了。

远东会议的展望

记者:陈先生既然谈到国际问题,那末,现在快要举行的远东会议,据陈先生的观察,对于中国有不有帮助。

陈:会议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必重视。

记者:那末,请陈先生把这个会议的背景来分析一下。

陈:苏俄是同情中国的,法国和苏俄有军事和政治的谅解。在会议中,中国可望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德国此时还离不开英国,不一定会帮助日本,他也不想牺牲中国的市场,可望他中立。意大利的态度倒很令人怀疑。美国的态度,以前不大好,自从罗斯福发表演说后,稍稍改变了,然美国终不会走到英国的前面,法俄也不会采取和英国对立的态度,在远东会议中,最大多数国家还是惟英国马首是瞻。英国太持重了,太保守了,太看重既成事实了,他固然不愿从中国的市场退出,而让日本独占,然而他的态度能够有利于中国至何种程度,中国抗战的胜负是有很大影响的。

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

记者:关于宣传,文化界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了。现在武汉已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平津和京沪各地的文化人,都跑到了武汉,有人还提出了"武汉时代"的口号来,陈先生觉得这个抗战的非常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文化运动,应该怎样开展呢?

陈：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就是文化人的参加抗战运动。小说家、戏剧家、诗人、电影从业员、音乐家、绘画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凡是以文化为职业的人，都应该把他的精力用到抗战的行动上。我们要把抗战的基础，建筑在广大的农村里，希望各地到武汉来的文化人，不要专门在武汉办刊物，而忘记那急待唤起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并且可使他们的艺术民众化。

记者：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

陈：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报纸杂志都肯登我的文字，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

记者：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陈：不对！不对。这是大公报记者听错了我的说话，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那位记者问我，是不是打算参加实际政治（他的意思全然是指政府里面的行政）工作，我说，这于我不大相宜，十五六年时，我也没有担任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捆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记者：明天就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陈：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我打算把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以及抗日与革命的关系，约略的说一说。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谈至此，已经将近六点钟了，室内也渐渐阴暗起来，窗外又正下着雨，记者还要过江，于〔是〕就告辞出来。

1937年10月16日 《抗战》周刊第一卷第六期 署名：陈独秀

和斠玄兄赠诗原韵[①]

莫色薄大地，
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
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
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
龙性岂能[②]驯。

1937年10月

雪云:《陈独秀诗录略注》。《革命史资料》第五期，1987年2月

---

① 1980年春，雪云访问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钟凡先生，得陈独秀诗两首，此是其中之一。

斠玄，又觉玄，陈钟凡的别号。"和斠玄兄赠诗"，即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在陈钟凡家小住时，周佛海、胡适等人前来笼络，陈独秀不为所动，陈钟凡目睹此情，十分敬佩，便在这年10月赠诗给陈独秀，诗云:"荒荒人海里，聒耳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得诗后便步其原韵，和了这首五言诗。——雪云注

② 一亦为"易"。

致亢德

先生：

日前收到由中行寄来三元，已复一信，谅达览。顷收到上月廿九航空信，知前寄二文及照片等，业已达左右，至慰。中华演词油印稿乃弟手写，与各报所记大不相同，希再行对阅一次，倘不相同，当可刊载也。弟在此间所发表之言论，当以弟写者为据，各报所记谈话及演词，颇多省改，势不能一一更正，真是糟糕！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势不得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倒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续，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佛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在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率陈乞恕，此祝

撰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夜

《作家书简》(真迹影印)①

---

① 这封信题为《关于〈实庵自传〉》发表于《古今》月刊第八期(1942年10月1日)时，将信中第一段文字略去。

打倒消极先生

各方面的消极态度不改变，会形成抗战的致命伤。

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中，人人都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不应该消极的避难，尤其是青年男女。

政府及党部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增加抗战的力量，不应该消极的防止民众运动越轨，官僚派心目中不越轨的民众运动，乃是一种仪仗，在抗战中不能够发挥群众的自动的真实力量。

政府在财政上，应该积极的强迫富裕的官商拿出钱来；不应该消极的采取紧缩政策，裁人减薪，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制造一部分汉奸。

政府在处置汉奸的问题上，应该积极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杜绝汉奸所以普遍发展的根源；消极的惩罚是不够的。

在商业上，应该积极的谋货币百物之流通；不应该消极的限制人民向银行提取存款和阻碍内地米谷买卖，致商业停滞，造成经济恐慌。为了防止资本逃走和米粮资敌，只有在最后出口地方，由政府严行统制和检查。

在军事上，应该积极的向敌人弱点进攻；不应该消极的防守应战，使敌人得以自由移动集合其优势军力，将我们的防地陆续各个击破。、

商人应该积极的要求政府筹款发展生产；不应该消极的力图减少救国公债之负担。

工厂主应该积极的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以培养工人的工作技术与劳动力；不应该消极的减资加时，以削弱工人的劳动力，削弱生产。

农民应该积极的抵抗土劣之压迫；不应该因为愤恨土劣据区保甲长之地位鱼肉农民，而对于参加抗战取消极态度。

学校应该积极的改变课程，以适合战时的需要；不应该消极的迁移到边远地方，简单的避免敌机轰炸。

对于伤兵，应该积极的改良其生活与教育，并帮助其组织与活动；不应该消极的防止他们捣乱。

对于伤兵之救济与慰劳，应该积极的号召社会团体群起参加工作；不应该因为顾虑汉奸从中活动，而消极的加以阻止或限制。

对于地方各级政府，应该积极的改造加强；不应该消极的维持现状。

一切不反对抗日战争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怀疑政府抗战的决心而取消极的旁观态度，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以加强政府抗战之决心。

消极态度是抗日战争之致命伤，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

1937年11月8日　《民族战线》创刊号　署名：陈独秀



“言和即为汉奸！”

战胜而言和，乃停止军事行动而收得战胜之果实；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

前几天外报盛传中日言和停战，全国人心大为不安；幸而外部发出辟谣的消息，并且中国负责当局告合众社记者，谓“于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从此以后，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及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

此时不但全部言和是妥协、屈服、投降，就是上海局部停战言和，也是一样！其理由有七：

一、全面抗战，是既定的国策，一旦局部言和，是明明破坏了国策，政府的威信失坠，在内政上会发生极大危机。

二、在军事上使敌人得缩短战线，专力于其真正目的地之华北，以减少其军力和物力之消耗。

三、上海左近一天在战争状态中，不啻一天为中国关税之天然壁垒，国内工业一天有发展的机会；一旦停战，上海所有的工厂都毁尽了，外国工业品(连日本的工业品也在内)便如潮涌入，无法阻拦。

四、战争是工业国出超国致命的威胁，农业手工业入超国的中国在这方面便反而有益无损，在三个月的战争中，中国的入超显然是停止了；一旦停战，外货涌入，入超必然较战前更为可怕，因为入超增加，法币的准备金必然减少，法币一旦动摇，全国经济大恐慌便随之到来。

五、民族抗战，正是提高国民精神上之最有力的兴奋剂，一旦妥协屈服言和，由失望而悲观，国民道德之向下坠落，必一日千丈，强项者自杀，卑怯者沉溺于烟、赌、娼，也是一种自杀，如此可悲的现象，必然普遍

于全社会，而无可救药，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六、妥协、屈服、投降之后，在落后分子中，愈益加强他们认为日本必然兴盛，中国必然倒霉的信念，一班趋炎附势无耻投机分子，现在犹未正式加入汉奸团体者，必然潮水似的奔赴汉奸这条道路。他们如果有顺利的政治环境，还会公然形成政治集团，如朝鲜的“一进会”。

七、南宋偏安的局面，现代已经做不到了，日本兵占据华北后，不久军事工作一完成，华北伪国或所谓华北自治一出现，中国的工商业的国内市场丧失了一半，南方将如何存在呢？况且日本军至多停一二年必然还要南下，以达到她原来以华北为“自治区”，以华南为“亲善区”的计划，那时人心已去，政府即欲抗战，更加无人愿意出钱出力了！

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现在还是时候；“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

全国文武大员，必须首先认购巨额救国公债，以为人民之倡；富商大贾们，也应该激发天良，掏掏荷包。像汉口这样一个最大的国内市场，纱业商人担认区区百五十万元公债，还要丑表功，并且实际还未缴纳；全武昌商界只认购七万元，已经不成话说，而且至今尚未缴齐！此等“贻误戎机”之徒，此种犹太商人，应该由政府及民众加以严厉的惩罚！不然还谈什么“有钱者出钱”的废话！当真只应该令无钱者出钱吗？

农村中城市中有力的壮丁，都应该不待政府之征召，而自动的依职业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地方，并且杀到前敌。或者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并且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也可免去政府下级人员及保甲长办理强迫兵役的许多流弊。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因为政府自己已经公告天下：“言和即为汉奸！”

言和固然是汉奸，即这几天言和谣言所传播的空气，已经足以灰前方将士及后方人民之心，助长汉奸的气焰；倘此种空气不澄清一下，还

会令北方本来动摇之将领更加动摇，发生保存实力的企图，甚至会有象阿比西利亚酋长的那种怪物出现。

要澄清这种恶空气，政府最高当局应该下一决心，将政府阁员中妥协动摇分子立时除去，而代以坚定主战的人物，则谣言不辟而息矣。一次行动，胜过千万次宣言。

十一月九日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1937年1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

对于醉生梦死昏昏沉沉的我们中国人，令人郁闷欲死的中国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固然有毁灭我们之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善于利用它，正是及时的无限大警钟，一针强心针和一剂最猛烈的兴奋剂。尤其是敌人的飞机轰炸遍了全中国的大都市，使我们没有逃避的余地，谁勇敢，谁怯懦，谁正直，谁奸诈，谁是有心肝的人，谁是冷血动物，谁有才干，谁是蠢才，都一一显露在众人的面前，不是拍马吹牛可以代替的了。人们只要不准备现在当汉奸，或静候将来做亡国奴，就是一班最写意的男女们，迟早都会脱下睡衣和拖鞋，拿起武器来自卫以卫国。我们不要把敌人的飞机轰炸简单看做灾难，应该看做是我们起死回生的圣药，希望它轰炸遍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由悠游自在变成疯狂。疯狂！疯狂！再来一百个疯狂！永远疯狂，永远不再悠游自在。我们吃了悠游自在的亏太厉害了，太长久了，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或者会医好我们这一个祖传老病。

1937 年 11 月 11 日　《宇宙风》(十日刊)第五十一期

署名：陈独秀



实庵自传[①]

第一章　没有父亲的孩子

休谟的自传开口便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迟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作为现代青年一种活的经验，不力求简短，也不滥钞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写自传的人，照例都从幼年时代说起，可是我幼年时代的事，几乎完全记忆不清了。佛兰克林的自传，一开始便说："我向来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你们当能忆及和我同住英格兰时，遍访亲戚故旧，我之长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

① 陈独秀流落四川江津时，曾亲笔将此稿赠台静农，在该稿末尾书有："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至廿，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念，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独秀识于江津。"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像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我那时心中老是有一个不可解的疑问: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他是抽鸦片烟的,在家里开灯不算数,还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才算过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那里去了呢? 这一疑问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个解答是人有好群性,就是抽大烟,也得集体的抽起来才有趣;然而这一解答还不免浅薄,更精微奥妙的解答,是烧烟泡的艺术之相互欣赏,大家的全意识都沉没在相互欣赏这一艺术的世界,这一艺术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怀了。我这样的解答,别人或者都以为我在说笑话,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刘叔雅才懂得这个哲学。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

“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我们知道打着不哭的孩子很多，后来虽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强盗。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我以为现时代还不能免的战争，即令是革命战争中的杀人，也是残忍的野蛮的事，然而战争还有进步的作用；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别的杀人更不用说了。

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据我所记忆的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表现出她这一弱点。

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渌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会栋梁。我的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有一年（大约是光绪十二年前后），大水冲破了广济圩，全渌水乡（怀宁东乡）都淹没了，这位族长哭丧着脸向我母亲诉说乡民的苦痛之后，接着借钱救济他的家属，我母亲对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钱的事却终于不曾答应。族长去后，我对母亲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母亲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不愿说的话，你再问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纳闷道：母亲时常当衣借钱济人之急，又时常教训我

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为什么今天不肯借钱给淹水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长呢？事隔五六年，我才从许多人口中渐渐知道了这位族长的为人：族中及乡邻有争执的事，总得请他判断是非曲直，他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很公平的不分亲疏，一概以所得鸡、米、烟土或老本洋多少为标准，因此有时他的亲戚本家会败诉，外人反而胜利，乡间人都称赞这位绅董公正无私！他还有一件事值得舆论称赞，就是每逢修圩放赈，他比任何人都热心，无论严寒酷暑，都忙着为大众奔波尽义务，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别人所担任一段都更不坚固，大概他认为如果认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于他已是一种损失，失了将米放赈的机会，又是一种损失，这未免自己太对不住自己了！至此我才明白母亲皱眉不语的缘故，是因为她已经深知这位族长之为人，然而她仍旧恭敬他，这岂不是她的弱点吗？

还有这族长手下用的一位户差（户差的职务，是奉行族长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孙到祠堂处罚），同时又是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的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过阴，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的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胡话，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大概是酆都城的土话罢！是我气他不过，跑去约了同屋及近邻十多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失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一个小小呵欠便回到阳间来了，闭着眼睛问道："这边有了火烛了罢？"我的母亲站在床边微笑的答道："是的！"他接着说："这可不错罢，我在那边就知道了。"我在旁边弯着腰，缩着颈脖子，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母亲拿起鸡毛帚子将我赶走的很远，强忍着笑，骂道："你这班小鬼！"但她还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这位阴差爹爹，并且送钱托他买钱纸银锭，这便是我母亲优容奸恶之又一事实。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燥，其实我性情暴燥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

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幸而我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我始终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我们当然不应该苛责前一辈的人，尤其是不曾受过新旧任何教育的妇人。

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着不尽；所以无论城乡，屡考不中的人们，往往埋怨祖坟的风水不好，掘出尸骨来改葬，这便是那班圣人之徒扬名显亲的孝道；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面，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当大哥考取了秀才时，母亲很高兴，而我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母亲高兴，惧的是学八股文章和应考的灾难，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大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

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的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像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李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那时我和别的几个人，因为是幼童和县、府试录取第一名，或是经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师案前面试，所以他很便当的亲自收取卷子，我并不是考幼童，县、府试也非第一名，一入场看见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样，知道经古已经考取了，不用说这也是昭明太子帮的忙)，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

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人家有点兴旺，他们也要附会得比实际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像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很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第二章　江南乡试

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旧在梦中。我那时所想像的灾难，还远不及后来在考场中所经验的那样厉害；并且我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所以在那一年中，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好在经义和策问，我是觉得有点兴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

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同行的人们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大家都决计坐轮船去，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时到南京乡

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比现在日本人走私或者还威风凛凛。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过南京乡试的，只有我初次出门，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丁令当郎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那时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马车还没有，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市虎”，南京人所诅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车，更不用说；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因为甲午战后付了巨额的赔款，物价已日见高涨，乡试时南京的人口，临时又增加了一万多，米卖到七八十钱一升，猪肉卖到一百钱一斤，人们已经叫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南京人的面容，还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见着人，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或是暗探；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别有原因的。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头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里的楼板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留下三个人看守行李，其余都出去分途找寓处。留下的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哥的先生，他是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领袖，当然不便御驾亲征，失了尊严；第二个是我大哥，因为他不善言辞；我这小小人自然更不胜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个。午后寓处找着了，立刻搬过去，一进屋，找房子的几个正人君子，全大睁着眼睛，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的说："这屋子又贵又坏，真上当！"我听了真莫明其妙，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呢？过了三四天，在他们和同寓中别的考生谈话中间，才发见了上当的缘故。原来在我们之先搬来的几位正人君子，来找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明明看见房东家里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坐在窗口做针线，等到一搬进来，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听说这种美人计，乃是南京房东招揽考先生的惯技，上当的并不止我们这几位正人君子，那些临时请来的仙女，有的是亲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当的固然很多，房东上当也不是没有，如果他们家中真有年轻的妇女；如果他们不小心把咸鱼、腊肉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此时也会不翼而飞；好在考先生都有"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奸淫窃盗的罪名，房东那敢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辱我们做贼，便是诬辱了皇帝！"天高皇帝远，他们这几句大话，未必真能吓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还是他们人多，一句话得罪了他们，他们便要动野蛮，他们一和人打架，路过的考先生，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上前动手帮助，商人知道他们上前帮着打架还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乱中，商人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闹到官，对于人多势大的考先生，官也没有办法。南京每逢乡试，临时增加一万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万元的进帐，临时商店遍城南到处都有，特别是状元境一带，商人们只要能够赚钱，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班文武双全的考先生，惟有到钓鱼巷嫖妓时，却不动野蛮，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而已，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

我们寓处的房子，诚然又坏又贵，我跟着他们上当，这还是小事，使我最难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头痛。屋里没有茅厕，男人们又没有用惯马桶，大门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处所，我记得那时南京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差不多每个人家大门外两旁空地上，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仅我们的寓处是如此。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那位老夫子，本来是个道学先生，开口孔、孟，闭口程、

朱，这位博学的老夫子，不但读过几本宋儒的语录，并且还知道什么“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他也是天天那样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时妇女在路上走过，只好当做没看见。同寓的有几个荒唐鬼，在高声朗诵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暇，时到门前探望，远远发见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登下去解大手，好像急于献宝似的，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我总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时踏了一脚屎回来，已经气闷，还要受别人的笑骂，骂我假正经，为什么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一脚屎回来，弄得一屋子的臭气！“假正经”这句话，骂得我也许对，也许不对，我那时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戕贼得很厉害，如果有机会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可是象那样冒冒失失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当街献宝，我总认为是太无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

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1937年11月11日、11月21日、12月1日　《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期　署名：陈独秀

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的一切物质力量，是打不过敌人的，我们可以打胜敌人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来，不做奴隶的伟大精神。

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说大话，而要有具体的事实表现，这种具体的事实表现，就是除了汉奸以外的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

假如我们有钱者能拿出十万万现金，有力者能拿出千万壮丁，不待战事结束，已足够使敌人气馁，无法继续对我们作战了。

大家万万不要笑我说大话，十万万现金，一千万壮丁，实实在在能够拿得出的。

或者有人说：自抗战开始以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在街头巷尾都看见了，听见了，可是谁出过多少钱，谁出过多少力，何以至今还不大看见听见呢？我以为这是因为大家还没有指出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之实行条件。

要使有钱者出钱，首先要问：谁是有钱者？顶有钱的是在外国银行有大批存款的人们。我归纳起好几个银行界朋友的谈话，中国阔人存在汇丰、麦加利等等银行的款项，至少有一百万万元。如果政府下一个决心，最客气最少也可以请他们拿出十分之一即十万万元来，购买救国公债；万一不及此数，再加以农村富户的窖藏，妇女首饰，及一般国民的献金，十万万元是可以办得到的。这个数目已经比政府现在发行的救国公债额加了一倍，而且都是现金。政府有十万万现金做准备金，便可以加印二十万万法币，决没有通货膨涨后物价高涨和外汇跌落的危险。政府拿这二十万万元，一半加购军火，一半补助后方的纱厂、大小规模

的织布业和运输业，这样一来，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有了一半把握。如果把"有钱者出钱"变成"无钱者出钱"，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此不独政府所得有限，且会因此造成后方可怕的危机，若再加以不肖的官吏土劣借此从中敲诈渔利，前天《武汉日报》《扩大献金救国运动》一文中所说："尤望显宦巨富……出其所有，以身作则，为国民倡。""勉力济助政府者，多为生计困难，节衣缩食之平民，而拥资巨万之人，反不数数觏。"这几句话真是切中时弊之名言。

谁是有力者？当然是农村和城市的壮丁，要使壮丁出力，必注意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他们有自动参加抗战的情绪，不可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这种强拉来的壮丁，数目必不能多，不够用，而且无论在前方或后方，均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送往前方补充兵额，比募兵更要坏得多，在后方强迫征兵和强派公债合起来，更会造成农村中可怕的危机。前天有一位黄埔出身的青年军人，和我谈到这一问题，他也承认强拉壮丁的危险，他也承认经过广大的群众宣传而招募的兵，比有名无实的征兵要好得多。第二，壮丁必须使之成为有政治教育有自动活力的群众组织，有了这种组织，补充前方，保卫后方，都根本不成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以游击队的形式，扰乱敌人后方，即令敌人利用近代武器占领了我们的大都市，而不能够统治我们的全部领土，这种效果，当然不是简单的强拉少数壮丁所可得到的。据好几个从河北来的朋友说："政府这几年在河北各县的壮丁训练，是有了成绩，可是缺少政治教育，未能成为有自动活力的群众组织，我们的军队从平汉津浦一撤退，各县县知事和警察一挟款逃跑，壮丁们便无人统率召集，一时群龙无首。又没有自行集合工作的习惯，敌人委派的县知事和维持会一到来，已训练好的壮丁，大多数都变成了敌人的力量。"他们说到这里，都几乎声泪俱下，像这样有力者为敌人出力的可悲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再使之出现的了。现在南方十几省，每省以百万壮丁计，能够有一千多万人，再多多少少的武装起来，政府手中若有一千多万武装的有政治教育的有自动活力的壮丁，前方后方的问题，那一样不能解决呢？

如果在现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钱者不出钱，有力者不出力，将来亡

了国，大家都一样要做奴隶，要受敌人的残酷蹂躏和东北四省及冀、察、绥人民所受的一样！

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万万元和一千万壮丁的援助，不但能够打退站在眼面前的敌人，即全世界各大强国，也永远不敢小视我们中国人了！

1937年11月21日 《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二期
署名：独秀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打〕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1937年11月21日 《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二期

署名：独秀

给陈其昌等的信

璠昌霁[①]诸兄鉴：

璠兄十月十四、十七两信早已收到。十六日信并猴子[②]的信与做书计划，亦早收到（廿日的信也收到）。他所拟做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现在能这样耐心的做书，真使我不敢不赞一词，因为我是一个外行。我回他这样的话，未免使他扫兴，然而实在无可回答也。璠兄的婚事，我闻之且喜且忧，喜的是得着意外的良缘，忧的是他将来的生活。圃兄[③]来此已一星期，日内或将到湖南去教书。我不愿在此久居，亦不能久居，去处尚未能定，因天下老鸦一样黑也。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④]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们乱骂史国，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璠兄说别人是宗教徒，现在大概也受了宗教的传染而不自觉了！霁兄十一月二日收到，璠霁和俊昌[⑤]意见或微有不同，根本仍是一样，即是不懂得此次战争的意义，超林则走得更远，根本和你们仍是相同的，即是把上次帝国主义间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对昌俊还有点幻想，并不是他们关于最近局势的见解和我接近，而是因为他俩的工作精神比较积极，如果能在群众中积极工作的

---

① 璠，即罗世藩。昌，即陈其昌（上海托派临委成员）。霁，即赵济。

② 猴子，即孙煦（雪庐）。

③ 圃，即晓圃（濮清泉）。

④ 彭，即彭述之。（本篇及以后有关各篇托派成员的假名、别号等，均由郑超麟提供。）

⑤ 俊昌，即寒君、陈其昌。

人，终会抓住现实。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关于老彭和长子①，即使意见相同，我也暂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香兄来信亦收到。昌兄十月廿九日十一月三日的信及英文信均收到，是事无法可设，我也不愿设法，恐怕出力不讨好，前次罗君就是一个殷鉴，报馆所记自多失实，《申报》访问记，我未见着，能寄我一看吗？此种事太多了，无从预防，也无法更正，只好听其自然，好在将来有我自己写的文章书物为证。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此祝健康。

弟

仲　　手启

一九三七，十一，二十一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① 长子，即尹宽。

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十一月在武大讲演

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即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如果我们还不曾忘记阿比西利亚皇帝曾因单靠军队不发动民众而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即在敌人也懂得这个。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上海的日本报纸曾警告他们的政府说："日本军队战胜中国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全中国的民众真的起来作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了，政府应于此点深加注意"云云。

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发动民众，公开说不需要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并且"全民抗战"这句话，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语；实际上如果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空喊发动民众，喊破了喉咙，民众也不会有多大的回声，要民众起来，必须考虑到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我们须知：民众是有高度意识和意志的人类，不像牛马可以随着鞭子的声影，叫他们行就行，叫他们止就止的；更不是无意识的木石或粉团，人们要把他们做成什么东西就成为什么东西；所以无论政府的命令或政党的空口宣传，都同样没有发动民众的万能。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

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学生因为每日上课七八小时，尚且无法参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或十三小时，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无论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没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农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艰难，又加之以高租高利

苛捐杂税以及种种征发、敲诈，压迫得他们不能活命，他们眼前的敌人是贪官污吏、地主、土劣、保甲长，而不是日本军队，终年过这样痛苦生活的农民，怎样会有抗日的情绪。参加生产的工人农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绝非无业游民可比，而且他们占全国人民之最大多数，他们不能起来抗日，还能发动什么广大的民众呢？此外苛捐杂税，向下层人民强派公债和裁员减薪，也足以减杀小商人小职员的抗日情绪；学生功课太繁忙，也没有做抗日工作的时间。所以坐在沙发椅上，责备民众不爱国，不起来抗日的人们，简直和说“百姓无饭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样的货色！

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组织是一种力量，一切生物皆由无数细胞组织而成，细胞无力量，由无数细胞组织成各种器官，组织成各种生物，才发生各种力量；一盘散沙的民众也自然没有力量，民众有了组织，而且是经常的组织，不是乌合之众，便会发生伟大的力量。民众自身的痛苦解除了，然后才谈得上组织，也只有为解决自身的痛苦，民众才会迫切需要组织，并且解决痛苦之真的实现，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立即恢复并充实由各业民众自己选举的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等。官办的招牌的没有民众的民众团体，在抗战中，除了禀承上官命令发几个通电以外，是不会有任何力量的。

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组织而没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的组织力量，只会用于解决他们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之于政治，抗日乃是一种政治斗争。人类是政治动物，人民必须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国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隶，奴隶是不会爱国的，奴隶是不会自动的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舍命斗争的。在数千年专制政治之下，过着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对于统治者，老是抱定“抚我者后，虐我者仇”的见解，国家与民族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仿佛是一种奢侈品。所以现在要叫人民爱国，要叫人民起来为国家民族利益积极的对日抗战，不但要解决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组织，尤其要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与国家休戚

相关，这件事决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传教育所能够代替的。

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或者有人认为这样未免太发动了，我则以为没有这样的"太发动"，是不能够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和发动民众有关，就是政党领导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发动民众运动中政党领导的作用，一国中有几个政党存在着，便必然发生政党间争取领导民众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从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严重，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因为他们的政府党及在野党，都用发表政纲和公开的讲演，争取民众到自己党的方面来；各党在民众团体中亦各有分野，各自争取群众，争取在团体中的领导权，无论党争如何剧烈，从未想像到根本不容许他党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至于近年以来，有几个国家发生了一党专政的怪现状，根本不容许他党存在，这便根本没有什么政党间争取民众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谁都不能说现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义专政或共产主义专政，当然应该容许有党派间争取民众的问题，并且可用先进的民治国家的所通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党各派合作救亡的呼声，遍于全国，只要能够发动民众起来抗战，谁愈多尽点力愈好，在野党固义不容辞，政府党亦无所用其疑忌，在野党仅仅有了若干民众拥护，并不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且政府党如果毅然决然采用上述三种办法发动民众，别的党派能够采用更激进的纲领，争取得更多的民众，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令抗日的纲领不同，政党间遵循各国通行的办法，各据自己的纲领及政策，努力宣传，一任民众之从违，以争取民众，这正能够推动政治进步和提高民众之政治水平；倘然以为这样太过民主了，而采取不正当的甚至极卑劣的手段抢夺民众，如用武装打手和金钱来威迫利诱民众，复拿民众做自己的打手；造谣诬蔑对方，企图一党垄断；利用政治势力，利用民众落后意识，甚至以党员冒充民众压迫对方；政党间，甚至一党中各小派别间，如此这般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强拉硬夺，不仅不能发动民众，还会使已起来的民众失望灰心而消极。大家如果不赶快觉悟，如果一直采用这样的手

段争取民众，我包管各党各派将得不着一个民众；其结果不是各政党领导民众抵抗敌人，而是敌人领导着汉奸灭亡中国！

讲演日期1937年11月21日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题赠甲原先生

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

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

甲原先生

独秀(印章)

二六年一二月二四日[①]

① 这个年代是指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编者注

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

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

在芦沟桥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回政府真要对日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说：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

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即比它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投石，不待开火，胜败已可逆睹。我们必须预先见到这一胜败之必然性，然后才不至妄自夸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形成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

我们必须从与国获得大批的军器（特别是飞机与大炮），才能够作三个月以上的正式战争；我们必须从全国广大的民众获得大批的游击抗日的力量，与正式军队合作，才能够持久战，否则敌人还只消耗一小部分，我们早已消耗得精光了，还谈得上什么持久战、消耗战呢？

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

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如此，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危险便越厉害，德国国社党机关报驻远东记者说得对：

> 中国境内战事演进情形，颇不利于日军，苏联若自外蒙援助华军，既足以妨碍日军之推进，且可在“满洲国”边境有所举动，而予日以极大牵掣。苏联此项计划若果见诸事实，则外蒙即当由苏联予以援助，而成为对日作战区域，似此，日军之成败利钝端在该国能否迅速结束军事，俾克防止战事范围勿任扩大也明矣。

依日本人口十分之一计，可得六七百万壮丁，然而曾经入伍能够正式作战者，不过一百廿万人，其余的壮丁都不能作用，因为它为了侵略别人出国战争，当然不必要也不可能武装民众来作游击战。在它整个的国防计划，至多只能动员三分之一即四十万兵，来中国作战，其余八十万兵要留着防俄。它现在调来中国的兵，虽然还不及四十万，倘若它的胜利要超过华北及上海以外，调到中国的兵额必要达到四十万甚至五十万，这已经使它的参谋本部头痛（假令它占领的地方，没有中国民众的游击队在它的后方扰乱，而且有大批的汉奸帮着它巩固后方，它是可以节省兵力十万二十万的）；如果再加上外蒙参加战争，至少又要增兵十万，这更要使它的参谋本部束手无策。况且在中国民众蜂起持久抗战中，日本工业品在中国的市场莫由恢复，它在经济上所受到很大的打击，便影响到军费。

所以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呢？香港英文《晨邮报》说得对：

> 中国目前最危险的现象，就是在被占领地方的人民，处之安然，任敌人把他们的手给束缚起来。日本人现在是尽其可能的以博得他所占有的人民的欢心，如日本人在这方面能成功的话，那的确是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隐忧。

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来任敌人把我们人民的手束缚起来，我们现在便应该赶快开放民众运动，使人民的手不容易为敌人所束缚，更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人民的手束缚起来，免得将来敌人费事。我们如果不愿

意让敌人博得他所征服的中国人民之欢心，使他们甘愿做亡国奴，我们便应该解除人民的痛苦，博得人民之欢心，使人民能够自愿的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

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对日持久抗战，一旦政府军失败，精锐丧失，武器耗竭，国际调解论压迫于外，妥协动摇份子簧鼓于内，不妥协、屈服、投降，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即上海局部停战言和，便不能继续抗战，无论在形式上实质上放弃华北，更是公开的屈服投降。至于接受日本限制军备，聘请军事顾问，加入反共协定，取缔抗日运动等条件，那更不用说了。

此次抗战只有两个前途：中途妥协，对日投降；或者发动民众，抗战到底。每一个自命为拥护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须采取后一前途。如果真心主张抗战到底，就必须真心主张发动民众，对于发动民众，不加以任何怀疑与阻碍。

如果民众蜂涌的起来了，不但能够援助政府对日抗战获得胜利，即令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也还能够继续抗战，使敌人不能够顺顺当当，安安稳稳的统治全中国。

每一个真心拥护民族利益的人，总不至感觉到民众蜂起抗日比日本兵打进中国来更为可怕吧！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1938 年 1 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抗战到底

"抗战到底"这句话，在许多人当中，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呼声，但什么是"底"，却从来不曾明白清楚的指示出来。我以为真正彻底之"底"，应该是我在《抗日战争之意义》一文中所说的"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即是说日本及他国损害中国主权的一切特权利益都要收回，仅仅日本撤兵和收复失地，还不算是"底"。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一必须从改进政治来推动民众能够自动的参加抗日战争。"战争是政治之延续"，我们此次军事之失败，实际是政治之失败，不改进政治，民众是不会自动参加抗战的。如此，漫说抗战到底，连战到一年半载都很困难。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二不可幻想能够速成，必须放大眼光，必须把抗战延长到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这期间也许某一时惨败不堪，甚至某一时政府议和，我们也不可因之气馁。在强大的敌人之前，要想一战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运动，中途挫折和一时停顿，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紧的是打定主意，终于非达到国家独立之目的不已。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三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在对日抗战中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说不应该害单思病，把热脸就人家的冷屁股。况且依靠甲帝国主义来赶走乙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国家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者统治殖民地的制度，诚然比日本恩惠些，然而这是奴隶选择主人的态度，不是国民独立运动的态度。

这便是我对于"抗战到底"这句话的了解。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1938 年 1 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为自由而战

——在武昌艺专讲演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首先要说明“自由”的意义。“自由”是政治上法律上有严重意义的术语，不是如通俗的说法，自由自便，即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通俗说法自由自便的“自由”，和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必须要分别清楚。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别的动物如虎、豹、狮、象，其体力高过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征服别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的心灵即智慧比一切动物高，故有“人为万物之灵”之说。人类的智慧必须不受束缚，才能自由发展，换言之，人类智慧之发展，和所获得的自由程度成为正比例。欧洲人在中世纪，受了宗教和王权的束缚，学术政治的思想一切都没有自由。自文艺复兴前后，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各方面都有过为自由而战的流血的剧烈斗争，因此才有光华燦烂的今日。欧洲近代五六百年的历史，乃是为自由而战的历史，东方比西方落后，正因为一切学术思想，都为古来传统的政教所束缚，不能自由发展。例如艺术家必须有自由创造的精神，不受外来的束缚，而后天才始能发展，其他一切科学政治天才，也必须不受束缚，才能够自由发展，这是因为人类心灵不受外来的束缚，才有自由发展的可能。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之发生与发达，都得力于思想自由，有些其初还是由于胡思乱想，而得到偶然的发明与发见。

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的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至于涉及行动，在公法上，自由仍不应限制，因为它的对象，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在私法上，在国际法上，便不然了。个人的自由，应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一国的自由，应以别国的自由为限，过了此限，在个人为强暴，在国家为侵略，强暴与侵略，都对于人类整个的自由，加了伤害，这是应

该制止的。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因受了别国的压迫，他们为自由而战，是正当的，现在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战，为侵犯中国自由而战，便不正当；中国对日抗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则是正当的了。所以中国对日抗战，并不止是要收复失地，而是要争取整个的民族自由。日本从前曾提过中日亲善的说法，我们并不反对中日亲善，可是他所谓亲善，乃是要他坐着，中国人对他跪着的亲善，我们便不得不为自由而战了。中国对日抗战，并非侵犯别人的自由，乃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那么，如果中国一天不得自由，就要抗战一天，必须获得整个的民族自由，才能罢休，决不能中途妥协。故所谓抗战到底，不是空空洞洞的无目的而战，乃是要脱离奴隶的地位，得到真正自由独立的地位。抗战是为自由而战，抗战到底，即是为自由而战到底。这次战争如果失败，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做不自由的奴隶，永远的做奴隶，所以什么人都应该参加。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1938 年 1 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

——在汉口市立女中讲演

根本说起来，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之一，它和别的社会问题有连带关系，很少很难单独的解决，它是必须跟着大的运动来解决的，例如贞操问题，缠足问题，教育问题，职业问题，财产问题，法律地位问题和社会地位问题，婚姻问题。在以前封建的道德习惯还保持着传统的势力之时，妇女处在不利地位和受着残酷的虐待；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封建的道德习惯，受了几次民主运动的致命打击，妇女才得到了相当的解放；贞操问题虽然还不曾彻底解决，而稍受过教育的男子，却不敢公然以此苛责女子了；缠足问题解决了大部分；教育和职业问题之解决，我们虽然最不满意，而已有一点萌芽；财产问题和法律问题，虽然在实际上还没有多大效果，而法律条文上总算有了进步，如遗产继承及犯奸罪。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很低，虽然在欧化的绅士之交际社会妇女地位提高了，而一般妇女仍然拘囚在"家主婆"的生活中，"家主婆"遇着了怕老婆的"家主公"，固然是家庭之王，而在社会地位上终于隶属于男子；婚姻自由问题，曾经小小的震动了社会一下，而问题之解决还甚辽远，此问题之顺利的真正的解决，当在教育问题和经济问题解决之后，否则像现在不自由之自由，会造成许多女子之不幸和耻辱。没有劳动自由，便没有婚姻自由；妇女脱离了不自由的家庭，便走进不自由的社会，仍旧在天罗地网中呻吟着。

妇女现在所得到的一点解放，是以前几次社会大的运动之后果，不是从单独的妇女运动所能够得来的。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妇女即为了本身问题，也应该努力参加此次抗日战争的工作，努力使战争胜利，努力在抗战运动中，双手完成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1938 年 1 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①]

去年九月从南京到汉口舟中，我就拟定五个题目，打算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一在武昌住下，便开始动手写，并且在华中大学讲演时已告诉了听众；在华中、汉口青年会及武汉大学的讲演，便用了这个小册子头三篇的内容。其中第一篇在华中的讲演稿曾在汉口《扫荡报》上发表过；后来在各处的讲演稿，都在“暂缓登载”的禁令之下，未曾发表。其后，上海的朋友屡次来信叫我把这些稿子寄到上海发表，因为当时那里出版还稍稍自由一点，然我总以为有点过时了，未曾寄去。现在有几位朋友认为无论过时不过时，仍然应该发表；他们的意思是想拿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的小册子，做试验目前政治空气的寒暑表，在高呼继续抗战期中，究竟有无成为禁书的资格，我报之曰可，并自序此书之原委是此。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我英勇的空军击落敌机十一架于汉口上空时，急书此为纪念！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 1938 年 2 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① 本文是《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的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的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

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这一联合，在数月抗战中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可是同时两党磨擦的暗潮，日渐浮于表面，这是众人皆知，无可讳言的事。因此国人颇为惴惴，深恐此种磨擦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至影响抗战前途，并且这一问题日渐成为私人谈论时局的中心，这一忧虑，不是毫无理由的。

其实这种磨擦，除了根本原则不计外，其种子已包藏于联合之最初时期，即两党对于联合之方式，都未免鲁莽：一方面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一方面共产党在政治上事事迁就允诺，未能坦白的坚持自己抗日的政治主张，因此事后在政治态度及宣传上，引起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有言行不符的疑虑。一切磨擦便自然的日渐发生了。

此种磨擦如果双方都感觉有停止的必要，下列办法或者可以收相当的效果：

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

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

在原则上，政治上的争论，有可能推动政治进步，直接间接有利于抗战。非政府党党员在政府附属机关担任工作，这本与政权无关。政

府对于所属机关之用人，应采人材主义，不必一党包办，在野党亦应避免政府附属机关中地位之竞争；非政治的斗争即地位斗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各党各派如果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这种斗争是应该停止的。党派间以至一党中小派别之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地位斗争，只有为敌人开辟道路！

1938 年 2 月 19 日 《血路》第六期 署名：陈独秀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政治纲领是国内革命战争决定胜负一因素。此次中国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抗战，也是一种革命战争，在抗战中，要唤起全国广大民众拥护这一战争，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以求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鲜明的抗战纲领，具体的昭告全国人民为谁的利益而战；抽象的笼统的民族利益，不一定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尤其是比较落后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赞成拿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实际效果，下列的十条纲领，在抗战中断然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

（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

（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

（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

（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

（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在地民众之亲密合作。

（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

（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和战大局。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 1938 年 2 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一切幻想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战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件最实际最严肃的事，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这是多么危险呀！

自对日抗战以来，我们全国上下，拿各种各样幻想的宣传，特别对于国际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努力。这不独减少了实际战斗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时使一般人失望消沉的种子。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联制裁，《九国公约》制裁等等幻想，事实上已经随着第一期战争失败，而杳无踪影的过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静气毫无成见的洞察国际形势，难免不从旧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长出新的幻想来，以造成第二期作战之不幸，这是我们万万不容忽视的事。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处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以上便是目前国际形势之骨干。

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各国预想的军备尚未完成，还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们之间都相互知道彼此的军备同样不充分，只要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是不妨一战的。在此环境中，中国对日抗战，除

了向各〔个〕别国家购得军火外，不能有别的幻想，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们共同对日作战。

人们所谓德、意、日侵略阵线，或法西斯特阵线，乃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德、意、日侵略阵线这一个名词，在外延上不合逻辑。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国家，如果说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国家，便等于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德、意、日三国有了《反共协定》，虽然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而还未成为决定对于另一集团的军事同盟，特别是意大利之眼光四射，动摇不定，最近她因为奥国问题和德国暗斗，开始了和英国的谈判。德国虽然承认了“满洲国”，这并非等于宣布今后对于中日战争取消中立。军阀政治的日本还不是法西斯特国家，这乃铁一般的事实。前年法西斯特派政变失败后，受到广田内阁严重的打击，眼前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主力的议会，正在金融托拉斯资助之下，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右派各团体，还在向政府要求释放二月十七日防共护国团包围政、民两党总部之法西斯特派领袖；世界上有这样的法西斯特国家吗？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能容许别的政党盘据议会，公开的进行反法西斯特斗争呢？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会因侵犯别党总部而被捕，而向他们自己的政府要求释放他们自己的领袖呢？如果以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运动的国家，便是法西斯特国家，那么全世界能找得几个非法西斯特国家呢？在法国法西斯特的运动和力量都强大过日本，难道法国也是法西斯特国家吗！所以德、意、日法西斯特阵线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

至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更是子虚乌有之谈。苏联的政制，是独裁而非民主，她和英国始终是貌合神离，英国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表示对苏俄与德、意的斗争两面都不参加；英、法、美虽然同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固守着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欧洲的纷纠漩涡，更谈不上和欧洲任何国家的联合阵线。和平吗？在帝国主义制度未倾覆以前，和平是不可想像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宫的人们，应该懂得这个，因为他们现在还自称为列宁的门徒。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于侵略者的和平，她们

对于国内人民的反对派(如苏联)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英、法)却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饱受她们这种和平政策的苦教训了;现在中日关系,我们若企图避免战争,而希望和平,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后暂时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说:"如果某些强国不援助日本的对方,远东的和平当已成立了。"如此则和平便是侵略者胜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说法。在呼吁和平避免战争的各国,或者将来也会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它们或者更会进一步压迫中国,牺牲中国,跟在日本后面承认既成的事实,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如此则中国便在全世界一片和平声中断送了!呜呼!和平!和平!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国联派所号召的集体安全制度,在伦敦政府心目中的飞鸿,与其说是英、法、美、苏的什么阵线,不如说是英、法、德、意四强协定。这样模糊不定的集体安全制度,经过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事变,又以"不决战不妥协"的态度处之,所谓集体安全制度遂至搁浅。于是包尔温不得不继霍尔而下台,继霍尔的艾登仍旧继续"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张伯伦内阁依然走头〔投〕无路,直到最近中日战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日见英国在远东的特权与利益朝不保夕,迫得张伯伦不得不于决战或妥协二途选择一个:依避免战争的国策,张伯伦只有选择后者,于是艾登不得不辞职,集体安全制度遂由张伯伦宣告破产。所谓民主阵线,和平阵线,更是由海市蜃楼而幻灭了。① 照现时国际紧张的局面,"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本来是最无出路的如意算盘,依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霍尔及张伯伦的政策,比包尔温及艾登自较为合理,所以张伯伦一宣称"国联不能为任何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吾人不应再作国联仍能保护弱小国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梦想家所召集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昨日还轰动伦敦,今日便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这班梦想家,受过一九一四年的大教训还不够,现在又受到一个小教训,如果还不觉悟,将终于是一个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辞职的消息初传到中国时,我们的梦想家,还认为张伯伦的外交转变政策不会为内阁及国会所通过,会因此引起政

---

① 自本文第一句起至此,这数段文字曾题作《国际形势的幻想》,刊于《民意》周刊,1938年3月16日。后又收入《所谓国际二大阵线》一书,1938年10月,独立出版社出版。

潮；不料事实上，反对派工党在国会提出的谴责政府案，已为张伯伦的长篇激昂演说所驳倒，结果下院卒以三三〇票对一六八票而否决了。这是因为张伯伦在演说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国卷入战争漩涡内乎”一问题，不独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即在我们的梦想家所谓“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热烈反对侵略运动的英国劳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因为他们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与张伯伦同调的；剩下的所谓“热烈反侵略运动”只是一句空话而已。除了战争，空话是不能损伤侵略者毫发的。英国的劳工运动，本来是在和平空气中生长起来的，又加以第三国际近几年来和平主义的强调宣传，更是为张伯伦现行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张伯伦的现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协来避免欧洲战争，并且还会和日本妥协来停止远东战争。张伯伦这一政策是应该受人谴责的，然而克里姆宫的人们却不配谴责他。张伯伦虽然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物，而却是一个实际政治家，至少不象克里姆宫的蠢材，会幻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能够制止战争，会幻想喊喊反侵略口号，开开反侵略大会，宣传宣传，就能够不动干戈吓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说：“日本的胜利是比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危险要少些。”希特勒可以这样说，英、法、美也还可以这样说，苏联也可以拿这一理由来呼吁和平避免对日战争吗？照英、法、美、苏所力行的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政策，只有让德、意、日本日益坐大，会造成全世界一个更黑暗时期！在这一点，中国放弃和平，对日抗战，不但有民族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它专门计较自国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口号掩护之下，眼见中国失败而袖手旁观，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谈判，如果在牺牲弱小的条件之下顺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联合干涉远东停战局面，便会到来。我们万万不可因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认为他们会武装制裁日本，这不独非德、意所愿，亦非英、法所愿；它们干涉的压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还用在中国，使中国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欧洲让步，以阻止日本势力一直南下，完全独占了中国，完全扫荡了英国在中国南方的特权与利益。

如果我们不愿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国的条件，只有努力支持长

期抗战之一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能够支持抗战，不再败退，才能够多少转变张伯伦的政策。此时中日两方面都发出了长期战争的呼声，其实日本财政虽然比我们优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战争。她的赤字公债，战前已超过一百万万元，二年战争又需用一百万万，如果不能从中国攫取大量金钱，到了明年夏秋间，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汇兑率便难以维持了。财政一露破绽，无论日本军阀如何横蛮，也不能不认真考虑战争应否继续的问题。所以她们已经事先准备拿集会出版之自由向国民让步，来建立国民总动员的计划，以应付杉山所谓"较目前形势更劣之局面"。我们中国怎样呢？

我们的财政，我们的国民经济，自然更脆弱于日本。我们不能寄托幻想于国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我们更应该拿改良政治向国民让步，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撑持一年以上的战争，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溃。尤其要建立对各级政府的人民监督制度，才能够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苛税，以扫荡这些破坏国民经济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最大因素。国民经济之崩溃，对于战争的影响，比吃败战更加是致命伤。并且改良政治的实惠，如果真能广及于人民，风声所播，还能以挽回敌人占领地已失将失之人心，使之内向，使之自动的拒绝日货日钞，以加速敌人财政之崩溃。这不都是目前迫不容缓的事吗？

在怀疑民主政治的人们，或者会反驳我这一提议也是幻想；那么，外来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于自己的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不能拿改良政治来动员财力人力，和安定国民经济，不独战无可战，即忍痛言和，而战后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疮，又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乐观夸大自慰的宣传，经不得事实的打击；"人民愈穷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说！

1938 年 3 月 5 日　《政论》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署名：陈独秀

致《新华日报》[①]

我在去年九月出狱之后，曾和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又单独和剑英谈过一次。到武昌后，必武也来看过我一次。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与汉奸匪徒为伍，他应该公开坦白地宣言他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并在实际上反对托派汉奸行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

---

① 早在 1936 年 10 月，中共设在巴黎对外宣传的《救国时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即已发表社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请看托陈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此后连篇累牍发表攻击托派的文章，1937 年 5 月 30 日第 103 期载《陈独秀的'牢'中生活》一文说："就陈独秀与亲日派之密切关系，如以前由唐有壬的介绍而得日寇三百元……甚可信也。"但由于该报在海外发行，对国内影响不大。1938 年 1 月 13 日，康生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第 29、30 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枉陈独秀是汉奸，自九一八以来每月领取日本的津贴三百元。引起一场轩然大波。3 月 16 日，王星拱、高一涵等九人在《大公报》发表公开信："独秀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为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17 日，《新华日报》针对九人的公开信发表《短评》，说"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陈独秀在这种情况下，给《新华日报》写了这封公开信。(《新华日报》未发表)

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况且现在并非无政府时代，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在政府机关未判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各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一九三八〕三月十七日。

1938年3月20日《扫荡报》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

——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

一国中为什么有党同伐异的各党派存在，这不是根据人们愿意不愿意，而是根据社会各阶层客观利害不同形成思想不同所结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够由人们在主观上任意令它发生，令它消灭。

为什么利害不同、思想不同、意志不同的各党派能够合力抗日，这是由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共同意志；也只是因为有形成这一共同意志之可能性，我们才有理由提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问题，过此以上的合作、团结，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没有共同的利害，便没有共同的意志，便谈不上合作、团结。

不幸得很，竟有人在各党派合作抗战中，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诚然，人们提出思想信仰统一的问题，正因为企图实现一国一党消灭其余别的党派之理想。其实党派是相对的名词，如果别党消灭了，科学的说来，任何一党也就不能存在，因为那时各党派所代表的各部分人民不同的利害都消灭了，一切党派也自然消灭。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现在俄、德、意所谓一国一党的办法，即令政权的阶级性不同，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正因为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招来国内不断的纷争，将来还会成为崩溃之一因素。

现在的中国，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这就是说，无论各党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对于抗日救亡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便是所谓“对立的统一”；

"对立的统一",本是全宇宙普遍的规律,政治也不能例外。若企图统一思想信仰来抗日救亡,那便不知道要等待到何年何月了。譬如宗教上有儒、释、道、耶、回之分,哲学上有唯物唯心之别,政治上有集权分权之争,如此等等,何时才能够统一呢?我们能够要求他们为抗日救亡而放弃他们的思想信仰吗?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对于党派的问题,只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如果顾虑到战后之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纷争问题,这乃最后决定于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之发展,而非决定于思想信仰。

统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在欧洲中世纪,全欧洲的文化几乎都在公教会手中,宗教法庭用过无数次烧杀酷刑,也消灭不了异教徒,也没有把思想信仰统一起来,反而公教会本身倒分了无数的派别;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在中国古时,汉武帝和董仲舒,他们君臣曾热心拿尊孔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汉朝的宫廷中,始终完不了儒、法、黄、老的斗争,即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信仰,就是一个儒、道两宗的混血儿;后汉诸帝也曾严厉的拿谶纬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终于降服不了桓谭、王充的党徒。

历史的教训是很严酷的,我奉劝主张统一思想信仰的人们,多做点抗日救亡工作,少发点幻想罢!幻想一旦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

陈独秀:《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1938年4月　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抗战与建国

近来新发现"抗战建国"这一名词，可以说是有深思远虑的了。惟解释各有不同，有人说抗战胜利后再来建国；有人说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我认为这两说都是完全对。抗战就是建国事业之一，并且中国已建国数千年，即以民国而论，二十七年前的辛亥革命，就已经是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之开端。倘以建国作建设工业解，那便诚然非抗战胜利后谈不到，无论是内战或对外战争，都是破坏经济的，尤其是对外战争，海口被封锁，交通被破坏，机器原料之输入都很困难。原有的工业基础都很难维持，民族工业之大规模的发展，更是梦话了。

为了要明白建国即建立近代国家之整个概念，以及战后会出现一个什么形态的国家，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我们现今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什么时代。自从十五六世纪一直到今天，本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时代，法西斯特运动，乃是这一整时代的大流将转变为另一时代之暂时的逆流。这一逆流象征着前一时代行将完结，另一新时代快要到来，在前此五六百年整个民主革命时代，各国所完成之主要的民主任务是：

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

立宪政治之确立，

民族工业之发展，

农民解放。

在这一时代的各民族，必须完成这些民主任务，才能够摧毁旧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开展新的较高的生产力和新的政治制度，以成功所谓近代国家，即多多少少民主制的国家。

为什么要国家独立与统一？因为非脱离国外非民主的压迫和国内的分裂，一切经济政治都不能自由发展。为什么要确立宪法政治？因为非如此不能确定政府的权限，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全国人民的智力和

道德能够普遍的发展，以增加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增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与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为什么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这便是我们建国的整个概念。

在历史上各民族完成这些民主任务的动力，并非先天的限定是那一阶级，英国是资产阶级完成的，法国是小资产阶级联合工人完成的，德国和意大利是资产阶级联合地主贵族完成的，俄国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完成的。各国所完成的民主任务虽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无根本上的差别，即在落后的东方如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也完成了某些民主任务，所以她也勉强算是一个近代国家。

中国辛亥革命，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的完成，因此乃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是建国运动，并且是建立近代国家之主要的基本的运动，即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

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之民主革命时代行将完结而东方犹未完结的中国，民主任务不完成，即建立近代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曾解决，在国内外任何事变中，这些国家根本问题都会很自然的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成为革命的酵母。

目前的抗日战争，是建国事业中之主要的基本的事业，除开国际因素外，单就国内社会势力而言，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及财产关系，都截然不能混合并行，社会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因此在这一建设时期，政权党只能自行其是，除非在野党断然言行一致的放弃其阶级立场，是不能像在对外战争中和阶级性不同的党派合作的，这时阶级性不同的政党，只有站在在野的反对派地位。

如果国内各种社会势力都不能够完成民主任务，来建立一个近代国家，那末中国受外力牵制和国内纷乱的局面，只有延长至国际巨大变动法西斯特崩溃新时代到来之时。

1938 年 4 月 25 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九期 署名：陈独秀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

有人以为“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走到前面，人们的思想如果停留在“五四”运动时代，那就未免太落后了。

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已否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运动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且必须具体的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则“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许闭眼胡说的了。

“五四”运动时代所要求的是：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

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荡封建的残余。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

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

这些要求现在已经过去了，或完全过去了吗？“五四”运动时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在各个事变中，虽有参加社会势力广度之不同，运动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仅是些青年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并不能够说这一运动的时代性已经过去。这一时代性不但现在不曾过去，即在近的将来，离开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独立也是民主革命的要求之一)，不会推动什么革命，并且连规模较大的运动也不会有。政治经济之发展，会因革命的动力不同而异其形态，而推动革命的历史任务，必然是民主民族的要求，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所决定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不能够改变它。

正因为有些人们虽然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这样的见解，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以及由打倒富农到“请土豪劣绅帮忙”，由苏维埃政府到国防政府，由普罗文学到国防文学，由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到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

现在或者已经过去的是这班头脑昏乱的人们，而不是“五四”运动时代，现在一代的青年，不可再重复这样的错误了。所以我在大家回忆“五四”运动的今天，不得不指出“五四”运动之具体要求所代表的时代性，这不仅仅为了说明“五四”运动的意义，重要的还是为了指出青年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据点，即是：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参加一切民主民族的斗争。要坚守住这一据点，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混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

1938 年 5 月 15 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一期　署名：陈独秀



我们断然有救

去年九月，我在南京出狱未久，在中英协会和适之、孟真晤谈时，孟真向适之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他这样说的缘故，是因为在那几天以前，我们谈论世界大势时，孟真很颓丧的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势力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阴贼险狠，专横武断，一切不择手段的阴谋暴行，都肆无忌惮的做了出来，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我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很严肃的向我说："全人类已临到了窒息的时候，还能够自救吗？"我说："不然，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譬如日本的黑暗势力，横行中国，压迫蹂躏得我们几乎窒息了，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但可救中国人，日本人将来也要靠我们得救，不要震惊于他们那种有强权无公理的武装力量！"当时孟真也颇以我的见解为然。

我现在还是想着。

请看！鹿地亘先生夫妇的言行，堀田少尉的觉悟，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一种信公理不信强权的表示，而是黑暗中放出一线曙光，这小小的一线曙光，在我们人类还能够自救的保证上，比中国军队打败日本军队，还要有价值。有些中国报上，很错误的竟有"堀田少尉向我军投诚"这样说法，简直是把曙光变成了黑暗，恕我不能附和！

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

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营垒中，都会有曙光放出来，我根据这些观点，所以敢说“我们断然有救”！

1938年6月5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三期 署名：陈独秀



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

领导全国抗战建国的中国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在国民党的本质及其最近临大宣言和纲领中，政治水平较高的人们，自然早已懂得，其余或因政治的头脑不甚清晰，或系别有用心的人们，无论在党内或党外，似乎或还是意见纷歧，因此国民党的领袖及其中坚干部，应该清楚明白的昭告国人，以免曲解和误会，这是为要的，尤其是在高呼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今天。大公报曾经主张国民党的总裁应当对三民主义加以确定的解释，或者也是这个意思。

最近读到《政论旬刊》第十三期罗敦伟先生"党派统一问题"一文，其主旨是反对多党论，其主要理由是如下一段所说：

> 在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之下，经济机构上的力量是寡头的。有的是比较复杂的寡头，例如法国他们是多党制，英美是比较简单的寡头，他们是两党制，最近也有多党的倾向。代表多数集团的资本政党，当然并不在想像党外无党，也不在禁止党内无派。一旦资本的统制高度发挥，经济机构单一化，独占化，即立刻复为统一的政党。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都有他们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只有最庸俗的政党论者，才以为是人为的。苏联共产党的统一，也有他的必然性，完全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独占主义基础上，应有的上层筑物。

罗先生这篇文章，不用说是对我们《各党派合作问题》那篇文章而发（曾载《时事新报》），在这一段中及全文他处我所不能同意之点，本文中均不能详及，我认为现在应该急于提出讨论的是：罗先生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论者，而罗先生是否认为中国的经济已达到"资本的统制高度发挥，经济机构单一化，独占化"，而需要采用"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

法西斯党”，的政制呢？如果两者（无产阶级专政和德意法西斯制）都不好，英美法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也不好，那末中国国民党打算采用什么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呢？虽然各国建国都有他的特点，国民党将领导国民向那一大方向走去呢？如果领导国民抗战建国的党，自己还没有决定大的方向，自己还没有统一的政治意识和意志，则国民的努力真无所适从了，党内党外的纷歧意见更莫由统一了。罗先生所高唱的“现阶段的中国，固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要强化国民全体一致的团结，尤其需要统一的政治组织，统一的命令与行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因罗先生这一段话，使我们更感觉得国民党自己明确决定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万不能再含糊下去了！

六月十日

1938年6月15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四期　署名：陈独秀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

——七月十四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

在对外战争中，地大人多，自然是一大优点。俄国第一次被拿破仑之侵入，第二次十月革命后被欧、美、日本各国联合进攻，都仍能保全者，正因地大之故。此次中国对日本抗战，若非中国地大人多，已被日本灭掉了。中国单是四川一省，土地、人口都与日本相等，论理只四川一省，都有对日本抗战的资格；不幸中国的工业与教育都不及日本发达，所以在抗战一年中虽有各国的援助，仍然丧失了不少的土地、不少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更是蹂躏不堪。我们自从开战以至今日，并不是想在军事上战胜日本，只是因为日本逼迫我们到了民族不能生存的最后关头，不得不出于孤注一掷，为保存国家民族的人格而出于一战。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战争愈延长，我们固然愈加破产，敌人也愈加困难；我们的破产是愈加贫弱，敌人的困难是不能维持富强，这是由于他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尤其是对英、美造舰的竞争，形成了她将来的破产；这一点在敌人明白的政治家已看得透明，所以他们当中或者希望速战速决，或者希望停止战争，骨子里同样是认为战争不应该延长下去。所以只要我们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守住武汉不失，敌人便会知难而退，即是撤回使我们不能忍受的媾和条件，我们便能够在战败破产的废墟上，加倍努力，复兴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现在不要气馁，也不要大言自豪，只要看清敌我两方的真实状况，脚踏实地的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我们便有希望了。

我们将怎样支持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事力量。过去参加战争的军队，都有各种程度的疲劳与残破，最后的长城，乃是我们四川的大批生力军。因为大水灾的缘故，敌人用主力军由河南南下的战略，改变为由长江西进。此时在长江南北两岸和敌人血战和防守的，川军颇居重

要地位；我们希望四川第三次出兵，并且迅速派出大批的精锐部队，保住武汉，即是保住中国，所以我们敢说：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这便是抗战中川军的责任，也就是川军在历史上不朽的荣誉。

即万一不幸，武汉失守，在经济上、文化上，也只有四川能够领导云、贵做复兴中国的安哥拉。

四川的同胞们为了要加强劳动力和战斗力，以尽目前和将来的责任，禁绝鸦片烟，乃是第一件大事！

陈独秀：《民族野心》 1938 年 8 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民族野心

通常说到野心二字，人们便有点厌恶，其实无论个人或民族，野心用在占有欲固然不免令人厌恶，倘用在创造欲上，便是伟大、向上、有志气等同意义的名词。

我们民族现在种种不长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为什么缺少野心？有人说，因为民族衰老了，罗马之后今有意大利，为什么我们却衰老了？有人说，因为孔、孟、老、庄、佛教、宋儒等礼让退婴的学说，衰老了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血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

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而且是更高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这两个社会过渡时期，即前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造成社会的蒙昧无知和散漫，商业造成社会的奸诈和苟偷，于是它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都一般的衰落。

欧洲罗马衰亡后数百年，便踏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德川幕府一倾覆，紧接着便是明治维新，两个社会的过渡时期为时不久或几等于无。中国自晚周封建崩溃以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延长了二千年，第一是因为四邻都是些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因为海岸线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第三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市场，迅速的集累原始资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之继续进展，以此种种，遂至延长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然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自然也没有集中的前进的产业工人。这时代的原始农业，各家族占有或使用一块土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只要风调雨顺，便可靠天吃饭；只要家畜和子孙繁殖，使家道兴隆，便是无上幸运；薄税轻刑，是最好的政治，此外用不着人民的组织，用不着国家的保护，用不着政治革命，用不着对外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是商业支配工业，而不是工业支配商业，国内市场已足供其回旋，商人将本求利，固无择于本国制品或外国制品，即令是仇货走私，也一样发财，用不着民族斗争，便谈不上爱国，更厌恶革命战争；他们也和农民一样，根本不会有民族野心。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手工业工人不占重要地位，其特性亦近于农民，乡村的手工业，有许多就是农民的副业）；商人的特性是奸诈和无耻；这两种落后的特性合并起来，便形成了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无知而又无耻，中国二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脚色的，也终于是一班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分子，这正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之反映；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

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那便万象一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

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又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于是才会有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此次抗日战争发

生。然而正因为经济长久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缘故，旧社会的抵抗力过于强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与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资产阶级昏懦的可怜，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了朝野，这便是历次革新运动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

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在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中国现在的银行，仍旧是商业的，而非工业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影响到抗战如此之大，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这都是吃了我们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至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或者承袭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半吊子的见解，反对全部欧化，一方面主张采用现代生产制与军器，一方面主张保存固有的道德与文化，高唱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欧的物质文明；如此则中国永远不会欧化，即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永远不会走进中国来；永远死守着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永远没有什么民族野心。如果这样永远糊涂下去，我们对得起子孙吗？！

七月十六日

陈独秀：《民族野心》 1938 年 8 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论 游 击 队

时论对于游击队或者都有点毁誉过分罢。我所得的材料，却是可以毁的多过可以誉的，然而现在还不能下一个最终的结论。可是我们对于游击队有两点必须充分认识，方不至为时论所迷。

第一，正当的游击队有两种：一是属于正规军队指挥供给的别动队，一是民众自携武器、粮食的武装队，这两种游击队，也都必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第三种便是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军器、粮食的游击队，辛亥革命以来有所谓“民军”，即属此类，在战争中，在战后，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在此次抗战中，被人骂为“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的，正指此辈。

第二，即正当的游击队，虽有它的特殊作用，即战争中扰乱和牵制敌人，战争失败后使敌人不容易安全统治；然一离开正规军，而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在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

家。阿比西利亚的农村中，至今尚有不少的游击队，不断的袭击意大利军队，我们能说阿比西利亚还不曾亡国吗？印度西北至今还有一些所谓“王国”，我们能说印度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吗？

我们必须充分在原则上认识这两点，游击队运动在抗战中始有利而无害！

七月二十一日

1938年7月23日 《青年向导》第三期 署名：陈独秀

说老实话

“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对于现在的中国人（精卫先生自己和我当然都在内），真是逆耳的良言！

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话的人，决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

说老实话的意义，在表面上好像就是不说谎；然而更进一步解释起来，似乎前者比后者还有积极的意义，不说谎，只是消极的不说谎话欺骗人；说老实话，更是积极的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把真理说出来，在欧洲许多国的语言中，“老实话”和“真理”可以同用一个字，例如英语之Truth，俄语之 Pravda。

说谎话说出最高的价值，也不过是宗教；宗教是要靠说谎才能存在的，说老实话乃是科学的。科学家有时也有错误，然错误不过若干假定之不成立，真正科学家都不曾有心说谎。科学正是严肃的制止人们说谎，欢喜说谎的人们所以也厌恶科学。

欧美学术界，自从科学战胜了宗教，能够说老实话的人，日多一日。政治界便逊色多了；然而比起我们的士大夫群，还老实得多，譬如：他们的右派便自称是右派，资本主义者便自认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的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如果被人称为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心中便感觉得不愉快，甚至勃然大怒。

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在开会宣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此种状况究竟能够支

持几久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信从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

现在的环境并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即偶然吐出万分之一不忍附和时论的话，已经使有些人大大的不快了。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七月二十七日

1938年7月30日 《青年向导》第四期 署名：陈独秀

敬告侨胞

——为暹逻《华侨日报》作

此次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工业的统治，所以这一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外，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国民对战争愈尽力，胜利愈有希望，即使不能胜利，甚至因战败而亡了国，全世界也不至把我们看成永远亡国而不能复兴的民族。我们须自信：我们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伟大民族之一，只要多数国民能为国家尽力，是不会日久被人战败或征服的。

在此次战争中，海外各地侨胞，对于祖国之热望与援助，使我们住在国内的人，不但兴奋，而且惭愧。

关于侨胞的状况，我不大知道，本来不能有所贡献，只感觉有两件事要和诸位谈谈。

第一，我们的民族运动，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面，和帝国主义者以夸大自己的民族为口实来侵略兼并别人的民族主义（如以前俄国沙皇的大斯拉夫主义及现在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等等）根本不同；因此我们侨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个民族的独立国家，如果她不公开的直接加害于我们，我们便不应该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场，或站在什么"阵线外交"的立场，来妨碍别人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妨碍，不但违反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而且只有迫着他们对我们益加疏远，甚至仇恨。至于对于所在地的人民（无论是独立国或外国的殖民地），更应该公公正正的平等看待，断不可有伤害本地人民经济生活的侵略行为；我们自己正在为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战争，便没有理由侵略别人。

第二，我们国里的贪官污吏对于人民欺压敲诈，是世界各国中最可

怕的地方，回国侨胞吃过他们苦的事实，大概十本书也写不尽；然而侨胞断不应该因此对于祖国失望灰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国家的公仆，公仆不良，主人有权利起来赶走他们！不起来赶走他们，是人民自暴自弃；失望灰心，更是自杀！他们虽然是些公仆，而有了累代传袭的权威，"奴欺主"的局面已非一日了，赶走一批，又来一批，根本解决，只有主人渐渐起来亲理家政；主人能分神亲理家政一分，公仆的权威便自然减少一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然而我过去不曾自暴自弃和自杀，将来也不会自暴自弃和自杀，但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人们携着手共同奋斗到底！

我所欲言者，暂止于此。

民国廿七年八月一日于重庆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1938年11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

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私人资本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国家资本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范畴；节制私人资本，只有使资本主义之发展停滞缩小，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所号称的统制经济更是大规模的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不废除财产私有，都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私有财产制是资本主义之骨干，它之存在与否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水岭。

如果有人新发明一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那么我便要请问他：在这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财产私有制是否存在？这一种新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此外还有许多根本的理论，我另有专篇论列，兹不赘及，现在只提出两个无关宏旨的枝叶问题，唤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注意一下：

第一，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这正合你们的口胃；并且你们所谓中国社会生产力是封建的，这一怪论也从中共抄来；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

第二，欧美的知识分子，毕竟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点知识，不会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新发明，他们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不诚实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将和希特勒一样，以反对资本主义始以充当大资产阶级的豪奴终；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认真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必然要走共产的道路（德意的法西斯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为商品交换而生产，便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场了），无论你们愿意或不愿意。并且像你们“一反近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为交换而生

产”的主张，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几个最主要的国家社会革命成功后，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还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张，你们居然想把它运用到国民党及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几个党员这样随便谈谈，还不关紧要，倘若抗战建国纲领真采用了这样幻想的主张，则敌人将如何宣传，国际形势将发生如何变化，这是可以预见的。

这虽然是两个小小的枝叶问题，也值得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认真考虑一下罢！

八月二日

1938年8月5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九期 署名：陈独秀

我们为什么而战?

要问日本兵士为什么而战，他们多数的答复是为执行上官的命令而战，稍稍进一步的答复是为国威而战，此外便没有了，只有他们的政府知道真正是为什么而战。

我们为什么而战呢？我们多数的兵士知道为了日本鬼子欺压我们，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在这一点，我们的兵士比他们要进步得多。可是我们的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于此次抗战，应当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民族生存而战"，这句话当然没有说错，并且比"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要高明得多；但还未免抽象一点，笼统一点，并未表明为怎样的生存而战。

各个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气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质的条件，而且要有很好的丰富条件，才是光荣的生存，而不是贫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广田曾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他这几句话，正是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日本民族永远过工业的光荣生活，中国民族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国民族并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荣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以乡村建设为主要事业，而无视城市工业，则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于我，而我之抗战也是多余的事。可是事实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大城市，炸毁我们的工厂，正是因为要消灭我们的城市工业；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与之抗战，也正是不甘心做他们的农奴，而力争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受她的束缚。所以，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

"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这句话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先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于是不得不急于在中国取得煤铁羊毛棉花与市场,在库页岛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则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停止发展;因此,她对英、荷对苏俄尤其是对中国之冲突,遂日益加剧。在中国呢?中国有广大的市场,有丰富的煤铁羊毛与棉花,我们如果以乡村建设自足,无意发展民族工业,广大的市场听〔任〕日货倾销,工业的原料让日本尽量取用,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亲善的真实意义,她便没有对中国作战之必要了;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的长期战争。可是自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事,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着手建设,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这便是告诉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这一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于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发生了究竟将来谁是中国主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后只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

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人以为中国对日抗战太晚了,又有些人以为开战太早,这是战争的时期是否于我有利的问题,而不是战争本身的中心问题。

无论战争的时期是否有利于我们,而既已战争,我们只有把握住此次战〔争〕本身的中心意义,即是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而不为一切空话大话所眩惑,大多数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始终为抗战而奋斗。

大众只能为切身利害的问题而奋斗，不能为虚无飘渺的空话大话而奋斗。

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八月八日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1938 年 11 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致松年

松年：

三日抵此，不仅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1]。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了。此间租店屋，非绝对没有。但生意外来人不易做。据邓季宣的意见，景义仍以和胡子模合力在此开米店为妥当。在此收谷碾米运往重庆出售，与本地人交涉比较少也。季严等已到重庆否？倘大批人俱到，绣壁街住不下。罗太太（方志环女士）及季严夫妇，可住金家巷的房子。此房子可与薛农山先生接洽，此人上午在黄家垭口（四达里五号住宅），下午则在时事新报社。他们已到否？望即写信告诉我。

父字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

郭因：《陈独秀生平二、三事及其他》 文史资料选辑（安徽）

1980年第一辑，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① 1938年7月2日，陈独秀由汉口乘船到达重庆，在他的同乡邓初（医生，在江津开设有延年医院）邀请之下，于8月3日到达江津居住，不料邓妻拒绝接纳，只得临时居住在小客栈里。不久，住进江津城东门外郭家公馆内。后受邓初再次邀请，住进延年医院。1940年7月，迁居距县城三十多里的鹤山坪杨家石墙院内，直至逝世。

资本主义在中国

——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1]

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之真实性，除了进化论的反对者，已为众人所周知，现在无庸多讲了，至于跳跃的进化，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例如：在古代社会史上，北朝鲜及日本有些地方，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这是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之影响。又如近代史上，俄国因为西欧的影响，由封建的农业国，很快的经过了甚至于可以说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一跃而为近代工业并且踏进了产业托拉斯边沿的国家；在中国，一面继续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一面采用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最新的纺织机器，跳过了英国数世纪的循序进化，所以在上海马路上往往可以看见独轮车和无轨电车及最新式的汽车并行，马拖的公共街车时代则未曾经过。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之所以在中国有些跳跃的进化，也和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是受了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外来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力量以循序进化的。

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又会引起过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

---

① 据郑学稼《陈独秀传》(下)第1093页，讲演日期是1938年7月16日。

经济，要估计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了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或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国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而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资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庞大的商业资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之工业化则更加谈不上，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产生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来，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

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人们或者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含有缺点与罪恶，我们何不取法乎上，再大大的跳跃一下，采用生产力更高的社会主义呢？诚然，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已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中国，便不能够说没有跳跃进化之可能；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

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

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陈独秀：《民族野心》 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八一三”

此次抗日战争，自历史上的意义言之，自当溯之“七七”芦沟桥事变，然由地方事件发展到中央出兵，形成两国正式战争之开始，则为“八一三”上海之战。

自“八一三”上海开战之前夕以至今天，对于在南方开战之当否，始终有两种意见之不同。一种认为战争宜限于北方，在南方开衅，则于金融工商业牺牲太大；一种认为北方地形不利于我，而且惟有战地扩大，才能够达到消耗敌人之目的。我以为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既然开战，只有采用全面战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强过我们，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我们本消耗不过他们，我们之所以欲于采用消耗战的战略，一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远过于敌人所能够得到的；二是因为我们是以全力作战，敌人须分力以备别的国家，如陆空军之对俄，海军之对英、美；三是因为敌人能战而不能拼，我不能战而能拼。第三点尤为重要。

自开战以至今日，我们始终不曾幻想在军事上能够得到若何显赫的胜利，我们所有的把握，只是一个“拼”。我们地大人众，我们是农业国而非工业国，我们拼着失地，拼着丧师，拼着牺牲工厂，拼着伤亡满地，甚至拼着一片焦土，敌人是暴发户，我们是破落世家；破落户本一无所有，性命更不值钱，暴发户的绅士，慢说大门前的旗杆被人打毁，就是绸长衫被人撕破，也够大失体面，我们并不奢望能够打死这暴发户，只要拚得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们稍微客气的说和，我们便算是胜利了。

我们若始终忍受暴发户横霸无已的欺凌，而不与之较，今天丢一屋角，明天丢一块田地，后天又丢一处祖坟，现在变成脓包，将来更要讨饭无路走，只有死里求生的与之一拼。这一拼的损失，虽然不如敌人所说

非五十年不能恢复，而牺牲与痛苦却是太大了，尤其是南方各省。

我们的出路，只有忍受这不堪忍受的牺牲与痛苦，给敌人一点小小教训，使他知道我们也不甚容易欺负，或者会知难而退，尤其是到了国际形势稍稍于我有利之时。我们只要恢复一个像样的国家，只要我们在痛苦牺牲中，真正得到教训，真正懂得科学与工业之重要，真正懂得建立民主政治使人民与国家融合之重要，真正懂得绝对停止内战与军队统一、国家统一之重要，真正懂得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之重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我们便可以由破落世家变成新兴世家。

始终不抵抗，始终做脓包，固然毫无出路，即抗战限于北方，也正中敌人逐步南侵节省兵力财力之毒计；所以为扩大战地消耗敌人兵力财力计，由“八一三”上海之战开始全面战争，在战略上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1938年8月15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期 署名：陈独秀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我很奇怪巴金先生还会和他说道理，他还有什么希望呢？第二个背弃者便是我们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学，我们曾称他是日本的李大钊，他现在变得太不忠厚了！第三个乃是最近铃木茂三郎先生的所谓转向，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我们责备他们转向爱国主义，他们会愤愤不平的责问我们在中日战争中，只许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赞助爱国运动，而我们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转向爱国主义就应该被斥责吗？我以为这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玩弄名辞，而不曾考察其实际内容，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

还有班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藉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人们；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

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这种发源于背叛国际主义者"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更是错上加错。不把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的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预先占取资源以争胜,这是中国旧时大家庭各房媳妇抢着"积私"的丑态,还配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不能实现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法西斯国家,将来还会有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就现在的生活说,日本除了供给财阀军阀填不满的欲壑而疯狂的扩张军备疯狂的侵略战争所需要外,究竟影响到平民生活的资源贫乏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帝国主义来到世界上太晚了,要想学资本主义先进国,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的一小小部分,喂养劳工贵族,已属不可能,无产大众更不待言,她的商品和别国竞争,贱价劳动力始终是她的特长,那是骗人的改良运动,是如何可怜,所以日本对外侵略战胜一次,即紧跟着军备扩张一次,工农平民生活亦即紧跟着降低一次。如果说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日本的资产阶级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质条件;那末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丰富的资源以后数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农村更加破产而不是恢复呢?"九一八"前,日本输入满洲的商品价值七千万元,芦沟桥事变前已达到三万万元,同时物价总指数却比"九一八"前高涨到百分之百,这是表示工农平民的生活改善了吗?况且拿分润掠夺品的余沥来鼓动工人阶级赞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路战争,这本是欧洲资产阶级御用的所谓"社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学会了!

又有一般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高畠素之)责难胡适之为什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亲近英、美帝国主义。这一责难,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可惜他是日本人,就天然不免有点为日本帝国主义做说客的嫌疑!我现在没有必要代胡适之先生答辩,我只得正告他们: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曾企图在帝国主义者当中选择主人,我们认为中国的解放,必须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制,并不只是日本;可是事实上,近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公开的压迫之尖锐化,超过任何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的横暴,因此只好集中我们可怜的力量,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有人教导我们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者，我们只有认为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中国国民党从前的政策，本来是不反日而反英的，后来为什么走到相反的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何以不自反省，反而责难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呢?

我还要告诉一切日本的平民，我们的所谓“抗日”只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和军阀，而不是反对日本的平民，我们知道侵略中国，本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而不是日本平民的要求。任何派社会主义者，都不能附和极少数人所谓“纵断的民族运动”的说法，不但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回事，中国人中有大批汉奸，日本人中有不少同情于中国抗战的人，鹿地亘夫妇就是代表，请问这将如何纵断法？我们的纲领是，结合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平民，共同打倒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不独中韩人民，即日本人民，也只有到这时才能够得到解放。

如果许我做一个荒唐的假定，中国战胜日本后，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侵略日本时，则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便应该首先反对本国政府赞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对华抗战!

我这些话决不是对山川，佐野，铃木这等人说的，我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倾向社会主义的青年，能够听到我的说话，而且得到合理的回声!

最后，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敬爱日本人民的诚实和勇敢，洁静和富于同情心，甚至承认日本政治也比中国清明，并且痛恨中国社会之堕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没有两样；然而这一切决不能减少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的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八月二十一日

1938 年 9 月 5 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署名：陈独秀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而不能恢复，工业也很难发展。在抗战中，工厂被破坏，海口被封锁，更谈不上工业，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主义。如果我们一面高唱抗战建国，一面却因为回避意见纠纷，主张不谈主义，即不谈究竟采用何种主义的经济制来建设工业，那便有点莫名其妙了！

因为铁的事实之教训，即便向来迷信东方精神文化的人们，现在也很少公然反对发展工业，这是中国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发展工业呢？资本主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进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热的希望着解答的问题。对于一般本来头脑不清又怀着成见的半老人，我们值不得跟着他们缠夹，而对于纯洁的青年，却不能放弃指导的责任，不抹杀他们前进的心理，也不因为顾忌他们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迎合他们，欺骗他们，以图拉拢。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着于封主，农民附着于土地，工人附着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的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相同的。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

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远在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层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间没收的土地及财产无报酬的分给贫民，而为三级会议所拒绝。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由国会多数党(独立派)分出了约翰李尔波恩所领导的“平均派”，他们的理论家乌伊可吞利主张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消费，废止买卖，废止货币，废止雇佣，政府指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在十八、十九世纪间法国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苏美时派、许伯派及被人称为“疯人”的甲格龙、华来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税及财产税，组织公共作场，把国家一部分财产出租给无产人民，严惩高利贷者，由城市政府廉价售粮食给人民，并且企图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比夫、达尔脱等组织的“平等社”准备以暴动的手段，来实现平等者的共和国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那是建立劳动者革命专政的政权，主张共和国国民财富之分配，必须用在保证共产主义公社每个社员(即六十岁以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动中，有布南克巴尔比士领导于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张用

革命建立独裁政府，实现平等的原则。这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路。这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之历史发展上，资产者、小有产者以及工农平民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产力增高。同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已经由高利资本、商业资本和手工业资本，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当时还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沉醉在阻碍生产集中和生产力增高的“均产”、“平等”之幻梦。他们的失败命运，本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们的失败，正是社会之进步，虽然他们的英勇斗争，至今还值得令人钦佩，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巩固，资本主义的罪恶日渐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乃如雨后春笋普遍的发达起来，特别在法国，主要的，如圣西门派、傅利耶派、路昌伯朗派、浦鲁东派、卡白派、勃兰克派，一时风靡了欧洲。这些派别，痛恨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当中，除了勃兰克派和以前的巴比夫一样主张由少数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武装组暴动，夺取政权外，其余都是和平宣传者，希望统治者或慈善的资本家，接受他们的主义主张，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反对工人运动。他们除了做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的社会主义先驱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别国情，来否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

跳到〔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时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的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跃的进化。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此时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缠夹意见，我们不需要加以讨论。因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更非因为爱好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口中所说和手中所做的是两件东西。我只提出老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够了。马先生的大意是：中国不能走俄国的路，走美国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险；于是马先生感觉得没有出路，仍旧只有提出发展国家工业，同时容认私营工业而加以节制的主张，这正是罗斯福经济复兴计划的骨干；然而却没有人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马先生也不曾否认资本主义。不过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国，并非美国可比，且以世界大势而论，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来也不会有他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而日夕彷徨为预防将来发财时子孙滥用是谋，这和马先生同样是杞人忧天。并且这一杞忧，便会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意见一样，又要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岂非中国民族活该倒霉！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就人们所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在别的国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国家工业便以为这是国

家资本主义，已经又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那更是轻浮之见。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八月二十四日

1938 年 9 月 15 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廿三期 署名：陈独秀



抗战一年

此次对日全面抗战，虽然开始于去年八一三上海之战，而历史上的意义，当以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始，至今恰好一周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过去对外战争，对方都是些文化较低的民族，此次对日战争，对方乃是文化较高的民族，可以说虽败犹荣。

此时战争还未停止，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姑且不论，根据这一年的事实，我们算得是胜利了。敌人的军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他们军事上的胜利，本有科学的必然性，这是不必讳言的；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然不能够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敢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像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一点。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政治上仍然毫无办法，不但未得着一个张弘范、洪承畴，在民族意识压迫之下，并没有一个稍负时望的人肯认真为他效劳，因此敌人对于一般汉奸，很少敢于信任，一年以来，未曾出现一个有力的汉奸，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二点。敌人对我民族污蔑的宣传，曾经普遍了深入了全世界，然而在此次战争中，我民族抵抗强者的人格提高了不少，同时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在全世界文明人士面前无隐藏的暴露出来，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三点。敌人对我之侵略战争，尤其是长期战，并非真是全国一致的。最热衷战争的，只有少壮派军人和军事工业家；工农劳苦大众甚至小商人，根本反对战争，轻工业家和元老重臣甚至老成持重的军人，对于长期战争，也都有各种程度的怀疑，尤其是有头脑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都眼见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感觉得是他们国家致命的危机。这各种程度的反战情绪，将随对华战争延长而加强，如

果进攻武汉战旷日持久，得不着效果，受军事压迫的各种反战分子，会日渐抬头，这是敌人失败之第四点。

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自己怎样呢？我们的政治、军事、工业、经济、文化，事事不如人，吃败战是当然的；所幸在这一年抗战中，我们的一切缺点都暴露出来了，只要不是痴子和骗子，都应该勇敢的承认，不应该自欺欺人。勇敢的承认缺点，认真的改去缺点，比轻浮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要有益万倍。最后胜利并非必然的，要努力改去缺点，才能接近胜利之路；倘若轻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蒙住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此乃失败的道路。

说到改去缺点，真是千头万绪，现在已经有点缓不济急。在战争第一的今天，只好从治标方面，择其有利战争而不妨碍战争的几点着手，因为战败亡了国，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第一，外交上坚决的择用以本国现实利益为本位的政策，不但要从各与国获得大量的物质援助，特别是军器，即令是魔鬼的国家，只要它有利于我国或者不利于敌人，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利用；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我们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什么阵线，什么军事同盟，什么某国出兵，诸如此类的幻想，都应该断然抛弃。打吗啡针虽然能够暂时兴奋，结果是有害的。在野党倚外援以自重及利用外交来压迫政府，更是万分卑劣！

第二，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的党派应该口心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天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即使有某一国家军器的援助，也不能成为西班牙的局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作战，和德、意援助佛兰哥的形势不同，并且那时的国际形势会有利于日本。

第三，政府应该迅速决心解除人民的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改去过去一盘散沙的状态，使之有力量援助政府继续抗战；人民有了庞大的组织，募债和征兵的问题，便易于解决了。

第四，政府应该下大决心，严惩从高级官吏一直到保甲长的贪污分

子，代之以奋发有为的青年，以利抗战而挽人心；任何达官贵人，凡生活豪华，狂嫖滥赌，人民侧目者，此种毫无心肝的亡国大夫，应一律发往前线，参加开挖战壕工作，或编入运输队，以示薄惩。

以上四事，虽然卑之无甚高论，都是目前迫切应该力行的事。

如果力行此四事，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则今后七七纪念，比双十节还有价值，如此方不负抗战中军民的痛苦与牺牲！

陈独秀：《民族野心》 1938 年 8 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致郑学稼信八封

（1938年9月12日—1942年4月20日）

编者按：郑学稼《陈独秀先生的晚年》一文，载于香港出版的《掌故月刊》1972年4月。其中有陈独秀写给他的信十四件。且件件有手迹影印。后，郑又将此文和信收入他的著作《陈独秀传》（下）作附录之八《陈独秀先生晚年与我》。现从十四件信里选录八件并略加注释，附后。

一

学稼兄：

两示均已读悉，日来因血压高，头昏眩，不能伏案写字，故未及覆。今天稍好一点，始能勉强作此信。来信所谓胡氏似有神经病，是否指胡秋原？望示知。其在《时事》所为文颇不似有神经病者，想兄别有所见也。……我辈立论，应在寻求真理，非求其有利无利于何方也。《论资本主义》一文，《时事》不能发表，为什么？《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也不能登载呢！望代向农山[①]兄问明示知。农山兄即今还催我为《时事》做文章，做出又不能登（弟之头昏即由于天热勉为文而起），既不登载，又不以实情早日函告我，此殊非待朋友之道。待朋友不宜要手段！此祝暑安。卧榻草此，恕不能详。弟仲甫手启。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

二

学稼兄：

① 农山：薛农山，曾是托派成员。抗战时任《时事新报》主笔。

七月卅一日手教敬悉，谋生救国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长有所短，若用所短，于谋生救国均不适宜，吾兄以为如何？农山兄处春天两寄信，至今未得覆，其忙可知矣。弟亦未去信，以无善足述也。自四月以来，弟即居离城廿余里之乡间，机声虽时闻，料无妨碍。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约八月①

同信又附语：

将来倘或江津城被炸，亦勿以弟为念。

农山、卓轩②、国焘诸兄晤时乞为道念！又及。

三

学稼兄如晤：

前奉手教，当未作覆，顷又读廿六日函，知兄已辞职仍回复旦，想新加坡之行亦已作罢矣。弟甚希望兄仍留复旦，不必远行。弟有机会赴渝时，当得晤教也。农山兄久无信来，想工作太忙之故。德、苏两狼相争，或有一伤，可贺！以中国抗战计，当望希特勒失败，特恐苏联不久即屈服，则希特勒获得乌克兰之梦，高加索之油，大军直冲伊兰、伊拉克，则英国运命殊可悲耳。此复并祝暑安，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八日

四

学稼兄左右：

---

① 信内："自四月以来，弟即迁居离城二十余里之乡间"。据《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第八、十、十二页，陈独秀于 1939 年 5 月 27 日或 28 日由江津城迁居到鹤山坪。信内又说"七月卅一日手教敬悉……"可知此信大约是写于八月间。

② 卓轩，即任卓宣。

十四日手书敬悉，来书所论，尚多与鄙见微有不同，或者因为兄对于《我的根本意见》尚未详阅也。此提纲式短文，乃为托派（国外以至国内）先生们的荒谬见解而发，因为弟精神仍不佳，无力为长文，未能详细发挥，或不免为人所误解也。列、托之见解，在中国①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执笔耳。弟希望大作早成，得一读为快。此间日前有传言兄在某校演说，谓只有希特勒胜利，中国民族解放才有希望。今读来信，尊见似不如此，想系传言之误也。鄙意只有英美胜利，中国民族虽说不上解放，而政治经济才有发展希望。此祝教安。

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三日

五

学稼兄左右：

前接手书，比于廿三日覆上函，谅已达左右。前函所称兄对于国际局势的意见太过简略，顷又听到友人转述兄分析"太平洋之战及中国"之意见较详。其中有许多弟不得其解，也许是传说之误，特请赐教！

兄谓在打仗初期，美国必定是失败的；又谓中国现在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按美国初期作战之失败，这已经是事实，美国现在既已不能打击日本，她接济中国的路线又断了，或者比以前更困难；那么，兄所指中

① 郑学稼将"中国"误为本国。

国现在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是什么?

兄谓:为了以后着想,我们希望希特勒打胜仗;又谓:希特勒打胜仗,即是英国失败;又谓:英国不倒台,中国永远莫想作独立的梦。按现在骑在中国背上的,已经不是英国而是希特勒盟邦日本,希特勒胜利即是日本的胜利。此次大战的最终胜利,若属希特勒,英国固然倒台了,美国暂时也只好画洋自保。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必不开罪日本,使日本转向美国,以削弱他将来对美国夹击的右臂(有些宁为纳粹的中国人,希望希特勒胜利,就会为他自己驱逐日本于中国之外,这是无比的幻想),则那时中国还是要受日本支配,所希望的只是兄所谓"阿Q说的最后胜利"。若希特勒失败了,英美的力量已失了平衡,英国只能顾到欧洲而不能在远东与美国争霸,则代替日本在中国的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也不是俄国;这是于中国比较的有利,虽然说不上独立。"希特勒胜利→英国倒台→中国独立"这一公式,弟所不解,望详示之!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七日

六

学稼兄左右:

前月廿一日手书及《评传》一册前几天已收到,廿九日的手书昨亦拜读。承询各事略答如下:

无人有此主张,只守常以与白坚武同学之故和吴佩孚见过面,说不上合作。

当日反对我者以瞿秋白为首,由第三国际派代表来公开主持,何只暗中指令,开除党籍在此后一年余。

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

在广暴前,是否成立苏维埃,在中国党内无此问题发生,毛自传所

云不实，此书弟未阅过，尊作《评传》亦尚未看，看后如见到所引自该自传所云有不实处，再行奉告。

读廿九日手书，得知兄所谓希特勒胜利之有益中国，不过一时之插话，而非整个思想。在德苏战争之初，如果苏联打败了德国，中国北部或为其所有，南部则不然也。现在苏联大部分武装已消灭，已成为英美有面子的附庸，更无能为害了。如果最后胜利属于希特勒，苏联和英国固然都完了，中国岂有幸理？那时希特勒之胜利即日本之胜利，安得有时间空间容许中国能够利用德国工业击败日本？即在德苏开战之初，情形亦是如此。所以我始终认为只有希特勒失败，英美胜利，中国方不至完全覆亡（希特勒胜利，只有汪精卫式的政府能存在），因为中国和日本已不能两立，日本又为希特勒所倚重之助手，他决不能为中国得罪日本也（日本在远东势力，除英美胜利无法推翻），不知兄以为如何？尚希明确示知。前函问兄：农山久无信来，是否受人干涉之故？尚未见覆，希即示知！此祝健康，弟独秀叩。

又启者：希之定于本月之六日由油溪（？）携眷口起身赴渝，由渝转往贵阳，在渝约可住一星期。彼云必至农山、国焘二兄处一谈，兄所要之书，可就近托农山兄等言之。

大战不会很延长，欧洲也不至毁灭，如麦麦所云也。又及。

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

七

学稼兄：

十一、十三两示均悉。季山嘉有无此人，弟并不知之；即有此人，或像军校教官，非政治顾问，与弟均无接触也。……CP不赞成匆促北伐，为时甚短。不赞成原因：一恐武力还不够；一认为政治未必胜过北洋派，恐纯为政权之争夺战，兄如有材料能作一史稿也好。CP一向为第三国际（实际上是俄国当局）之命是听，俄国一向以各国党为其外交工具。故当日俄国助之政策不变，中国党内当敢有何争论？目前也还是如此，

惟政府健忘，尚容彼辈横行耳。《CP简史》倘照实写，其反共书店不能出版。弟之自传，别人难以代写。简史无意义，兄能来谈则大好也。八七以前，党中无暴动之争论；八七以后，弟实反对暴动，因认为其时革命已开始退潮也。国焘、农山兄等之能来，望告其事前示知！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五日

八

学稼兄：

一月卅一日手书诵悉：闻兄书稿未卖出不能来晤，一叹！闻兄书因攻击斯大林而不能出版，二叹！新加坡陷落当在旦夕，大局不能日久维持现状，我等应有远谋，此等小事又似乎不足叹也。……伊罗生之书，当然有些材料，然不尽可靠。据弟所知，其中神话亦颇多也。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此祝健康！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日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

张伯伦说:“任何国家,欲以武力统治全世界,余则认为非抵抗不可,因在此种之统治下,酷爱自由之人民统不能一日生存也。”罗斯福也屡次显明的以摧毁民主与自由斥责希特勒之统治。东西两半球这两大民主国的政治领袖,对于法西斯制之批判,可谓切中要害。

全世界近几百年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大部分是为了自由。

自由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群兽,而为之灵长,正因为主思想之大脑特别发达,生物学家,人体生理学家,同样告诉我们:人体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发达,愈不用则愈退化以至消灭。法西斯的统制,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们失了思想自由,大脑自然废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灭。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这是法西斯统治发展的自然逻辑。即短时期不至变为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绝对服从奴隶道德外,不能课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责任。

希特勒为德国自由而撕破凡尔赛和约,我们是应该举起双手赞成的;然而事实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党徒。其余的德国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马奴隶,这又何能够得到全世界酷爱自由的人士之同情!

号称民主共和国的捷克,直到国家垂亡的今天,最近改组的薛拉维内阁,以与捷克民族合作著称的斯拉伐克民族尚无一人参加;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和立法机关,斯拉伐克省以斯拉伐克语文为正式文字,今天才被容许(斯拉伐克民族或者会感谢希特勒!);其对待他民族可知。任锡曼说:“捷克苏台区内之人民,素在毫无生趣之情状中渡其时日,直至三、

四年以前，德国始予彼等一线希望。"捷克民族所独霸之政权，其对待异民族之专横，我们不必为之讳，希特勒高呼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民族自由而奋斗，也未尝不动人听闻；然而我们要问：日耳曼人在捷克无自由，归并到法西斯特统治下的德国，自由又在哪里？如果希特勒、任锡曼认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处在十八层地狱，我们则认为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是处在十九层地狱！

希特勒大声攻击别的国家，"自称为独裁制之政府，其存在全赖屠杀冤狱者，反被誉之为民主政体。"我们固然没有一点理由为这一独裁政府辩护，我们却可以劝希特勒拿镜子照照自己，免得只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也不能以别人吃海洛英作为自己抽鸦片烟的理由。希特勒夸耀自己并夸耀墨索里尼都为"举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所拥护之政府"，其实一切独裁政府，都会要这套把戏，独有民主政府办不到，这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它不敢象独裁政府那样无法无天的干。

本年三月七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有一段攻击法西斯特的文章道：

> 全世界优秀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都很清楚的认识了法西斯主义在展开进攻正义和真理的暴行。在这些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国家中，所有优秀的国民都被钳制了行动，封锁了耳目。日本的进步作家鹿地亘先生说：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经听不到了。'文化'在牢狱里面。法西斯的流氓们，要把世界拖回黑暗中古的时代，要把历史向后转，他们疯狂的杀人放火，'焚书坑儒'，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他们明目张胆的在进行破坏人类幸福的浩劫，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这一段话真说的痛快淋漓！可是我们也要劝他们拿镜子照照自己！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不要在别人是"暴行"、"横行"、"钳制"、"封锁"、"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说什么"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我们之反对法西斯特，不唯其名唯其实，无论他挂的是何等金字招牌，无论他为了何种目的，只要他在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

段，我们都一律反对。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十月十二日

1938年11月15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九期 署名：陈独秀



致托洛斯基

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的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

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到日军手中，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御线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军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领；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绝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争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溃，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经济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资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

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之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发生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他出去的。

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

被毁灭，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

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史大林不了解上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新的局势,因此做出许多错误;此次失败后中国局势的变动更要大过多少倍,更加不能乐观。在今天,我们若不能深刻了解未来可能的政治环境,及明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的力量及其政党的状况而依次决定实际可能开步走的工作方针,则惟有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

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农村各小城市所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如果国民党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让一大部分土地给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长江流域某些省份,在这一统治之下回到反共的旧路是很可能的。这时不但我们,即共产党,不改组及变更党名,连半公开的存在都会成为不可能。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的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

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三九年×月[1]

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81年版

又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1948年11月（无版权页）

[1] 这个日期是原有的。据郑超麟先生说：这封信由独秀写好后交与陈其昌。1939年2月陈其昌回到上海，将信交与格拉斯。原信无上下款及写作日期。（陈其昌将原信译成英文时，填了上下款及写作日期1938年11月3日。）在编陈独秀最后书信集时，郑超麟将写作日期估算为“1939年×月”。现此信英文件在外国已发现。（1995年2月2日，任建树访问郑超麟），又见郑超麟：《史事与回忆》（三）第220页。

致杨朋升信四十封

（1939年5月5日—1942年4月5日）

编者按：

杨朋升，又名鹏升（1900—1968），号蓬生，别号泰型，书画署名铁翁。四川渠县平安乡人。1916—1919年在北京读书，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后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到武汉时，杨在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署主任。陈居四川江津时，杨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他们书信往来颇多。陈信手迹有楷书、隶书、行书、草书各种字体，极具观赏价值。杨对陈的生活时有所接济。解放后，杨朋升一直被关押，1968年病死于狱中。现将陈独秀致杨朋升信40封（原信存四川渠县法院），依时间顺序编号，收入如下：

（一）

朋升先生：

四月二十九日手教敬悉。弟遭丧[①]非谣，前有一函寄先生及觉玄兄，述丧中不便为刘启明君为文写字，想未达兄也。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刘君所嘱，迟至此期，方能报命，晤时请代达鄙意！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心所拟著之书一部未成，诚堪浩叹！夏间拟至嘉定左近觅一清凉地居住，但未悉能否如愿耳。

此祝

---

① 1939年3月22日，陈独秀的嗣母谢氏在江津黄荆街逝世，享年78岁。

大安　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

（二）

朋升先生左右：

阅报知成都于十一日被炸，尊居如何，立盼来示报我以平安！敌机赴渝蓉者往往通过江津，居民闻声，未免惊恐也。

此祝

平安　夫人均此问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

信封背面书：倘朋升先生不在成都，即交夫人拆阅赐复！

（三）

朋升先生：

上月十一日成都遭敌轰炸后，即上一函询候平安，至今未获复书，不知此函达否？抑先生因事公出不在成都也？倘见此信，希即示复，以慰悬念。　　此祝

健康　夫人统此问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

（四）

朋升先生：

承转寄某先生所赠陆百圆，如数收到，即希代为道谢。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

（五）

朋升先生左右：

近日两寄手教，快慰之至！六月之炸倘先生及夫人均在成都，恐不能幸免，此真吉人天相之也。成都颇大，敌机势不能遍炸，倘非军政机关及繁盛商场所在，总可幸免。尊居西顺城街倘与此等地带相连，似宜移居小城守偏僻之地，慎毋说敌机炸过之地不再炸也。弟移居江津之鹤山坪已数月，离城二十余里，敌机过境百余次，有时并其声亦不闻之，近以交通太不便，拟移居县城对岸，然尚未大定也。和平当是尊夫人雅号，弟竟不能确切记忆，罪甚！杨子毅不知何人，清音阁即其别号耶？日内如得短句即写寄。　　敬祝

健康　夫人统此未另

弟独秀叩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六）

朋升先生左右：

二日手教敬悉。夫人命书，率尔寄达，不恭之至。西顺城街既近商场，似以移居为是，炸死固痛快，残废未免麻烦也，至少夫人及女公子必须迁居，或仍住青城。弟前在北大时，有一英文教员亦名杨子毅，故尔一问。久欲游成都，惟以其地拔海过高，不宜于弟之血压，恐终不果行

也。　　此祝

健康　夫人统此候安　恕未另启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七)

朋升先生：

前寄十一月二十二日手教并附嫂夫人所赐画笺，感谢之至！久未作复者，因贱恙加剧，近始略平也。尊居新迁骡马市街，门牌不知，故此函仍寄顺城街，未审邮员能转送到否？

倘能因公到川南，甚望枉江津一晤，惟弟住在离城二十里之鹤山坪，驾倘临江津，求先期示知，以便如期入城相见也。日内拟往重庆就医，或住渝二三星期，此时期先生如到渝，到国府致乐庐一问章行严兄即知弟住在何处。

此祝

健康　夫人均此候安　恕未另启

寄上拙诗《告少年》一篇，乞正！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八)

朋升先生左右：

由行严兄转来十五日二十二日两次惠书均读悉。弟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承公垂念，感何如之！本月四日即移居城中，惟以医生下月初由歌乐山抵渝市开诊，故至今迟迟未行，现已决于三五日内由此赴渝，抵渝即直住宽仁医院，住一二星期即仍回江津。至于医药费，

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友好皆未见如我，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吾兄盛意，心感之而已。　　此祝
健康　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公为行严所刻印章样本已为转去。

行严兄已移居中三路聚兴新村五号

（九）

朋升先生：

弟已于六日由江津起身来渝，住宽仁医院二号病室就诊，拟住院旬日，出院后住友人处旬日，即仍返江津。出院后住何处尚未定，留渝期间，兄有信来，寄中三路聚兴新村章行严君处转下可也。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问安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

（十）

朋升先生左右：

弟来渝住医院二星期，病稍减轻，根治仍在静养。此间嚣烦，不可久居，明日即起身回江津，赐示望仍寄江津县大西门内黄荆街八十三号延年医院邓仲纯先生转交，不误。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九日

（十一）

朋升先生左右：

在渝病院中曾寄上二函，已达左右否？渝市医院，不易〔宜〕久居，弟已〔于〕昨日午后三时回抵江津，乘船八小时，病势并未增剧，想已稍稍减轻矣。知注特闻。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十二）

朋升先生左右：

回江津后即上一函，谅已收到，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辱在知己，并谢字亦不敢出口也。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问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此次赐函中有容后面罄之说，岂最近有东游之机会耶？　　又及

（十三）

朋升先生左右：

前由行严转来赐款，即复呈一函，谅已收览。顷又得三月二十日手

教，并信笺信封，屡承厚赐，何以报之！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①]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承示为尊府君志墓，敢不用命，请即将行述寄来，以便乘精神稍佳时，拟稿呈兄修正。拟寻何人书，亦望赐知。此复

敬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问候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

前在渝乞白寿良君为刻印章，白文颇生动，附上一阅。　又及

（十四）

朋升先生：

顷接二十二夜垂询之函，至谢！此间自二十二日至今日，九天中□□□□皆有警报，此外□□□□□□□□□所幸敌机皆掠造境而过，城中未见敌机，更无被炸之事，不知蓉市何以有此误报也？尊处想尚平安。　此祝

先生及嫂夫人一切安恭！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按：此信系明信片，文字有湮损。）

（十五）

朋升老兄：

闻成都前昨两日被炸，兄处平安否，即希示知！城中天气渐热，弟

---

① 蔡元培先生于是年三月五日在香港九龙病逝。

已移回乡间，贱体如恒，知注特闻。　　此祝
平安

弟独秀叩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

赐示乞仍寄原处

（按：此信系明信片。）

（十六）

朋升老兄：

报载成都数有空战，路人传言尤烈，日前匆据寄上一明信片，至今尚未获复书，尊寓平安否，至以为念，接此信请即回示数字，以慰悬念！夏来空袭恐多，天气又热，嫂夫人及女公子以移居青城数月为宜。刘启明君前嘱弟书一联，早已寄去，至今未回复，不知收到否，晤时请代询之。　　此祝
健安及平安　和平嫂夫人均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

（十七）

朋升先生左右：

连日闻成都有警报，致函询问又不得复，正惶恐时，获读五月三十日手教，喜慰之至！闻青城极好，何必在乡间又筑屋，谅为久居计也。拙札草率不恭，竟蒙积藏，惭惑无似。示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未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

（十八）

朋升老兄左右：

六月六日手教读悉。敌前炸成都郊外斑竹园，不知是何目的？敌机十二日炸渝时，闻掷下传单云将炸平蓉渝两市，此种愚计大言，诚不足谓，然日常轰炸必甚猛烈，嫂夫人应即日移居蓉外如新都等县城中，且可久居，比乡下安全而又方便也。孕妇受惊恐易小产，切望即日迁移，万万勿犹豫！！！敌得宜昌，距程益近，将来警报与紧急警报必相距不多时，孕妇临时向乡下跑警报，绝对不宜，愚者千虑之一得，望兄切勿忽视之！弟移居乡间(鹤山坪)已月余，李雅髯君回江津城时恐不能相遇也。鹤山坪在江津县城西南二十余里，此时尚平安，来示仍寄城中可以转到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九日

（十九）

朋升先生左右：

前日读六月三十日手示，知嫂夫人及女公子均已送往青城，至慰。惟嫂夫人将产，青城山中或不便，以能长居外县县城内为宜，尊意以为如何？七月二十四日成都有空战，尊寓想平安也。敝寓昨失窃，窃去衣被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为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草稿，甚为可惜也！弟拟求四个好友各写一个小斗方，四个女画家各画一小斗方，装成四条屏，以为纪念，近已各得其三，想求兄为写一

小幅(纵横皆写)，嫂夫人倘喜作画，更为画一小幅，则成为完璧矣。倘蒙许可，得书即将纸寄上(纸幅大小一致，故必由弟寄上)。

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亦不能生存，兄为川人定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安好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

此间已势不可居，拟九月初赴渝治病，在渝南岸至多住一个月，即拟移居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不审此二城中兄有知友否？　　又及

(二十)

朋升老兄左右：

前寄函乞为作书并拟求夫人为作画，至今未得复，不知曾达左右未？久未见报载敌机光顾成都，想府上一切平安也。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

(二十一)

朋升先生：

五日九日平信及五日(信中此日期恐有误，以此信尚言“蓉垣近半月来无警报”)航空挂号信，均读悉。尊翁墓志文，稍迟即当拟上请教。此间米价三十余元一斗，每斗六十斤，或较成都斗大。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之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时代

又加以奸墨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计日嫂夫人已满月，谅已出院住城外，但九里堤距蓉市太近，以稍远迁为宜也。收款复函附上，但称某先生而不及姓号者，虑彼有所忌避故，如此可乎？报载十二日成都西城又被炸，不知情形如何？近日连上两函，一附史表一份，一附宣纸一张及史表补文一纸，谅均已达到。弟病无大痛苦，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耳。数闻人言中大医学院之戚君内科极好，现在成都，不知兄识之否？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公子均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

(二十二)

朋升先生左右：

五日惠书敬悉。尊翁墓表属草寄上，表与志详略有殊，示下事略，足用不嫌少，惟行文陋劣，希先生正之！关于年月日尤须详细审核，勿任讹舛。事略言尊翁生于光绪庚辰年，寻庚辰为光绪六年，以时间计之，亦当在此年，旁注乃谓为光绪二十几年，恐有误。光绪二十几年无庚辰。光绪帝在位只三十四年，距民国三年只六年。尊翁卒时断不止二十岁左右，且先生生于庚子乃光绪二十六年，岂有父子生年相差只数年之理耶？依中医之理，血压高乃阴不制阳，鹿茸益阳，服之乃以薪投火矣；西医视鹿茸为补品，高血压亦不宜补也。允赐书件，望早日惠下。

此祝

双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事略寄还，乞查收　　又及

（二十三）

朋升老兄：

四日惠书敬悉。请行严写墓表事，已专函告之，并请其直接函复吾兄，纸及稿可即寄去，似不必候其回信，因此人疏懒异常，即肯写亦未必有回信，且稿必钞副寄去，恐不写且将稿遗失也。适之字既不佳，且远在海外，托写亦不便也。弟求兄之书希望早日赐下，写时不必矜持，即随意如来函之字即大佳也。弟睡眠尚好，夜中小便只一二次，只足畏寒，手部反畏热，贱恙非由血虚，血虚则患低血压矣，贱恙适与之相反，比正常血压高三四十度，万不宜再服鹿茸矣。即兄服鹿茸亦必留意，至大便带血时则不可再服也。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候安公子等问好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弟已移居城中，乡中天寒，盗又大炽，不可居久，来信仍寄此处。又及

（二十四）

朋升老兄：

前示嘱函行严兄为尊翁书墓表，此即专函告之，不审其已有书抵兄否也？同时弟亦复兄一函，谅已达左右，乞兄之书，甚盼早日赐下。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每月用二百元，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升，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昨接成都省立传染病院某医生来书，据云成都除房屋人工外，其他食用物价较重庆尤高昂，弟因此料想兄处月非五百元不能维持，或恐不只此，而收入未必有此数，弟尤为困难，不审何以应付之，拟

否另设他法谋生，便中乞示一、二，以免关怀。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五）

朋升兄左右：

前函谅达，不知纸及稿已寄行严否？昨日友人自渝来云行严面告他纸到必写。纸及稿倘尚未寄，盼即寄去，惟稿必钞副，恐其失去或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向兄索稿之事，因此人疏懒生活无秩序，自幼即如此，老来更习名士派，不可治矣。至于写，弟可担保其终必践约也。其旧居已毁于轰炸，方在修理中，暂居“通远门外两路口重庆村八号”，信件可寄此处。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未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十六）

朋升先生：

承赐书条及白木耳并五日九日两函，均先后收到。拜谢，拜谢！

尊翁墓表行严虽应写，然其人过懒，倘日久不寄上，可示知，以便再函催也。物价如此高涨，吾兄每月亏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贱恙如旧，勿念。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此函想正当旧历年关入览，敬贺元旦之喜。

又及

(二十七)

朋升先生：

前寄二月二十六号挂号信，内附千元汇票一纸，信中未云此款作何用，即今已逾半月，尚未见来示说明，何耶？前为提大字联，曾否收到，来函亦未提及，尤为惶惑，此联寄出时，弟疏忽未曾挂号，倘途中失去，将如何是好！此二事务求吾兄拨冗示知，至盼至祷！　　此祝健康

和平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二十八)

朋升老兄有道：

四月三日手教读悉。久未作复，至歉。行严官僚习气又加以名士习气，书法又不足被之金石，吾兄何必定欲彼书之耶？谢无量君闻近在成都，兄必识之，彼为弟四十年前老友，晤时希告以弟之住处及近况，武昌别后，已数年不见矣。有泸县罗希成君，寄居成都之北郊，收藏颇富，有蜀石经一方，最驰名。吾兄如识其人，请转求赐拓片一纸见寄，是所望也。日来又有空袭，劲草园想平安无恙。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公子夏健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

（二十九）

朋升老兄左右：

一月前曾寄上一函，烦兄问谢无量君消息及向某君乞蜀石经拓本，至今未回复，不知收到否？阅报成都有敌机数至，然轰炸不烈，想尊寓悉平安也。　　专此敬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

（三十）

朋升先生左右：

久未通信，十余日前又寄上一函，亦未获复，先生身体安否？或因公他往乎？至以为念。接阅此信时，甚盼即复我数行，以慰远怀。

此祝

健康　夫人均此未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

（三十一）

朋升老兄左右：

前奉七月八日惠书，尚未作复，兹又接读七月二十四日来示，内附有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前求兄转向罗君觅取蜀石经拓片，已有所得未！敌

机日来尚至成都，尊居在郊外，想平安也。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

（三十二）

朋升老兄左右：

日前上一函内附有致晋公一短信，当已在此函之前达到。闻上月底蓉市被炸甚惨，尊寓究竟平安否，颇以为念；兹收阅转来罗希成君与吾兄书，乃由防空司令部代发，又非吾〔兄〕笔迹，更滋疑虑，得此信望即复数行，以释远怀。

此祝

健康　嫂夫人统此候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

（三十三）

朋升老兄左右：

八月三日夜、八月十二日、八月二十灯下，三函均诵悉。兄所书联，寄到即为题识，但虑拙笔有辱尊命耳。蓉城大劫，尊寓竟平安，至慰，至慰！江津城及白沙镇，曾各落一弹，非有意轰炸也。仆寓离城二十余里，想无妨碍。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已觉骇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为生者，将何以堪！物贵由于币贱米昂，币贱乃自然之理，无法可设；米贵则大半由于人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图之以自救邪？罗希成君之石经拓片想尚未至兄处也，

谢无量兄近日见面否？　　专此敬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实物税只能解决军食问题，于民众绝无好影响。

（三十四）

朋升先生：

久未寄手教，正焦灼时，突于同日接收上月二十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三书，欣慰无似，并欣悉嫂夫人于上月十一日产一麟儿，兄似颇重生男，且母子平安，不得不遥为恭贺也。承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向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知！前在汉口，刘辅丞先生闻弟将入蜀，曾托弟之友人送弟川资五百元，存之笥箧中入蜀时始用之，今后亦将于赴蓉时动用某先生所赐也。被窃衣物大半追回，惟兄赐刻篆章及拙稿则去如黄鹤矣！闻成都气候温暖，于高血压病颇相宜，惟以道路遥远，恐非病体所堪，即能到成都，亦只能居新都、郫等外县城中，以跳〔跑〕警报绝对非贱恙所宜也。求书之纸，迟日即寄上。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

（三十五）

朋升老兄左右：

前收某君赐款，比即寄复，又寄上拙作史表一份，想均已达左右矣。闻四五两日蓉市均遭空袭，计日嫂夫人产子尚未满月，尚在城中否？安否？寄上白纸一张，求大笔为书直幅。嫂夫人在产中，不便求画矣。史

表油印时落一段，兹补印寄上。尊居离蓉市太近，何不移居郫县、新都等处耶？

敝寓离县城二十余里，暂颇安静，病亦如恒，望勿远念。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同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四日

（三十六）

朋升老兄：

久未寄书，谅尊况如旧也。章行严确已赴湘，写件已如约寄兄否？前托兄向罗君所求之拓片想尚未到手也。闻成都米价下跌，确否？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三十七）

朋升兄左右：

十一日手书诵悉，罗希成君赐石经拓片二纸亦收到，请代为道谢！大书对联已率涂数字交邮寄上，想已达左右矣。此时弟居乡亦月需费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数倍，如何可支？为兄计，唯有出外做官（只有县长或管理粮食之职务，可以发大财），及移家出川（黔、湘、桂之生活费都比川省要少一半）二策。以弟之年力，此二策均不能行，惟有转乎沟壑已耳！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十八）

朋升老兄左右：

题兄大字联已于两月前寄上，拙作《韵表》寄上已近一月，均未获复，不审都收到否？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不知兄拟作何打算也，接此信！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希即赐复

弟独秀叩

〔一九四二年〕元月九日

（三十九）

朋升老兄：

读上月二十六日手示，知拙作《韵表》已入览，按尊函语气，大收对联似尚未收到，心中至为不安，以《韵表》遗失尚可补寄，对联倘有失，无以偿之也。所嘱之事本应尽力，奈一时想不出适当之人，以非于我于彼均为深交不便言之，或言之无效耳。兄就近乞晋公一言，岂非最适当耳。弟贵阳之行已决计作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印谱叙文，因弟于此道过于外行，殊难着笔。兄尚有兴趣作花酒麻雀之游戏耶！

此祝

健康　和平嫂夫人及公子均此问好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

（四十）

朋升先生左右：

三月十二日、二十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谢谢！以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及此，且感且愧！弟于印章过于外行，然累寄命，不敢坚辞，百集成时，拟勉强书数语以塞责也。前次移黔之计，主要是为川省地势拔海较高，于贱恙不宜，非为生活所迫。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惭？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疑伪作此言以慰我耳，倘真收到，请示以弟所题语句，则始能相信也，如何？　　此祝

健康　和平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

（按：杨朋升在此信信封上书曰："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寄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六月二十日。"）



致台静农等人信二十九封

（1939年5月—1942年2月）

编者按：《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有陈独秀晚年给他的信百余封，关于文字学方面的信已选入本书第六卷。现将有关陈独秀的健康状况、余稿刊印出版以及与友人交往等信件29封（其中致邓仲纯、陈可忠各一封），并略加注释，收入本书。

静农兄左右：

弟病血压高五十余日迄未轻减，城中烦嚣，且日渐炎热，均于此病不宜。燮逸劝往聚奎[①]夏，云彼处静、凉、安全，三者均可保。弟意以为连接校舍之房屋，未到暑假以前，恐未必静，倘（一）房租过多，（二）床、桌、椅、灶无处借用，（三）无确定人赴场买菜米油盐等，有一于此，则未便贸然前往，兄意以为如何？倘兄亦赞成我前往，上述三样困难，请就近与邓六先生[②]一商赐知为荷。

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五月十二日（1939）

静农兄左右：

十五日手示敬悉。柏先生[③]婿系在马项垭自租屋，以楼房炎热，去否尚未定，并无为弟租房子两间之事，想系传说之。顷晤雪逸[④]兄云聚奎周校长[⑤]已回信来欢迎我去住，我亦决计去。房租一节，雪逸云不要；我以为多少总要出一点才好，用人雪逸云不必专雇，有学校工役代

---

① 聚奎中学，在江津县白沙镇黑石山上。

② 邓六先生即邓鹤丹，燮逸的长辈，此时是聚奎中学校董。

③ 柏先生即柏文蔚。

④ 雪逸即邓燮逸。

⑤ 指当时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周光召兄）。

办;我以为自雇一人(男工)较为方便。家具一层雪逸不大有把握,此事必须准备好,倘聚奎借不出,只好到白沙场小住一二日,购齐再去(床一、饭桌一、厨桌一、书桌一)。

顷仲纯[①]又云:闻之令弟,彼校(服务团所办中学)左近,有屋三间出租,可否劳吾兄亲去看一看,倘地点安全,光线空气可用,住此比聚奎交通较便也。尊见以为如何?或日内即赴白沙场在银行小住一二日,往聚奎或另租屋,候见兄时再决定,如何?(望即示知!)

此祝

痊安

弟独秀手启五月十七日(1939)

静农兄:

昨晚检验血压,又由三〇三度(似为二〇三度)高涨至二三〇度,非急得极静、极凉之地休养不可,聚奎允借之房屋或另租他处之屋,都以不朝西、不邻近课堂操场或大家庭儿童吵闹,为必要条件。如何乞即复!

此祝

痊安

弟独秀手启五月十八日(1939)

昨函谅达。令弟所云彼校邻近有屋三间出租,倘系不朝西之独立小院,决舍聚奎而租此屋。又及

静农兄:

读杨君与兄函,略见聚奎觅屋不易,且弟日来头晕耳轰,有加无已,由江津赴白沙四小时轮船之挤闹,非病体所能堪,已托友人在鹤山坪找屋,弟曾亲往一次,凉、静可靠,坐滑竿二时可达,三五日即去,白沙之行作罢矣,特此奉闻。

此祝

---

① 仲纯即邓仲纯,是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五世孙。此时邓仲纯在江津城开设延年医院,直到陈独秀死,他一直是陈的义务通信员和保健医。

痊安

弟独秀手启五月二十一日(1939)

静农兄如握:

弟移来鹤山坪[1]已十日,一切均不甚如意,惟只有既来则安之而已,据脉搏似血压已减低,而耳轰如故,是未恢复原状也。此间毫无风景可言,然比城中空气总较好也。来示望仍寄旧居,其中有友人留守,函件可转达也。

此祝

大安

弟独秀手启六月六日(1939)

静农兄左右:

一日书并转下唐君函已收到。唐君之《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已由傅孟真转来一部,与魏君[2]通信时,望便及之。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弟以尚未交稿,不便函索,希兄向该馆一言之。贱恙日来无大变化,知注特闻。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四月十四日(1940)

静农兄:

今晨明信片发后即获读二十六日手书,知前上两函均已达览。馆中有款,望直寄弟寓,或由农工银行转下,万万勿再寄第九中学邓季宣[3]转,请即切告馆中出纳室办事者!任北大讲座固弟之所愿,然以多病路远,势不能行;为编译馆编书(不任何名义)事或可行,惟馆中可以分

---

① 鹤山坪,地名。距江津城30里。原为清朝二甲进士杨鲁丞的故居。1985年后属江津市五举乡。现作为陈独秀故居对外开放。

② 魏君指魏建功。

③ 邓季宣,邓仲纯弟,曾留学法国,此时为国立九中总教导主任兼高中一分校校长。

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亦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余待面谈，不赘。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四月二十九日午(1940)

静农兄：

回乡已十余日，贱恙并未见剧，识字教本已勉强续写若干，倘病不再发作，上卷大约在下月内可以完成，兄带去之稿亦望能于下月半抄好，届时建功兄倘能偕兄来江津城一游，即可将原稿带来，弟亦可将续写之稿交兄带去也。兄等如能来游江津城，务于动身前十日函告我，以便按期入城也。兄带去之稿尚遗漏一字，今附上，望加在甲介字前后。编译馆二百元已寄来，收据附上，请交该馆会计。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五月十八日(1940)

静农兄如握：

顷见兄于二十五日致仲纯书，愤怒异常。前有友人金君自重庆来江津看我，亦云闻之教部中人告诉他，部中月给我三百元；今编译馆中又有人云弟从部方领到稿费；想必都是部中有意放此谣言，可恨之至，请兄为我严厉辟之，是为至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五月二十九日(1940)

倘陈馆长[1]亦闻此谣言，可将此函与他一阅！又及昨上一函，谅可与信同时收到也。又及

---

① 陈馆长指教育部所属中央编译馆副馆长陈可忠。

明 信 片

静农兄：

前寄上补稿一条及收据一纸，至今未见赐复，不知收到否？弟稿已写完成，再校阅三四日，即可交卷，不知兄带来之稿已抄若干？如此时局，弟极盼弟此书能早日印好出版，以免原稿丧失，失则不可再写矣。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六月八日(1940)

久未接来信，不知疟又发否？

静农兄如握：

四日手教读悉。稿已完全写好校过，拟廿前后派火房[①]送至白沙编译馆交兄手收，前稿望早日抄好，以便将原稿交来人带回。敌机每日光顾，江津城天天有警报，人心慌乱，仲纯兄几乎天天跑警报不在家，月底赴江津聚会之约，势必延期矣。此次续写之稿，约为期月余(日写五六小时，仲纯若在此必干涉也)，甚勉强，致于左边耳轰之外，又加以右边脑子时作阵痛，写信较长，都不能耐，势必休息若干时日不可。下卷略成，虽非完璧，好在字根半字根已写竟，总算告一大段落。法币如此不值钱，即止此不再写给编译馆，前收稿费亦受之无愧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六月十五日(1940)

静农兄左右：

昨函发后即获读由仲纯兄转来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兹派焦姓火房将全稿五册送上，收到望即交馆中速抄速印，希望能于秋季开课前出版。如此时局，此稿一天不出版，皆有散失之可能。香港印刷固佳，

---

① 姓焦，为陈独秀烧火做饭和到江津城来往送信取信等。

但随时皆有被日本占领之可能，倘川中能刻篆文，弟极端赞成兄在川雕板之提议，成都太远，校对不易得人。欧阳先生[①]在江津城所刻诸书，均可用，词品用小字刻颇精美，毛诗石印，稍次之，均附上一阅。馆中如同意，兄可函仲纯兄向欧阳一调查刻印处在何所及刻价纸价若干也。弟意好的毛边纸亦比洋纸价贱，最好馆中自己买纸，雇工到白沙开雕。焦火房白沙乡下人，彼需回家看看，明后日可回到白沙场到兄处取回信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六月十六日(1940)

兄前带去之稿一册，倘已不用，望交火房带回。

静农兄左右：

十八日惠书敬悉。日前陈秀清[②]自白沙回到德感坝来函云，兄曾卧病家中，不知近日已全恹否？史表照原文分三段连续横印，装订成册，不必贴合为直表也。诸夏居甘肃时已在陶器时代，大约商周均经由秦陇入陕，傍渭南而居，后周人定居渭水流域，商则沿黄河南岸而移居豫鲁，夏则沿黄河，经河套而入居晋南，八姓大约亦曾经河套(鄂尔多斯旗发现新石器即其证)，而更东经包头绥远而至燕北，南下青徐。禹疏九河约为河套九河，《孟子》禹贡疏九河之说，太夸张，在古代之交通及工程均不可能也，此虽假定，颇近情理，不知可以分别补入表中否？治中国史，鄙意只可断代或分门，如经济艺术等，专力为之，全部史非一人之力所能任也。弟前在金陵狱中，曾拟作《宋末亡国史》及《明末亡国史》二种，以此足为今人之鉴也，今万无此力为之，兄其有意于此乎？倘馆中能出版，兄不妨为之也。敌人不入川，则到处可居，倘入川则大难矣，弟尤大难。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邓六先生有可靠之亲友在乡间能容我避居否(总须离场稍远)？语罕[③]所居万家山不知情形如何？敌人入川，土匪必蜂起，黑石山必不能安居也，兄此时住处尤不妥。前闻合江

① 欧阳先生指欧阳竟无，著名佛学大师，与陈独秀时有交往。

② 陈秀清是陈独秀侄孙女。

③ 语罕即高语罕，中共早期党员。

曾被炸,想尊翁平安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九月二十五日(1940)

静农兄:

二三两日函及史表补文均收到,史表则早已由农工银行转来,史表补文有修改处,奉上一张。《晚明讲史》不如改名《明末亡国史》,修改时望极力使成为历史而非小说,盖历史小说如列国、三国,虽流传极广,究于历史及小说两无价值也。拙稿付印事,顷已发函陈馆长言之。鄙意倘寄商务印亦不成,在白沙油印亦较善于束之高阁。油印能手,亦可印五百份,择其清晰者可装成二三百份。白沙乡间医药太不便,稍迟拟移居江津城中(已托仲纯兄为租屋),不往白沙,邓六先生之屋可不租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十月十四日(1940)

静农兄如握:

拙稿加字两条,前日寄上,谅已收到。兹又有加改一条如左(加改书稿文略)。

二十七来书昨读悉。铅印石印恐都渺茫,商务既积压馆稿数十种未印,焉能提前印拙稿,弟与王云五无深交,且此人但认得势力,不认交情,弟虽函托亦未必发生效力,鄙意想请陈馆长发稿后特给王云五一信,问其可否提前即时排印,倘回答是个否字,仍望由馆中油印二三百份,分散各省,以免川乱将原稿散失,拙稿虽未臻完善,而弟颇自矜贵也。邓府屋既不□,则不谈矣。之瑜如能在聚奎任课,薪金自当由校中决定,他但重礼貌,薪金不甚计较,前在博学,据弟记忆,月不过百元。

此祝

健康

弟独秀叩十二月卅日(1940)

静农兄如面：

十一日赐书诵悉。拙稿馆中自印决无可能，商务如不能提前即排印，仍望吾兄代弟转告陈馆长付油印，油印虽不佳，聊胜于无也。旧年后兄果能来游否？尊翁倘回白沙，亦望其同来，以久未晤面也。资深兄往聚奎教书事，不知如何？谈锡山君之妹(现住仲纯处)上海美专图工科毕业，曾任过中学教员，倘聚奎新本[①]需图画及劳作科教员，兄可推荐之。薪金决不计较，倘能延聘，她即可前往。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一月二十日(1941)

仲纯兄：

六日函及夔康[②]函均收到。数日无敌机来，不知何故，兄有所知否？和战问题，柏先生在渝当有所知，能设法向之打听否？倘继续轰炸外县，江津必不可免，白沙虽与江津城同，而聚奎左边邓六先生之房屋，必无被炸之事，兄眷如必离开江津城，往此处最好，望勿游疑！如必去，宜速(此字旁画圈)去！并望劝静农移去，柳马冈未必安全。闻綦江有军事机关，与江津不同。欧阳书屏格式遍寻不得，前次实未寄来，不妨请欧阳先生再开一个。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七月十日(1941)

静农兄：

拙稿如能真付印，望即就近在白沙石印，万勿木刻，书名亦望勿改！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七月十三日(1941)

---

① 新本指新本女中，邓氏家族在白沙创办的学校。

② 夔康即邓夔康，江津白沙邓氏家族人。任农工银行经理、董事长等，对流落来川的陈独秀颇多照顾，陈独秀的丧葬事宜是他一手操办的，并葬在他家之康庄。

静农兄：

前函谅达。悼李光翁[1]诗另纸录呈。拙稿倘真能付印，切望(二字旁画圈)即在白沙石印，铅印木刻均河清难俟。兄等均劝之瑜兄仍回聚奎，而于环境容否他再回，似未深(此字旁画圈)加考虑，虽劝无益；情势如能回，瑜兄不待人劝也。

此祝

暑安

弟独秀手启七月二十二日(1941)

古韵表[2]已收到否？务希示知！又及

静农兄：

七月十九日二十四日两示均读悉。古韵表油印二十份(用前印史表纸)，需纸价若干，望嘱写油印者计算示知，为荷！韵表尚有自序一篇，约三千字，日内写好即寄上，建功兄愿写一批评性之序否？识字教本初以教部与馆间有误会未能印，今闻误会已释，而仍未付印，不知其症节究竟何在？《拼音文字草案》，早已售于商务，韵表仍初稿，此时不拟正式付印，《连语类编》已约与北大，弟并无他稿可以出售，兄与瑜兄函所谓弟之稿费问题尚谈不到，不知何所指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八月六日(1941)

静农兄：

收据八纸(印花每纸六分业已扣去，故弟处未贴)及□君嘱写之件，乞为转交。弟是否移居白沙看英美是否对日开战而定。拙著馆中已着手开雕否？倘无开雕之意，下卷不必续写矣。工人江津可雇，何必远求之于成都。弟处前日被窃，草稿失去，倘寻不回，下卷写时益觉困难，馆中若无心付印，弟更无心续写矣。

---

① 李光翁指李光炯。

② 《古韵表》指陈独秀所撰《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

此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

弟独秀手启八月八日(1941)

静农、建功兄：

静农兄十三日手书读悉，建功兄赐寄大著亦拜领。拙著韵表已动手写否？补入各字另纸录上。纸价需若干望早日计算示知(只印二十份)。建功兄能作一文好极，时间当来得及，表写印好，另写订入可也，弟自序亦须迟数日始克寄上。

此祝

著安

弟独秀叩八月二十日(1941)

静农、建功二兄均鉴：

寄上韵表自序六纸(收到望即赐知！)，希检收。希望建功兄之序能同时一并印出。何日可以动手写印，需纸价若干，均望早日示知！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八月二十七日(1941)

望印二十份，兄等处留八份，以十二份托农工银行寄弟可也。又及。瑜兄已决定在九中教历史。又及

静农、建功二兄：

前上两函，一附韵表修改稿，一附韵表自序，至今未接来信，不知收到否？此韵表编译馆能代印否？如能印，印纸及腊纸共需价若干，希即示知！倘不能印，望兄等暂时代为保存黑石山兄寓中，勿寄江津，因江津城及白沙场最近均有被炸危险也(渝友来云敌广播如此)。韵表格子颇小，写字太多，油印时恐甚糊涂，各格有收录字过多者，望兄等酌量将其不必要者删去若干可也。

又自序文中有二处请注意修正之（两处改稿略）。

写油印时，最好能照原稿每行均画纵横格子，读之始能清楚不紊。

韵表所取之字有漏略不全者，希就兄等所忆及补之！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九月五日（1941）

静农兄：

九月八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一日四示，均于近一星期中先后读悉。韵表由馆代印且用其腊纸，陈馆长如知之，乞代为道谢。胡小石君不知将寄我何物？不知是否好久以前请其所写之小斗方？前以久未得兄书，疑兄有病，今得书果然，未知现已全好否？编译馆之困难，想仍系教陈[1]之必欲据为己有也。韵表自序是否已照弟迭次所改者写之，全部写成约在何时？不知双十节边能订成寄江津否（希望能加紧写成）？家姊灵柩将于下月即十月（阳历）二十日由油溪运至江津城安葬，弟必进城一行，如无警报，或提前于十五边即动身，并拟在城小住一星期或十天；即有警报，十九日亦必进城，住二三日，望在此期间，韵表能订好寄至江津城也。建功兄前有动身赴滇前来江津一晤之言，倘能来，可在十九、二十、二十一这几日（如无警报可于十六七来）。韵表能带来更好，兄及建功夫人能同来一游否？韵表写好（不必订）望即（此字旁画圈）检一份送与小石，并征求他的批评。我料他必大不以为然也。漠译高著中国音韵学，望向馆中借来一读。

此祝

健康

建功统此

弟独秀手启九月二七日（1941）

静农、建功二兄：

---

① 教陈指陈立夫。

二十六日寄静农兄函，已收到否？家姊安葬之期，乃改在阴历九月初三日（阳历十月二十二日），弟拟于阳历十月二十或二十一日始进城。建功兄动身赴滇之期，未必能迟至此时以后，江津城晤会之约恐不可能。之瑜兄准于双十节后十三或十四来弟寓小住一二日，兄等亦能同时来此一聚否？来时坐木船至龙门滩，登陆八里即到弟寓（石墙院杨宅），坐滑竿单趟十元即够也。如何？希即赐知！

韵表不知已写成若干？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九月卅日（1941）

静农兄左右：

三日手示诵悉后，又收到高书一大册，内有重阳日手示（重阳为十月二十八日，远在三日手示之前）。高书略读后即可奉还，至迟

静农兄：

十一日信夔康于十六日方送仲纯处，与十七日信同于十九日由仲纯处取来，以后有笨重之件不便交邮者，方托银行寄，因银行转交必然比邮局要慢些。请陈馆长寄来识字教本副本一部事二十一日已致函言之，倘交兄转，可不必真寄来，存之兄处可也。倘交代在迩，不能候重庆寄回顾吴借去之本，可否由兄以弟取校名义，将馆中仅存之一本，取存兄处，以便将来转售于商务？倘能如此办，弟可补上一签名盖章。托兄取来之信，以备交待时查问。馆事已如何决定，兄仍留与否，均望示知！识字教本编译馆必不能印，转售稿与商务事，兄可否即时（此二字旁画圈）代表弟托陈可忠向王云五一商之？天气颇寒，行动不便，决不能赴黑石山看梅矣。建功兄处两寄航空信，均未得复，不知收到否？通信时便询之。前寄韵表一份给傅孟真，竟未收到，兄寄尹默者，收到否？有回信否？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一月二十五日（1942）

可忠先生左右：

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以过虑而忽之！

此祝

大安

弟独秀手启二月二十六日（1942）

简孤桐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

1939年秋

编者注：这首诗录自白吉庵著《章士钊传》第332页。

附：答陈独秀[①]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
闲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
总持静者心，妆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
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

《章士钊全集》(7)第177页

---

① 章士钊收到《简孤桐》诗后，很快写了这首《答陈独秀》诗。

赠程里鸣联[1]

美酒饮到微醉处，

好花看在半开时。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① 程里鸣，安徽省安庆人，医生，抗日战争时期居江津，此联是陈独秀去江津时（约1939年下半年）赠给程里鸣的。

告　少　年[1]

太空暗无际，昼见非其形。
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
光行无所丽，虚白不自生。
半日见光彩，我居近日星。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
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
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轻。
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
食以保躯命，色以延种姓。
逐此以自足，何以异群生。
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惊。
伯强[2]今昼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
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
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
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
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
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

---

① 1939年8月23日苏法协定签订，在此之前不久，法国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陈独秀得此消息后在“一个无月的黑夜”奋笔疾书写下这首长诗。并赠与濮清泉、陈中凡、台静农诸友人。濮曾写信问陈：“《告少年》是对一般独裁而言，还是专指斯大林?”陈回信说：“我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陈独秀论文选编》(下)第381页。据陈独秀给杨朋升信，可知不迟于1939年12月30日。首次发表于1940年1月11日《新新新闻》旬刊，今据亲笔稿校订。

② 伯强，古代传说中的疫鬼名。

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
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为恶恐不足，惑众美其名。
举世附和者，人头而畜鸣。
忍此以终古，人世昼且冥。
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
强弱判荣辱，自古相吞并。
天道顺自然，人治求均衡。
旷观伊古来，善恶常相倾。
人中有鸾凤，众愚顽不灵。
哲人间世出，吐辞律以诚。
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
千金市骏骨，遗言觉斯民。
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
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1940年1月11日　《新新新闻》旬刊第二卷第二十期
署名：仲甫陈独秀

赠太虚法师联[①]

一切无常，
万有不空

为
太虚法师书

独秀

《周末》 1987年3月7日

① 太虚法师(1889—1947)，浙江桐乡人。原件藏汉阳龟元寺。估计此联是陈独秀在汉口时期(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所写。

书赠胡子穆先生[①]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知辛苦乱离中。

1987年8月 《革命史资料》总第7期

① 胡子穆(1892—1956)，号国镠，祖籍休宁。1907年，东渡日本，先后毕业于宏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系。回国后历任保定农专、武昌高师生物教授、安徽电政监督兼电报局局长。抗战爆发后，流亡四川江津，任国立九中总务主任。这首诗约作于1939年。

常见末句为"不觉辛苦乱离中"，现经胡子穆之子胡庆臻校正，复原诗句。

挽方守敦联[1]

先生已死无乡长，

小子偷生亦病夫。

1939 年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署名：独秀

① 方守敦(1865—1939)，安徽桐城人，近代诗人、书法家、教育家，1939 年在原籍病逝。时陈独秀与守敦先生之侄方孝远同寓江津县城一院内。旅川皖籍同乡假罗汉寺集会吊唁守墩先生，陈作此联。

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

何处乡关感乱离，
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
且喜疏狂性未移。

1939年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朋升夫人和平女士寄纸嘱书手册，即奉一绝

前年初识杨夫子，
过访偕君昨日情。
寂寞胭脂坪上月，
不堪回忆武昌城。

二十八年秋独秀作江津(1939年)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赠台氏父子[①]

坐起忽惊诗在眼，
醉归每见月沉楼。

① 台氏父子，即台兆基及其子台静农。据台静农回忆：1939 年，“我准备纸笔，请他写字……他以行草写了一幅四尺立轴，他说多年没玩此道，而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又写了一副对联。”这幅对联“首句是明人诗，次句是他的诗。这是他早年集的。还没忘记”。《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大成》第 205 期。（文中所说“四尺之轴”，未找到。）

寄沈尹默先生①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②，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
《大成》第二〇五期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此四首绝句是陈独秀托台静农转寄给沈尹默的，时间在陈独秀定居江津以后。
② 另本“尽”作静。

给西流等的信[①]

第三国际过去反法西斯的口号并没有错，他错在以不通的“人民阵线”“反侵略阵线”等口号，凭空做联合布尔政府的梦，而不是组织国际普罗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等到英、法布尔政府和法西斯的希特勒政权开了火，它们却一面实际站到希特勒方面，一面宣布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促使英、法工人反对战争，法国共产党四十余人，因赞成对希特勒战争而被开除，这实际也是援助希特勒让他对英、法得到胜利。在渝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大译载其列宁反对一九一四大战的论文，天天高喊此次战争是上次大战的重演，即双方的帝国主义者都是为了维护其奴役本国人民和掠夺殖民地而战争。《动向月刊》[②]竟做了他们的应声虫，在这一理论上，我竟看不出中国托派与史派之区别。列宁对一九一四大战理论之正确，是由于他不肯抄袭马恩对普法战争之现成的理论，而是自己脑子观察分析当时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与特质；其口号之收效，是由于帝俄实际是战败国，而且俄国地大，德国对它不能加以布列斯特和约以上的迫害，十月革命才得以保全。现在呢，我们也不应该抄袭列宁对一九一四大战之现成的理论，也应该用自己的脑子观察分析此次战争的环境与特质，一切理论与口号都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是不能随便抄袭的。对于像欧洲大战这样大的事变，不能观察其活的环境与特质，而视为历史重演，以背诵一大篇过去大战的经验与理论了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乃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啊！历史不会重演，错误是会重演的，有人曾把列宁一九一四大战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反帝的特质，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

---

① 西流，即濮清泉。

② 托派刊物，第一期于 1939 年 7 月出版，月刊，10 月底被迫停刊。一月后，于 12 月出版《破晓》。次年 4 月出版《西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 290 页。）

本；现在又有人把列宁当年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此次战争，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质，无论他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希特勒，英、法虽不是被压迫的普鲁士，但希特勒却是横行欧洲的拿破仑第三，而不是威廉第二；因此，不但在德国，即英、法普罗政党固不应采用“保卫祖国”的口号，却应该采用“共同攻打法西斯的希特勒”的口号。今天的武器和交通都和以前大大地不同了，英、法的国内战争即令能够成功，倘在希特勒倾覆以前，革命新政权的命运决不能像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样幸免了！吾兄来信也说：“如果是法西斯胜利，人类将沦于浩劫，因此应尽力阻止法西斯的胜利。”这话对极了。但怎样阻止法西斯胜利呢？我认为只有希特勒对英、法战争失利，和以前拿破仑第三战败一样，引起国内革命，才能阻止法西斯的胜利；若在英、法取失败主义，只有促成人类的浩劫，胜利的自然是希特勒，固然不是英、法政府，也不是英、法和德国的无产阶级。若谓交战的双方都是帝国主义者，工人都应该反对，这完全犯了以前把希特勒和白朗宁同样看待，把国社党与社民党同样看待一样的错误，这样不分轻重皂白的错误，以前因此帮助了希特勒在国内成功，现在又会因此帮助希特勒在国际成功，普罗固然要准备明天，可是今天应做什么？今天已经在战争啊！赞助希特勒或反对希特勒，事实上、理论上都不能含糊两可；反对希特勒，便不应同时打倒希特勒的敌人，否则所谓反对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胜利，都是一句空话。尊意如何？尚望详示。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

……前函意有未尽者，①兹再陈之如下。弟有二信念：(一)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二)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我根据以上的见解，认为不但在英、法、美

---

① 省略号是原有的。

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令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民族斗争一脱离了世界斗争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动的；而且在事实上，印度一旦脱离了英国，必然转入日本或俄国的统治，使希特勒对英取得决定的胜利，这不是反动是甚么？我这一意见，不但连根兄[1]见之骇然，即兄等亦必认为宜慎重考虑，因为和我们脑中以前所学习的公式太冲突了。此信亦望转寄连根兄一阅，并前函一并抄给×兄，那便更好。……

一九四〇年四月廿四日

反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的大斗争，不是由于民众，而是由英、法对德战争这一较好的形式，这是全世界革命者的耻辱，若再空谈高调，使国社主义者获得胜利，那更是耻辱罪恶！又及。

……关于你对于欧战的意见，答复于下：你对于欧战所持的意见，是根本把平日所持对于民主和苏联的意见推翻了，还免不了为现成的理论和公式所拘囚，即是为列宁对于上次大战的理论和公式所拘囚，未能用自己的脑子思索问题，即犯了上次写给兄的两点之第一点。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马恩未曾见着，所以列不能袭用马恩对于普法战争之现成的理论；我们时代之法西斯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列宁也未曾见着，我们也不能袭用他对于上次大战的理论。上次大战的结果，无论英败或德败，人类的命运无甚变化，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我们能认清法西斯的胜利，能加速大众民主的实现吗？如果这样想，便是“死狗”在德国希特勒登台前之荒谬见解之重复，我们能假定此时能在英法号召国内革命来答复法西斯吗？我看客观上的条件没有一点使我们能够做这样轻率的假定，这样的假定除了帮助希特勒和“死狗”以外，没有别的效果。以前有许多人不要国民会

---

① 连根，即王凡西。

议，只要苏维埃，我曾问他们：苏维埃诚然好过国民会议，但将怎样走向苏维埃？兄现在说："我们不能忘记大众的民主"，我也要问你："你只是不要忘记没有用，将怎样走向大众的民主"？形式的局限的民主，于大众的民主斗争是有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是大众的民主运动的制动机。即以中国问题而论，英法若是败了，中国不外日俄两国的统治，若英法胜利了，全世界法西斯运动破产，当然会恢复东西旧秩序，其影响于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可想像而知，我们能做比此更好更美丽的梦吗？以前，第三国际在国内的口号是"人民阵线"在国际的口号是"和平阵线"；"民主阵线"这一口号很少用；即各国党曾经用过，我不能承认，那是不对的，因为根本苏联便不民主，各民主国又并未曾有和希特勒决战的表现，那时拿民主阵线这一礼物，从事联欢英美政策，以为各民主国内民众斗争的制动机，这和现在各民主国向希特勒开炮时他们却不采用民主阵线政策，前后都是错误的。至于此次拥护民主，不能和上次大战中拥护民主相比，因为上次大战时尚没有法西斯的问题，上文已经详释过了，余详前此为此问题写的信，可以参看，此信和前写老×的信，均望寄××一阅，免弟重写，兄和我在数年前都已认为死狗是全世界罪恶之魁首（这次不是○×兄所谓感情用事），谁来推翻它，我们都赞成，兄已忘了吗？我现在说，老实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的奴隶！……[①]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②]

---

① 这封信不曾收入自由中国社出版部的版本，无写作日期，省略号是原有的。

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所载四篇论文、十封书信已全部收入张永通等同志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以下简称《选编》）。水如同志据《选编》本，将十封信收入他所编的《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我们在编辑这部分资料时，初据《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版，无编者姓名〕，进行校勘，发现《选编》本在文字上有脱误，致使某些文句费解，或含意相反。因此，我们只有尽力寻找到《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才能校勘这部分资料。这里我们要感谢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同志，是他首先在该省博物馆找到这本书，寄与我们。该书为铅印本，上有编者改动一、二字的手迹数处。但亦无编者姓名，无出版单位名称，据"编者按"所注的时间是1948年11月28日。经校阅，《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两个本子所不同的是：前者按论文和书信分类编纂；后者依写作时间先后次序编排，并少收了四封信，增加了胡适写的《序言》。本书第三卷除已收录《致托洛茨基》、《给陈其昌等的信》二文外，其余各篇均据前书收录。

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

——作于四川江津

"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国五、六、七年间在北京大学,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了。

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先生没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学生,凡是追念蔡先生的人,都应该服膺他这两点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后,有一位北大旧同学写信嘱我撰一文备登公祭时特刊之类,并且说:"自五四起,时人间有废弃国粹与道德之议,先生能否

---

① 据《何之瑜致胡适》信:"北大同学会曾要仲甫先生写篇纪念文章,这篇文章登出来的,是被删节了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59页。

于此文辟正之”，关于此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

凡是一个像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炉中，各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甚至那一民族灭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还要长，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保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渣”当做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

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和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譬如：活焚寡妇，在古代印度视为道德，即重视守节的中国人也未必以为然；寡妇再嫁，在中国视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现时的中国，也不算得什么大不好的事；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战场上能多杀伤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谈；男女平权之说，由西洋传到中国，当然和中国固有的道德即礼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现代的中国绅士们，在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实男子如果实行男女平权，是需要强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父牧师坏；清代的仆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

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1940 年 3 月 24 日 《中央日报》 署名：陈独秀

给连根的信

……你们的意见一致①，我都见着了，不得不力疾简单的复你数语：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现在你们又拿这一空洞的名词做武器，来为希特勒攻打资产阶级民主的英美。第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阶级作用不同(帝国主义是金融寡头结合中产阶级，只能容忍无产阶级的组织宣传至某种限度；法西斯则是金融寡头结合流氓无产阶级及右派急进小资产阶级，根本铲除无产阶级组织与宣传)，不懂得法西斯的经济制度比起英美帝国主义来，是由日渐国际化的局面，回转到国家化，自给自足的封建化，而认为只是简单的政制不同。政制是由它阶级的经济的推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即以政制的表面而论，德意俄的格柏乌政治和英美法的议会政制，是小小的不同吗？第三，是不懂得"中间斗争"的重要性，我们若一眼只望最后斗争，以为只有最后斗争才能够消灭法西斯及其复活，才能够解决问题，则中间斗争若反法西斯运

---

① 文中的省略号是原有的。

动，罢工运动，国民议会运动，等等，都是无益之举，只好静候着最后斗争从天下降了。再加上第四，英法失败后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之假定，这完全是幻想奇迹（参看与××的信）。以上四种根由之总根由，还是："对于实际的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的公式。"自然科学的公式有时还可推翻，社会科学公式更脆弱得多，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拿旧的公式当做万应丸，永久演绎的用在现时日益变动复杂的事件上，自然牛头不对马嘴。

大战开始以来，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声疾呼根据列宁在上次大战的理论，指斥英法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之虚伪，反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声称两边都是侵略的强盗；实际上词句之间却暗暗左袒希特勒。我细读你们的信，不但在思想上与死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晓》一小册（《破晓》当然是根据托洛斯基的意见），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像这样为史大林、希特勒做义务宣传，态度还不明白吗？还说什么对两边都不左袒呢？"反对民主国的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理应该合并了。如此你们以后再反对史大林，便是无政治原则的私人权位之争了。除了史大林手中所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你们的意见若无望改变，和死狗妥协，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如果依照你们的希望（至少《破晓》的作者是如此），各民主国连美国也失败了，托洛斯基便不能在墨西哥居住，那时不与死狗妥协，还有何出路！

……

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现在提出两个问题请兄答复：

（一）在纳粹威胁之下英法革命党，是用反纳粹口号能够集合力量，还是用反本国政府口号能够集合力量呢？

（二）假使现在德国内部有一种民主势力对纳粹掀起国内战争，你们主张同时一齐打倒，还是联合纳粹打倒民主派呢？或是如意因的主张同时冷淡呢？

又　白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给西流的信

西流兄左右：日前寄上一函，内附超麟兄来信，想已达览，七月廿一日手示并守一兄的信已读悉，因病不能早复兄信，今犹如此（此函陆续写了廿余日才写好，精神不佳可想）。望勿多疑！

来函谓："他对民主的了解，和对于世界的局势过于乐观，我觉得还不免一些稚气"，我们所争论的中心点，正是这两种问题：（一）大战失败国有无革命。（二）应当保护民主。你既然认为他稚气（其实是反动），又说他没有错，即你自己也感觉得有点自相矛盾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只能答复一个否字，尤其在英、法，在此点，资深和希之[①]比我尤坚决的否定英、法会有革命的局势，其理由是：（一）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史大林派摧除干净；（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经验，战败后宁肯把武装全交给国外的敌人，免为国内的敌人所利用；（三）此时德国的武器和战术及统治征服地的方法，均非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可比，英、法政府军失败后，民间一时决不能苍头特起；（四）德国尚未获得世界霸权，一败战事即可了结，纳粹失败后，继之者不会仍为法西斯政权（此情势恰与英、法相反），届时社民党及其他自由派会抬头，然此只能说有利于革命运动之开始，很难说希特勒失败德国马上便会起革命，以无革命政党故，基于上述原因，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引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一九一七的梦，才会说此次大战是上次大战的重演。英、法革命既无望，在英法取失败主义，除了帮助希特勒胜利之外，还有甚么？历史不会重演，人为的错误是会重演的，以前认为白朗宁内阁和希特勒是一样的，因此帮助纳粹

① 资深，即何资深，又名何之瑜。希之，即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

得了政权；现在又认为纳粹的德国和民主的英、法是一样的，又帮助希特勒征服了有民主传统的法兰西，我还可进一步推论，如果人们仍旧轻视民主崇拜独裁像守一所说："人类不管好坏，总只得抉择于法西斯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独裁之间。"换句话说只能抉择于德、俄两种政制之间；那么，即使英、法失败引起了革命，也只有使世界更加黑暗堕落和希特勒胜利一样，一个格柏乌的苏俄已足够使人们窒息了，再加上几个格别乌的苏法、苏英，你老兄能受得了么？如此，则必须详细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诚如守一所说："我们中间主要的不同意见，还是在于民主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见前函及后表）。（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

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LT 主张为恢复苏维埃、工会及党的民主而斗争,也是等于叫昨天回来,等于叫老百姓为历史的残影流血。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 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

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其余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所以东方需要民主，西方不需要民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如果我们认为目前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为首要斗争，第一必须承认即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第二必须取消刘仁静破产的理论，即：任何时期，任何事件，无产阶级都不能与别的阶级共同行动；这一理论，显然在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都不能采用，在目前国际战争中也同样不能采用，若采用这一理论，都只有反动作用。昌兄说：“在战争进行中之现在，民主与法西斯之显然限界已归消失，或将归消失。”这句话真莫名其妙！（一）在政制本身上，民主与法西斯绝对不同的限界永远不会消失；（二）若说其限界消失是指英、法、美等民主国日渐法西斯化，即令真是如此，也绝对不能据此以为我们应该欢迎独裁反对民主的理由；（三）英、法、美将来法西斯化，是要靠第三国际第四国际帮助希特勒完全胜利，希特勒军队打到甚么地方，当然法西斯化到什么地方，否则英、法、美的民主传统不是轻易可以推翻的，如果把战时的内阁权力加强当做是法西斯化，这便不懂得法西斯究

竟是甚么；（四）若认为现在的民主国和法西斯之显然限界已归消失，请睁开眼睛看看下列对照表：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据这张表，二者的限界，在英、美是几时消失的呢？在法国是因何消失的呢？每个康民尼斯特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今后的革命若仍旧认为“民主已经过时，无级政权只有独裁，没有民主”，那只有听任格柏乌蹂躏全人类；并且即这种革命（？）亦无可能在英、法失败后发生，你们主张在英、法取失败主义的口号，到底是为了谁呢？史大林派很巧妙的第一步以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代替了反法西斯的口号；第二步便对英、法、美放冷箭以掩护法西斯；你们和他们取了同样的步骤，你们的

第二步骤，在破晓[1]及守一[2]与我函中充分表现出来了！守一等对大战的见解，是由于估计苏联性质及对民主态度出发的，我皆与之相反，而彼此却都是一贯的，惟有你老兄对大战态度同意于守一等，对苏联与民主似乎还是和我接近，此真不可解。此函请抄给老赵[3]及守一等。原函及前各函，均望寄还我，因为打算将来印出来。昌兄信附上，此祝健康！

弟
仲白 〔一九四〇年九月〕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

① 破晓，系一杂志名。
② 守一，王守一，即王凡西。
③ 赵，即赵济。

我的根本意见

（一）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

（二）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

（三）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

（四）应该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武断性，和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自然性之间的不同。

（五）应该严格区别急进而虚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

（六）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惶投降的后果。

（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十）此次国际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用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他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

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一）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军势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量，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义、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十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其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够为它算命，如果拿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在德国国内政变时，史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统一，在经济上不能够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之束缚（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

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十四）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胜负的因素；即在国内战争，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新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

（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①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① 自由中国社出版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将这个年代误为1940年。

贺邓蟾秋先生七十大寿联[1]

火学从衡称卓彦，

事功耀赫当寿铭。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① 邓蟾秋，名鹤年，即邓燮康的五叔。四川江津县城人。陈独秀晚年寓居江津时结识的朋友。叔侄对陈多有照顾。陈独秀病逝后，邓蟾秋赠江津西门外鼎山之麓的康庄别墅作茔地。

病中口占[1]

日白云黄欲暮天，
已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垣[2]雪消难尽，
愁似池冰[3]结愈坚。
斩爱力穷翻入梦，
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4]藏有中山酿[5]，
乞取深卮疗不眠。

张君宝:《陈独秀晚年的诗》 1986 年 2 月 22 日《团结报》

---

① 这首诗和下一首《寒夜醉成》首见于 1986 年 2 月 22 日《团结报》,对诗中的某些词句,颇觉费解,且怀疑传抄有误。于是写信给郑超麟老先生请教。郑老于 1986 年 7 月 24 日复信,指出诗中的错字,随后又成文《谈陈独秀的两首诗》,发表于《解放月报》1987 年 12 日。现将诗中的错字逐一指出(任建树)。两首诗的写作年代约为 1940 年

② 垣,原文为"担"字。

③ 池冰原为池"水"。

④ 邻家,原文为"家麟(人名)"。

⑤ 中山酿,名酒,亦名"千日醉"。

寒夜醉成

孤桑好勇独撑风，
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
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形健，
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
醉乡老子是元戎。

张君宝:《陈独秀晚年的诗》 1986 年 2 月 22 日《团结报》



独秀书来促写杨鹏升父墓表[①]

懒性从来作答迟，多君笃老重风期。
剧伤羊祜碑仍□[②]，为识杨雄字失奇。
笔债偿从积薪后，作家误被隔邻嗤。
恰逢湘水归休日，定与书成当去思。

一九四一年初

① 这首诗录自白吉庵著《章士钊传》第 333 页。是陈独秀写给章士钊的，催他为杨鹏升父写墓表。据 1940 年 12 月 28 日陈独秀致杨鹏升信这首诗约写于 1941 年初。

② 此诗第三句“谓克强墓”。克强墓有碑无文。原是蔡元培作墓表。而蔡又等章士钊提供行状。一误再误，故黄兴墓直到而今，仍是有碑无文。无独有偶，古代羊祜墓也是有碑无文，传为趣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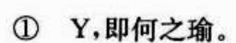
给 Y 的信[①]

Y兄：

……兹附上致HS二君函，望与彼等通信时转去。……H等希望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陶孟和也是如此)乃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我辈最好与之讨论实际问题(历史的及现状的)，使之无可逃遁，不必牵涉抽象的理论及主义的圈子，免得缠夹不清也。陶孟和不是不懂，仲纯弄错了。……即祝

健康

弟独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① Y，即何之瑜。

致S和H的信

H S二先生：

与H[1]先生别三年矣，与S[2]先生更廿余年不见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慨叹！

顷见二位与Y兄书，于弟近作有所示教，感谢之至。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董"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

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问其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其为陆稿荐出品而嗜之，是迷信也，倘若味道好，因其陆稿荐出品弃之，而此亦成见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

倘有新作，自当奉上乞教，弟所欲言甚多，惟病体不能多写作，即写

---

① H，即胡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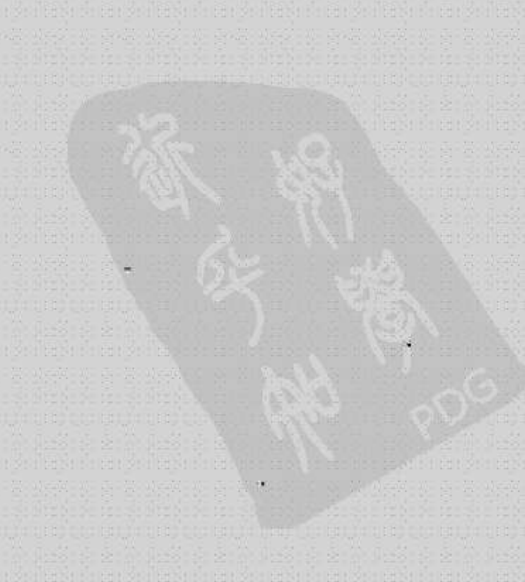
② S，曾被误认为孙洪伊。后经郑超麟老先生致信胡秋原询问，乃确认是孙几伊。

出，虽油印亦不易办到也。此祝

健康

弟独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春日忆广州[1]

江南目尽飞鸿远，
隐约罗浮海外山。
曾记盈盈春水阔，
好华开满荔枝湾。

雪云:《陈独秀诗录略注》《革命史资料》第5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① 这首七绝是陈独秀写给陈钟凡的。最后落款为"弟独秀于江津〔一九四一年〕三月廿四日"。——雪云注

据《陈中凡先生年谱》第47、48页，陈独秀在诗后，还有信:"兄曾至广州，此情此景想有同感也。惠书已诵悉。弟所托颉刚代购者乃文史书报，非生活书店出版不值一读之小册也。兄近日曾晤抚五先生，想彼因事至成都也。此祝 斠玄兄教学俱进。弟独秀于江津。三月二十四日"

闻屈原祭日友人聚饮大醉赠建功[①]

除却文章无嗜好，
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
不及刘伶老醉乡。

民国三十年七月于蜀之江津

川言:《陈独秀诗录略注》《革命史资料》1987年4月第6期

① 原诗后有:“闻光午之瑜静农及建功夫妇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建功兄。”——川言注

悼老友李光炯先生

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余有奇感，以为永诀。其时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也。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中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紧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录寄余光烺君以纪哀思。光烺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而有婿矣。

民卅夏日(1941年)

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为教育，抑气历风尘。
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
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挽大姊[1]

兄弟凡四人，惟余为少焉。
长兄殁辽东，二年共和前。
二姊老故乡，死已逾廿年。
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
大姊幼勤谨，祖父所爱怜。
及长适吴门，事姑姑称贤。
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
夫亡教子女，商读差比肩。
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
抗战军事起，避寇群西移。
率家奔汉皋，姊颜犹未衰。
卅年未见姊，见姊且危颠。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卜居江津城，且喜常相随。
诸甥善营贾，市利可撑持。
姊性习勤俭，老益戒怠侈。
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
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
强之拒不纳，作色相争持。
针帚恒在手，巨细无张弛。
如何操奇赢，日夕心与驰。
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

---

① 陈独秀大姊吴陈氏，嫁安庆吴向荣。抗日战争期间，一家流亡四川，和陈独秀同寓江津。1941年7月15日，患中风不治，病逝于江津油溪镇。7月中旬，陈独秀和此诗。

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
行年六十九，一病遂不支。
今春还山居，余病静是宜。
姊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
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
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胞弟独秀挽于蜀之江津鹤山坪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署名：独秀

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

作于 1941 年秋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署名：独秀



题"朴园收藏"[1]

百年乔木读书堂，允矣吾宗世泽长。
文物不随戎马尽，蜀中独有鲁灵光。

1941年12月

选自《胡适日记全编》(七)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① 原诗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写作时间依下文估计。

据《胡适日记全编》(七)：1943年1月21日。"今收到四川岳池陈树堂先生一封信，是三十年十二月四日付邮的！此君家藏书画万余卷，名'朴园收藏'。有独秀、尹默诸人题诗。"信中说："仲甫西来，备谭过往。声容犹昔，鬓髭已苍。"

对月忆金陵旧游

辛巳秋作(1941 年)

匆匆二十年前事，
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惊梦醒，
一江凉月载孤舟。

壬午暮春写寄

静农兄

独秀自鹤山坪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署名:独秀



漫　　游

峰峦出没成奇趣，
胜境多门曲折开。
蹊径不劳轻指点，
好山识自漫游回。

录近作一绝以寄静农兄

民国卅一年一月七日（1942年）

独秀书蜀之江津鹤山坪（阴阳文两印）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郊　　行

蹑屐郊行信步迟，
冻桐天气雨如丝。
淡香何似江南路，
拂面春风杨柳枝。

作于1942年春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致朱家骅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独秀启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

附：朱家骅致陈独秀

仲甫先生大鉴：

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托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颂时绥不宣。

弟朱家骅　一月二十七日

（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右边注有“已由甘秘书呈签后送交张君”——笔者注）

朱家骅致陈布雷

布雷吾兄勋鉴：

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

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注，敬先奉复，祇颂勋绥。

弟朱家骅　一月二十日

（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笔者注）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①]

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已使世界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拿过去理论公式的表格来填写将来的事变之发展，简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第一种结果之可能最少，我们似不必加以推测，第二种和第三种以何者最大呢？以现状观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开战已两年多了，又因得到苏联出来撑持，英国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时以全力仍不能敌住德国在北非的少数部队，若说它能够于最近的将来战胜德国的大军，这是很难想像的事。若认为英国在各战场之失败，都由于陆空军之寡不敌众，再过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军器生产大扩充之后，战局便会转变；惟现时虽有人发出“全面改厂”的呼声，而鉴于过去直至现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误国及工厂主只顾私人的利益，将来军器生产之竞赛，英、美能否胜过德国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邻邦，确实大成问题。即假定将来可以胜过，又有何神秘能够使希特勒及其伙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内，按兵不动，静候英、美扩充军备呢？德国的内部危机，诚然大过英、美，然在对外战疲或溃败前未必爆发。德国唯一的弱点是缺乏煤油，这也只是她在始终无力夺取高加索或伊朗的条件下不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因素。基于各种情势，德国利于速战速决，英、美则利于持久战，双方都以争取时间为第一要着；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国的春季攻势，无论发生在地中海或欧俄大陆、马尔他、直布罗陀、苏伊士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或莫斯科、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都可以说是决定此次大战

---

① 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本文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由于军事委员会战事新闻检查局认为“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而予检扣，未能发表。现全文照录。

全局胜败之最大关键。这一战线之胜利若属于德、意、日，英、美是不能够长久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单是地大人众物博，并不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

倘胜利属于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会中，或国际善后会议中，便开始形成对立的局面，战后英国收拾欧洲、北非洲、近东以至中东，已非易事，一时决无力量及于远东，远东以至南洋、澳洲，自然会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那时苏俄将是两方面拉拢的奇货，英、美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胜利倘属于希特勒，英国便完了，美国也只得暂时划两洋以自保。希特勒虽胜利，他的枪口仍然要向着西方，自乌拉山、伊朗、印度以东，则非他的军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时无论美、日是否成立和议，日本将是美、德两方面拉拢的奇货。美国固然未必继续对日战争，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他也不会为了远东问题开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转向美国，自断其两洋夹攻美国之右臂，希特勒知道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消灭后，他若威胁日本，日本有获得美国退出远东的条件而和美国妥协之可能。美、德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世界还会有几次大战，我们还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战争的因未除去以前，战争的果是不能免的，并且胜利若属于德国，下次战争必然来得更快。美、德间固然虽无所谓和议，而实际战斗亦必告一段落，德国固然需要一停战时期，建立她的新秩序以收胜利之果，更需要补充足够渡美的战舰及运输舰之时间，然一过此时期，德国对美战争便会从南美洲开始。本来每次国际大战都不过是前次大战之继续延长，我们切不可为“永保和平”、“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资本制度消灭”，如此等等好听的宣传所眩惑，梦想战后这些都会实现。

欧美人想就资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图，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结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边，巍然起来了脱拉斯；在劳动立法普遍了半个世界之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得恢复计件工资。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灭资本制度更不能够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轻松。此次大战后，不但英、美，就是在德、意、日的世界里，也必然企图改良资本制度，以适应他们的统治，希特勒一向非难资本主义，这并不能够欺骗任何

人，只是他和他自己开玩笑。他们改良的企图，不外拿关税协定甚至经济同盟，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关税壁垒；拿物物交易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货币作用；拿产业国有化，来代替某些私人的企业。各集团圈内关税壁垒即能减轻，对于另一集团圈的关税壁垒势必还要加强；物物交易的办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够交易的，仍旧以货币计算，仍旧是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种产业国有，已经是前世纪所有的事，全部国有化，即实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好似说得通，而事实上必不可能。占有生产工具的大集团，不经过革命的没收，而自愿的把私有财产贡献给国家，这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个超然政府来和平的没收。这一所谓"超然政府"，上午企图没收别人的企业，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别人没收了。所以以上三种改良企图，决不能动摇资本制度的基础。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她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个的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私有财产制和商品生产制，是资本制度之基础，亦即其弊害之根源。这一生产制，其目的是为拥有生产工具者出卖商品，增加其私有财富而生产，不是为直接供给一切人民食用品而生产；其生产力愈益发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产力与购买力之均衡，因之，而生产过剩，而物价低落，而工厂倒闭，而工人失业，而形成经济恐慌；经过一时期，生产力削弱而恢复原状，后又因生产力比以前更加强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环而构成恐慌之周期律。自来救济生产过剩之策有二：一是自动的减少生产量甚至毁坏生产品这一愚蠢可笑的办法；一是争夺殖民地及国外市场走向战争这一疯狂可怖的办法。为了必须把国内生产过剩的商品向国外市场推销，还必须阻止国外商品侵入国内市场，就不得不加高关税壁垒，扩张军备，准备战争，以至实行战争。这一串因果相联的现象，都是现代国家当局所必须采用的步骤。因为他们既不能消灭资本制度，便只得让资本制度牵着鼻子走，否则只有失败，这本是事实之必然，决不是什么思想，什么良心所能使之改变的。在全世界几个强大国家必须争夺市场，必须准备战争，必须实行战争的时代，大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彼此挤得水泄不通，怎样谈得上民族自

决、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战之终了，威尔逊的十四条，未尝不轰动全球，而随即销声匿迹者，并非路易乔治和克利蒙梭欺骗了威尔逊，乃是威尔逊欺骗了他自己，并且这一欺骗，亡了法国，害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丧失了强国的体面。此次大战后，谁还要在资本制度世界标榜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下次大战中，谁就是失败者。

此次大战后，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都仍旧不变吗？资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自动的根本放弃，但统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变，即是：由民族化到国际集团化这一形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并非帝国主义制度之终结，而它反走向扩大与加强。今后不但十九世纪以前的民族国家运动已随着帝国主义发生而没落，即二十世纪初期的七八个帝国主义列强之对立也要完结。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国家进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之较幼者，日本是最后一个，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市场都已为他人捷足先得，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疯狂的以战争来改变帝国主义世界旧秩序之唯一的原因。战争的结果，真正完全独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两个领导国之对立，美、德之对立，或英、美之对立，其他国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义之下，分别隶属于这两个领导国所领导的集团圈之内。日本和苏俄，当然都有各自领导其集团圈之野心，然而生产力终于要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他殖民地及落后国，若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新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各集团圈内，依国力之强弱，其地位略分四等，第一等是较有面子的所谓“同盟者”，例如日本之于德国，苏俄之于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意大利之于德国，荷兰、法、比之于英、美，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经济，都多少要受领导国支配；第三等国是被保护国，例如法、比之于德国，丹麦、意大利之于英国，菲律宾之于美国，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独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连自治政府也没有，统治权操诸领导国总督之手。比殖民地更次一等，自来是没有的，有之便是种族日渐消灭之美洲、澳洲之土人。各集团圈内的国家民族地位虽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他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着领导国的模样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国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

都要按纳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也要按着民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呢？这要靠着领导国的革命成功才能实现，才能够影响整个集团圈，依俄国革命的经验，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弱的一环之破碎，终于不能够使它全部瓦解。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有些欢喜做梦的人，当此次大战一开始，便梦想弱小民族独立的机会到了；其实亚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国便入了德、意的掌握。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胜悲哀，如果再觉着今后连民族斗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纳粹党会支配半个地球，他们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坠落到悲哀的深渊，将感觉着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此次大战，即使不幸得很，胜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而在经济上和英、美胜利一样，固然不能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而资本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渐次减少世界上许多小的经济单位，除去一部份经济发展之障碍，将比战前的社会生产力要突飞猛进，这是在客观上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质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只有眼光狭隘的教派之人，才见不出这一远景。人类历史和地球一样，无论在光明的白昼或黑暗的深夜都是进行不息的。

正经的说来，认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何况在两派帝国主义的主脑，争着以战争状况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只有欢喜幻想的人听着才感觉得惊异，如果从全世界经济由统一而进步的观点看来，民族斗争受到限制，不一定完全是很坏的事。无论是全世界或一个国家以内，没有革命的统一，反革命的统一也

有进步的意义。例如吴佩孚的统一比军阀割据好，刘湘的统一比防区时代好。并且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并不是说被人领导的民族将驯羊似的一无所作为，只是今后的民族斗争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有此警觉才能够开始实行有效的步骤：(一)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以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现在已经不是李鸿章时代，不应仍做富国强兵一跃而为十八、十九世纪式民族独立国家及二十世纪式世界头等国的好梦；(二)创造自己的实力(工业及民族的组织)，以准备与领导国国内革命相应和的斗争，以达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进步，不应幻想关起门来，在一个国家内以一个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实现民族资本主义的国家之独立；(三)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个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若仍旧由民族立场出发而斗争，印度眼前的敌人便是英国，中国将来也要再来一次抗美战争；(四)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该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诚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过当，便会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视一切，形成偏畸的发展，竟把民生国防所依赖而应该特别重视的物质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还有人竟把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光荣，印刷与火药之发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缩小在文艺圈子里，这样误解文化的结果，遂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发生了万分不应该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把口里哼哼诗词手里耍耍笔杆，应该称为“文人”的，无端改称为“文化人”，这和日本称中国为“文字国”同样是对于中国文化之讽刺；一是继续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挡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

或者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轴心和非轴心两派帝国主义各自扩大其势力圈之斗争，非民族解放之斗争，弱小民族之参加毫无意义。这一见

解是由于他们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够依赖帝国主义帮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中立”这一名词，现在战争史上将不会再见了。缅甸人如果说：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而不能和不认识的天使来往；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并不知道现世界有甚么天使，只知道你们所谓认识的魔鬼，比你们不认识的魔鬼，还要凶恶十倍！中国如果有人说：帮美国打日本，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我们应该告诉他：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

以上的说话，或者有人认为是低调，那只好让将来的事实教训他。

〔一九四二年〕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致欧阳竟无[1]

贯休[2]入蜀唯瓶钵，
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
老馋独羡武荣碑。[3]

《欧阳竟无大师纪念刊》1943 年 5 月

---

① 辛巳年岁暮(1942 年初)陈独秀向欧阳竟无借武荣碑时以诗代信赠欧阳竟无。

② 贯休，晚唐诗僧，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

③ 武荣碑全称《执金吾丞武荣碑》。汉碑在山东济宁。书风淳古峭健，属力竣劲拔之汉隶佳品。

赠罗宗文联[1]

还师自西旅，

祖道出东门。

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

独秀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署名：独秀

---

① 罗宗文，四川乐山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双流、永川、江津、铜梁等县县长。1940 年 9 月，罗在江津任上，去拜访过陈独秀，1942 年 3 月，罗调任铜梁县长，离任拜访陈独秀，求书一幅，陈写了此联赠罗。

再论世界大势①

有人说我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中所估计的国际形势，将来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这未免太悲观了。我以为评量客观上的估计只应问其现实性如何，不必论其是否悲观。现世界自前世纪之末以来，金融资本即已冲破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的天下已经成为事实，不如此便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将来的问题，将来不过是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再火并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而已。一天没有振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之干涉，这种状况仍要继续下去，而且会发展到比我们所估计的或者还要坏些，即是：此时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英国固然完了，罗斯福或也至倒台，美洲的希特勒将起而代之，下次的世界大战亦即德、美

未　来　世　界
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法西斯蒂专制
近　代　世　界 资产阶级民主制 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
古　代　世　界 （希腊罗马） 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
上　古　世　界 氏族社会民主制

① 本篇原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的续篇。前篇发表后，遭各方非议。本篇因国民党中宣部以“顾虑对苏外交”，禁止刊登。（唐宝林：《陈独秀年谱》第537页）

战争，将不是民主与纳粹之斗争，而是两派法西斯蒂集团之火并；如此则会真是如罗斯福所说，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才能恢复；如此则人类进化史将走入如上表的道路。

照上表，则将来法西斯蒂专制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亦即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如果人们躺在幻想和乐观的安乐椅上，听任纳粹存在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一黑暗的时期到来之可能。

客观上的估计和主观上的努力虽然不能相差很远，而也不一定都走同一方向，譬如：我们估计此次战争德、日胜利的可能较大，这不阻止我们主张在胜负尚未决定之前，力助英、美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不能因为应该力争民主同盟方面之胜利，遂盲目认为轴心国家只有失败。我们可以追求理想，而不可追求远离事实的幻想；只可认清非绝对不可能的理想，艰苦的前进，那怕较为辽远，却不可拿乐观的幻想以自慰。与其以乐观的估计构成海市蜃楼来自己安慰自己以至松懈了事前的戒备；不如拿可能的悲观的估计，以警策自己，以唤起别人，加紧事前之努力。如其闭着眼睛否认将来会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不如睁开眼睛，看清可悲的趋势，承认将来还有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制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之危险，因此加紧主观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战中，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的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经过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蒂专制，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缩短将来的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我们可能追求的理想如此而已；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这即是我所以不顾旧日同路人的讥评，而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之理由。最坏的是以客观上乐观的估计，来代替主观上的努力；假使在此次大战之前，张伯伦、伏罗西诺夫和诺斯克，不取轻浮的乐观态度，把敌人看得不值一击，而很慎重的以充分的军事准备，替代大言壮语，

此时战局形势当然要好的多;因为现时的敌人,不像清朝的总理衙门可为外国人的大言壮语所吓倒,也不会为口头宣布的军备扩充案或军火生产激增的数字所欺骗,由恐吓欺骗而得到胜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三月十六日李维诺夫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聚餐会演说中,有几句话说得很对:"余信时间之因素,为作战双方均不可恃之诡诈盟友,吾人一方面从事持久之战争,另一方面准备军需品与后备力至于超过敌人之程度,固为得计;但此种计划,必须敌方保证在该期间内无所事事,方克有济。但君等均悉吾人之敌方必不如是,彼等必将利用其现有之成功,继续推进,继续占领土地,囊括原料之新来源地,奴化百千万人民,甚至获取新与国,敌方所获之此项利益,其结果势必较之我方在此种单方面停战状态下所获得之军备上优势,超过我方之成就而有余。""吾人苟竟以吾人无战败可能一类泛泛之论,互相告慰,则吾人之距离胜利之实际途径,亦必愈远,此为吾人所常引以为惧者也。"这即是对于美国人以及所有同盟国的人"最后胜利天然必属于我","德、意、日只有失败"。这等轻浮的乐观,加以痛切的砭针。既往不咎了,时机不容我们一再放过,今后要想获得最后胜利,必须痛戒轻浮的乐观,我们试将哈里法克斯(此人是敦刻尔克战役后英国舆论所指谪的张伯伦内阁中误国罪人之一)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乐观的演说,和同时李维诺夫的说话(见上)对照一下,我们更应该根绝乐观态度,把他看作敌人,而严肃的注意下列几件事以代替乐观:

(一) 英、美两国必须对俄国不怀疑忌之心,而以大部分力量协同俄国军队保住莫斯科,不可再像李维诺夫所指谪"把配备很好的军队放在没有战争的地方";也不可相信某些人的胡吹,俄国在战争中已证明他的实力超过了英、美,她可以击溃希特勒;更不可认为保住莫斯科只有利于俄国。军器生产之增加,是同盟国最后胜利之保证,而军器生产需要时间,哈里法克斯很乐观的说:"美国尚具有军事上与工业上之潜在力量。"他忘记了我们不能用魔术使那些潜在力量很快的变成军器,希特勒把春季攻势推延到夏季,大约他的进攻目标还是莫斯科,只有保住莫斯科至一年,或是一年半,使希特勒无法抽调大军南下,美国和英国才能有够用的时间,增加军器生产至超过敌人的程度;否则一旦莫斯

科陷落，俄国军队精锐溃丧，这正中了希特勒各个击破的计划，乘战胜之威，移军南下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和日本会师苏伊士，以封锁地中海，此时英、美军器生产之增加尚未成就，而大势已去矣！

（二）增加军器生产，不是空喊所能收效的，求与敌人的军器不但相等，还要超过，现有的军器制造厂当然不够用，建设新厂时间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只有"强迫改厂"，即是尽可能的将别种工厂改造军器。没有超过敌人的军器，即没有最后胜利。说到这里，恐怕又有人反对，说这是"唯武器论"。其实人类自发明石矢以来，战争的胜利即日渐依赖武器，到了现代，几乎可以说战争是武器的竞赛，法军在绥丹，英军在敦刻尔克以及马来、新加坡之英勇的惨败，都证明了这一真理；反对唯武器论者，他们自己向美国要求坦克车和飞机的呼声，也并不弱于别人，其自身也证实了这一真理。

（三）以过去国际联盟的经验，要得到战争的胜利，要得到战后的集团安全，都须要组织有领导有相当强制力的经济及军事之国际集团，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之所不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要求——我们应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联邦之过渡。至如尼赫鲁所主张之除开英、美的亚洲集团，说起来很漂亮，其实这样只有使亚洲落后延长，而且这和缅甸人"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人种的偏见，同样会替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我们必须排斥这一有害的幻想！在唯力的现世界，离开英、美和德、意、日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而苍头特起，这不是幻想，便是欺骗。尼赫鲁亚洲独立的主张，和苏巴斯鲍斯印度民族独立的呼号，虽然动机不同，而结果都只会帮助德国和日本。

（四）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的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谪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

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他们的共同意见，是民主自由已不适用于现代国家，他们所谓现代国家，无可争辩的是德、意、日，或者还包含着俄国，而当然不是英、美。这样，是否会使全国进步分子不明白我们抗日战争扩大为反德、意、日战争到底为了甚么？是否会使全国战斗意志分散；是否会帮助敌人讥笑美国“拿民主物资援助非民主国”这一毒辣的宣传；又或是否会使友邦怀疑到我们参加民主同盟之忠实性；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或者有人认为今后永远只有法西斯蒂的天下，并不只是一个时期；民主自由将永死不能复生；这种没有多少事实或历史依据的估计，只能说是一种思想，这也无所谓悲观或乐观。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①]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① 本篇抄件注“三月廿八日”。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之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

被压迫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那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

但是这一斗争若限制在民族斗争的范围以内，其前途如何呢？

第一，自国内言之，活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对于民族落后性，不但不能减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因此向后转且不论，单就经济而言，在持久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封锁及通货膨胀，因为没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组织又薄弱，很容易为贪官、奸商和地主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财之千载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以饥寒困苦，你若主张用不很和平的手段去掉这种现象，便有人大喊：这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破坏了一致对外的民族阵线；并且实际也真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然而这种现象不去掉，正是民族解放战争的致命伤，而又不是宣传劝告或政府一纸禁令所能去掉的，这便怎样办？

第二，自国际言之，各派帝国主义相互争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场极端尖锐化的今天，甘地认为一民族不能依赖强国的帮助而得到自由，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没有别的强国帮助，也不能脱离眼前的强国之压迫；并且有些强国不管你依赖不依赖它会强来帮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于是尼赫鲁没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张拒绝美国之帮助，美国势力如进了印度，我们知道它对于殖民地的态度，

不但好过德意日，并且好过英国，菲律宾便是榜样；然而菲律宾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这理由当然十分正当）排去英国势力，另换一个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鲁无论如何强调宣言印度受外人压迫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们内心也未必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真能够赶走英国，同时又击退日本和德国；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继续执行不合作运动而已。这又怎样办？

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对于我这一见解，或者有人提出两种驳论：一是说，落后民族如何谈得上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够和别国的劳动者及别的弱小民族结合在一起？一是说，社会主义是否包含民族解放问题？

提出第一种驳论的人，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章，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之开始。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即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相互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强压迫者之大结集，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

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提出第二种驳论的人，是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弄迷惑了，第二国际只企图在资本统制之下，从事改良运动，所以不曾计及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旅"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国外把帝俄时代对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了。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如果有人根据近来苏联对于中日战争及此次大战之初对于波兰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怀疑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社会主义了！假使俄国仍旧坚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她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这就是说，不应该和英美同样站在事外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她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拼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日本便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她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中俄

一直共同抗战到今天，日本便无力横行南洋，蹂躏菲律宾、马来、爪哇、缅甸，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当纳粹军队进攻波兰时，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栗，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这时英法比联军还未崩溃，希特勒并未曾认为能够在东西两战场同时得到胜利，孤立的波兰失败后，东战场没有问题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击溃英法比联军，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这一大群小国！

单就俄国前后立场不同其结果也不同这一串历史故事，已足够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了。

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她的全民族政策之后果如何呢？她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其结果俄德战争不开始于希特勒在欧洲孤立之时，而开始于希特勒击败了欧洲各国之后，俄国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协的代价之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若没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她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连中国共产党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击”的恶名；其结果，明天日本仍会协同希特勒夹攻俄国，陷俄国民族于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时将不能得到中国有力的声援，因为她已坐视中国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

〔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给 Y 的信[1]

Y 兄[2]：

返校后来示敬悉，××[3]带给你的江津日报，望寄给我，弟不愿送文章在该报登载，而×××已快走了。××已赴印度，前函已告兄，谅已收到了。兹送上一文(原编者按：即《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可以说是前三文(原编者按：即《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了。给二位老寡妇看后，可与×××一看，愿抄与否，由她们自便。需否抄一份给×××诸君看看，由兄决之。倘需抄一份给他们看，他们看后，可寄给×××。抄寄他人，可以不必，因请人抄写不易，寄去他们也不会了解和同意，第三文《再论世界大势》弟处已无抄稿，望将原稿掷下。此祝

健康

弟独秀启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

① 这封信与下篇《后记与信》的信，内容基本相同。这封信里的“×××”可能是何之瑜在编辑《最后论文和书信》时，将真姓名隐去的。现将两篇一并收入如后。

② 何之瑜，时在国立第九中学(设在江津)任历史教员。

③ ××，均系原有的。

《后记》与信

编者按：读者读完本篇文字后，便可知这一题目之由来。所谓《后记》是何之瑜将陈独秀的四篇文章《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编纂成册后所写的。封面上书“陈独秀遗著我的根本意见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抄”。因《后记》与《信》关系密切，故破例收入正文。本篇由沈寂供稿。

去年的“五四”几个学生要我带她们去看陈先生，当时我们没有谈什么，我回九中之后，就给他一封信，可惜我给他的信，都没有存稿（他的遗箧中，除有回音韵文字学的几封通信外，其他往来信札，都没有存稿），大约我所说的，是人们对他前面三篇文章的批判，和些根本问题的谈论，他不久回我一封短信，并寄给我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见上面）他的信上说：

瑜兄：

返校后，来示敬悉，仲纯带给你的江津日报望寄给我，弟不愿送文章在该报登载，而且罗宗文已快走了，兹送上一文，可以说是前三文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了，给二位老寡妇看后，可与邓卜许三生一看，愿抄与否，由她们自便，需否抄一份给光、李、方、邓诸君看看，由兄决之，倘需抄一份给他们看，他们看后可寄桂基鸿，抄寄他人，可以不必，因请人抄写不易，寄去他们亦不会了解和同意，第三文（再论世界大势）弟处已无抄稿，望将原稿〔掷〕下，此祝健康。

弟独秀手启

五月十三日

这封信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是五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多钟送到的，那么这封信当然是十三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写的，文章在此时完成的，先生就在这一天的黄昏时候得病，到二十七日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夜记于九中